

## 目 录

- 1、武清人创始的唐山万里香烧鸡
- 2、武清人创办的唐山第一家照相馆“鸿璋照相馆”
- 3、武清人开天津近代针织工业先河
- 4、武清人始创秦皇岛西餐店——宝星饭店
- 5、武清人创建“狗不理”
- 6、“崩豆张”创始人——张德才
- 7、“内联升”鞋店创始人——赵廷
- 8、津门药业膏胶露酒专家——吴秀岩
- 9、民国年间传奇的皮鞋油销售商——王树常
- 10、开天津地毯业先河的武清人——李秉彝
- 11、“万全堂”茯苓糕干与武清杜氏
- 12、耿日初创始永安茶庄
- 13、济南第一家搪瓷厂创始人杨子衡
- 14、“刘海风葫芦”创始人屈文台
- 15、武清人创立的评剧早期班社——山霞社
- 16、从武清走出的王致和臭豆腐
- 17、武清人创建的天成斋
- 18、吴趼人笔下的武清风情
- 19、冯梦龙笔下的武清爱情故事
- 20、沙河刘的蝓蝓葫芦
- 21、《义贞记传奇》记述的武清爱情故事
- 22、明朝发生在武清的“梁祝”故事
- 23、《施公案》与武清小车会
- 24、《醉茶志怪》中的那些武清记录
- 25、《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的武清故事
- 26、清末武清奇案
- 27、《华勇营出军志》记述的河西务
- 28、《永庆升平》中的武清故事
- 29、《蜨阶外史》记述的武清故事
- 30、俄国人笔下的运河风情
- 31、《荷使初访中国记》与武清河西务
- 32、清文人笔下的武清故事
- 33、《施公案》与杨村
- 34、黄遵宪笔下的武清
- 35、《孽海花》与武清河西务
- 36、张同书四游三角淀
- 37、英国人眼中的武清段北运河
- 38、描述武清的竹枝词
- 39、日本人笔下的武清
- 40、汪由敦的途径武清冰床诗
- 41、诗中的杨村和杨村驿

- 42、红学家笔下的高五姑
- 43、武清陨石三百年下落不明
- 44、崔黄口的“九桥十八庙”
- 45、河西务的“九窖十八缸”
- 46、周家务的宫廷音乐会
- 47、武清有过海市蜃楼
- 48、京山铁路为啥在武清绕了个弯儿
- 49、途经武清的萧太后运粮河
- 50、十三陵地下玄宫中的武清白城砖
- 51、象生花高手出武清
- 52、武清城关的惠泉亭
- 53、流行于武清的北板马头调
- 54、刘邦在武清兴建泉州古城
- 55、武清鲜于璜墓摭谈
- 56、东汉鲜于璜墓碑发现始末
- 57、武清“元宝”寻踪
- 58、潞水漕影
- 59、北运河沿岸之战
- 60、亲手击毙柳小五的匡克维
- 61、霍元甲与李瑞东比武的真实过程
- 62、程派高式八卦掌源自武清
- 63、曹雪芹与武清的渊源
- 64、明代北京上方山的两位武清籍名僧
- 65、清康熙年间著名高僧溟波
- 66、亦僧亦商的武清人
- 67、北京妙峰山王三奶奶殿
- 68、天津最早的天主教堂在武清
- 69、刘髯公与末代皇帝
- 70、刘髯公义葬周铁珊
- 71、马三元打杨村（鼓词）
- 72、柏林奥运赛场上的武清人
- 73、王庆坨曹氏家族故事
- 74、杜建时前夫人是“中共地下党”吗？
- 75、国内研究灵岩石的第一部专著
- 76、运河枪声
- 77、1950年国庆节“阴谋爆炸纵火案”中的武清人
- 78、高聘卿和他灌制的唱片
- 79、天安门国徽的制作者是武清人
- 80、第一届春晚是武清人主持的
- 81、曹试甘与西部歌王王洛宾
- 82、抗日英雄王氏姐妹
- 83、从北大走出的两位武清籍大师
- 84、“私遗不入家”的田豫
- 85、“茅屋知县”祖应世

- 86、许铤上书开“海禁”
- 87、闭关三疏的李钦
- 88、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丁昌平
- 89、为民请命的陈池养
- 90、武清的皇帝行宫
- 91、武清名僧黄和尚
- 92、天津小洋楼里的武清人
- 93、天津广武学会里的武清人
- 94、赵佩茹在杨村吃忆苦饭
- 95、新风霞与武清名伶的交往
- 96、书画家赵元礼原籍为武清辩考
- 97、旧天津窑主——李万有
- 98、一庙压三县
- 99、义和团在武清抗击八国联军纪实
- 100、华北地区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桥——杨村双龙桥
- 101、天津地区最早的正式汽车公路
- 102、天津地区最早的减河
- 103、间隔最长的集市——一年一集的古镇太子务
- 104、天津最早开凿的运河
- 105、解放后天津刊行的第一部姓氏资料
- 106、武清李善人义修灤县东门桥
- 107、康熙题诗警示地方官
- 108、乾隆武清题诗补遗
- 109、柳林行宫探源
- 110、“雍阳”称谓探究

后记

**康熙题诗警示地方官**

**乾隆武清题诗补遗**

## 华北地区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桥——杨村双龙桥

民国十年（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在修建了京津之间第一条正规的公路——京津汽车路（也称京津大道）之后，为了跨越北运河，使全线贯通，于同年在杨村开工建造公路大桥。该桥位于河西务与汉沟之间，曾一度定名为西汉桥，此为华北地区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

该桥紧傍杨村镇北边，横跨北运河，桥位部分的河床水深3至5米，冬季枯水期河宽35米，夏季洪水期河宽50米。筹建时，北京政府拨款6.5万墨银，由杨村镇担任村正（即村长）的乡绅陆稚秋主持，聘请了比利时人为主办工程师，这个比利时人携带者中国籍的妻子和读小学的儿子住在陆稚秋家的后院达半年之久。全部工程承包给天津的一家营造厂，营造厂还在当地招雇了一些瓦木工匠。9月开工，翌年3月竣工。

该桥下部结构是两排一组的钢筋混凝土桩柱，共两组，3孔，每孔跨径20米，桥身全长60米，桥下净高6米。上部采用下承式系杆拱结构形式，简支梁桥面板，全宽9.7米，其中车行道5.5米两旁各设人行道2.1米。在人行道外侧装有混凝土立柱横穿铁管的栏杆。在车行道两侧与人行道之间，各有3组半圆形的钢筋混凝土拱圈，由桥面至拱顶高3米，由拱圈联结系杆以牵引桥面，减缓桥面下边大梁的压力，活载达5吨以上。由于大桥拱圈在桥面以上，每侧又成为3个半圆的弧形，所以当地群众都叫它“罗锅桥”。

桥建成以后，立即在桥西设立了护桥房设路警护理，收缴“过桥捐”。当时，一辆大车收铜元4枚，一头骡马收铜元2枚，一头驴牛收铜元1枚，行人过桥不收费。

据说杨村的“地脉风水”好，所以历代出了一些大官。村正陆稚秋哥哥就是清代进士出身的道台。杨村大桥建成后，本镇乡绅富户认为这种结构形式酷似两条无头无尾的困龙，破坏了本村“风水”。故此商定了解决办法，由本镇义兴楼金银首饰店东家阎赞臣操办，由各大户捐资，瓦匠徐宝贤包工，雇工匠在桥的两侧拱圈上各加饰了一个龙头一个龙尾，面向北京，右侧龙头朝南，左侧龙头朝北。连接两组各3个起伏的拱圈，形似活生生的两条巨龙，从此，人们始称此桥为双龙桥。

该桥建造坚固，历经军阀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仍然畅通无阻，大桥建成后不久，全国性的专业刊物《道路月刊》曾经评论这座大桥为“全国汽车路桥梁之冠”。

## 天津地区最早的正式汽车公路

天津地区最早按西方标准修建通行汽车的正式公路，是 1920 年前后修建的京津大道，后称京津汽车路，也即今天的京津公路。

原在清代及其以前，从津赴京，一是出北大关（卫城北门），过正北营门（也称拱辰门，即清代曾格林沁修筑的外壕墙营门），过子牙河、大清河，经西沽、杨村至京，也称西沽叠道；一是出北大关，过翊运门（也称堤上门），经窑洼、西堤头、杨村至京；再就是出卫城东门，过建魁门（也称锦衣门）新开河，京宜兴埠至京。其中，第一条路为正道。在出了天津市区以后，去北京尚有 3 条路可行：一是经汉沟镇、杨村、南蔡村、河西务、灤县、通州，进朝阳门到北京，此为东道；二是在南蔡村斜向西北，经旧武清县城（今城关镇）、桐柏镇、采育镇，进建国门到北京，此为中道；三是过了汉沟镇斜向西，经旧安次县城、韩村镇、礼贤镇、黄村，进永定门而到北京，此为西道。此次第一次修筑正式的公路，因北运河堤路基高，线路行程短，并远离早期建成的京津铁路，故选取了东道。

民国六年（1917 年），适值河北等地水灾。段祺瑞北京政府用美国红十字会救灾款 10 万元墨银（墨西哥银元），北京政府又出资 15 万元墨银，决定以工代赈修建京津大道。指定救灾督办熊希龄主办，委任金玠伯为京津大道督办，聘请马君为总工程师，还聘请了外国人为顾问。同年秋，开始对由北京经通州至天津全长 132 公里的路线进行了详细的测量；从河北省、河南省等受灾地区招募灾民 3000 余人，组成施工队伍，11 月开始分北京、通州两处施工。后因经费不足，只修了北京至通州的一段，将残存的清代铺筑“御路”的块石撤去，加宽并填高了路堤，铺筑了泥结碎石路面。

工程中辍，难孚众望，各界纷纷要求把全线修通，特别是当时新兴起的汽车运输行业呼声更高。于是在 1920 年 6 月由民间商家向北京政府借款 25 万银元，美国红十字会也予以赞助，天津警察厅也参与汉沟至天津市区一段的赞助，才把路由通州修到天津，与市区相接。该路路基宽 6 至 8 米，有的路段利用北运河堤，无堤路段填筑路基高半米至 1 米。修筑了路拱、边沟，没有铺筑路面。沿途还修建了 4 座小桥，此后又修建了大型的杨村双龙桥，至此全线贯通。

这条路是天津地区第一条按一定技术标准修建的正式公路。当时《道路月刊》称：“吾国今日以道路运动始肇于京津大道”。

## 天津地区最早的减河

筐儿港减河开挖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是天津地区开挖最早的减河。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和三十八年(1699年),北运河在武清县筐儿港接连决口,漕运航道受阻。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皇帝亲临决口处视察,决定在决口处修建减水石坝,并开挖减河,河旁筑堤,直通天津东北的塌河淀。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员外郎牛纽受命建坝。减河挖成后,坝也建成,坝宽二十丈,杨村上下百余里河平堤固,康熙皇帝为此还特意亲笔书写“导流济运”碑文。到雍正六年(1728年)经怡贤亲王允祥申奏,筐儿港减河石坝拓宽至六十丈。此后筐儿港减河曾多次维修、疏浚,在分泄北运河洪水,保证漕运畅通方面起过很大作用。

筐儿港减河最初的路线是自滚水坝东南流至杨家河附近,注入麦子淀(今已淤废)汇入塌河淀,塌河淀水可由贾家沽道(今月牙河)泄入海河,亦可向东入七里海由北塘泄入渤海。至同治年间(1862年至1874年)筐儿港引河下游淤涸,遂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命周馥主持重开一条新河,由朱家码头折向东北,再转向东南至宁河县造甲城附近入七里海。周馥在实地勘察时有一少年向他建议把新河道开挖成两条并行河道,“中留平地半里,而以挑南河之土筑南堤,以挑北河之土筑北堤。小水可走两河槽,大水则中间半里河滩足矣,水退我尚可种摊地,此上策也。”当时随行人员对这一少年的话均不以为然,而周馥却采纳了少年的建议,开挖了这段河道。这与现代设计的排洪河道完全一样,可见当时的河工技术水平是很高的。

筐儿港减河的石坝在上世纪30年代被改造成一座八孔闸,至1960年又被改造成一座十一孔闸。至今,在闸的前后还可找到当年滚水坝的基础木桩和条石,后开挖北京排污河,其河道与原筐儿港的走向已大不相同。然这座闸却坐落于北京排污河上,仍是筐儿港枢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汛期可提闸泄洪。

## 间隔最长的集市——一年一集的古镇太子务

武清区泗村店镇太子务村每年腊月二十五为集日，一年中仅此一个集日，历代不衰，被传为佳话。

太子务村始建于辽代，为辽运粮河榷税之所。运河故渎尚存，名“西河沟”。因元朝太子曾在这里造船，故名太子府，简称太府，又称太子务。村西南隅旧有宫殿，为皇太后看望太子所居，故名“凤凰台”。解放初仍台高数丈，云水苍茫，青苔叠翠。志载：“常有游人裹粮往访。”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翰林院修编、邑人孙清来此游春，触景生情，在“凤台春晓”一诗中吟道：“邑南斗舍古遗台，闻道当年有凤来。仰止若山临梵宇，高登为阜近僧斋。城边芳草随时长，路侧幽花触景开。劳筑不知谁创始，一游一豫一抒怀。”凤凰台被誉为武清古六景之一，亦为“太子务三宗宝”中之一宝。太子务“三宗宝”为“三盘井、凤凰台、大寺有棵龙爪槐。”大寺即“龙泉寺”。这个村除古寺龙泉外，还有两座关帝庙，一座周仓庙，以及菩萨庙、药王庙、娘娘庙、土地庙、旗纛庙、马神庙、龙王庙等。每年正月初八为“龙泉寺庙会”，四月十八为“娘娘庙会”。自明朝洪武初年迁县治于元卫帅府镇府衙（今城关镇）后，由于太子务位于县治正南15华里，曾为漕运要道，连接京师的驿路也在这里通过，一时商贾云集，成为繁华小镇。每旬逢五排十为集日，远近乡民来此交易，被誉为“京南第一镇”。后因水患而集废，唯每年腊月二十五日年集沿袭至今。是日，方圆数十里村民身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来此赶年集。俗称“乱肉市”。旧时街道两旁肉架子长一里余，各种年货应有尽有，交易人数以万计。这个集日从古至今经年未断。时有“二十五，赶太府”之说，并有一句地方歇后语：“太子务集——一年一个。”两个集日中间相隔时间为一周年，实为全国之最。

## 天津最早开凿的运河

天津开凿最早的运河是“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和泉州渠是曹操为了北上攻打乌桓（今辽东一带）便利军运而于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开凿的。

东汉末年，豪强割据，曹操为了统一北方，北征袁绍。袁绍溃败后，残部投奔东北部的乌桓。曹操为彻底消灭割据势力，决定北上征讨乌桓。于是以幽州为其根据地，集结军事力量。当时古北口防守严密，曹操欲从渤海出辽西至塞外，这就必须将军资粮饷运至幽州东部的泉州（今武清）、无终（今蓟县）一线，为了漕运，于是开凿了几条人工运河。

平虏渠是沟通滹沱河和泃水的人工运河，它将滹沱水南支引入泃水，相当于现在的南运河从青县到静海独流一段。这样，原来分别入海的漳水、滹沱水、泃水便连成一气。

泉州渠是沟通洵河和沽水的另一条人工河。洵水发源于蓟县北部，南流入鲍丘水（今潮河）。潞水，即今白河，当时上游曰沽水，中段名潞水。下游曰笏沟（今北运河），东南流入清河。泉州渠的南端在泉州县（今武清区东）内的清河与沽水汇合处东侧，北端位于洵河与鲍丘水（其上游相当现在的潮白河）汇合口的偏东处。泉州渠开凿后，鲍丘水的一部分即由该渠流入清河（今海河），当时武清称泉州，此段运河因经其境而称泉州渠。后来，曹操又自洵河口向东开渠，入濡水（今滦河），名曰新河。

通过上述三条人工河道（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加上原来开凿的白沟渠，河北诸水整个相互沟通起来。原来分别入海的河北各条河流都与泃水相通，这才初步形成了海河水系。而诸水汇流的地方，自然形成了水运码头，这就是天津的三岔河口。由于运河的开通，江淮物资可沿颍水、蕞荡渠往西北入黄河，经枋头沿白河北上，经漳水，入滹沱，由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与濡水相连，西部可通过鲍丘水、潞水等运达幽州及其以北地区。天津地区对幽州的辅助作用更益显示出来。曹操开凿运河的工程，对天津形成为北方的水运枢纽起了促进的作用。

## 解放后天津刊行的第一部姓氏资料

解放后天津刊行的第一部姓氏资料是《武清姓氏》一书。

《武清姓氏》一书分为“姓氏百家”、“姓氏分布”和“姓氏琐记”3个部分，有当时武清县地方史志编辑室对全县姓氏、户数、人口及人口分布进行普查后，于1987年底整理、核实、编纂而成。该书收入武清县1987年12月时的姓氏，639个，成为解放后天津刊行的一本比较科学、完整的姓氏资料。

形式构成多种多样，而且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祥地。姓氏在历史上曾起到“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的作用。在今天，姓氏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的现象，作为人的一种识别标记，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解放，在姓氏上也体现了男女平等。子女有选择父姓或母姓的自由，也体现了姓氏的时代特征。

根据《武清姓氏》的统计，武清县现有639个姓。其中，复姓5个；拥有万人以上的姓13个，即王、张、李、刘、杨、赵、陈、孙、高、马、周、韩、曹；人数最多的为王姓，计76827，占全县人口的10.37%；人数最少的姓只有1人；只有1人的姓有129个。

《武清姓氏》的刊行，为研究武清社会、地理、人口、风俗等，提供了详实的、可贵的资料。

## 武清李善人义修灤县东门桥

灤县作为县治，一直隶属通州，地处古延芳淀附近，东临运河，多河富水，地势低洼，尤其夏季雨水成洪，断摆阻路，交通十分不便，行人不想被困，只能冒险过河。

灤县古为镇，后升为县，元朝再升为州，明降为县，清降为镇，民国再降为村，其兴衰历史皆与河水有关，明朝正德初年(1506)始筑土城。嘉靖二十二年(1543)扩建，始有四门，但很低矮。东门外灤河分流支汊(即港沟河)历来无桥可通，来往行人只能靠小船摆渡过河，每逢大雨洪水，船翻人亡的事经常发生。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清县王善人在北京做厨工，攒了些钱。一次从此上船渡河回乡，船在河心被水浪掀翻，同船之人死于洪水急流之中，他则幸免于难，被人救起，也有人说是河神保佑了他。从此以后他发誓建桥，尽其所有也不够，便多方募捐集资，终建石桥一座，称灤县东门桥，行人称便。

桥今仍在，东西向，全长四十四米，宽七米，为平面石桥，用花岗岩石细磨精筑。桥面顺铺条石，规整而有序，两侧原有石栏，方头望柱，栏板素面光洁。十三间方孔，高三米而略有余，没有分水石和镇水兽之类东西，长方石块所砌雁翅，一陡三伏，今桥面尚可通行。

此桥有段传说：修此桥人是个瞎子，不知什么原因，据说为赎前世之罪，自幼发愿，修桥铺路，多做善事，选中灤县东门河边这块地方以后，尽其大半生乞讨募化，颇有点武训精神。最后感动上天，金石为开，终成大愿，后来修成正果，做了桥神。传说虽然荒诞，但却寄托了人们对修桥人的感念和祝愿。

一九五八年，桥北大片洼地辟为水库，桥洞用砖砌堵。文革时桥栏被毁拆用。后来桥北新路调直，成为柏油路，此桥停用至今。一九八五年九月，定为通县文物保护单位，并立文物保护标志。

(李汉东)

## 康熙题诗警示地方官

据史书记载，康熙曾驻蹕和途经武清十七次，在县城、杨村、王庆坨、标垆、东柏村、许家庄、栾城村、崔黄口、筐儿港、东马房都曾驻蹕，留下了不少诗篇，其中一首《看运河建坝处》诗云：

十月风霜幸潞河，隔林疏叶尽寒柯。  
岸边土薄难容水，堤外沙沉易涨波。  
春未浅夫忙用力，秋深霖雨失时禾。  
往来踟蹰临渊叹，何惜分流建坝多。

此诗描写民工在北运河修建防水坝的情景，浅夫也叫“应船”，是京津一带运河附近居民，出河工可以免征钱粮的农户。

据《津门诗抄补遗》载，康熙皇帝还曾在武清写下《春日郊行示地方官六首》，主要内容是借春游警示地方官员，这些诗未曾收录在武清历史典籍中，现增补如下：

其一

警蹕幸畿南，中和慰闾里。  
千村静路尘，淑气遍远迤。

这是说皇帝出京南下，虽然戒备森严，但是皇帝还是要亲民，中和、淑气都是平和对待百姓，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其二

每春来此地，黎庶皆安康。  
尚德先宽政，官僚免直方。

此诗可以看出康熙时期政策比较宽厚，注重德政，而少用酷刑。

其三

春蒐省耕种，莫误农桑时。  
假寐羹墙睹，殷勤意在兹。

此诗的春蒐是告诫人们春天可以去打猎，但不要耽误春耕，羹墙睹是个典故，讲的是古代舜对尧的仰慕。

其四

牧民寄所重，授钺赖宣风。  
曩昔官箴在，开诚上下同。

这首诗是说皇帝要对民众进行宣教，也要听取官员们对帝王的箴言。

其五

平成多历年，生齿既蕃庶。  
惟食在天时，轻徭民自豫。

此诗描述的是国家安定的太平景象，仍是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

其六

案读五经义，遐观四海图。  
缅怀洙泗州，期共乐天衢。

这首诗表达了用孔孟之道治国，以期普天同庆。洙泗州是指洙水、泗水，二水分别在曲阜南北，是孔子聚徒讲学之处，在这里表达了对孔子的缅怀，天衢是指帝京，引伸为帝王要与民同乐。

## 乾隆武清题诗补遗

据成书于 1991 年的《武清县志》“大事记”记载，清高宗弘历曾先后察河、道经武清六次，分别是：

第一次，乾隆十五年春，乾隆巡视王庆坨西南永定河南堤，作“过永定河”五言诗；

第二次，乾隆十八年二月，再次巡视永定河南堤，作“乘舟观永定河下口之作”五言古诗并跋，九月刻石树碑；

第三次，乾隆三十二年，巡视天津，周览河堤淀闸。由北运河过境书“导流还济运”碑文，立碑于筐儿港；

第四次，乾隆三十五年二月，阅视筐儿港，题五言诗“阅筐儿港工作”刻石立碑；

第五次，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南巡至宝稼营；

第六次，乾隆三十八年，阅视淀河、永定河下口堤，作“往阅永定河舆中作”五言诗。

乾隆帝三次到筐儿港视察水利工作，每次都留诗一首：其一《阅筐儿港减水坝作》作于乾隆三十二年（即 1767 年）。诗云：导流还济运，圣训久昭垂。夏备减涨用，春来断港时。酌中诚已善，筹外小资治。敢曰继绳愆，安民意厘斯。

其二《阅筐儿港工作》作于乾隆三十五年（即 1770 年）。诗云：减河制诚善，日久注为阡。前度命修筑，今来阅接成，港春流则断，涨夏杀其盈。原始宣防意，本因一策营。

这首诗道出了北运河遇夏秋盛涨时节，筐儿港两减河分洩由塌河淀七里海入海，旧时坝身出水处高于河七尺，以致减水跌落成坑，今谕方观承接筑十五丈，使堤坡渐下以导其下。

其三为乾隆三十八年（即 1773 年）乾隆帝阅视永定河等处河务途经筐儿港又留下了一首加注的五言诗。诗云：北运殊南运，中泓沙底翻。赖斯方贮水，以彼少来源。夏潦复虞盛，涨彼此洩屯。功成亏一策，深意视名存。

此诗是说，北运河底多软沙，筐儿港迤北有数处尤苦，停蓄必致一洩无余，是以前年遇此，有人知浅之害，未知浅之善及一弊一利的道理。以上三首诗都刻在“导流还济运”碑上。

近读本市史学家张显明先生的《津门诗抄补遗》，发现乾隆皇帝驾临武清仍有不少诗篇，现摘录如下：

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年，乾隆来津时乘龙舟走南北运河，途经武清时，在船上写了三首诗：

### 一．过武清县作

驱车过雍奴，广甸甚沮如。去岁夏行潦，此地被灾遽。永定既决堤，北运亦漫淤。大田普无收，曷以卒岁度。是用赈济施，更敕勤宣布。今来细体查，老幼欢夹路。庶几免流离，未见仍廛虑。秋麦亦已茁，禾黍云种布。设以此地论，惧雨宜晴煦。虽然彼高田，宁无望雨处。

辛卯仲春月上浣，御笔。

注：雍奴为武清古名。这首诗是说去年由于永定河北岸决堤，北运河西岸溢水，使武清许多村庄受灾，由于去年赈灾工作搞的好，今年春天又降旨加赈，龙船行到武清看到民无菜色而老幼夹路欢呼。

## 二．月一首

仲月逮上弦，川夕湊澄景。舟舫潏漾间，人疑广寒境。闪波断却连，晶光峭犹冷。御园岂不泛，无过湖山等。片时即归棹，清夜那伴永。唵唵宛相亲，朗朗斯益静。眠迟亦何妨，恰合宵衣省。

辛卯仲春月上浣，御笔。

## 三．即事一首

筐儿港迤北，流沙数处浅。春月水致艰，大舟滞动转。故用就深处，避浅三程展。人知浅之害，未知浅之善。是河无闸坝，流沙为之限。设非此停蓄，一往水存鲜。通漕赖乎兹，一弊一利显。

辛卯仲春月上浣，御笔。

以上三首均为乾隆三十六年自京赴津途经武清时的船上之作。

## 四 武清县行馆作

潞水上源春令浅，御舟体大送浮难。酌中因致为行馆，信宿缘图奉大安。固不可同诚不说，於斯颇觉憩斯宽。有亭有阁则何必，率为慊然鲜为欢。

辛卯仲春月上浣，御笔。本诗写于乾隆三十六年

按：武清原无皇帝驻跸之处，这次因有皇太后需上岸安憩，将拆天津杨惠庄行宫的旧材，移到武清县的桐柏村建成武清行馆。

## 五．至宝稼营登安福舫作

避浅因教陆路遵，就深御艇侯河滨。水营制斥过于昔，宝稼名欣祝自春。木榻筠窗意以惯，云容波态景从新。万民安实一人福，敢傲一人劳万民。

辛卯仲春月上浣，御笔。本诗写于乾隆三十六年

按：宝稼营明代叫包家营，后因乾隆的龙舟安福舫停于此处，岸上设水营护驾，改名为保驾营，又演变为宝稼营。水营是临时用苇席搭的帐篷。这首诗是乾隆看到水营的苇席外面又蒙上了黄布，还添设了几楹板房，他认为主办者没向他请示就自做主张，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把主办者找来申斥一顿，让立即撤去，以免被下一站效仿，其实当时是康乾盛世国家富强，而乾隆还是要求下属节俭。这就是民间盛传的乾隆降旨禁铺张一事，以上诗篇对于丰富武清运河历史资料弥足珍贵。

(李汉东)

## 109瞿佑赋诗武清

瞿佑(1347-1433),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有诗名,14岁时即席赋诗,就深得著名诗人杨维桢的赏识,被誉之为瞿家的“千里驹也”。现存诗集、词集各三部,计数百首。即使在其享誉盛名的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中,在写闺情艳遇的鬼神故事时,也夹杂了大量的诗词韵语,以逞诗才,从而开了明代诗文小说的先河。

读《津门诗钞》,知道瞿佑写过天津诗,但对这位元末明初的著名作家与天津的因缘却不甚了然。最近读到《瞿佑全集校注》,才了解其来龙去脉。

瞿佑生活在动荡时代,饱尝战乱之苦,仕途又历经坎坷。但此老能随遇而安,率性而为,所以活到了86岁高龄,这在古代文人中是不多见的。永乐初,他任藩王朱木肃的幕僚,因“辅导失职”而入狱六年。出狱后又放逐保安(今河北涿鹿)十年,回京时已是79岁老翁,又历经三年才告老还乡。他于1428年9月11日自通县启程,沿开通不久的大运河南下,10月15日到达南京。此时的瞿佑如释重负,终于可以自由地打发属于自己的时日了。他饱览着运河两岸的旖旎风光,咀嚼着漫漫人生的酸甜苦辣,即景生情,诗兴大发,短短月余,竟写了八十首诗。

按照行程方向,在如今的天津界内,从河西务到静海县共写了九首诗,除了两首回忆诗外,其余七首是写风景与风俗的,这七首诗中又有两首是描写武清的。在《次河西务》一诗中,有“昔年征税地,今日往来程。缥缈瞻帆影,咿哑听橹声。买薪供爨事,沽酒慰离情。夹岸人烟集,时闻笑语迎”的描写。河西务地处武清北部,北运河西侧,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从元代便成了漕运中心,也是大都周边最大的仓储基地,瞿佑记下了那舟航辐辏,商民攒聚的盛况。下面的《过杨村》一诗细致地描绘了这个运河重镇的富庶与繁盛:“鹅鸭浴澄波,羔豚牧远坡。小桥通大市,官舰贩私醪。接屋千屯富,炊烟万灶多。同舟有南客,劝我一吟哦。”这是一首早期描写杨村的宝贵诗篇。诗后的“自注”中也说“自通州来,此地最富庶”,人烟稠密,禽畜成群,商旅肩摩毂击,络绎不绝,真的是一幅绝好的运河人家图。

总之,瞿佑写的这两首武清诗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它不仅丰富了北运河文化,也丰富了武清的历史文化。

## 开天津地毯业先河的武清人——李秉彝

天津地毯工业源远流长。早在清朝初年，天津就开办了地毯厂，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势，成为东方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天津地毯花色瑰丽，加之质地坚韧，绒面柔滑光亮，享有世界名牌工艺品盛誉。早在1893年，天津地毯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即获得金质奖章；1903年，又在美国圣路易斯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天津地毯成为中国近现代出口地毯的发祥地，名扬海内外。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公贵族四散奔逃，外国大兵肆意掠夺宫廷艺术精品，包括皇室地毯。他们将地毯抢到欧洲，引发了上流社会追求中国皇室地毯的热潮。从此，越来越多的欧美人士见识了中国地毯，喜欢上了这种地毯。他们喜爱地毯上精美的图案，更佩服中国人这种精细的手工技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到20世纪20年代之初，天津商埠很发达，很多外国人将从北京及中国西北买来的旧地毯，集中在天津装船出口，再运送到西欧等国。为了节省转运的费用，一些外国人考虑复制这些地毯，认为在天津开店设厂可以扩大货源，还可以减少中途运费。于是，小的私人地毯作坊便在天津诞生了。与此同时，这些小作坊还邀请北京的艺人来天津教授制作工艺，并临摹了从西北民间地毯中借鉴的吉祥图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天津的地毯工厂有300多户，大部分是外商所办。“美古绅”是外商在天津开设较大的地毯厂，拥有2000多名工人，还有很多小厂为它加工。其中中华人在津办厂最早，规模最大的要算天津“玉盛永”地毯厂，创办人是李秉彝。李秉彝，字玉德，1884年出生于武清县城关镇。其父李春林，母侯氏，家道小康。1897年，李秉彝赴北京“继长永”地毯厂（是其崔黄口大宫城舅舅继长永于光绪二十年所开）学徒三年后，于庚子年（1900年）返津，与其表舅郑福明和李君有等三人，在德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英中街开设了“三盛永”地毯局，后因意见不合而散伙。李秉彝由其父变卖家产，独自开设了“玉盛永”地毯厂，并聘请北京的师兄来津帮助发展业务，协力同心，日渐发达。最后，得到了德侨商人李大氏（译音）的支持，这位德侨商人将英租界达文波路（今建设路）瑞记洋行的三层大楼交由“玉盛永”承做该行的全部业务。与此同时，李秉彝还介绍这位德侨商人去北京旅游，并为其代购古玩等，数年之间，获利颇丰。后因德侨商人奉命回国，为了扩大业务，李秉彝又于1917年自购李善人花园（今人民公园）对面的10亩土地，全部用于建立新厂房，购置了弹花机和木制机具百余台，并增设了女工纺线部自行染线。此时，职工达600余人，扩大了生产经营的规模。李秉彝成了天津华商地毯行业的领军人物。此时的崔黄口、城关已建立地毯分厂几十家，从业两千多人。

## 柳林行宫探源

柳林和柳林行宫在元代以后是历朝帝王极为重要的一个活动场所。在 1999 年成书的武清县文史资料第八辑《御河文化史料》第 106 和 107 页分别以“元世祖忽必烈在武清建柳林行宫”、“元顺帝驾幸泉州城”两篇文章，记述了柳林行宫建设的时间、帝王巡幸时间以及行宫壮观景象。后来，很多报刊也相继撰文，提及柳林行宫就是现在城关的柳林屯云云。

查《元史》，其中涉及到柳林和柳林行宫的相关记载多达 40 多处，是元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年代久远，柳林及柳林行宫遗迹已荡然无存。《日下旧闻考》在“通县”一节记载柳林行宫条下说：“柳林在县西，元时行宫无考”。

南开大学李治安《关于元大都城郊的柳林行宫春猎》一文，对柳林春猎的地理方位进行了考订，探讨了元朝诸帝春猎的盛况，结合《马可波罗游记》相关记载做了笺证，并分析了春猎的多寡及其文化背景。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陈喜波、国家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张清华的《北京通州区牛堡屯村为元代柳林行宫说》一文，从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猎习俗与柳林行宫的建立、捺钵制度与辽金元时期帝王行宫之名称、北京通州区牛堡屯村为元柳林行宫所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引证。

蒙古灭金宋以后，统一天下，建都于大都（今北京）。作为北方游猎民族，蒙古贵族也有同契丹人一样的游猎习俗。同样，蒙古人也看中了通州南部湖泽广布的自然条件，并定为游猎之所。时过境迁，辽代烟波浩渺的延芳淀水域到元代已经离析为几个较大的湖泊，分别叫做南辛庄飞放泊、栲栳堡飞放泊、马家庄飞放泊和柳林海子等。此处所谓的飞放泊，乃是元朝帝王打猎之地，《元史》记载：“冬春之交，天子或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今通州张家湾南部的牛堡屯一带就位于柳林海子附近，是元代帝王的一处重要游猎之地。根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的记载，“柳林，在县西。元至元十八年，如州，又如柳林。是后，皆以柳林为游畋之地，建行宫于此”。由此可知，柳林行宫当建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 年）。因柳林地区为春捺钵（元朝对帝王行宫的称谓）之地，元代历朝帝王多次巡幸州，畋猎柳林并驻蹕于柳林行宫，其中元顺帝于至正三年春猎于柳林，驻蹕柳林行宫时间长达一月有余。元代，柳林行宫一直是元朝帝王重要的活动地点之一，直至元朝末年。柳林行宫很可能毁于元末的战争中，《元史》记载至正十八年三月，“毛贵犯州，至枣林，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遂略柳林，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刺不花以兵击败之，贵走据济南”，很可能柳林行宫毁于这场战火，此后柳林行宫不再见诸于典籍记载。由此可见，柳林行宫大致在今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的南部一带。

另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柳林，在县西。元至元十八年，如朔州，又如柳林。是后，皆以柳林为游畋之地，建行宫于此”。柳林行宫建在州之西，而牛堡屯恰恰在大小北关、前后南关之间的元朔州故城（辽金阴城）之西，与古籍记载十分吻合。

按照传统的做法，帝王巡幸，史书及地方志书是有记载的。就地方志书本邑可查的乾隆七年、光绪七年的县志对于帝王驻蹕这样的“荣耀”是都只字未提，恐怕让人不得不怀疑武清柳林行宫的存在了。

（李汉东）

## “雍阳”称谓探究

在武清的旧称谓中，还有“雍阳”一说。这一说法泛传极广，由来已久，但迄今尚无文字根据。武清古称雍奴早已见诸史载，毋庸置疑。据元朝至元五年（1339）在武清县重修天齐庙时所立的“东岳行宫之碑”记载：“自东汉封寇恂侯于此，昔号之曰雍阳，为中都畿县，至唐更名曰武清……”（见光绪七年《武清县志》）。这是武清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出现的雍阳称呼。

明朝万历年间，武清知县陶允光在《新建文学泮池聚奎楼记》碑文中称：“雍阳北拱神京，南襟沧涓……”；清康熙年间进士赵珣在《祖公生祠碑铭》中有“侯再领雍阳”、“雍阳丸土”等句；清康熙四十年《武清县志》知县章增印“原序”载文：“雍阳为京东剧邑……”。乾隆七年《武清县志》载文，明朝的武清举人王斐，隐居潞水之傍，终身不仕。甘贫乐道，不事请谒。当道匾其庐曰“雍阳高士”；清代立于武清邱家庄南的《坦斋李公墓志铭》有“雍阳之族”称呼，以及近年来在天津北辰区汉沟、北仓出土的《王公墓志铭》、《冰崖赵公墓志铭》等文物中，皆有“雍阳之族”、“雍阳望族”等称谓。至于历代文人的诗章中，称武清为“雍阳”的就更多了。比如清代武清知县祖应世的《雍阳独坐》；清代张景载有“一片雍阳地……”的诗句；清人赵东旭的《秋日雍阳西郊》等。

查《说文解字》“雍”古同“壅”或“拥”，堵塞也，本意是“在外围加一圈”。《康熙字典》解释“雍”为四面有水。《中华大字典》解释“雍”为小河流形成的小溪。“阳”为山的南面，水的北面。

武清历史悠久，史载：“武清，古为泉州。汉泉州、雍奴二县之地。”泉州乃“历水泽八十里，取泉流即清”之意。而雍奴也是指水泽。《水经注》云：“雍奴，藪泽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澄而不流曰奴。故名。”显然，当时的武清是个“水乡泽国”。自元封五年（前106）改泉州为县，至北朝太平真君七年（446）废泉州县治入雍奴县治，泉州建置存在552年，与雍奴县并存，说“雍阳”是雍奴的别称，未免过于牵强，实属望文生义。说“东汉年间寇恂封为雍奴侯，雍阳的叫法就流传下来了，结论过早。因为《东岳行宫碑》明确记载“昔号之曰雍阳”，就是说在此之前，人们就已经称呼雍奴和泉州为雍阳了。

嘉靖二十二年（1544）霸州兵备副使杨大章始修城关城。三门各建城楼，东曰：翠环沧海，西曰秀拥太行，南曰：路近瀛洲。北无门，颜其额曰：封联蓟阙。隆庆三年六月至五年八月（1570—1572）巡抚都御史刘应节等相继将土城甃以砖。门各有楼，楼各有署：东曰：辽海扬威，西曰太行献秀，南曰：控引畿服，北曰：拱畿神京，独不启门。乾隆三十年（1766）领帑重修。三十一年竣工。设三门，东曰溯涧，西曰景岗，南曰定澄，三门各建城楼。北无门，建镇雍楼，并筑北极台于其上。

河西务旧无城，明隆庆六年（1572），巡抚都御史杨兆，总督军务兵部侍郎刘应节，霸州兵备副使吴兑、宋守约，始建砖城。楼四座。隍深八尺。四门：东曰寅宾，南曰阳明，西曰拱阙，北曰澄清。三角为三便门。”

从城关及河西务古城门阙来看，武清西接太行，北倚燕山，南极渤海，又有藪泽之说，整个区域处于华北平原“马蹄形”地带，背山面水，雅称雍阳，名符其实。

在谈及“雍阳”由来时，有学者曾撰文：“至于历代文人的诗章中，称武清为‘雍阳’的就更多了。比如清朝顺治皇帝的近臣张吾瑾在记述顺治皇帝巡幸武清时，写下了一首《御驾幸猎雍阳忝级二十四韵》诗，”经查乾隆七年《武清县

志》为“张吾瑾写下了一首《圣驾幸武清恭纪二十四韵》诗”。诗中并未提及“雍阳”二字，只不过是讹传讹所至。

又在网上查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下辖一个镇，叫雍阳镇。它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向广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呈高原丘陵盆地之势，南部为乌江支流雍江，水资源较为丰富。全镇流域面积 1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三条，呈背山面水之势，地形与武清基本相似。

窃以为，传统说法当属《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是首次阐明“阳”字的方位含义。故自古以来，凡地名带“阳”字者，一般均释为某水之北或某山之南，雍阳则因武清县前身泉州县、雍奴县位于渤海及雍奴薮（三角淀）之北，燕山以南，从而称为雍阳。而雍阳只是出现在艺文之中，非官方定置。形同人们把昆明称之为春城，应该是一个“雅号”，而非正式的什么“别称”。

但雍阳之称是在何时出现的呢？考之《穀梁传》成书于西汉，那时“山南水北”之说已约定俗成。雍奴立县于汉武帝在位中期，而雍奴水早已存在。据此推断，雍阳的雅号在西汉时代就可能存在了。

## “万全堂”糕干与武清杜氏

杨村糕干是天津颇具特色的民间小吃，它以易消化、健脾胃、松软可口而著称于世。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杨村万全堂茯苓糕干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就荣获三等“佳禾”铜质奖章。1956 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杨村参观，杨村糕干成了招待贵宾的佳品。亲王和夫人都盛赞杨村糕干好吃，周恩来总理连说：“不减当年，不减当年。”

杨村糕干出于杜氏，《杜氏家谱》始创于清嘉庆初年，同治初年续修，至 1943 年三修，今存三修本，一册，铅印本，是由十二世杜鸿年、杜涵等人纂修。

据谱载，杜氏原为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明永乐初迁江南大户充实畿辅，有杜金、杜银兄弟二人携眷北来武清，定居杨村北一里的北郑庄，至上世纪 40 年代，传至十四世。

初来北方的杨村杜氏，以耕读为业，生活并不富裕。灵活而聪明的杜家，面对运河上运粮不息的江南船工，开始以稻米、白糖为原料，做起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糕干，颇受欢迎，生意越做越大。到了清末，前店后厂的杨村杜家开设的糕干店有万全堂、万金堂、万胜堂、万源堂、万顺堂等数家。据传，康熙皇帝七次出巡，三住杨村，每次都要吃杨村糕干，并且说：“糕干松软可口，容易消化，经常食用不亚茯苓，有健脾养胃之功效”遂有“茯苓糕干”之美名，并且嘉谕贡品，获准特供江南优质稻米为原料。其中“万全堂糕干”最富盛名，传说是杜氏第三代杜馥创设的店铺生产的，然而《杜氏家谱》第三世仅录杜应魁一人，不见杜馥之名，所以它的确切创设时间和创始人尚是疑问。

杨村杜氏北迁后五百年间，家族中虽乏巨富显贵，但文物孝廉、文物庠生还是代有其人。至清末民初，家族极重人才培养，大学毕业生、留洋生不断。如十二世杜鸿春，交通大学毕业生，曾任北京、张家口、开封无线电台台长；杜鸿训，国学生，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存记；杜鸿年，北洋陆军学堂毕业生，官中央混成旅旅长，补授陆军中将。十三世杜建勋，清华大学肄业；杜建初，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铁路工程师；杜建维，北京大学医学院肄业；杜建业，辅仁大学肄业；杜建时，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堪萨斯州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后回国任中将参事、天津市市长之职，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可谓杜氏家族中出类拔萃者。

## 耿日初创始永安茶庄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河北大街西侧与石桥胡同交口处的永安茶庄，是享誉津门的五大老字号茶庄之一，门市为两层楼房，门面装修新颖，店内悬挂着现代爱国诗人、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所书匾额。

清末时，茶庄最初由徽州人吴隆泰、方鹤年、万明清合资经营，初名为吴隆泰茶庄。1924年，由于营业不佳，改由曾在天津德裕茶庄、水庄茶庄当学徒、店员的耿日初经营，并更名为永安茶庄。耿日初是当时天津茶商界的维新人物，擅长交际，在社会上有些名气。

耿日初（1891 - 1949）名吉迪，以字行，直隶（今天津）武清人。自任经理后，另在南市、西南角和北京设有分号。永安茶庄改租后资本不多，单凭耿日初本人的交际广泛和信用。1945年又南下自采，开拓业务，采取由批发赊欠进货，在店内零售的办法，获利很大。永安茶庄得与正兴德、泉祥、广裕、成兴并列为天津茶行五大户之一。位于北京的永安茶庄创建于1935年，因店主经营有方，又是茶叶的行家，素以茶香茗馨、色重味长、条缩紧结而驰名。永安茶庄所售自制拼配的茶叶馥郁芳香，独具特色。

耿日初接管茶庄后，善于利用宣传，扩大茶庄的名气。当时河北大街是通往郊区、武清、宝坻等地的交通要道，客商来往频繁。永安茶庄以斤秤大，茶的玉兰味浓，作为招揽客户的手段，生意日渐兴隆。

耿日初病故后，茶庄由其子耿绍同继续经营。解放后，永安茶庄响应国家号召，公私合营。耿绍同任茶叶公会主委，后任市工商联常委及红桥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公私合营后的永安茶庄成为红桥区糖果糕点公司的下属企业。

永安茶庄拥有大批老顾客，生意一直红火，在京津两地享有盛誉。后在文革期间曾更名为青春茶庄。1987年，茶庄经翻建整修在原址恢复老字号。1996年河北大街拓宽道路，永安茶庄拆迁，迁址后的地址为红桥区河北大街天桂里1号楼4门底商。现在，永安茶庄主要经营福建、安徽、浙江等地乌龙、龙井、毛尖、茉莉茗眉、红、绿、花茶等200多种茶叶，还有全国各地的茶中珍品，如庐山云雾茶、黄山毛峰茶、云南普洱茶、碧螺春茶、西湖龙井、君山银针、武夷岩茶等。各类茶叶品种齐全，高、中、低档、一应俱全。店内高悬于右任先生书写的“永安茶庄”匾额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欣赏。

永安茶庄坚持传统经营之道，以斤秤大、茶的玉兰味浓为主要特色，在天津茶叶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茶庄的现在经营者，仍以准斤足两、质优价廉、童叟无欺的经营宗旨，传承着老字号的经营特色，赢得新老顾客的信赖，一些因拆迁而搬走的顾客，不顾路途遥远，倒几次车也要来永安茶庄购茶。

永安茶庄以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重塑老字号品牌形象，既坚持老字号的经营传统，又不断创新经营方式，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组织适销对路的商品。例如：北方人喜爱花茶，而现在出于健康理念，绿茶、普洱茶、乌龙茶日益被人们接受。于是永安茶庄每年都要组织大量的明前茶、谷雨茶、黄山素毛峰、各种档次的铁观音等，深受广大顾客青睐。

## 济南第一家搪瓷厂创始人杨子衡

### 打小工打成小老板

上世纪 20 年代，祖籍是河北省武清县马家口（今天津市武清区）的杨子衡，带着他的弟弟，背井离乡，卷着铺盖卷从农村来到济南谋生。

杨子衡兄弟俩初来济南时身无分文，有一次，又饿又困的他们在一个拉煤的货车上睡着了，一觉醒来险些被火车拉到东北去。他们在济南打小工、做学徒，过着很艰苦的生活，用平时一点点积攒下的钱，从摆地摊开始闯荡自己的人生。后来，哥俩用全部积蓄盘下了一家名叫“阜钰”的金银首饰铺。店铺坐落于院西大街福德巷斜对过的路南约在今泉城路西首路南苏宁电器的位置。今天，从 1934 年出版的《济南大观》一书中，还能找到“阜钰”这个老字号。

杨子衡盘下的金银首饰店里有大量库存的金银玉器大小件等，在销售这些物件的同时，他也在思考下一步的发展。同时，杨子衡的弟弟经过自己的努力后来成功经营了一家金店，生意也非常红火。从此兄弟俩各自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 创办济南第一家搪瓷厂

当时的济南已经有不少金银玉器作坊，院西大街一带更是聚集了多家金店银楼。杨子衡盘下“阜钰”后，经营上难以有太大的突破。

这个时期，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有些思想进步的年轻人不喜欢佩戴金银玉器首饰。在工业相对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地区已经萌现出新兴的轻工业——搪瓷制造。这在当时是非常时尚新奇的事物。而在济南乃至山东则还是一片空白。于是，杨子衡就有了切入这个行业的想法，通过天津老乡和朋友们的帮助，学习制造技术，经过多渠道的努力，1932 年初，济南的第一家搪瓷厂就在西门大桥南侧河岸边的志德院落成了。全称是“济南阜钰搪瓷徽章厂”，院西大街的铺面作为工厂的经营部，专门用于洽谈订单业务及零售产品。

最初，搪瓷厂的规模很小，主要给医院、学校等团体制作搪瓷证章、徽牌和一些色彩单一、造型简单的搪瓷缸子、搪瓷脸盆、搪瓷盘子等日用品。但是生意很好，发展也非常快，不久包揽了济南所有街道名称牌、门牌门号、汽车、自行车、地排车、马车牌照牌号的制作。因为质量过关，后来全省的牌照都在“阜钰”定制。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有一段小黄金期，“阜钰搪瓷徽章厂”也在这个时期很快站稳了脚跟。

### 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这期间，一个重要的技术工人辞去“阜钰”工作，自己建了一家搪瓷厂，名为“济南大恒证章店”，他的铺面同样在院西大街，两家铺面相距不足 100 米。同一时期，青岛也出现了一家搪瓷厂。于是，“阜钰”有了同业的竞争对手。

杨子衡并没有因此畏惧，他一面从天津、上海等地采购质量更加优良的原材料，引进了加工机器，一面学习先进技术，改良了手工制造的工艺，并从上海高薪聘来技师培训工人，使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质量比拼和攻关较量，青岛的搪瓷厂最后被“阜钰”所淘汰。“大恒证章厂”的经营同样每况愈下，眼看要做不下去了，杨子衡收购了“大恒证章”。

后来发生了这两件事，杨子衡的搪瓷厂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规模更加扩大，此时，拥有两个商号和两家铺面，工人的数量扩大到近百人。阜钰搪瓷和大恒证章成为山东省内为市政、城建、水利、公安、院校、医院、卫生行业定制搪瓷质标牌、徽章、标尺的订单企业。搪瓷技术达到可以精细刻字，并可以挂彩做简单的图案。另外，门市上也增加了工艺镜框、银铜奖杯、大型银尊礼品的制作销售。

### 办公室装了十几部电话

1937 年底日军占领济南。日本人无理强行要求志德院的搪瓷工厂搬迁。杨子衡只好又重新选址，将工厂迁到了起凤桥，维持经营。

上世纪 40 年代，阜钰门面房对面的“天丰和”银楼歇业关闭，杨子衡买下了其房产。“天丰和”的房产面积很大，有铺面，有加工间，还有三进的套院和二层的楼。“天丰和”的二层楼是古建筑的风格，像个庙，但很漂亮。杨子衡把二层楼改造成工人宿舍，给工人们住；并建了工人食堂，给工人们请来师傅调理伙食。有了“天丰和”，杨子衡建了规范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十几部电话，杨子衡用他们联系业务和炒卖黄金。经常电话同时响起来，忙得接不过来。

这是搪瓷厂生意最好的时候，家境已经很富足，花钱也比较铺张，杨子衡夫人置办了多处房产，其中包括后来落实政策后归还的大厅门前街一处，为现在的家人居住一直到拆迁。

### 杨子衡的为人

杨子衡一生为人醇厚诚信，脾气温和。即使工厂回款一时没有收回来，资金再紧张，但工人人们的工资是从不拖欠的，即使借款也要按时发。他给工人们建宿舍、建食堂，逢年过节都要照例给工人们发油、发面、发红包。直到 1986 年后辈去塑料厂开具入股归公的证明时，意外遇到了一名外号叫“大地瓜”的阜钰老工人，他十分钦佩这位创业老人。

生意场上，杨子衡不但日夜操心，而且为了厂子的事情北上南下地奔波。在后辈残存的童年记忆中，他经常亲自去各个单位送货。他是个不能闲的人，勤奋正是每一个成功的人通有的特质。

杨子衡思想进步开明，注重教育。他的两个女儿都生性独立要强，读书一直到大学，并定居他乡。大女儿画得一手好油画，在呼和浩特中学教美术，定居在包头。二女儿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天津一所大学教俄语，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英语，定居到天津。

### 搪瓷厂的萧条

大约在上世纪 40 年代末，济南阜钰搪瓷徽章厂开始走向萧条。个中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接到了水利局的一个订单，制作黄河水文标尺。因为搪瓷铁质胚胎热胀冷缩的缘故，在实际应用中与度量衡产生了微差，被冠以“违反中华民国度量衡法”的罪名，处以巨额罚款。上世纪 50 年代初，因为给飞鸽牌自行车制作车尾标牌一事，搪瓷厂再次陷入经济纠纷。两次受挫后，工厂生产也因资金问题受阻，杨子衡先后变卖了部分房产。同时，市面上出现的塑料和法琅工艺、喷漆技术，使得搪瓷行业也受到某种冲击。由于政府订单减少，搪瓷厂业

务量迅速下滑，杨子衡被迫遣散了大部分工人，关掉了起凤桥的工厂，仅保留了院西大街两家铺面和后面的加工作坊。

此后不久，在全国公私合营大潮中，杨子衡的全部资产被合算为股份并入了新中印刷厂，后转到位于道德街的一家塑料厂。从此，“济南阜钰搪瓷徽章厂”和“大恒证章店”在济南工商业中消失。1957年，杨子衡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6岁。

## “刘海风葫芦”创始人屈文台

抖空竹既是一项娱乐活动，也是一项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深受人们的喜爱。更由于它从一般的玩耍发展到成为一种民间杂技艺术，经常出现在国内外的舞台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因此，空竹的制作也多为人们的重视。

北京厂甸的空竹，品种固然很多，但最负盛名的，当推天津宫北修竹斋的“刘海”牌。天津建成古文化街，断档多年的“刘海”空竹又出现在儿童玩具柜台上，货摊前嗡嗡声又响起来了。而“刘海风葫芦”的创始人正是驰名海内外的武清人屈文台。

屈文台，天津民间艺人，又名定生、问梅吟社、白云山人。1857年生于武清六道口村。他自幼喜好武术，爱玩空竹。13岁起，就会制作空竹，并且将空竹抖得娴熟。民国初年，屈文台举家来到天津，在天后宫山门外的“张仙阁”旁开设了“修竹斋竹木制品店”，生产品种也逐步增加，有木桶、木盆以及一些漆器竹木制品，但还是以空竹为主业。他采用民间传说“刘海戏金蟾”的图案作为商标。故其制作的空竹被称为“屈记刘海牌风葫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海风葫芦曾名噪一时。屈文台所创制的“刘海风葫芦”早年除在“修竹斋”出售，每逢春节前后，还在天后宫大殿前月台下右侧临时设摊售卖，摊案上方书有“刘海风葫芦天下驰名”九个大字。中间悬挂屈文台本人像片，右边是价目表，左边是创造经过的启事，两侧上角各挂着两个黑色大风葫芦做幌子，案上和地下圆笼内放置成品，出售时还代顾客挑选试抖，终日应接不暇，一时非常畅销，逐渐形成了天津有特色的民间工艺精品。

“刘海风葫芦”的特点是：选材精良，以檀木为轴，取其滑润，硬度高，精选应季大毛竹为圈，风轮外围刻槽，用苕麻鱼鳔缠绕，做工精细，声音响亮，坚固耐摔，曾有玩家编成顺口溜“修竹斋的不怕摔，怕摔的不叫修竹斋”。因此在同行业中独树一帜，无与伦比，曾风靡于城乡百姓之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健身玩具和春节市场上不可缺少的节令商品。而且每逢卖货亲自解说，并亲自示范，教授各种抖法，因而深受顾客欢迎。

空竹别名很多，响葫芦、嗡子、地铃、响铃、转铃、扯铃、天雷公公等。在天津俗称蒙葫芦、闷葫芦、风葫芦，在武清称抖嗡。这些别名都显示了一个特点：声音独特。这种玩艺儿有大有小，每孔一响，孔数越多越大抖起来则越响。风葫芦造型上分单轴和双轴，双轴由六响到三十八响，单轴由三响到二十八响，响越多声音越高越好听。它的“声眼”位置安排准确，内部竹哨深浅合度，声音响亮。双轴的抖起来比较平稳易抖，抖单轴的就要靠技术了，有的人能耍出许多花样，什么“猴爬杆”、“鸡上架”、“仙人过桥”、“高抛”等。成年人看着孩子们玩，手心痒痒，有时也要接过绳杆练上几手，玩起来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抖空竹讲究抖单轴的，在两根竹竿头上拴住一根细线绳，抖时把线绳绕在光滑的木轴上，向前一甩一抖，就把空竹带起来了。然后利用惯性找好重心，空竹在绳扣中间转呀转，靠风力灌到孔内吹出声响，发出一阵接一阵的嗡嗡音响，抖得越急，响声越震耳。有的人在抖响之后，还要一抖手臂，把木轴从绳套中甩出，让空竹在光滑的地面上靠单轴旋转，就如同小孩玩陀螺似的，转得差不多时，用绳一兜又把它带回来接着抖。

值得一提的是，六道口人不仅创制了驰名中外的“刘海风葫芦”，而且把抖空竹这项杂技艺术推向了国外。清光绪八年（1882），六道口的民间艺人刘锦堂创编了多种抖空竹的技巧花样，并开始在城内边出售空竹边表演。据说他抖

空竹的技巧有许多种，如鹞子翻身、金鸡上架、正钓鱼、反钓鱼、大撒把等。他曾走出国门到欧洲、美洲表演，历时一年多，归国后在本村设空竹练功房收徒传艺。他的高足刘君恒等也曾赴欧美及亚洲的暹罗、缅甸、印尼等国演出。20世纪20年代，过埠艺人田双亮只身在国外卖艺，归国后来到天津，在天津发迹成名，被称为“中国扯铃人”。他在天津创演抖大盖、抖酒嘟噜（一种肚大脖长的盛酒瓷瓶），并在抖空竹技巧上练就了十几套抖法，如跳线、腰腿串抛高等一系列高难动作，为“抖空竹”这一民间艺术走进剧场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天津较早以抖空竹进入杂耍园登台表演的王葵英、王桂英、王淑英姐妹不仅具有高超的技巧，且能以玲珑、细腻、轻柔、优美的表演吸引观众。此后，抖空竹成为天津杂耍园子必不可少的杂技节目。

另据《天津文化艺术志》载，新中国成立后，武清的抖空竹专业演员刘家武、于志良、曹学敏等都成为天津杂技团的骨干力量。刘家武9岁在家乡六道口拜师刘君有门下，除练出了较全面的抖空竹的机智灵敏、腾越弹跳等技巧，还掌握了腰、腿、跟头等杂技基本功。由此，他创演了许多抖空竹的新技巧，如脱线转体720°，抛高连续三次跳线接，以及“三打一”的传递等群体表演；抖大盖的表演创演了左右扑蝴蝶、大背剑转720°等，为丰富和发展抖空竹节目作出了贡献。上世纪70—80年代，天津市杂技团抖空竹新秀纪月琴、张薇、赵福忠、国庆丽等不仅把传统的抖单双头空竹、大盖、酒嘟噜的技巧全部继承下来，而且有了很大提高。90年代的青年演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突出了群体表演的大量对传和相互传递、二节人互换、抛高跟头接等新的技巧，并将形体与舞蹈动作巧妙地结合起来，增强了节目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抖空竹是一种全身性技巧运动。上肢要提、拉、盘、抖，下肢要跳、绕、落、蹬。腰部要扭、随，头部要俯仰、转动，眼睛要瞄准、追看。因此，民国年间“刘海风葫芦”被杂技艺术家王雨田搬上杂技舞台，屈文台为杂技表演者亲自特制了杂技表演专用风葫芦，平衡度好，稳定性高，外观精美，实为“刘海牌风葫芦”之精品，深得表演艺术家的赞赏。河北省吴桥杂技团添设的抖风葫芦节目，也是由屈文台提供的“刘海风葫芦”。“刘海牌风葫芦”一百多年来名声不衰，畅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市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铜奖。与“泥人张”、“风筝魏”一起逐渐形成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手工艺精品。“刘海牌风葫芦”曾在全国第三届少先队代表大会上被少工委认定为“全国少先队指定用品”，后又被天津市体委认定为“全民健身指定器材之一”。2007年5月，在天津举办的首届“空竹联谊会”上，“刘海风葫芦”第四代传人屈彦晖赶到现场。当场亮出了具有百年历史的一对巨大的空竹。这两只风葫芦是由屈文台精心制作的，高55厘米，直径35厘米，中间的铜轴直径就达4厘米，重量达到10千克左右，原是放在老店作招牌用的。为了向观众展示“传家宝”的魅力，屈彦晖当场解下腰带，缠住空竹慢慢地抖起，他的同伴也找来一条粗绳抖起另一个巨大空竹。场面隆重，表演精彩，热闹非凡。随着“嗡嗡嗡”低沉的哨响，全场响起阵阵掌声。二〇〇九年十月“刘海空竹制作技艺”被天津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据考，抖空竹始于南宋，在《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中，有“宽阔处踢毽、放胡哮、斗鹤鹑”的记载，这里的“放胡哮”，即指抖空竹，因抖动时发出的声音呼哮作响。《水浒传》第十九回：宋江和卢俊义见街市上一个汉子，手里拿一件东西，两条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牵动，那物便响。宋江见了不识，使军士唤那汉道：“此是何物？”汉子答道：“此是胡敲也。用手牵动，自然有声。”胡敲也即胡哮的另一种叫法。宋江作诗两首。其一曰：玲珑心地最虚鸣，此是良工

巧制成；若是无人提挈处，到头终久没声名。这是宋江被招安后感而发的嗟叹，却引出空竹的一段野史。在《水浒传》一百一十回里，宋江的另一首诗：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讲的就是在受命征讨方腊的路上看到有人玩空竹的情景。当然，小说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所著，但也表明，写书人的时代，抖空竹已经很常见了。

至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说：“空钟者，剝木中空，旁口，……别一绳绕其柄，……一勒，空钟轰而疾转。”说明那时的抖空竹也叫做“抖空钟”。据说现在好些地方也还有这种叫法。

据传，三国时期曹植就曾作过一首《空竹赋》，如果这算是有关空竹最早的记录，那它的历史至少有 1700 年了，诗中描写的“乐手无踪洞箫吹，精灵盘丝任翻飞。小竹缘何成大器，健身娱乐聚人气”正是抖空竹的场景。可惜现在人们对曹植这首《空竹赋》的内容已无法考证。

1938 年屈文台逝世，时年 81 岁。其子屈绍先、孙子屈德武继承祖业，继续制售“刘海风葫芦”。后宫南宫北大街重修后改称古文化街，虽恢复了“修竹斋”字号，但屈文台所创制的“刘海风葫芦”已成绝响。刘海空竹制作技艺现已传承至第四代。

## 武清人创立的评剧早期班社——山霞社

刘翠霞，1911年生于武清熬嘴村，评剧“四大名旦”之一，刘派创始人。

刘翠霞3岁的时候随母亲沙氏“下卫”讨饭，10岁时被卖给撂地艺人何丑子学唱辽河大鼓（辽宁大鼓），不久随师傅到大连谋生。11岁进了李金顺（李氏亦为武清人）的落子班，走上了评剧艺术之路，后拜张柏龄、赵月楼学唱评戏，并受到罗万盛指点。十四岁拜赵月楼为师。曾为花莲舫、李金顺配演。十五岁的时候，因花莲舫（花氏亦为武清人）生病，由刘翠霞“救场”，偶尔与李金顺合演《打狗劝夫》，上场后，获得了几次彩声，从此开始演二旦了。十六岁时开始唱正戏，十七岁就担任主演，并且挑大梁。1927年，评剧名角李金顺去东北，花莲舫亦离开天津，使得原有的“金花玉班”失去主演，即由刘翠霞担任主角。鱼行商人陈静波对刘翠霞大力捧场，为刘新置守旧和行头成立“山霞社”（又称为“山华社”）。这个班社是当时天津评戏界最大的班社，班主叫李华山（刘翠霞的亲眷，今廊坊市安次区落垓村人，以在饭馆做饭为生，为人仗义，胆识过人，在天津鼓楼一带很有威名。解放后回乡务农，1962年逝世，人称李三爷）。这一时期，她主要是继承了前辈演员李金顺、花莲舫的表演艺术，尚未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

“山霞社”是评剧早期的一个实力最强的班社，社内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荟萃了当时津门评剧界的精英、名家，有刘翠霞及其亲传弟子刘小霞、小翠霞（即新翠霞）的旦角，有桂宝芬的小生，李彩芳、李玉芬、张月宁、赵凤珍、碧月花、碧玉花、赵凤宝的青衣花旦，赵红霞的青衣二旦，罗万盛、赵良玉的老旦，李兰舫的彩旦，王玉堂的花脸，王守业的老生，李小楼的里子老生和丑，王小楼的三花脸，张福堂打鼓，张凯的大弦，王福田打梆子，贾玉田的大锣。配角与场面都很出色，阵容相当齐整，演出剧目质量颇高，当时评剧界人士都以能加入“山霞社”为荣。山霞社成立后红紫一时。从福仙、同庆、小广寒、华北等小型茶园、戏园，一直演到下天仙、东天仙、大舞台等大型戏院，甚至经常在专接京戏班的北洋、春和、明星等戏院演出，受到天津市民的广泛欢迎。1933年，应北京广德楼之约，刘翠霞率“山霞社”首次赴北京演出，也是她第一次领“山霞社”赴外地演出。获得成功。紧接着又去大连、济南、奉天等地巡回演出。1934年，又二次进北京，在吉祥、华北等大戏院演出，因剧目不适应时代，所以上座率不佳，这次演出失败，对她后来努力丰富演出剧目，改革演唱艺术，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刘翠霞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从京剧和文明戏中吸收营养，邀请清朝遗老文东山编写剧本。从1935年到1938年，刘翠霞排演新戏约有百余出，并勇于吸收其他剧种之长，在表演、唱法、服装、化妆、灯光、道具等各方面均有所改革。这一时期，是刘翠霞逐步形成“刘派”艺术的时期，也是她艺术生涯中的顶峰时期。

“山霞社”除去经常上演《雪玉冰霜》、《玉镯记》、《劝爱保》、《三节烈》、《打狗劝夫》等刘翠霞的代表剧目外，还从当时盛行的文明戏中汲取营养，排演了诸如《一元钱》、《三女性》、《空谷兰》、《啼笑因缘》等时装戏，丰富了评剧上演剧目。此外，“山霞社”也还在演出形式上加以改革，在许多戏中使用机关布景，刻意美化舞台。1934年在福仙茶园首演的一出新编神话剧《金鱼仙子》，刘翠霞在剧中饰演金鱼仙，为此她专门设计制作了一身缀满鱼鳞的行头，并且每片鱼鳞都镶上一个干电池小灯泡，台口装有数片通电的铁片，演员一上场，脚底的铁片踩在台上的铁片，全身的灯泡顿时通亮，蔚为壮观。这种新奇的表演形式，

令观众趋之若鹜。“山霞社”在艺术的改革与创新，对评剧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刘翠霞是在评剧“四大名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位优秀演员，她以刚劲动听的演唱风格著称，把京剧和大鼓唱腔融入评剧之中，创立了深受群众喜爱的“刘派”艺术。在福仙茶园挂牌，每天演出日夜两场，寒暑不辍，茶园门外常常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1935—1937年是刘极盛时期。在1936年春节期间，芙蓉花从北平来津，李金顺嫁人后仍住天津英租界。“山霞社”的管事人李华山主办评剧著名艺人合作演出，演员们都拿出看家好戏。有芙蓉花的《枪毙驼龙》；朱宝霞的《麻风女》；李金顺、金灵芝的《珍珠衫》；刘翠霞的《血玉冰霜》。演完戏，新闻界倡议评选“评戏皇后”，当时李金顺、芙蓉花都推选刘翠霞，其他主演也都同意。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消息，刊登了照片，从此刘翠霞名上添了“评戏皇后”。白玉霜后来在上海唱红了，来津演出也挂了个“评戏皇后”，刘翠霞就改为“评戏女皇”了，这个头衔用了六年，直到她逝世，成为天津评剧发展史上的佳话。天津盐商“益德王”家廿四姑与刘交往甚密，曾给刘拍过一卷家庭电影，十来分钟，选剧《三节烈》公堂一折，桂宝芬饰演县官，流传于世。

三四十年代，高亭、百代、蓓开、昆仑、宝利等公司分别为其录制了唱片(现已收集39个剧目的唱片40余张)。

1939年，她虽然身体孱弱，但是仍然抱病登台演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1941年，终于因积劳成疾，卧榻四十余日后，与世长辞，年仅三十岁。

## 从武清走出的“王致和臭豆腐”

提起闻名遐迩的“王致和臭豆腐”，不光是北京人，再往大了说，乃至中国老百姓和全球华人，恐怕没有几个不知道的。“王致和”与“同仁堂”老中药铺同龄，均始创于清康熙八年，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时至今日，“王致和”作为响当当的“中华老字号”之一，仍以其产品的细、腻、松、软、香五大特点，深受海内外华人消费者钟爱。

### 王致和卖豆腐为生

据《武清县志》记载，王致和家几代人均居住在潞河岸边的河西务村。不过，王致和家昔日家境寒微，到他这一代，基本以沿街卖豆腐为生。但生活中的艰难并没有压倒生性乐观的王致和，他自幼机智聪颖，再加上曾读过几年私塾，闲暇之余，特别喜好读书，尤喜诗词，到中年时已学有小成，打小儿讲究礼数的王致和同时深受乡民们尊敬。

### 无意中做出臭豆腐

据县志讲，在某一年的炎夏清晨，王致和正要挑担子外出卖豆腐，不料一位远房亲戚突然闯进家门，说其要娶媳妇，请他去家里帮忙，随后不容分说便将王致和生生拉走。待王致和离家数日后返回，刚一推开屋门就马上闻到了一股冲天奇臭。随后当其打开蒙豆腐的包布一看，雪白的豆腐生了一层薄薄的绿毛。自幼以勤俭为本的王致和见此很不甘心，他下意识地抓起一把豆腐送到嘴里，不料竟然有股厚重的醇香味儿蕴含其中。接下来，王致和除去豆腐表面上的绿毛，又将豆腐切成若干小方块儿，然后挑着担子出门沿街卖起“臭豆腐”来了，结果没成想竟很快卖完了。以后，他如法炮制，生意竟越做越好。从此，王致和的豆腐买卖犹如芝麻开花儿节节高，而且白豆腐、臭豆腐兼营，并很快在京南卫北一带声名远播。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从此成了平民百姓饭桌上的一道美味珍馐。

### 偶然间时来运转

光绪八年，王致和时来运转，应试顺天府。考题为《知味下车》。王致和心机一动，写了一首诗，盛赞自制的臭豆腐。诗文为：“明言臭豆腐，名实正相当。自古不钓誉，于今无伪装。扑鼻生奇臭，入口发异香。素醇饶回味，黑臭蕴芬芳。珍馐富人趣，野味穷者光。既能饫饕餮，更可佐酒浆。餐饌若有尔，宴饮亦无双。省钱得实惠，赏心乐未央。”

考官看后大怒，说王致和玩世不恭，玷污考场，要予以治罪。多亏张之洞从中说情，他对考官说：“《知味下车》之题，考生千篇一律皆论酒，岂不乏味？惟王生之臭豆腐诗别开生面，且词意豁达。故以重新裁定为是。”王致和因而得中第一百零七名举人，并任知县，后升任知府。

后来王致和辞官，在北京开办一家臭豆腐铺。其大门对联为：可与松花相媲美，敢同虾酱做竞争。横批为：臭名远扬。这只是一段传说，真假无从考证。

## 武清人创建的天成斋鞋店

提起北京的老鞋店，谁都会说出“内联升”、“同升和”，其实，旧京城前门外的鲜鱼口胡同里，共聚集着七家十一户鞋店，个个都称得上是老字号。这么多家鞋店开在一条小街道上，生意还都不错，正应了北京人的一句老话：“货卖一堆山”。这些鞋店是：天成斋鞋店、大成鞋店、集升斋鞋店、长福斋鞋店、大丰鞋店、兴隆斋鞋店、步云斋鞋店以及天成斋鞋店的四个分号(天成斋分号、天源斋、天利斋、天华馨)。

天成斋鞋店开业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了。

要说天成斋鞋店，得先从马聚源帽店说起，可以说，没有马聚源就没有天成斋。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1841年年底，马聚源帽店柜上分红，分到最后，还剩一些，怎么分也不合适了，有的说，把这点钱存在钱庄，大伙吃利息；有的说，买点布，大家做件衣服；有的说，拿这点钱，在外面支个小买卖，不仅本钱丢不了，还能生利。大伙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可干什么呢？其中一位伙计说，我认识一个做鞋的，人心好，手艺也好，还会经管，不如与他合伙开个鞋店，大家一听，这事有门，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个鞋匠姓刘，因为他个子高，大伙见面都叫他“大刘哥”。“大刘哥”是武清人，在一家小鞋铺学得一手纳鞋的好手艺。出师后托人在前门一带找了一间小房住下，白天在屋里做鞋，傍晚夹一个小布包，到附近的旅社、小客店卖鞋。由于他为人诚实勤快，又能吃苦耐劳，鞋做得不错，收入也算可以，自己正想找个地方开间买卖，没曾想，马聚源的人找到门上，双方没有更多的客气寒暄，一锤定音，开鞋店的事就按双方的约定：马聚源帽店出资，大刘哥为领东掌柜，店铺开在鲜鱼口西口路北。店铺是只有一间门脸的两层小楼，楼上做活，楼下卖鞋，店员四五名，开业伊始，生意一直不错。店里的伙计大部分也都是武清、香河一带人。后来，马聚源给这个小买卖起名叫“天成斋”，意味着天助我也。

过去老北京人常说，当官的、金店的大老板买鞋都到内联升，农民、商贩、赶车的、拉脚的买鞋都去天成斋。天成斋生产的鞋有农民和市民穿的直脚圆口黑布鞋；有八旗兵、绿营兵、轿夫、跤手、赶脚们穿的足青布双脸鞋；有脚行(搬运工)、赶大车的喜欢穿的洒鞋；有老人们冬天穿的大云头(老头乐)；有人们下雨穿的油靴(雨鞋)等。由于天成斋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平头百姓，鞋的质量又好，所以备受人们的欢迎。因此，他们做的鞋也日渐紧俏，供不应求，从店铺面积到职工人手都愈加显得紧张。

同治年间，天成斋在鲜鱼口布巷子北口路东开设了第一个分号“天源斋”；光绪年间，又在鲜鱼口胡同中段路南开设了第二个分号“天成斋分号”；随后，又在自家店铺东侧开设了第三个分号“天利斋”。到了民国年间，天成斋为适应市场需要，又在鲜鱼口路北开设了第四个分号“天华馨”，专卖绣花女鞋和各式皮鞋。这时的天成斋几家店铺共有职工140多名，它不仅在北京名声鹊起，而且远播通县、昌平、宛平、大兴等县的乡村集镇。

天成斋鞋店在生产上，选料真实，制做认真；在对待顾客上，不敷衍，质次保换，一保到底的经营作风换来的。天成斋的双脸鞋和洒鞋是该店的名产品。所谓双脸，是在鞋面前缝有两条平行的皮条，一是好看，二是为了结实。天成斋的双脸鞋有两种，一种是劳动者穿的足青布面双脸鞋，另一种是武术界、善扑营摔

趿的穿的缎子面和礼服呢面的双脸鞋。洒比双脸鞋更耐穿，前面也缝有两条皮脸，不过是“人”字形皮脸，足青布鞋面还要缝成菱形的图案，并且鞋底是加厚不分层，全包的“山底”。天成的洒鞋也有两种，一种是搬尖洒，另一种是长脸洒。搬尖洒前边加厚密缝，耐踢耐碰；长脸洒，脸长跟脚不容易掉。其次，天成斋的圆口皂、老头乐以及油靴等也都是深受顾客欢迎的。天成斋制作时，足青细布鞋面都是在织布厂定织、在染坊定染的；礼服呢鞋面都是花高价买那约一个铜板厚的上好呢子；做双脸鞋和洒鞋的皮脸，必是厚硬平整没有绉折的“股子皮”（就是驴屁股皮）；底子的选料也很讲究，千层底里除中间稍絮几片七成新的旧白布外，其余都用新料；纳底子的麻绳如买不到好货，就发给加工户麻，让他们自己用拨锤打麻绳。

1956年鞋店参加公私合营，并入鲜鱼口百货商店。1966年，改名“向阳鞋厂门市部”。1978年，又改名“北京布鞋厂门市”。1985年天成斋鞋店在原址鲜鱼口恢复了老字号。

## 吴趸人笔下的武清风情

由清代谴责小说家吴趸人 1906 年撰写的章回体通俗小说《恨海》，以 1900 年庚子之役为背景，以未婚青年陈伯和、张棣华沿运河逃难生活为主线，用三个半章节的篇幅形象地再现了武清一带的社会乱象，揭露并控诉了八国联军的侵略罪行。

吴趸人，名沃尧，原字茧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我佛山人。1866 年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广东南海人。二十多岁时去上海谋生，后客居山东，远游日本。1897 年，吴趸人开始在上海创办小报，先后主持《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1906 年，他担任《月月小说》杂志总撰述，发表了大量的嬉笑怒骂之文。此外，他还创办了沪粤人广志小学，主持开办过两广同乡会。吴趸人一生共创作了三十多部小说，现存二十余种，著名的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等，因之赢得了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大家的美誉。

《恨海》对武清风情的描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真实地记录了运河两岸的义和团运动。在第三回“紫竹林无处访鸿泥，八百户暂时驻芳趾”里，对运河沿岸的七百户、九百户（今属武清区）等村庄请义和团设坛学拳的情况做了记述，反映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可怜天津卫，从明朝到今，未曾遭过兵劫，这一回怕不免了。”“到处是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那店房又矮又小，郁着一屋子的闷气。有时到院子里走走，又是满院子的骡马粪臭，夜静时，直熏到屋里来。加之心中悲苦，何曾得一夜安眠？”二是对武清民俗民风和乡村生活进行了刻画。由于主人公逃难是沿津京官道、京津铁路以及大运河展开的，故对武清的描写非常集中、细致。涉及的地方包括六百户、七百户、八百户、九百户、杨村等村街。在八百户张家客店，土灶、油灯、水缸、小米粥、片儿汤、烙饼摊黄菜与农民的质朴情感，构成了一幅和谐、宁静的乡村图画，使得疲于奔命的外乡人获得了暂时的安歇。三是对武清的方言俚语描述得惟妙惟肖，像“打尖”、“末后”、“铺盖”、“通身”、“火炭”、“碍事”、“半道”等武清人常用的方言俚语随处可见，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运用娴熟。同时也证明了吴趸人在武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恨海》这一真实特定历史阶段的记述，对于研究庚子年的武清历史文化、地名文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形象化史料。

## 冯梦龙笔下的武清爱情故事

冯梦龙，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在其《醒世恒言》中，将发生在武清的刘方的爱情故事编著在“刘小官雌雄兄弟”一章节中，使武清蒙村发生的这宗善行义举广泛流传下来。阅读冯梦龙的另一本书《情史》时，卷九里有一篇题为“无缘者真亦成梦，有缘者梦亦成真”的描述，演绎出一段发生在武清的“折扇”姻缘故事。

千里姻缘一线牵。这姻缘一事十分奇妙，素不相识的一对男女，只因了一把折扇牵线，竟结成了情深意笃的恩爱夫妻。真难说是天定还是巧合。田娟娟与木元经的折扇姻缘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木元经是明朝成化年间的一名才子，年少才俊，仪表轩昂。一年盛春，他只身一人来到泰山，领略雄伟东岳“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为了第二天清晨在泰山绝顶观日出，夜里停宿在秦观峰。山风清爽，夜里睡得十分香甜，美梦翩然入睡乡。他梦见自己迈步在一片秀美的山水之中，忽有一美女飘然而至，遗下一诗扇，转身隐入一所雅致的宅第中。他拾扇展读，还没等他看清扇上的题诗，忽闻一阵清脆的晨钟轰鸣，把他惊醒。清醒后，虽然没有记住诗文，而梦中所见山水宅第却历历在目。

第二年，木元经被当地府学推荐入朝廷太学，赴京途经武清县。到武清时，正值落红遍地，柳絮飞锦的暮春时节，此地风景清丽宜人。离太学开讲还有一段时间，因而木元经决定在武清小作停歇。找了家客栈住下，安排妥当后，就到了夕阳西斜的时候，迎着和暖的晚风，木元经信步走出客栈，不知不觉走到了郊外。过了一座小石桥，前面不远处是一个翠绿葱郁的树林，一条小径通向深处，四周嫩草如茵。木元经十分惬意地左顾右盼，忽然眼前一亮。发现道旁草地上躺着一把娟秀的折扇，拾起一看，是一把精致的檀香木骨绢面小扇，扇头上用红丝绳系着一对小巧玲珑的水晶蝴蝶，展开扇面，上面题着一首诗：

烟中芍药朦胧睡，雨底梨花浅淡妆；  
小院黄昏人定后，隔墙遥辨麝兰香。

诗意清雅优悠，春意甚浓。再看字迹，是一笔娟秀的小楷，似出自姑娘之手。木元经体味着诗韵，再次抬头四顾，猛然觉得眼前的景致十分熟悉。仔细一想，原来是与去年在泰山上所经历的梦境如出一辙，心中不免惊奇。

再沿着小径往前行，远远看见有一妙龄女郎，带着两个年幼的婢女在溪畔花丛间游玩采花。木元经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还不待他靠近，那女郎似乎有所察觉，唤了两个婢女。一阵莲步轻移，循小路走进树林前的一所院落中，只抛下一路轻盈的笑语。木元经不知是进是退，眼巴巴地望着那所院落，竟然也与当初自己梦中所见一模一样。他不由得有些心神恍惚，既兴奋又怅然，掏出佩刀在路旁树干上刻下一首七言绝句：

隔河遥望绿杨斜，联袂女郎歌落花；  
风定细声听不见，茜红裙入哪人家？

眼看已暮霭四合，此地不能久留，他快快地转回了客栈。夜里，他悄悄向店家打听郊外树林中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家，店家告诉说：“此去三里许有田将军园林，公子所见，莫非是田将军的爱女田娟娟？”

这荒野之中，为何会住着一个单门独院的将军呢？原来这田将军是上轻车都尉田忠义，他在征讨西北敌寇时，被流矢射伤，凯旋后伤口始终不愈，于是携带妻女回故里武清养伤。田夫人钱氏是世家之女，精通文墨，雍容淑静。田将军夫

妇膝下只有一女，闺名娟娟，在母亲的悉心教养下，通晓经史，擅长音律，配上她的天生丽质，在武清县内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佳人。娟娟随父母隐居在树林葱郁的郊外，每天主要的事情是在父亲病榻前侍奉汤药，闲暇时便带着她的两名婢女游玩在溪水林木花草间，日子虽然清寂，却也别有趣味。

再说客栈中的木元经，这一夜心潮起伏，难以成眠。天刚破晓，他立即起身盥洗，又兴致勃勃地循旧路来到郊外溪桥畔，徘徊在树荫花丛中。希望再次与佳人不期而遇，聊慰他渴慕之心。一直等到中午，除了风摇花动，不见佳人踪影，他只好返回客栈用午膳。午后，木元经又回到桥边，静坐在草地树荫下，等待着奇迹出现。片片落花随溪水而去，转眼又是黄昏，奇迹却不曾发生，无奈之下，木元经又在另一棵树干上刻下一首诗：

异鸟娇花不耐愁，湘帘初卷月沉钩；  
人间三月无红叶，却放落花逐水流。

由于学业在身，木元经不能在武清久留，只好快快地离开，进入京城。在太学中，承教名师，埋头苦读，但心不由己地拿出拾到的折扇把玩，视如珍宝。三年后，木元经完成了学业，被派往京城为官，走马上任，真可谓少年得志。又是一个春天，京城的牡丹花开得争奇斗艳，城外更是繁花似锦。公务余暇，木元经独自骑了一马，往郊外踏青。

一路清风送爽，不知不觉来到人迹稀少的远郊。行至一溪桥边，木元经牵马到溪中饮水吃草，然后自己手摇折扇，站在桥头观赏远近阳春美景。见不远处路旁有一处人家，木元经感觉有些口渴，便牵上马，想去讨口茶喝。

出来开门的是一个慈善的老翁，他热情地邀请木元经进屋歇息奉茶。木元经随老翁入内，里面院子很大，前面是几间茅舍，通过一道内门，却是另一番天地展现眼前：其中有楼台亭榭，花木成荫，一条小径穿花而过。木元经又觉似曾相识，原来是与泰山梦境酷似。他大感意外，心想其中必有天机，于是故意拿出在武清拾到的折扇扇风。

老翁叫人进了茶水，自己与客人在厅中落座，见到客人手中的折扇，十分客气地借过来看了片刻，又问客人折扇的来由。木元经把武清拾扇的经过如实禀明，老翁嘱他稍等，自己则持扇隐入内室。

不大一会儿，老翁喜滋滋地走了出来，对木元经说：“天下真有这般巧事，我见你这把扇上的字迹似我外甥女的手笔，恰好我妹妹和外甥女住在我这里，因此借了让她们去看，果然此扇是我外甥女的失物。你们甚是有缘，舍妹请公子入内一见！”

木元经怀着兴奋又惶惑的心情，被引入内院的一处花厅，只见厅内幔帐妍丽，摆设讲究、典雅，屋角摆放着各种乐器。过了一会儿，一位年约五十的老妇走了出来，雍容华贵、神情慈霭。木元经见过礼，老妇徐徐开口道：“老身钱氏先夫上轻车都尉田忠义，前岁因战伤归故乡武清休养，小女娟娟不小心失落此扇，不想落到了公子之手，然而当时树干上刻的两首诗，不知何人所为？”木元经听田夫人念了那两首诗。恭敬地答道：“是在下昔日所题，不想惊扰了夫人。”接着又关切地问：“不知老夫人何时由武清来京城？”

田夫人神情黯然地说：“先夫已经离世，年前我们母女从武清投奔到此地哥哥家。”说完后，田夫人折回内室，一会儿，引出一美丽的女郎，云鬓花颜，款步轻移，宛若天仙一般。木元经看了这女郎儿大吃一惊，她竟然与泰山梦中所见美女一模一样。心想必定是机缘天成。双方见过礼，木元经把他泰山神梦的情形细细叙述了一遍，在座的人都惊叹不已。田夫人暗中示意他可央媒人来说下这门

亲事，木元经心领神会，天近黄昏时，告辞回城。

第二天，木元经就请了媒人，一同往郊外去求亲，田夫人自然是爽快地答应下来。既有天定情缘，又有双方情意，一对佳人在这年四月就缔结了良缘。

没出一个月，木元经奉旨督运要去南方，留下娟娟一人在家。一晃数月过去，娟娟思夫心切，每日里只能靠书画打发时光。这日，她闲来无事，提笔作诗一首：“闻郎夜上木兰舟，不数归期只数愁。半幅御罗题锦字，隔墙裹赠玉搔头。”这天傍晚，木元经沿运河回来了，娟娟出来迎接。木元经说：“刚才在船上得到了你写的诗，还没来得及回复。”说着，就把娟娟写给他的这首诗说了出来，并回应一首赠与娟娟：“碧窗无主月纤纤，桂影抚疏玉漏严。秋浦芙蓉偏献笑，半窗斜照水晶帘。”

打那以后，夫妻二人便形影不离，两人如鱼得水，如胶似蜜，情投意合，异常恩爱，一有时间就往郊外探视田娟娟的母亲和舅父，有时也在郊外小住几天，小夫妻的日子十分甜美和洽。一天，木元经问田娟娟：“平日在闺中作何消遣？”娟娟含笑答道：“相公没听说闺中有十乐么？即是：晓钟理妆、晴窗临帖、昼长读画、晓霁浇花、巡檐觅句、隐几观棋、月下抚琴、灯前问字、夜凉摊卷、午倦烹茶，妾就用这些排遣闺中时光。”木元经追问：“那般不觉寂寞么？”娟娟娇羞喷言：“自然不比今日美满。”夫妻俩相视而笑。

木元经知道娟娟善作诗，便索要她过去的诗篇拜读。娟娟从盛嫁妆的箱中翻出满满一筐诗稿递给夫君。木元经仔细翻阅，如临胜境，爱不释手。略略看过后，他找出自认为最佳的一篇是一首“咏雪”绝句：

霏霏玉屑点窗纱，碎碎琼柯响翠华；  
乍可庭前吟柳絮，不知何处认梅花。

这诗读来只觉一股清越雅香的气息扑面而来，无忧无喜，一种超尘脱俗的淡远。

新婚后的两个月，木元经因公事奉命南下，田娟娟缠绵难舍，作了三首诗送别：

其一：

两月缱绻意气投，一朝离别话新愁；  
暮云春树相思际，惆怅关山独倚楼。

其二：

别绪环生目欲斜，灯前分袂泪交加；  
还期异日相逢处，携手同看姊妹花。

其三：

情到痴时语亦痴，泪清和墨写新诗；  
归舟若至金陵地，陇上梅花寄一枝。

木元经在南方办完公事，已是层林染红的深秋季节。因离家已久，便顺路回家探视老母。不料木母正患病在床，木元经奉汤药服侍左右，不能离开。木母病渐好转，天又下降寒雪，北方天冻冰封，无法成行。木元经思妻无奈，只有掏出随身携带的折扇把玩，以解相思之愁。他千方百计地托人捎信到京城，备述思念之情，并约定春风解冻时返回京城，并接她南下拜见婆母。

田娟娟独守空房，朝思夜盼，只等春风降临人间。长夜漫漫，她不由地暗叹：“修到神仙好夫婿，也愁无奈别离何。”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谁人能够长聚不离？娟娟就差人给木元经捎来一首诗，诗云：“楚天风雨绕阳台，百种名花次第开。谁遣一番寒食信，合欢廊下长莓苔。”木元经读罢此诗，双眼噙满

泪水，便急忙启程，等见到娟娟，她已卧病在床一个多月，木元经见到面容憔悴的娟娟，心里感到无限懊悔。也正是这种苦涩的离别，才衬托出团圆时的甜蜜呢！

不久，木元经母亲去世，他因娟娟抱病在床，只得自身一人回家守孝。第二年春天，娟娟病情转重，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寄上绝句一首给木元经。元经接到诗，泪流满面，急忙回家去看望娟娟，但娟娟已离开人世。服完母丧后，元经再次进京，见到墙上娟娟的画像，无限悲伤，提起笔来，在画像旁边题诗一首：

人生补过羡张郎，已恨花残月减光。  
枕上游仙何迅速，洞中乌兔太匆忙。  
秦娘似比当时瘦，李卫惭多旧日狂。  
梅影横斜啼鸟散，绕天黄叶倚绳床。

这首诗被当时的人们广为传诵。

## 武清人创始的唐山万里香烧鸡

鸡类食品的制作，在全国种类颇多，我国南方的广东一带盛产桶子鸡；我国中部山东一带讲究脱骨扒鸡；北方的河北讲究烧鸡(又称熏鸡)，并成为特产，驰名全国。

久负盛名的唐山万里香熏鸡店始创于 1944 年，创始人邓润，祖籍天津市武清县崔黄口村。邓润十四岁到唐山学艺，由于勤奋好学，深受师傅的喜爱，出师后继续刻苦钻研，为了深入研究我国传统食品制作技艺，邓润曾在北京学习宫廷皇家食品制作技艺，博采众家之长，融进南北风味，形成了独特的食品加工制法。

邓润独创的“万里香烧鸡”，在配制中，选料精良，配方独到，调味原料均选用各地名品。因此，烧鸡味道醇美，食而不腻，回味无穷，堪称美食佳品。

1942 年，邓润在唐山小山新成街路南东口，新罗天楼下租了两间门面，自营开设“第一香酒馆”主要经营销售自制的烧鸡、酱肉等食品。由于烧鸡质优味美，受到社会各界赞誉，名传京津两地，邓家名声亦同远震，遂将“第一香酒馆”更名为“邓记熏鸡店”。邓记烧鸡名噪一时，当时的《唐山工商日报》登文对邓家制作的美味烧鸡进行赞扬，报载：“邓记制作的熏鸡香味路遥远”，此一举，邓记烧鸡更是名声大振，1944 年，邓记熏鸡店迁移新成街路北，扩大门面，并借香味路遥远之意，更名为“万里香熏鸡店”。

万里香烧鸡是唐山驰名的传统食品。其特点是“型似琵琶、色泽棕红、香烂适口、香醇甜嫩、味道纯正”，迄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以其独特的传统风味而驰名。在保持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经几十次反复试验，创出了独具风味的万里香烧鸡，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和偏爱，一些海外宾客也对万里香烧鸡交口称赞。1949 年建国后，万里香的食品受到政府的重视，1956 年，邓润制作的烧鸡被列入唐山特产，参加全国食品展览会，受到行家们的高度评价。从此，邓润赢得了“熏鸡专家、酱肉大王”的美誉。1998 年获河北省著名商标、唐山市放心食品、河北省优质产品、第 2 - 7 届河北省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第十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河北省人民政府振兴河北经济奖、全国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先进单位等荣誉。

## 沙河刘的蝓蝓葫芦

有一本由李燃犀在“五四”运动以后撰写的章回体通俗小说《津门艳迹》，该小说以前清光绪中叶都市生活色情凶杀、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的社会劣迹为背景，揭露了豪华堕落的上层社会的种种丑闻轶事。其中在第十二回“未到先知孙阴阳谈相鹤鹑店，肆财傲物高起发误认蟋蟀王”一节当中，提到沙河刘的蝓蝓葫芦，经笔者造访，在武清沙河确有此事，这一史话再现了武清人独具匠心的民间艺术风格和对惟妙惟肖艺术品的赞美，从中闪耀着我区古代先民智慧和创造精神。

清朝中叶，宫中盛行逗蝓蝓这门行当，后来逐步流入民间，一些地方以此为生，买蝓蝓葫芦，做口框儿的、刻蒙心的逐渐兴旺起来，而盛蝓蝓的葫芦比较讲究，按当时的话讲“奇技淫巧，百美骈臻”。蝓蝓分品种，称络纬为“黑虫儿”，蟋蟀为“白虫儿”，品种不一样，葫芦也就不一样。“至于卖葫芦都有专家，自己种着地，有的用纸模子，有的用瓦模子，范出各种形势。有的专盛蝓蝓，有的专盛油葫芦，有的是蝓蝓儿葫芦，有的是蚌嘴儿葫芦，以至于金钟儿、吱啦子，都有一定的。这器皿，无非是因物致宜，取其发音清越。常玩草虫的一看葫芦，便知是谁家的出品。那不用模子规范、天然长成的，名为“本长儿”，更是难得好的。个中有一个艺制葫芦的专家，姓刘，家住沙河，大家都称他作沙河刘。他家出的葫芦比较旁人卓异不群，无论甚么虫儿，放在沙河刘的葫芦里，放出来的音韵与众不同，因而他的声名广播，远近皆知。凡是北京的内监，王公大臣，讲究玩畜虫儿的，都喜欢买沙河刘的葫芦。他的葫芦一律是六块瓦的模，任凭他人如何仿效，终不如他，而且一看，立辨真伪。沙河刘初次到天津，便投奔河东一个混混儿张三。因为脚下飞快，大家送他绰号，叫做燕尾（音 yi）子张三。北京下来的人买葫芦的，必须到燕尾子张三家中去找。皆因张三在河东一带颇有声名，本人又开着蝓蝓圈。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沙河刘投奔张三，便为得是与养草虫儿的人们接近。张三却因沙河刘得与焦老公相识（焦是宫里的公公），焦老公也是爱玩畜虫儿的，每到天津，必找张三买沙河刘的葫芦。

## 《义贞记传奇》记述的武清爱情故事

吴恒宣，字来旬，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人，海州地区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清乾隆年间戏曲家、剧作家。著有《云台山志》、《郁州山人集》；所撰传奇 4 种，《义贞记》、《火牛阵》、《无双记》、《玉燕钗》。另与崔应阶合著《双仙记》。其中在《义贞记》中记述了一段发生在武清的爱情故事，读来颇有兴趣。

据记载，清朝乾隆年间，蒲州太守刘登庸生有一女名秀姑。秀姑天姿聪颖，端庄秀丽，可称得上是美妙佳人。有一次，刘登庸进京期间，结识了山阳县孝廉捐道銜程光奎。程光奎有个儿子名叫允元，与秀姑年貌相当。于是由父母作主，秀姑与允元定下婚约。但不久，允元随父回到南方，从此音信皆无。

刘登庸因事被罢官后，不得已由家乡平谷迁到了天津的北仓（时属顺天府武清管辖），几年后便离开人世。刘登庸本是清官，家中并无积蓄，他这一死家里更加贫困，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自家的房产就连租赁的钱都抵不上，为了生活，干脆卖掉。秀姑与庶母、姐、妹、嫂、侄及弟清善共计八口租住在李姓的一间破房子里，过着无衣无食的日子。秀姑的四弟崇善住在南仓，每天就是卖点儿稠粥都没法保障生活。冬日里，全家人只能互相依靠在一起取暖度日。过了一年，崇善又含泪死去，家里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常常是两三天不能生火做饭。赶上夏日连雨天，房子漏了，一家人只能在屋旁的草棚中，看着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境况惨不忍睹。北仓有张、赵、翁姓三位义士，同情秀姑一家的遭遇，知道准提庵的尼姑照震乐善好施，就把秀姑一家人的遭遇说与照震，照震说：“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于是吩咐人打扫出一间房屋，将一家老小安顿下来。住的地方解决了，吃的还没有着落，三位义士又集资数千送给秀姑一家。每天供给仓米二升，但一家老小仍然不能吃饱肚子。不久，一家人还是相继病饿而死，就剩下秀姑一人。幸亏秀姑靠从小学会的刺绣手艺，借此勉强维持生活。十六年后，秀姑随尼姑照震从北仓迁到天津城内接引庵。又过了十四年，前来进香的人都没见过秀姑的面。每逢庵中有重大活动的时候，许多信女前来，知道庵里有个漂亮的姑娘，争着要一睹秀姑的芳容，越是这样，秀姑越是不想相见，大伙儿都怀着敬慕的心情纷纷离去。刚来北仓的时候，秀姑还有一位弟弟叫宗善，到武清范瓮口（今武清王庆坨大范口）李氏家做了上门女婿，并生有一子名叫永安。宗善曾出门到湖北，但不知何故一去未返。永安长大后曾驾马车带着母亲探望秀姑，想接到范瓮口，但秀姑坚辞不肯。并说：“我已是年过六十的人了，何必再打扰你们呢。”

再说程允元。自从允元随父回到南方后，家父病故，家道也日渐衰落。每次想北上寻找秀姑，其兄都始终阻拦。曾有人传说秀姑已死去，兄长劝允元再娶，而允元决心不能毁掉了与秀姑的婚约。并对兄长说：“即使是秀姑死了，我也要亲自瞻仰一下她的坟墓，有什么事儿然后再议。”这期间程允元生活上始终坎坷仕途上不得志。一晃过去了三十多年，程允元在表侄杨吴增的陪同下，于乾隆年间丁酉年，也就是 1777 年，坐船沿运河北上到了北仓，打听秀姑墓，当地人都说不知道有这事儿。于是顺路到了杨村，再打算前往平谷。在杨村时遇到操拨船的北仓人王福功，当问及王福功是否知道刘登庸一家境况时，王福功说：“多少年前知道有这么一家人，生活可苦了。自从刘登庸死后，儿子壮实的出去谋生都没回来，家里的老少也相继死去了，只剩下四姑娘还在人间，年轻时许配给江苏的程姓公子，听说程公子已经故去，这姑娘誓死不嫁他人，先是住在北仓的准提

庵，后来迁到了津城的一个尼姑庵里，具体叫什么名字就不得而知了！”程允元高兴地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程公子。听说刘小姐已经死去，这次来这里本想瞻仰一下她的坟墓，敬杯水酒以表达心意，没成想她还活着，你带我去一趟庵里，怎么样？”王福功说：“我有个哑巴仆人，很是讲义气。他经常去看望在尼姑庵里的刘小姐，前些年，只要是他听说谁给尼姑提亲，他就用拳教育那些说媒的尼姑。既然知道这次是你想娶刘小姐，这事儿又是阴错阳差，那就得了，让哑巴仆人领着你去，就可以看见。”程允元见到哑巴仆人，说明情况，拉着程允元前往尼姑庵。到了接引庵，叩响门环，出来的正是尼姑照震。女尼照震接待了允元。照震说：“你来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从前有一位新选大尹少年丧偶，听说秀姑很漂亮，就托其亲属给秀姑说媒，秀姑因觉得有辱贞洁而绝食两天。我急忙谢罪才算了事。我已发誓从此再不涉及婚姻之事。你走吧，别再侮辱秀姑的人格了。”照震闭门而入，允元没办法只得惆怅离去。到了船上对时任旗丁的表侄说明原委。其表侄深为感动，约请当地很多讲义气的男女，呼吁官府成全他们二人，并联名呈状至漕运上司，再转呈天津县令。天津县金之忠经查访，得知确有其事。于是派巡司吴喻尼去做秀姑工作。秀姑以无父母主婚为由拒绝。吴喻尼说：“如今你的父母不在，县里人就是你的父母。况且你也是为了程允元而等到这么大岁数，现在程允元前来娶你，你却又不愿意嫁给他。这是什么理由呢？”这时，宗善的内弟李文灿听说了这件事儿，也前来劝导秀姑，并拜谒了金之忠。金之忠选择了吉日，拿出十金让手底下人给他们二人，作为结婚之用，并对李文灿说：“咱们共同商量着把这桩喜事办好。”然后又另外拿出十金，说：“这些钱先给他们买些结婚用品，有些我可能想不到，这些就作为婚礼贴补之用吧。”李文灿把这事儿跟姐姐和照震一说，大家都深为感动，秀姑激动得泪流满面，看到大家都这么热情撮合他们二人，终于答应了这门婚事。

这年六月初八日，金之忠为二位伉俪准备了婚房，扎置了彩车，选派了上好的马夫，招致了两家官府的仪仗队伍，请人书写了“义男贞女”的金字牌。带领着数百名衙役，护送着程允元来到接引庵。这一天，整个大街被围观的人们堵得水泄不通。人们纷纷称赞为这对有情人做了一件好事、义事、善事。

待婚礼结束后，金之忠又赠给二人一些生活费用，并开具了关文，送他们平安回到南方。江苏剧作家吴恒宣将这一段美妙佳话写成杂剧《义贞记传奇》，在民间广泛流传。天津有个周太史曾感慨地说：“像秀姑这样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皈依到佛门之下，又是那样忠贞于佛门，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是她父母家人教育有方，不给家人丢脸，独守做人操守，不沾染坏习气的结果，她这种做人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再说程允元年近六十，非秀姑不娶。始终以为秀姑坟墓敬上一杯酒为自己的心愿，以此洁身自好，拒绝再娶，仗义施情，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再合适不过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金之忠的成人之美，竭力撮合，即使是秀姑再贤惠，也不能促成这段美满姻缘，让后世传为美谈。”有趣的是，秀姑南旋时，山阳知县金公显也是天津人，他为二位新人盖了住房，并发给了“糊口之费”。

后来天津诗人梅成栋在其《津门诗钞》中册卷十二按语中说：“贞女之事始于金，终于金，始于天津地，终于天津人也，亦奇。”

## 明朝发生在武清的“梁祝”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它毕竟是民间传说。在武清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梁祝”故事，只是其结局并非“死后化蝶”，而是“喜结良缘”。

据清乾隆年《武清县志》卷十二《刘方传》记载：刘方是明代一位方姓军人的女儿，年十五时其母死，乃女扮男装，随父运送灵柩回老家安葬。走到武清的蒙村，其父又在一刘姓老者家中病故。她只好将父母暂葬在蒙村。刘姓老者将这个女扮男装的方姓女子收为“义子”，更名刘方。过了两年，山东东阿县的刘奇因黄河失控受灾，逃难也到了武清蒙村，刘方的义父刘翁也收留了他，与刘方弟兄相称。隔了两年，刘方的义父父母双亡。刘奇、刘方守孝期满之后，刘奇提出要娶妻成家，刘方借故阻止。在此之前，刘方的义父父母和刘奇，从不知她是女儿身。

有一次，刘奇见春来双燕筑巢，感触中在墙上题了一首诗：“营巢燕，双双雄，朝暮辛勤巢始成。若不寻雌寄壳卵，巢成毕竟巢还空。”显然，刘奇以燕寓意，说明“双双雄”成不了家。刘方见诗笑了笑，和了一首：“营巢燕，双双飞，天设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愿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刘奇见诗起了疑心，说：“诗不错，能不能再和一首？”于是刘方又和了一首：“营巢燕，声唧唧，莫使青年空岁月。可怜和氏忠且纯，何事楚君终不纳。”诗意很清楚，刘方自比卞和献璧，把刘奇比作楚王因不识而不纳。刘奇大骇，说：“照此说来，弟是花木兰一样的女扮男装了？”刘方点点头儿。刘奇又问：“那么，我们是做兄妹呢，还是做夫妻？”刘方迟迟不答。刘奇一再追问，刘方流着眼泪说：“我父本姓方，因送我母灵柩客死于此，我恐路上不便，才女扮男装。幸喜义父收养了我，和兄在这里一起生活，这不是偶然的。假若和你做兄妹，我若嫁出去，又不愿离开父母的坟墓，请兄三思。”刘奇又惊又喜，想当晚就和她成亲。刘方说：“我若托身于兄，不同于世俗的私奔，而在于承续三家的宗嗣，成三义之名，一定要按正式的礼仪成亲。”刘奇依了，二人坐以待旦。翌日举行了正式的结婚典礼，成了夫妻。后来他们的子孙成了旺族，但溯及根源，系由二刘一方三姓组成，延续着三家后嗣。故被时人谓之“刘方三义”，所居之村亦被称为三义村。

事过数十年后，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将这桩奇闻写成了文章，名《刘小官雌雄兄弟》，收入《醒世恒言》第十卷中。明代作家陶辅的《花影集》中也有篇《刘方三义传》说的也是这件事，使武清蒙村发生的这宗善行义举广泛流传下来。

## 《施公案》与武清小车会

在一年一度的春节花会调演中，人们都会见到惟妙惟肖的小车会表演，其细腻的表情动作，刻画出了剧中人物的多样风格，是较为完整的民间艺术。

小车会表演的是《施公案》中黄天霸带领三班衙役化装成戏班，在庙会上捉拿费德功的故事。主要角色是诸彪(推车老汉)、诸香兰(拉车姑娘)、朱光祖(打莲花落穿青衣留小胡子者)、贺人杰(身背两柄短链锤)，以及黄天霸、张桂兰(黄天霸夫人)、杨香武、费德功等。演员全是油彩化妆、包头、身着戏装，手拿道具。武场以大鼓、大锣、大钹、小钹等伴奏。文场以民乐为主，有唢呐、笙、笛、板胡等。表演动作主要有串四门、下对、跪场、文上桥、武上桥、跑场等。根据鼓点和乐曲，演员以不同舞姿、不同风格进行表演。

小车会表演，是一个竹制的小车道具中坐着一个人(实际是站立行走，盘着的腿为假的)，前面一人拉车，后有一人推车，三人为一体，虽角度不同，动作却协调一致，犹如一个完整的小车在行走。武清一带盛行小车会有百余年历史，并传至第六代的豆张庄乡西柳行村的“太平车会”。其舞蹈内容是根据《八蜡庙捉拿费德功》的故事情节编排的。坐车的美女为武艺高强的张桂兰；拉车人为男扮女装的贺人杰；推车的为诸彪；黄天霸、朱光祖扮成一对卖艺人，每人手拿一霸王鞭；金大力和关太分别扮演大丑婆和二丑婆。大丑婆是整个舞蹈中演员与乐队的总指挥，他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动作，还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敏。其本身本是体魄彪悍的金大力，他与二丑婆同样是男扮女装。因此，表演中既要有女性特点，又要有男性的力度。特别是在其腰身的左摆右晃中，给人以幽默、滑稽之美。小车会舞蹈的基本步为“丁字步”、“踏步”、“云步”、“旁弓步”、“前弓步”、“大八字步半蹲”、“十字步”、“推车蹲裆步”等。

八蜡庙小车会的主要道具是一架彩车，即用竹木绑扎，上饰彩绸和丝线做的车帐子。中间用数根木方打樨，两侧加护栏柱，并留出艺人表演的六角孔做一车排子。排子下面蒙布，挂车围子并绘上车轮图案。此外，在小车会行进表演的场景中，还设置一架拱桥，桥面用铁板或木板铺设，桥身两侧蒙布，上绘有砌石和桥孔图案。

至今，西柳行小车会每到节日都出来表演。他们阵形整齐、层次分明、服装传统，每个演员表演风格独特，文武场演奏多种曲牌与锣鼓点，场面风趣，高潮迭起。

## 《醉茶志怪》中的那些武清记录

《醉茶志怪》四卷，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是李庆辰唯一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时人杨光仪为之作序，极力称誉。此书问世后曾刊行多次。

《醉茶志怪》共有 346篇，其中很大一部分颇似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志怪简明质朴而又富于理趣，轶闻错出其中，多寓劝戒之意。书中可视为小说的虽不足百篇，但其思想内容却相当复杂，故事类型与人物类型亦相当繁多。这些故事多托兴鬼狐，带有传奇色彩，情节曲折，起伏跌宕，颇能引人入胜，许多篇章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中的佳作。其中卷二中的《潮异》、《蛤珠》、《返魂》、《木妖》，卷三中的《猪龙》，卷四中的《武清乙》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武清现实情况，对于爱好文学的读者们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潮异》记载：

邑有潮不过杨之说，事亦甚奇。每潮溢时，御河潮至杨柳青止，北河潮至杨村止，西河潮至杨汾港止，过此无潮。

《蛤珠》记载：

西淀渔人，每夜渔，辄见水上有光荧然，及晓始灭，如有年。一夕，于放光处网得一大蛤，持归其家，旋入市。及还，其妇已煮食，壳中得一大珠如指顶。渔人取珠视之，色黄暗，深怨其妇，妇亦悔。方诟谯间，有二人款门入，谓曰：“珠已熟，无用矣。如愿售，请赠十千。”渔人诺之。二人得珠，欢跃而去。渔人悔，追之已渺。或云仙也。

醉茶子曰：按珠无光，以乳汁煮之，则光复明。是珠应无熟一说。果使熟真无用，又何以十千购之哉？渔人惑矣。

《返魂》记载：

某甲将入都，晚投杨村客店。主人引入后院，窗下停一柩，乃主人之子妇新殁者。甲惧，请迁他所。时客舍填溢，不得已止宿焉。甫就枕，梦一少妇二十许，举止端凝，衣裳整肃，向甲再拜云：“妾棺中人，命合不死，阎君放还。请为白诸阿翁，速剖棺出我，否则不可活也。”甲惊寤，少顷又梦如前。怪而呼主人，告以故。启棺，女果苏。客视其人，宛如梦中所见。因诘其何以求救于客，并冥中何所见，则茫然不解。是知人当不死，鬼神呵护，不必其魂有灵也。

《木妖》记载：

杨村孀妇刘氏，年四十许，素贞静，终岁不出户。庭院中有老木一段，形质朽蠹。妇暑月乘凉，每坐其上，觉有人道之感，遂有孕。将近弥月，妇泣谓其子曰：“予贞洁自持，不图有此奇丑。尔为我招亲党，所产妖物，请众观视，以明我心。”子如其教。及期产一男，体甚肥白。众皆匿笑。妇惭忿，剖之，儿肾内一木条，弯曲至脊，解视肢体，骨节皆如朽木，殆感木妖之气而成也。众疑始释。然则楚姬产铁，事或不诬也。

《猪龙》记载：

辛未岁，河水涨发，有渔人于潞河中央见一物，首大如丘，其形类豕，头浮水面，顺流而下。或云是猪龙也，见之主一邑大水。纪文达公笔记曾载水中巨羊头浮于波面，云亦是龙。设此二物相遇，不知自以为何如也。

《武清乙》记载：

武清某乙，勇敢好武，善习拳勇。与里中健男角力，均莫能敌，以故勇名大著。先是乡俗，凡有丧者之家，每择一静室，盛设酒肴，布夹于地，扃门禁人窥探，夜深往往闻室中枷锁叉钹声。次日启视，地上或有人足迹、鸟兽蹄印等形，

即知亡者后身托生何物，谓之出殃。此俗闻吾邑昔年亦然，自嘉庆年间始不行焉。某乙偶吊诸戚家，适遇殃期，欲窥其异，阻之不可，乃入室匿帷中。三更许，闻窗外旋风骤起，俄入室，烛摇摇欲灭。风定，有一鬼物立堂中，手持利叉，身高如中人，巨面高准深目，顶有双歧如角，皮色黝黑如熊掌，袒臂着朱裙。亡者被枷锁，伛偻随其后，谦抑如延上宾。鬼登筵大嚼，饕餮有声。乙视其状，暗思其貌虽狞恶，而身仅类中人，应无大力，盍出其不意而擒之？乃跃出大喝。物惊起，乙遽捉其发，而脑后殊濯濯然如髡，急按其脖，物伏于地，乙老拳毒手大肆发挥，物嗥叫欲遁，声啾啾然。乙提其叉猛刺之，如烟而没。回顾亡者亦渺，而叉犹在手，喜其锋利。及晓视之，则银箔所糊，长仅尺许耳。

本书所选收的作品，均系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的佳作。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的武清故事

《阅微草堂笔记》为清代文言笔记小说集。作者纪昀，字晓岚，清乾隆时人。他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到乾隆皇帝嘉奖。本书主要记述鬼狐怪故事。有的是小说，有的仅为随笔杂记。

其中作品或表现作者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与同情；或用辛辣痛切的语言对吏治的黑暗，腐败，以及官员贪赃枉法丑行予以抨击，对社会的种种弊病，以及世态人情的浇薄、奸诈等等进行讽刺和指斥；或对道学家的拘迂、虚伪给以深刻揭露。还有几篇不怕鬼的故事，写来饶有趣味，脍炙人口。此外，书中对异域的描绘，文笔清新，引人入胜。

文字的风格，尚质黜华，简雅隽永。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给予较高评价：“凡侧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阅微草堂笔记》清代文言小说中的重要作。其历史地位及对清代小说发展的影响，仅次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这本书中记载了武清的有关故事。

在卷二《栾阳消夏录》(二)中曾记载：

又武清王庆坨曹氏厅柱，忽生牡丹二朵，一紫一碧，瓣中脉络如金丝，花叶葳蕤。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从柱而出，纹理相连，近柱二寸许，尚是枯木，以上乃渐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时亲见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先生曰：物之反常者为妖，何瑞之有！曹氏亦式微。

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带殉，越数年墓前恒见一白蛇。后墓为水啮，棺坏朽。改葬之日，他珍物俱在，视玉带则亡矣。蛇身节节有纹，尚似带形，岂其悍鸷之魄，托玉而化欤？

译文：还有，武清王庆坨曹家大厅的柱子，忽然长出两朵牡丹花。一朵紫色，一朵碧绿色，花瓣中的脉络好象金丝，花叶繁茂下垂，过了七八天才枯萎谢落。花的根从柱生出，纹理与柱相连；靠近柱子二寸光景，还是枯木，往上才渐渐发青。先母太夫人是曹氏的外甥女，小时亲眼见过厅柱的牡丹，当时都认为是吉祥征兆。我的外祖雪峰先生说：“反常的物就是妖，哪有什么吉祥征兆？”后来曹氏门庭也衰落了。

先外祖母说：曹化淳死后，他的家人用明代的一条玉带殉葬。过了几年，他的墓前常见有一条白蛇。后来坟墓被水浸蚀，棺材朽坏。在改葬那天，其它珍贵的东西都在，而玉带却不见了。蛇的身上有一节节的花纹，像玉带的形状。难道是他凶猛暴戾的魂魄借玉而化的吗？

在卷七《如是我闻》(一)中记载：

干宝《搜神记》载马势妻蒋氏事，即今所谓走无常也。武清王庆坨曹氏，有佣媪充此役。先太夫人尝问以冥司追摄，岂乏鬼卒，何故须汝辈。曰：“病榻必有人环守，阳光炽盛，鬼卒难近也。又或有真贵人，其气旺；有真君子，其气刚。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肃杀之气，强悍之徒，有凶戾之气。亦不能近。惟生魂体阴而气阳，无虑此数事，故必携之以为备。”语颇近理，似非村媪所能臆撰也。

译文：干宝的《搜神记》记载马势的妻子蒋氏的事情，就是现今所谓的走无常。武清王庆曹家，有个老仆妇充任这个差使。先母太夫人曾经问起阴司追捕，哪会缺乏鬼卒，为什么还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回答说：“病人的床榻必定有人四面守护，阳气炽烈，鬼卒难以接近。又或者有真正的贵人，他的气旺；有真正的君子，他的气刚，鬼卒尤其不敢接近。又或者是带兵主刑的官，有严峻酷烈之气；

强横凶猛的人，有凶残暴戾之气，鬼卒也不能接近。只有生人的魂灵身体是阴的而阳气却旺盛，不用顾虑这些事，所以一定要携带他们以备不时之需。”话说得颇近情理，好像不是乡村老妇所能够杜撰出来的。

在卷八《如是我闻》(二)记载：

《杜阳杂编》记李辅国香玉辟邪事，殊怪异，多疑为小说荒唐。然世间实有香玉。先外祖母有一苍玉扇坠，云是曹化淳故物，自明内府窃出。制作朴略，随其形为双螭纠结状。有血斑数点，色如熔蜡。以手摩热，嗅之作沉香气；如不摩热，则不香。疑李辅国玉，亦不过如是，记事者点缀其词耳。先太夫人尝密乞之，外祖母曰：“我死则传汝。”后外祖母歿，舅氏疑在太夫人处，太夫人又疑在舅氏处。卫氏姨母曰：“母在时佩此不去身。殆携归黄壤矣。”侍疾诸婢皆言殓时未见。因此又疑在卫氏姨母处。今姨母久亡，卫氏式微已甚，家藏玩好，典卖绝尽，终未见此物出鬻。竟不知其何往也。

译文：《杜阳杂编》记载了李辅国香玉辟邪的事，特别怪异，人们多疑这件事是荒唐的小说。可是，世间确实有香玉。我的外祖母有一个青玉扇坠，据说是曹化淳的旧物，从明朝内府中盗窃出来的。玉坠的做工朴素简略，是随着玉的自然形状雕刻成两条螭龙互相缠结的样子。上有几点血斑，颜色如同熔化的蜡油。用手摩热玉坠，拿到鼻前嗅，就能闻到沉香气味；如果不摩热，就没有香味。怀疑李辅国的香玉，也不过如此，只是记事的人点缀词语，作了夸张而已。一次，先太夫人向外祖母秘密乞求这个玉坠，外祖母说：“我死以后就传给你。”后来外祖母去世，舅父怀疑玉坠在太夫人手中，太夫人又怀疑在舅父手中。卫家姨母说：“母亲生前佩戴这个玉坠，从来没有离过身。可能是带到土里了。”可是，侍奉疾病的婢女们都说入殓时没见玉坠。因此，又怀疑玉坠落在了卫家姨母手中。现在卫家姨母早已去世，卫氏家境败落得很惨，家藏的古物器玩，全部典卖一空，一直没见出卖玉坠。到底还是没人知道玉坠落到了哪里。

在卷十二《槐西杂志》(二)记载：

王庆坨一媪，恒为走无常(即《滦阳消夏录》所记见送妇再醮之鬼者)。有贵家姬问之曰：“我辈为妾媵，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恶相抵，大善恶则不相掩。姨等皆积小善业，故今生得入富贵家；又兼有恶业，故使有一线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业，则恶业已偿，善业相续，来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恶业，则善业已销，恶业又续，来生恐不可问矣。然增修善业，非烧香拜佛之谓也，孝亲敬嫡，和睦家庭，乃真善业耳。”一姬又问：“有子无子，是必前定，祈一检问。如冥籍不注，吾不更作痴梦矣。”曰：“此不必检，但常作有子事，虽注无子，亦改注有子；若常作无子事，虽注有子，亦改注无子也。”先外祖雪峰张公，为王庆坨曹氏婿，平生严正，最恶六婆，独时时引与语，曰：“此姬所言，虽未必皆实，然从不劝妇女布施佞佛，是可取也。”

译文：王庆坨的一位老妇人，是常常走无常的巫婆(即《滦阳消夏录》所记载的那个能看见送妻再嫁之鬼的老妇。)有贵族家庭的姬妾问她：“我们这些人人都做人家的姬妾，是从何因果而来？”她说：“阴间的法律是小的善恶行为可以相互抵偿，大的善恶则不能相互抵偿。姨娘们都积下了小的善业，所以此生可进入富贵家庭；也都兼有恶业，所以使你们还有美中不足。你们在此生如果能增修善业，则可抵偿过去的恶业，善业相加，下辈子就能十全十美了。此生如增修恶业，将善业抵销，恶业相加，下辈子恐怕不可想象了。但增修善业，并非是烧香拜佛之举，孝顺长辈，尊敬正室夫人，使家庭和睦，才是真正的善业。”其中一人又问：“有子无子，这必然是命运前定的，请你查一查。如果阴间的簿籍上注定我

无子，我也就不再作这梦想了。”她说：“这不必查，只要常作有子的善事，即使阴籍注着无子，也可改注有子；要是老作无子的恶事，即使阴籍上注着有子，也可改注无子。”我的外公张雪峰先生，是王庆坨曹家的女婿，平生严肃正直，最恨媒婆、巫婆等类走家串户的三姑六婆，但却常常叫这位妇人来说话，并说：“这个老妇人所说的虽然不见得都符合事实，但是她从来劝妇女依赖布施去讨好佛法，这是可取的。”

在卷十四《槐西杂志》（四）中记载：

倪媪，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舅姑怒，逐诸门外，使自谋生。流离艰苦，抚二子一女，皆婚嫁，而皆不才。茕茕无倚，惟一女孙度为尼，乃寄食佛寺，仅以自存，今七十八岁矣。所谓青年矢志，白首完贞者欤！余悯其节，时亦周之。马夫人尝从容谓曰：“君为宗伯，主天下节烈之旌典。而此媪失诸目睫前，其故何欤？”余曰：“国家典制，具有条格。节妇烈女，学校同举于州郡，州郡条上于台司，乃具奏请旨，下礼曹议，从公论也。礼曹得察核之、进退之，而不得自搜罗之，防私防滥也。譬司文柄者，棘闱墨牍，得握权衡，而不能取未试遗材，登诸榜上。此媪久去其乡，既无举者；京师人海，又谁知流寓之内，有此孤嫠？沧海遗珠，盖由于此。岂余能为而不为欤？”

念古来潜德，往往藉稗官小说，以发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诸琐录。虽书原志怪，未免为例不纯；于表章风教之旨，则未始不一耳。

译文：倪老婆婆是武清县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了丈夫。公婆想要嫁她，她发誓不嫁。公婆生气，把她赶出家门，让她自谋生路。她流离失所，非常艰苦。她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抚养成人，结婚成了家，却都没有出息，她孤零零地没有依靠。只有一个孙女削发做了尼姑，她就寄食在尼姑庵里，赖以生存。如今她已七十八岁了。她可以说是年轻时立志，一辈子贞洁。我怜悯她的气节，也时常周济她。马夫人曾经对我说：“老爷身为礼部尚书，主管天下节妇烈女的旌典表彰，而这个老太太就在眼前却顾不到，这是为什么？”我说：“国家的典章制度都有程序。节妇烈女，由学校推举到州郡，州郡上报给御史台，然后才启奏皇上下圣旨，下达礼部衙门评议，为的是听从公论。礼部可以调查核实，决定取舍，但不能擅自搜罗人选，以防止营私或滥加表彰。比如掌管科考的，可以在科考的答卷中，行使权力录取，但不能录取没有经过考试的遗漏人。这位老太太长期离开家乡，既没有推举她的人，在京城的人海中，又有谁知道有这么个孤寡的老太太。沧海遗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我能做而不做。”想古往今来被埋没的有德之人，往往借助小说，才得以发出一点光亮。因此，我大略记些倪老太太的情况，附在这本琐谈录中，虽然本书属于志怪，写进这些内容与体例不合，但在表彰教化的宗旨上，却是一致的。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晚年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他虽然是公认的清代著名学者，乾嘉时期统治阶级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但由于作者身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其作品的宗旨无法摆脱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书中充满了因果报应、天道轮回等内容，多数篇幅属于道听途说或臆造事实，结果使得这本书的艺术成就收到了限制。

## 清末武清奇案

清朝年间，杨村有个杨老汉，六十多岁了仍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守着祖业田产过活，倒也衣食丰足。不足的是老伴去世多年，不免有些寂寞，但所幸留下一儿，小字名叫红玉，年方十五岁。这红玉长得清秀喜人，从小就老实听话，街坊邻居都喜欢他，夸他将来和他爹一样，是个承家守业的好后生。杨老汉对儿子更是爱若珍宝，早早地就为他聘了个童养媳养在家里。这童养媳叫蕙姑，小模样也很可爱，是五十里外柳姓人家的女儿，柳家看中杨老汉家道殷实，儿子红玉与蕙姑年龄相当，人又规矩，就答应了杨老汉把闺女提前送到杨家做童养媳。而杨老汉心疼儿子，怕他孤单，没个耍伴，故要蕙姑以童养媳的身份先送到杨家来。

蕙姑进杨家后，红玉和她日常在一起嬉戏说笑，两小无猜，日渐情厚。杨老汉一心盼望早点抱上孙子，在蕙姑过门三年后就为他们二人办了婚事成了亲。结婚那天，杨老汉家贺客盈门，一对新郎才女貌，招引得客人们赞不绝口。连连夸说：“新郎新娘真是一对玉人哪，玉人哪！”大家纷纷向杨老汉祝贺：“您老好福气啊！守着这么一对佳儿佳媳，往后日子好开心哦！”“就等着抱大孙子吧！”杨老汉捻着花白的胡须，笑咪咪地瞅着锦衣花簇的一对儿女，也觉得心满意足，禁不住呵呵地乐。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次日艳阳高照，杨老汉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停当，用过早饭，见儿子儿媳的新房门仍紧闭无声，猜想小两口新婚燕尔，甜蜜如梦不知晨昏，也便不太在意。心里笑道：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吧。于是自己在院内闲溜了一会儿，看鸡鹅争食，又到田头村道走了一遭，看了看庄稼长势，散了散心。回来已是将近晌午该用午饭的时候了，却见新房门仍然紧闭，杨老汉心中不免来气了，觉得儿子儿媳太不懂规矩，纵是新婚情蜜，哪有大白天还躺在床上缠绵的呢，这岂不叫村人笑话，叫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人们会笑我老杨没家教！正气间，猛然又想，不对！儿子红玉循规蹈矩，怎会这样呢？媳妇是从童养媳养大的，平日里也曾教她长幼男女的礼节，虽是新婚媳妇了，但也不会连晨省昏问的规矩都不顾、日上三竿还不出来拜见我这个公爹吧！他越想越心疑，便在院内大呼：“红玉，红玉！啥时候了，还不起来！”连叫几声屋内无动静，杨老汉一下心慌了，忙叫来伙计：“把门打开！”伙计将门撞开，杨老汉也顾不得男女内外有别、翁媳礼规体面的事，闯进新房里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新妇全身裸露，仰躺在床上，而新郎红玉却不知去向。走近观看新妇，面容依旧，摸摸手，却已冰凉，早已死了。检查身上却没有一处伤痕，只有锦缎被褥上淌有一滩血迹精斑，显见是二人欢爱时遗留的。杨老汉不禁放声哭嚎，他既哭眼前已命丧黄泉的儿媳，又痛心儿子的不知去向生死未卜。杨老汉老泪纵横，哭嚎得气咽声哑，左右邻居闻声赶来，见此惨状都惊得张口结舌，大家窃切私语，议论纷纷，都不知杨老汉家里这出悲剧是为何发生的。

杨老汉涕泪满面，呆若木鸡，众人见他已无法理事，便主动帮他料理起新妇的丧事来。众人皆叹息不已，一面请人去寻找杨老汉儿子红玉的下落，一面派人给柳蕙姑的娘家报信。杨老汉虽悲痛得茶饭不思，但见众邻舍都来帮他料理丧事，又极力劝解他，只得自己打起精神来主事。杨老汉认为：媳妇死得突然，是凶死，不吉利；况且正是炎夏，天气酷热，他怕儿媳的尸体停在家里日久腐臭，招致瘟疫，传染邻里人家，第二天便请人收殓了棺材，抬到荒野坟地里葬了。

三日后，柳蕙姑的父亲得知女儿死讯后赶到杨家，见女儿的丧事已办完，棺材已经葬到坟地里去了，连女儿最后一面都没见上，不禁哀痛锥心，老泪纵横，长声痛哭。悲痛之余他心里开始起疑，就追问杨老汉：“我女儿死了，为何不等我来见一面就埋葬了？”杨老汉悲叹道：“媳妇之死惨不忍睹，又加上天气炎热，怕尸体腐臭招来瘟疫传染邻家，故匆匆葬了，实是无奈啊！”柳父又问：“蕙姑得何病而亡？”杨老汉据实说：“洞房花烛，二人欢爱，并没生什么病。”柳父惊异道：“这可怪了，好好的我女儿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又追问：“为何不见你儿子红玉？”杨老汉又哭着说：“玉儿自那日新婚酒宴之后，晚上进了新房，至今不见踪影，也不知他哪里去了，生死不知。已请人去寻找了好几次，还是音讯全无！”柳父听了更加气恼：“呸！哪有这样事？谎话，胡扯！定是你儿子嫌弃我女儿，新婚之夜害死了她！又怕担当杀人的死罪，故连夜逃了。说不定是你们父子合谋将我女儿害死，好日后另娶新人。这明摆着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你还狡辩，我姓柳的可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当初是你求着要我家蕙姑到你家做童养媳妇的，可怜我女儿小小年纪就到了你家，她规矩懂礼，没犯一点过失，你们父子如何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将她害死？真是天理难容！”杨老汉有口难辩，只得忍气听亲家责斥。左右邻舍看见这情形，都来替杨老汉辩解、作证。柳父道：“你们众人作证，我说不过，如果红玉在这里的话，这件事也就容易弄明白了，可现在他畏罪躲起来不见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女儿不能白死，我只好到衙门告状了！”说罢，柳蕙姑的父亲愤愤地拂袖而去，立刻到县衙告了杨老汉父子的状。

隔日，县令率差役到了杨村，地保迅速安排地方设了公堂。县官把杨老汉叫到堂前，审问他新婚之夜媳亡子逃的事情始末，杨老汉颤巍巍地跪地如实禀告，县令又问众邻居，大家说的都和杨老汉一样。县令又问柳蕙姑父亲：“你女儿在家时可曾与人有过私情？”柳父答道：“老爷明鉴，我女儿蕙姑十三岁就到杨家做了童养媳，如何会有私情呢？”县令听了自思：“既然如此，撇开情杀不提。”便发话道：“你们众人都是一面之词，谋杀还是自亡，打开棺材就真相大白了。”于是叫差役拿绳子捆了杨老汉，牵着他到坟地指认了儿媳的坟墓，众差役掘开坟打开棺材，只见棺材中哪里有什么死去了的妙龄新娘，只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子躺在里面！围观在场的包括县令都大吃一惊。县令厉声审问杨老汉：“这是怎么回事？”杨老汉此时也是一头雾水，糊涂得话都说不出。县令又责问众乡邻：“你们刚才还为他作证，如今可怎么说？”众人都说：“老爷，我们实在不敢说

谎，当时是亲眼看见杨家的儿媳殁进这棺材里的，亲眼看见棺材被抬到这坟地里葬下的，实是没有半句谎话。现在新妇变成了老人，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柳父禀道：“老爷，棺材既然是杨老汉家抬出来的，我那棺材里的女儿如何换成了这老人的尸体，杨老汉一定知道。我女儿到哪里去了，请老爷做主，定要问他个明白。”县令听了，又把杨老汉押到堂上，叫差役动刑拷问他，逼他说出实情。杨老汉虽然熬不过大刑的折磨，却实在说不出什么，他人又老实不会说话，只好死受。众邻居又来替他求情，县令只好暂时把他押入县牢里，一面叫人把棺材重新掩埋了，一面贴出告示，招人来认领棺材里的那个老人尸体。

此事过了月余，忽然一天一个人来县衙自动投案，说自己是杨村杨老汉的儿子红玉。县令立即升堂审问他，红玉此时道出实情说：“新婚之夜，洞房花烛，因自己平日和她玩耍惯了，今忽成了新婚夫妇，天随人愿，欢喜无限，就和她戏耍玩笑，用手戏掐她的身上，引得她笑个不停，不想一下掐中了她的神谭，她忽然倒在那里不动了，我急忙持灯照她，久唤不应，四肢冰凉，才知已经死了。”

原来红玉掐中了蕙姑的神谭，她一下背过气去了，他却不懂解痉之法，又怕担害死人之罪，一时畏罪连夜逃走躲在一个朋友家中。他却不知道这事连累父亲杨老汉获罪入了狱。近日那个朋友在县城偶然看到县令贴出的告示，遂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他才得知父亲因他而被押在狱中受苦，不久将判刑抵罪，所以急来投案，红玉说：“请求老爷释放我父，红玉情愿自己领罪。”县令听了红玉的诉告，深信不疑，当即释放了杨老汉，把红玉押进了县牢里。

杨老汉被释放回家后，终日闷闷不乐，自言自语，邻人见他如此，怕他得了疯癫病，都来劝解他：“儿子已经回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虽然还关在牢里，可他并未犯故意杀人的死罪，日后再慢慢想办法救他出狱，出了狱再给他娶一房媳妇，日子不照样会好起来嘛。”又有人劝道：“你自己一个人老是愁闷，日久非生病不可，不如自己出外去散散心，让心情好起来。”杨老汉深感邻居们的好意，便真的打了一个简单的包袱背上，出门去了。

出了村，杨老汉惆怅不知所往，徘徊良久，突然想起离杨村七十里外的文昌县是个大县城，人烟密集，商铺繁华，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于是便搭上一条船前往文昌散心。船行到一个叫周溪的村镇边，杨老汉抬头一望，忽然看见远远河岸上的垂柳下有一个年轻女人在洗衣服，那身态有些熟悉，不由心跳了一下，待船行靠近岸边时，杨老汉细瞅那女人，竟然像自己的儿媳柳蕙姑。杨老汉这一惊不小，愣愣地看了那女人好一会儿，心里寻思：天下女人相貌相像的很多，但名字多有不同，我何不用蕙姑的名字唤她试试，要是她不应那就不相干了。于是杨老汉壮着胆子抬头冲那个女人大叫道：“蕙姑，蕙姑，是蕙姑吗？”他叫声未落，那女人已经抬头看见了杨老汉，不觉也吃了一惊：“来的人是我的公爹吗？您老因何来到这里？请下船来，儿媳有话想要向您说呀。”杨老汉听了她这话，惊疑不定，远远地问：“你是鬼呀还是人呀？”蕙姑脸现凄惨之容说：“儿媳是人，不是鬼呀，请您不要多疑，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您先下来再说吧。”杨老汉叫

船老大将船缆住系在岸边，上了岸跟蕙姑走。大约走了一里多地，进到一所草房里。里面虽不十分宽敞，却很洁净，看着不像一般农家光景。杨老汉坐下后，直言问道：“蕙姑你因何到了这里？你可要实话告诉我，我不会责怪你的。”蕙姑听了十分悲伤，泪流满面。就把那夜的遭遇据实告诉了杨老汉。

原来，新婚之夜蕙姑一时背过气去，到第二天夜里却苏醒过来了，此时棺材已埋在坟地里。好在当时杨老汉用得急，买的只是一副薄木棺材，木板薄且有缝隙，尚能有空气流通，蕙姑在里面用力撑开板缝，大声呼喊求救，缝隙被她撑得越来越大，她才得以呼吸通畅不死。到第三天天亮时，有两个木匠背着工具经过坟地，他们是叔侄二人，姓寇，隐隐听到新坟中传出的呼救声，大吃一惊，于是两人停步察看，发现新坟上的土有震落，呼救声正出自于此坟，便挖开坟撬开棺材，发现新妇还活着。这蕙姑原本就年轻貌美，又穿着华丽的婚服，更加光艳夺目，木匠中的那个侄子见了就心动了，要把蕙姑带回家去，他那个叔父是个正直善心的好人，不许侄儿这样做。就详细问明了蕙姑的住处要送她回家去。他侄儿说：“叔，我如今已长成大人了，又缺少钱财，要娶媳妇也是一大难事。如今救下的这个女人正好，一不麻烦媒人说亲，二不费一文聘礼，我就娶她做老婆了，岂不是天赐良缘？”他叔叔说：“你这样做是乘人之危，伤天害理，是犯罪。不如你把她送回她丈夫家，他家必然会厚礼酬谢你，你得了好处，也不会惹下什么麻烦，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侄子生气了：“为贪图一点好处，白白丢了这样漂亮的媳妇，傻子才干呢！况且她夫家早就以为她死了才埋的，我现在救了她带她回家去，他夫家也说不出什么来，您要是不说出去别人谁知道？”他叔叔说：“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这样做，日后一旦事发，人家会把你当盗墓贼再加上抢占民女罪，到时候必然会牵连上我。我老了，不想再去受牢狱之苦，这事我决不许你做。你不愿送她回去，我就独自送她回村。”又对蕙姑说：“娘子你不用怕，老汉送你回你夫家去。”蕙姑听了十分感激，就跟着寇老汉走。没走多远，忽然身后噗地一声巨响，蕙姑回头一看，只见那寇老汉已倒在地上，他那侄子手持大斧正朝他老叔后背猛砍，血流遍地，蕙姑吓得跌倒在地。那寇木匠狠心砍死了自己的叔父后，把他的尸体扔进了那副棺材，盖好钉牢，掩上黄土，于是完好如初。寇木匠转身一把将蕙姑从地上拉起来，逼她跟他上路。蕙姑跪下哭着哀求他：“好人求你放过我，送我回杨村，我一定重重谢你，给你足够你娶一个新媳妇的钱，决不食言。”那寇木匠鼻子里嗤了一声，色迷迷地看着她笑道：“放着眼前的美人我不要，倒去梦里寻老婆？世上有这样的傻蛋吗？你要是跟我回家，我一定好好待你，你要说不的话，我就赏你两板斧，让你和我那叔叔一块儿躺到棺材里去！”蕙姑听了那些狠话，心想要是不答应这个凶徒，一定会被他杀死。拼着一死固然能保留清白之身，然而这个冤仇就终究不能洗雪了，而且丈夫和公爹也永远不会知道我蕙姑是怎么屈死的，不若暂时留下性命，待日后找机会报仇！蕙姑于是忍悲含泪跟寇木匠走了。木匠一回到家中就逼她成了亲，蕙姑纵然有满腹冤屈，也只得从了他。

杨老汉听罢蕙姑的哭诉，不禁泪如雨下，连声说：“儿啊儿啊，想不到你受了这样的苦。这都怪我，怪我呀，怪我一直想得不够周到，匆匆忙忙就把你的身体埋了，害你遭这恶贼的欺辱，罪过啊，罪过啊！”蕙姑也是悲哭不已，杨老汉再三安慰儿媳，又把家中变故告诉了她，对她说：“你不知我有多愁苦啊，你如果不回去，这个冤案就无法了结，红玉早晚会在牢里折磨死。赶快跟我回家去吧，等那个姓寇的恶贼回来了，你就逃不掉了！”蕙姑急忙收拾了一下，跟着杨老汉乘船返回杨村。

一路顺风地进了村，快到家的时候，蕙姑忽然看见对面有个后生背着斧锯匆匆走来，仔细一看正是寇木匠，那寇木匠见蕙姑和杨老汉在一起，大吃一惊，感觉不妙，就上来强拉蕙姑跟他回去。蕙姑此时有杨老汉在身边，不再怕他，大声骂道：“呸！你这个恶贼，我以前是身单力弱才被你抢走，今天老天有眼，我婆家公爹来救我回村了。你这恶贼六亲不认，连你亲叔叔都杀害了，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在我面前行凶！”杨老汉听了蕙姑这些话，方才知那个后生就是寇木匠，气得扑上去就打，还一边大喊：“捉贼啊，快捉贼啊！”村人都闻声赶来，围上去把那寇木匠五花大绑押送到县衙。杨老汉也领着蕙姑上堂击鼓喊冤，县令闻听，立刻升堂，一用大刑，那寇木匠吓得尿了裤子，连连磕头服罪画押，县令一声令下将他押入死牢。又叫人把杨红玉从牢狱里提了出来，当堂释放。

柳蕙姑见丈夫红玉形容憔悴，披枷带镣，十分凄惨，不禁扑上去抱住他放声大哭。县令见了也觉怜悯，便叫他们二人相搀着回家，重新结为夫妇。至此，杨老汉的老脸上一扫乌云，方才绽开喜色。

原来那寇木匠到杨村邻近的地界做了半月木工，那天正好完工回家。因离杨村不远，也是他劫数已尽，行至半路，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媳妇正是从杨村的坟地里救活后抢回家的，而今神鬼不知，心中好不得意，便想绕道杨村看看动静，不料正好撞见蕙姑跟随杨老汉返回家来，真正是冤家路窄。

杨村的这桩婚夜奇案最终以喜剧收场，从此传得四乡八镇人人皆知了。

## 《华勇营出军志》记述的河西务

1902年，英国军官巴恩斯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回忆录《华勇营出军志》，保存了八国联军在1900年3月至10月侵华期间所有活动的细节。

巴恩斯（1867~1937）出生于印度喀什米尔。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后，他被陆军选派来华，协助组建了包括印度兵、安南兵、香港及新加坡的华人士兵在内的威海卫中国团——华勇营。在华期间，他随该团镇压威海卫民众的起义，参与了天津解围。1900年，他率领该团的一个分遣队开往北京，参与了攻陷北京之战。1937年，在英国去世。

巴恩斯在“华勇营”服役期间，写下了大量日记，后以日记内容为基础，编撰《华勇营出军志》一书。该分为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周边的战斗、天津陷落之后、开往北京、其他战役、保卫交通线路等八个部分，共三十三章。

据书中记载，“华勇营”成立后，先被用来镇压当地的抗英斗争。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华勇营”被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英国陆军军装。1900年6月22日，“华勇营”192名士兵和10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

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巴恩斯写道，华勇营“是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唯一英军代表，非常光荣。”

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8月4日下午二时，联军途径武清向北京开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在英占区站岗放哨。8月28日，“华勇营”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

“华勇营”在驻守的河西务镇，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写道，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在于他们见到是“华勇营”看守，便将此地认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绝不容其他军队插手。有几次，德国兵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便出手干预，德国人只好乖乖付钱。醉酒闹事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惩戒过两次，日军军官两次都登门道歉。“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吸引了当地百姓的关注。十多英里外，另一个镇子也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

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

《华勇营出军志》虽然出自一个侵略军军官之首，很多语言也充满敌意，但对于认识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研究他们在武清的侵华史，弥足珍贵。

## 《永庆升平》中的武清故事

清康熙年间，河西务街上出现了一家“广聚粮店”，老东家张德玉，家有良田数顷，膝下三子：长子广聚、次子广才、三子广太，是个人财两旺之家。张德玉平日熟读外科，乐善治病，口碑很好。三子广太 13 岁时，老父去世，将粮店分予长子，田地分予次子，因广太尚小，不事经营，遂将钱财留在广太名下，让其与母亲一起生活。广太不喜读书，偏好丝弦，迷恋武艺，尤善交结，终日里呼朋唤友、出入赌局。16 岁时受朋友撺掇，在勾栏院“四美堂”结识落难女子韩红玉，互许终身。两人来往当中，广太耗银数百，家中断了接济，便四处赊借。长兄广聚本是异母所生，将广太视如眼中钉，为谋夺家产，就在中秋之夜，趁广太醉酒熟睡之机，将其装入布袋，准备活埋。就在广聚外出挖坑之际，广太将腹中酒饭倾吐一地，家中一只白犬入室舔食，顿时醉倒。所幸两位嫂子为人贤良，私下急用醉犬将广太换出，待广聚返回后，于慌乱中误将白狗埋掉。张广太死里逃生，从运河搭船到了天津。一次在娘娘宫前打把式卖艺，偶遇回族老丈回教正，被收为徒弟。三年之后，师傅见他练就一身好武艺，便赠他短刀一口，避血块一只，任他自谋生路。广太与师傅分别后，凑巧在运河上见到几只官船，船旗上写“钦命上海道哈”。这位哈大人生性好听词曲，遂将广太带到任上。后因军功，被康熙老佛爷加封三品衔，以副将留用，准戴花翎，赏穿黄马褂，钦赐博奇巴图鲁，并赏银二千两，准假半年，指婚通州府守备胡忠孝之妹为妻。在衣锦还乡途中，为试探其兄，就在离河西务六里之遥处打尖住店，换着破衣行至家门。其长兄见之疑是鬼魂，仓惶逃避，后又买动官家将其告上公堂。就要动刑之际，他的随从送来官衣官帽，将恶兄和贪官吓得跪地求饶。张广太念及嫂子的救命之恩，最终还是宽恕了兄长，一家人相聚团圆。张广太遂遵旨娶胡赛花为妻，又接韩红玉进门，胡氏贤淑，不论尊卑，一家人和睦而居。后张广太屡建军功，直做到江苏水师营副将。

就在张广太将诸事料理停当之后，他不由得想起那条因为自己而无辜枉死的白狗，心中甚是悲怜。遂在村北一里之遥的自家地里，找到了当年埋狗的地方，专为白狗修建了一座坟墓，并于坟前栽松树、立石碣，唱对台戏。一时间，白狗坟的故事传遍了京城乡里，并被评谈古今之人广为演绎传播。二百多年后的光绪年间，有文人郭广瑞将其编著成书，名《永庆升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其故事情节有不少为全国性剧种京剧所采纳改编，后人也曾将此事编成评书《血祭白狗坟》等曲艺形式，使河西务发生的这桩千古奇闻得以流传永久，在民间产生了深远影响。

郭广瑞，字筱亭，一作晓亭，自署燕南居士，大概为京畿一带人。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有“国初以来，有此实事流传”，“实有古迹可凭，并非古词野史”云云。另据传说，在河西务药王庙东北隅，即今五七村东北角一里许处，确曾有过一座白狗坟，后因洪水冲淹，加之张家后人疏于管护，便消失了。还有，在清末民初时，河西务街里有一家专门经营盆碗的店铺，这就是乡人熟称的“碗儿张记”。“碗儿张记”的后人就曾向人们讲述过白狗坟之事，并声称他家就是广聚粮店张德玉的后代。通过上述情节，白狗坟一事虽则听着有些离奇，但又让人不能不信。

## 《蜚阶外史》记述的武清故事

《蜚阶外史》被学界称为“能与《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骖驔者，甚属寥寥。”它与张昞的《琐事闲录》、边厚庆的《旅居笔记》以及何宗海的《惜荫轩随笔》统称为晚清民国文言小说四种，前三部作品代表了晚清河北文言小说创作的成就。

《蜚阶外史》作者高继珩。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高继珩（1797—1865），号寄泉，宝坻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人，由河间大名教谕，任广东盐场大使。才优学博，与边袖石、华枚宗并称畿南三子。工墨兰，任意挥洒，每画扇题诗赠友。著《培根堂诗钞》、《蜚阶外史》等。因宝坻古为泉州，故字号寄泉。性聪敏，诗古文词见辄通其奥窍。

《蜚阶外史》用很大篇幅记述了京畿一带、天津及其所辖武清、宝坻、宁河、蓟县、静海等地诸多志怪故事，涉及武清的地方就有五处。

在“两烈女”中记述了王庆坨医师梁广文为文安县两烈女书写诗文一事；在“楮叶集”中记述了武清人赵野治印之事；在“酒”中记述了泗村店曾经盛产美酒；在“司马秀谷”中记述了司马曾在武清三角淀任通判，之前也曾任杨村做过官，擅山水人物画。而最为有意思的是作者在“鹑”中，惟妙惟肖地记述了发生在蔡村兴善寺的故事。

文中记载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斗鹌鹑故事。当时有一个住在武清蔡村兴善寺中的和尚，名叫鸿僧。他非常喜欢斗鹌鹑，蓄养的鹌鹑数以万计。后来他得到了一只玉鹌，长颈短尾，纯洁如雪，就像一只小鹤一样。它十分擅长搏击，飞起来有三四尺高，每次搏击时都能十分准确地击中敌手，因此附近地区没有一只鹌鹑能战胜它。后来邻村的西贾得到了一只黑鹌，毛色纯黑，短小精悍，当它与其他鹌鹑相斗时，两个翅膀伏在地上，就如燕子掠水一般。它的嘴硬得像锥子一样，啄时令对手无法逃避。村人对玉鹌和黑鹌都非常喜爱，将它们称之为天龙和地虎。鸿僧与西贾也因为两只鹌鹑而结为好友，并约定两鹌永不相斗。不料后来有一次由于误会，这两只鹌鹑不得不互相争斗起来。只见玉鹌怒视以待，黑鹌两翼伏地，斗得天昏地暗。到后来甚至连各自的身体都无法辨清，只看见黑白两个影子飞快地一来一往，扭成一团。这时旁边围观之人无数，大家屏住呼吸，紧张至极，都认为是看到了一场从未见过的好戏。玉鹌身上已受了数十处伤，血浸透了羽毛，它张开双翼拖到地下，学着黑鹌的样子，眼看就要败下阵来。但只见它突然跃起五尺，猛朝黑鹌啄去，黑鹌遭此一击，魂飞魄散，只得垂翅逃走。西贾见后非常气愤，拔出刀来要与鸿僧拼命，经过鸿僧的解释，总算结束了这场纠纷。后来鸿僧一直与玉鹌相依为命，直至鸿僧圆寂的那一天，玉鹌也在他手中死去。这个故事极其生动地描写了斗鹌鹑时激烈、惨壮的场面，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中那种盛行的斗鹌鹑风气。

《蜚阶外史》虽属志怪奇谈类读物，但对于研究丰富武清地方史料尤为珍贵。

## 武清人创办的唐山第一家照相馆“鸿璋照相馆”

鸿璋照相馆始建于1909年，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唐山最早、历史最悠久的照相馆。鸿璋照相馆创始人靳秀峰，河北省武清县下伍旗乡忠义村人（今属天津市武清区），少年时在北京大兴照相馆学徒，出师后由在唐山的族叔靳财资助下，在小山大街东头路北盖起两间房屋，前面为门市，后面为操作室，唐山第一家照相馆“鸿璋照相馆”就这样开业了。

鸿璋照相馆开始是个家眷铺，除靳秀峰是经理兼摄影师外，其它雇员都是家族成员。靳秀峰精通摄影技艺，照片拍摄、取景、洗印俱佳，服务热情周到，因此，鸿璋照相馆开业不久，就赢得很高信誉，精湛的摄影技艺，良好的服务，使鸿璋照相馆顾客盈门，应接不暇。鸿璋照相馆当时在唐山还独家经营各种照相器材，这些器材物美价廉，近销全市，远销山海关及汉沽一带，销售额与日俱增。由于经营有方，业务不断发展，鸿璋照相馆规模不断扩大，翻盖扩建了门市和操作室，聘请了专业摄影师、洗印技师以及照相器材营业员，鸿璋照相馆可谓名噪一时。

1956年3月鸿璋照相馆实行了公私合营，靳秀峰任私方经理，4月并点撤点，鸿璋转为专门销售照相器材，商店设在解放路，后来搬到建国路，成为唐山市百货公司专业用品商店，除经营照相器材以外，还经营乐器和体育、文化用品，是唐山唯一的专业用品商店。

## 俄国人笔下的运河风情

1858年4月，俄国修士大司祭、汉学家巴拉第（1817 - 1878）从北京启程来津参与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并刺探天津布防情报。他在日记中记述了途经大运河的观感，成为今人了解150年前武清风情鲜为人知的资料。

1858年4月23日，巴拉第在赴津途中，途径杨村这个著名大镇。这里是小货船的码头，被称作驳船，负责从天津往通州运送官粮。每艘船装载约二十袋米。这里有4000至5000艘这样的船。杨村还因为是海潮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出名，所以历史上有“潮不过杨”的说法。穿过满是店铺的长街，他们不知不觉来到了白河（海河也称白河，此处特指北运河）堤岸上。这里河岸平坦，数不胜数运粮的驳船一条接一条逆流而上。它们沿着白河鱼贯而行，直到天尽头，桅杆连成一线，平原上满是桅杆和帆连成的线条，看着非常有趣，描绘出河流的曲折蜿蜒。广阔的平原上美丽如画的武清呈现在他们面前，沿岸街上都是人，路上行人和肩挑装满东西的篮筐的小商小贩络绎不绝，非常热闹。趁着还未和欧洲人完全打起来（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人们努力尽快把官粮运往通州。南风帮助运粮船逆流而上，却给它们吹来一大阵灰尘。

巴拉第在途径杨村的日记再现了昔日“西指神京御水通，蒲帆乱射夕阳红”的运河美景以及“野水千帆集，人声沸暮烟。楼台两岸寺，灯火一河船。邻舫多欢笑，深更尚管弦。……”的两岸盛景。也道出了中华民族即将遭受到一场灾难。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

## 《荷使初访中国记》与武清河西务

荷兰人约翰·尼霍夫，曾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随荷兰使团前来中国，在来华进京途中，对沿途所经之地的风景、地貌作了细致观察，对各地的河川、城墙、寺庙、宝塔和奇特的建筑物等都有形象逼真的记载，约翰·尼霍夫作为使团配备的一名素描画家，图文并茂地把武清河西务的繁荣景象介绍到海外。

约翰·尼霍夫 1618 年出生于德国的伯爵领地本德海姆的余尔森市，1640 年做过水手。后来，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工作，就是在此期间他随东印度公司候叶尔和凯塞尔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交流，并写下了《荷使初访中国记》这本书。本书于 1665 年出版。

书中简要记载了 1655—1657 年荷兰贸易使团一行 16 人在中国旅程中所经过的广东、江西、南京、山东、天津、北京及京城里的皇宫等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城市、乡村、政府、学术、工艺品、风俗、信仰、建筑、衣饰、船舶、山川、植物、动物、反抗鞑靼人的战争等方面都有精彩的描述，并配有中国实地画下的 150 幅插图，开拓了欧洲人研究中国的新阶段。

在他所著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描写道：“七月十一日（1656 年），我们来到河西务，此地距天津卫一百八十里，位于运河的左岸。该城方圆步行约半个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两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在此缴纳通行税，所以这个小城非常出名。使臣阁下在此受到热烈的款待，当地长官还在他的府第里隆重宴请他们，二位使臣（为了在礼貌上礼尚往来）送了他一份小礼物。可能是那位分巡道示意他不能收，他拒绝接受我们的礼物。即使如此，他仍希望得到几小瓶玫瑰水，使臣阁下也就很乐意地派人送去玫瑰水。”尼霍夫的这段白描，道出了当时河西务风貌之一斑，包括素描在内都是研究武清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堪称弥足珍贵。

## 清文人笔下的武清故事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关于武清的笔墨用“杨村打尖”、“赶骡驴”、“饮假酒”勾勒京南卫北武清的民风社情。

吴趼人,又名沃尧,字小允,号趼人,亦作茧人,别署我佛山人、野史氏、老上海、抽筋、主人等,广东佛山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一生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曾芳四传奇》、《俏皮话》、《两晋演义》等数十种小说及寓言、传记、改良戏曲等作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它最初连载于1903年~1905年《新小说》杂志上面,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分册的单行本(每本12回,直到1910年才出齐,共108回)。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怪现状》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年的黑暗现实。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第六十九、七十二、七十六、七十九、一百零一回分别记述了作者在河西务、杨村以及老米店的经历。其中在七十六回“急功名愚人受骗,遭薄幸淑女蒙冤”中记载了“杨村打尖”一事:

俭叔叹道:“我丢了的不是别的东西,却是一封八行书,夹在护书里面。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我在枕箱里取出护书来记一笔帐,不料一转眼间,那护书就不见了;连忙叫底下人去找,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里面甚么东西都没有丢,单单就丢了这封信,你说奇不奇呢。你叫我如何报失!”。

在六十九回“责孝道家庭变态,权寄宿野店行沽”中记载了“赶骡驴”、“饮假酒”的经历: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系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杏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他不动。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她摔下来。然而尽

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了。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燥，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杨村（由天津进京尖站），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

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净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饼摊旁边，还摆了几棵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的了。

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的坐了一大会。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道：“怎么去这半天？”店家道：“客人只怕是初走这里？”我道：“正是。”店家道：“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买呢。客人初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劣。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钱，所以买这劣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

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背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寓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背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道：“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道：“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我道：“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老者道：“卫里吗（北直人通称天津为卫里，以天津本卫也），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卫里，卫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厘卡上的捐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厘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子，就捐一趟，

自然把酒捐坏了。”我道：“捐贵了还可以说得，怎么会捐坏了呢？”老者道：“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只得搀和些水在酒里。那厘捐越是抽得利害，那水越是搀得利害，你说酒怎么不坏！”我问道：“那抽捐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捐多少算的吗？”老者道：“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捐，是论车捐；却又不讲每车捐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捐多少。说起来是那做官的混帐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捐，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我道：“这又有甚么分别？”老者道：“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的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顽法。”

以上史实对于研究清末武清社情民风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 《施公案》与杨村

《施公案》晚清民间通俗小说。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8卷，97回，未著撰人。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现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嘉庆年间。现尚存多种道光年间的刻本。1982年北京宝文堂新排印本402回，包括部分续书。

小说的中心人物施仕纶，实即康熙年间施世纶，字文贤，清汉军镶黄旗人，曾任泰州、扬州、江宁知府、漕运总督等官，著有《南堂集》，《清史稿》有传。小说《序》称“采其实事数十条，表而出之，使天下后世知施公之为为人，且使为官者知以施公为法也”。但书中许多公案题材和情节，大都出于虚构。

《施公案》从施仕纶作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所作之事，不外“审案”和“剿寇”。情节比明代公案小说稍加曲折，断案之外，又有私访遇险之事。书中大小十余案，大都靠托梦显灵、鬼神监察来解决，灵怪色彩很浓。它是中国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的合流之作。在同治、光绪年间曾续至10集。小说语言通俗，类似口语；但粗糙庸俗，语多不通。其善于铺排，则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的特点。其中收录了有关杨村的有关事情：

第一百八十七回“县主徇情主仆疑忌，总漕折狱生死冤明”中：

“……僧人问走堂的：“此地离杨村多少路程？”走堂的说：“大约二百余里……。”

“……后来僧人说：“不错，他是静海县人氏。”后来那僧人又说：“师兄你往那里去？”先来的说：“咱俩知己好友，有话不能瞒你，我要上杨村报成寺里找当家静成和尚。我们相好，闲走一遭。不知师兄要往何处去？”那僧人叹了口气，二目留神，看见计全人物虽不惊人，心中暗想：也要小心为是。……”

第一百八十八回“怕刺客神眼留心，疑计全钦差遇险”中有“……因为路过杨村，走双塘儿歇息……。”

另外，根据《施公案》改变的古装电视连续剧《施公奇案》中，有如下描写：

“……世纶（小说作施仕纶）与香蓉拜神后，在回家的路上遇上卓英格格，但见她疯疯癫癫，手上拿着一页杨村的县志，更不停说杨杰背部有颗痣，令二人甚为不解。二人便随她到杨村，这里竟然是香蓉父亲杨杰的故乡。二人往找杨杰奶妈，竟发现奶妈死于屋中，世纶更发现在这独居老人家中竟然有花生糖碎，便开始对某人产生怀疑。经多番试探，世纶终推断出唐家血案的真凶……。”

从以上文字记载可以看出，本书虽则虚构，但不乏史实存在，作者记录静海离杨村距离大约二百余里，还有杨村报成寺里的当家静成和尚，运河漕运历史以及电视剧中的《武清县志》都与史实相符，证明作者至少亲自来过杨村，或在史书上知道这些资料，这对于研究清代杨村历史是不可多得的史籍资料。

## 黄遵宪的《武清道中作》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梅州人，别号人境庐主人，清末杰出爱国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年轻时即写诗反对拟古主义，务求写出“我之诗”。黄遵宪的诗歌主张和实践，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诗界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以“旧风格含新意”为追求目标。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特别是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有“诗史”之称。他的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封建专制主义、封建学术文化和旧礼教的批判精神。还利用诗歌直接为改良主义运动服务，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宣传外国的科学文明。他的《人境庐诗草》是一块标志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最后阶段转向革新时期的里程碑。据钱钟联的《黄公度先生年谱》记载，黄遵宪曾两次来津，并有 17 首以天津为背景的诗作传世。其中在此书卷二中有一首《武清道中作》：

始识风尘苦，吾生第一回。斗星随北指，云气挟东来。走竟偕牛马，臣初出草莱。海天千万里，南望几徘徊。

天到荒寒地，山犹懒刻镂。沙濛惟见日，树瘦尽如秋。长路漫漫苦，斜阳渺渺愁。岭南好时节，不为荔支留。

绿树如云拥，门前百尺桐。吾家正溪北，有弟住墙东。尽室团圞乐，行人梦寐中。茫茫百端集，到此意何穷。

唐魏风同俭，幽并气不豪。龙衣将瓦覆，牛矢压墙高。忧患家多口，荒凉地不毛。最怜罗马拜，中妇乞钱号。

居者与行者，劳劳同一叹。天恩才咫尺，民气不衣冠，地况穷荒远，人兼琐尾残。临门图一幅，谁上九重看？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北方百姓的贫困生活“龙衣将瓦覆，牛矢压墙高。忧患家口多，荒凉地不毛”以及“民气不衣冠”、“地况穷荒远”的荒凉凄苦景象，只可惜《人境庐诗草》反映民间底层百姓生活的诗篇不是很多，但从这些现实主义的诗篇中可以看出，这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却写得很深刻很有感情，使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同情人民苦难的心境，因此，这些诗作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外，尚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价值，对于研究清末武清历史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 《孽海花》与武清河西务

《孽海花》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以状元郎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 30 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

作者曾朴（1872～1935）中国清末民初小说家，出版家。家谱载名为朴华，初字太朴，改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近代文学家、出版家。

曾朴的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孽海花》。《孽海花》是近代小说中思想和艺术成就都比较高的一部。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封建士大夫的昏庸与堕落。全书写了 200 多个人物，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在选材、结构、语言方面都独具特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把它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孽海花》在第十九回“淋漓树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觴名士寿”中对河西务的描述有以下特点：一是描述了河西务的街景，“……这日走到河西务地方，一个铜盆大的落日，只留得半个在地平线上，颜色恰似初开的淡红西瓜一般，回光反照，在几家野店的屋脊上，煞是好看。原来那地方正是河西务的大镇，一条很长的街，街上也有个小小巡检衙门，衙两旁客店甚多……”；二是记录了河西务的方言俚语，如“拾掇（音 duo）”、“歛（音 chua）拉”、“孱（音 can）头”、“玩意”、“盘腿”、“坎肩”等武清方言俚语在书中随处可见；三是记录了当年河西务曾设立了巡检司衙门；四是记载了河西务当时的民居格局，即正房和厢房，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记述，对于研究武清河西务历史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 张同书四游三角淀

三角淀，又称苇淀，在民间有东淀、西淀之称。原位于天津西北子牙河、北运河之间，向西穿北辰区到武清区西南部（王庆坨、汉沽港一带）。明朝蒋一葵著的《长安客话》上说：“三角淀在武清县南，周回二百里。”1751年，清康熙年间，修筑永定河南、北遥堤，三角淀则被囿于两堤之间。

当年的“三角淀”，应有一定气势，故多有诗咏。

张同书，字玉裁，著名诗人。生于1878年，直隶（河北）雄县人，城南诗社社员。1909年“早游严范孙（即严修）尚书之门，并受诗文法于陈石遗、林畏庐两先生”。自1915年开始，长期寓居津门，曾在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家馆任教，与严修、赵元礼、高凌文等津门学者名流多有诗酒往来。

张同书曾四次自雄县沿河乘船莅临三角淀，并留诗四首：

### 其一：《夜抵三角淀》

隔溪村犬吠，  
夜气渐冥冥。  
魂挂将衰柳，  
波摇乍出星。  
霜浓汀草白，  
风历浪花腥。  
萧瑟陂田外，  
孤舟偶一停。

### 其二：《三角淀》

东淀如斯大，  
恢恢纳百川。  
导河洋禹贡，  
敷土始尧年。  
风日相吞吐，  
沧桑几变迁。  
津沽人似海，  
此地水为天。

### 其三：《阻风东淀荏苒又年余矣追忆有作》

疾雷破山风击岸，  
雍奴水上夜将半。  
征衣湿尽雨如麻，  
暮忆此时肠欲断。  
驹光掷我如飘轮，  
尘往年年攀此身。  
纵有田园归不得，  
况欲取禾三百捆。

### 其四：《重九日由家回津舟抵三角淀感作》

雍奴水上浩无垠，  
日暮何从问水滨。  
巨浸汹汹吞钓艇，  
黑烟缕缕辨行轮。

饱尝艰苦成来往，  
偶狎凫鸥有主宾。  
老圃黄花天际树，  
回看应亦恼征人。

张同书四次莅临三角淀并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填补了志书中无三角淀诗文的历史，给后人了解当时雍奴薺的盛景，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 英国人眼中的武清段北运河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五日，大英帝国派遣以贤明的政治家、皇家大臣和杰出的外交家马嘎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出使中国。这是“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第一次正式接触。他们由天津大沽白河口登上了清朝官员为他们准备的船只，正式进入中国内地。船队溯海河而上，航行至通州登陆，然后经陆路到达北京。他们将在华的经历记录了下来，留下了马嘎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等回忆文字。其中的部分内容，为当时的天津段北运河勾画了一幅白描写生像。

携使团自1793年6月15日，“自交趾支那之多伦海湾出发，向中国开行。”于八月初抵达天津，然后沿运河进京。在记述途径武清时，有如下记述：

“12日礼拜一。清晨抵达武清，未几即复开行。余于船中无所事事，乃得以吾笔之余沈，择不甚紧要而有可记之价值者记之。

华官派至各船执役之人，平均每船十四五名，以三十七船共计，数达五百以外。故每有所事，一呼百诺。即至难之事，亦无不立办。此辈服务既勤，身体亦异常坚硕，足应其劳动之所需。虽肩背多曲，作圆球形，然绝非病象，乃作工时俯首之所致。面色以久暴日中，作紫铜之色。初见之者，以为面色既黑，体干必笨重，不能为灵巧之事。然吾观彼辈投身河中，洗冷水之浴，出没于波浪之间，其活泼敏捷，故未尝以面黑而减色也。彼辈一至夏季，即裸其上体，故自腰以上，肤色之黑与面若，腰以下则甚白也。此间多蚊蚋，终日随船缠扰，挥之不去，殊以为苦；又有一种巨蛾，其大几与嚶嚶雀相若，亦至可厌恶。而两岸树深之中，日夜蝉鸣不绝，无事时静焉聆之，觉凉风习习自两腋而来也。

13日礼拜二。清晨，有下级华官数人，督饬厮役，循例送供给之物至船。有食物数种，已发酵不可复食。余以是日天气极热，法伦表升至八十八度以上，食物之酵腐，正意中事，不能厚责经办之人。故仅令厮役取去，嘱易新鲜者送来，未曾加以声色。而高级华官闻之，立传经办之下级华官去，摔去其头上顶子以示罚；又呼厮役至其船。笞责若干数。余闻其事，甚骇其所用刑罚之不当。

至午，与樊大人相见，即为言明天热致醉之故，请不必重责经办之人。今厮役受笞，固已无可挽救，至革去顶戴之官员数人，尚望从宽开复，恕其既往，敝使雅不愿贵国官员以敝使之故，致遭斥革。樊大人唯唯而去，其状虽似颇以吾言为然，而已革之华官数人，则始终未闻有开复之消息，是可见中国之法律与公理，不能以吾西人之目光判断之也。

14日礼拜三。上午，于北岸望见绝华丽之大厦一所，云是乾隆皇帝南下之行宫，屋顶多用黄瓦，日光烛之，烂作黄金之色，奇观也。是日，天气较前数日凉爽，天空中恒有浮云飞驶而过，然又无雨。苟吾船开行时，船前不鸣锣以喧扰吾耳者，吾此行爽快极矣。据华人言，开船鸣锣，乃向吾表示敬礼之意。但吾仔细观察之，凡吾船至转弯或调换方向之时，亦鸣锣以关照同行各船，则此扰人意绪之锣声，于表示敬礼之外，尚含有航行时之信号之性质也。

15日礼拜四。吾船自入口来，一路多为荒野，望之令人气闷。……”

清代乾隆时期是南北运河运输的鼎盛时期，数不清的漕船、民船来往于北运河上，英国使团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佐证。当他们驶出三岔河口进入北运河的时候，很快发现自己进入了无数船只组成的航运大军之中。斯当东描绘道：“河面上挤满了各种船只，船上至少住着几千人”。约翰·巴罗则描绘道：“一天

之内，我们在这天河里超越了六百多艘大船，没艘甲板上都有十到十二个独立的舱室，每个舱室都住了一家人。从天津到通州的河段上这种船有近千艘。”除此之外，“河上各种各样的船或者川流不息，或者泊在岸边，每艘船上也都挤满了男女老少，人数不少于上面提到的大船”。据他估计，“在90英里长的距离之内，水面上漂浮着不少于十万人。”货船上装载着形形色色的货物，大宗的棉花、铜钱、大米、丝绸、盐、茶，都是京城所必需的，还有一种让他们感到十分惊奇的货物，就是“一种黄色的干饼”，“似乎是各种各样的污秽和粪便的混合物”，那是京城的花儿匠所用的肥料。

康熙年间，“导流济运”的筐儿港水利工程建设，使得北运河两岸的农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当使团的船只驶出天津城区的时候，他们发现除了岸边高大的柳树、官宦府第和寺庙门前的榆树或杉树林外，运河两岸很少看到树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田野，主要的农作物是高粱、高粱中间套播着粟米、小麦、大豆等作物。使团成员对田里劳作的农民非常感兴趣，他们看到这些农民非常贫穷，巴罗记述道：“几乎所有的村舍都破烂不堪，条件十分恶劣。这些简陋的茅屋，一些是用烧得半透的砖堆砌，另一些是用泥巴建造，屋顶盖着稻草或芦苇。”但是他们依然非常勤劳，“所有田地耕种得都非常干净整齐，好像园田一样，没有一点杂草”。高粱在当时不仅是粮食，还有很多其他的用处。当时的北运河由于河底淤泥沉积，河床高出地表。农民就在河堤开挖水槽，由上到下引水灌溉农田。使团经过的运河，有很长一段用高粱秸秆做成了堤道，从堤道上通上水槽，对附近的田地进行灌溉。

北运河有一种说法，叫做“潮不过杨”。就是说，潮水在北运河中只能上至杨村，船只再往北行就只能靠风力或人力了。斯当东对此描述道：“顺流推动船只走出了天津三十英里路之后，潮水停止了”。风停水静的时候，船只只能依靠划桨和拉纤向行驶。使团乘坐的是中国官方为他们提供的大型客船，每船有两只大桨，有的在船头，有的在船尾，每只桨需几个人才能划动。如果遇上逆流、逆风，就要用到纤夫了。使团的船只平均每船用十五个船夫，总共有五百人之多。纤绳的样式是这样的：“拉绳一头绑在桅杆顶，同另一根绑在船头上的绳子结起来。绳子很长，上面结成许多活圈，纤夫把头伸进圈内，绳圈达到人的胸部。绳圈上多半绑着一块木板，这样可以减少一点绳子压迫胸部的力量。”根据随团的中国官员介绍，当时运河中官船公事船所用的纤夫，都由当地官府代为召集，但是给予的工钱极低，所以很少有人应征。地方官于是按户勒派，乃至强行捉来拉纤，不到目的地绝不放回。他们赤裸着上身，露出他们古铜色的皮肤，肌肉发达，但都有些驼背。遇到水浅的地方，就要脱掉所有衣服，下水拖船。他们排成一条直线，嘴里哼唱着歌谣以统一步伐。

两个月后，使团仍由北运河返回天津，他们看到纤夫们换上了统一的服装，是一种镶红边的制服，头上戴着“有红色扁平结子的大帽”，看上去显得整齐了许多。他们这一次只在天津短暂停留，补充给养后，就经三岔河口入南运河，一路南下。

## 描述武清的竹枝词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过来的。唐代刘禹锡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它以吟咏风土为其主要特色，对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通俗易懂、贴近群众，故深为百姓喜爱。

天津竹枝词始见于明，发展于清，而盛行于清末民初，《中华竹枝词全编》收录有关津门竹枝词九百余首，其中涉及津沽武清的也不在少数

近现代以来，由于大运河漕运的兴盛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武清增添了厚重的文化色彩。写竹枝词的文人，不但看到了运河带来的繁荣和美丽，也敏锐地感到了运河漕夫和沿河百姓生活的艰难。康熙年间著名诗人吴之振就说过，“自张家湾至天津通惠河二百四十里，沙渚壅塞，行舟甚艰”，他作《行船号子》歌曰：“春涨方生未没篙，冰凌初解利如刀。船头套子才撑过，沙嘴横斜舵阁牢，荡漾河洲浴鹭鸶，傍船偏要立多时。短蓑独速歌铜斗，依是烟波踏浪儿。鹢首嵯峨压浪开，旗梢风脚舞高桅。官人不知行舟苦，只遣冬冬打鼓催。”道光名臣黄爵滋也在《杨村竹枝词》中写道：“北运河，北风奈尔何？南运河，南风将若何？黄花鱼到时，长官先得食。黄花鱼过时，长官不下食。二月船出坞，十月船归坞。归坞冰折舵，出坞急如火。离离沙上鸣，愁杀船家翁，衙衙仓中鼠，羨杀船家归。”虽只道出运漕累民之冰山一角，读者亦不可不察。

《清代北京竹枝词》里有一组“都门纪变百咏”记述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奋战的情形，成为史料翔实的历史见证：“才过杨村半日程，一千精锐泰西兵。赴援无计通前路，陷入重围不放行。”记述了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反“洋教”，烧毁天主教堂，派一千精兵从天津登陆欲占北京，行至杨村被义和团包围不能前行，被迫返回天津。

《听鼓词》则采取纪实的写法，记述了清军在河西务抗击八国联军，不战而逃的情景：“津门战鼓动地敲，三鼓而衰两将逃，十八子死河西务，舆尸乱涉流滔滔，东人鼓角风怒号。”

这些记述武清的竹枝词无疑对研究武清历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史料。

## 日本人笔下的武清

从清末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日海上航线的开通，中国大陆吸引了更多的日本人前来华北和天津。来天津的日本人有的是求学工作，有的是观光旅游，有的则是受官方或民间组织机构的委派，来华从事调查、研究或搜集情报。他们以游记、纪实、日记、信件、见闻录、地志等形式记录来华经历。作者有政治家、教官、商人、学者、宗教家、作家、军队画家、诗人以及学生等等。他们来到天津，或短期调查、旅游，或长期工作、学习。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旅行目的，不同的个人兴趣，都使得他们记录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显得如此的丰富多彩，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历史资料。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万鲁建先生一直从事天津日租界和日本侨民社会的研究，搜集了大量日文资料，经过多年的积累，筛选，翻译整理，集结出版了《津沽漫记：日本人笔下的天津》一书。收录了日本出版家、政治家坪谷善四郎（1862—1949）1900年义和团事变后不久作为随行记者来津而作的纪实文字《北清观战记》，详细记述了沿北运河途径武清的经历：

### “白河的御用船”

天津至北京间，陆路有二十九日里（1日里约为3.9公里），铁路只能从天津通到杨村，杨村北京间的道路已被团匪破坏，还没有修好，而且天津杨村间的道路属于俄国管理，各国的输送全部依靠白河水运。……如果从天津至杨村间使用铁路，再往北就必须走水路，因此各国在天津通州间的往返多依赖水路。往返其间的船每天都有数百艘，最初大部分都为日军所借用，其数约有六百艘。每艘船往返需要十天，每天约有六十艘船从天津出发，船上都悬挂着日章旗，每艘船都有一两个日本兵跟随，以防暴民袭击，兼为防止被外国军队抢占。……已故的大久保甲在归国途中曾吟诗云：“和成初下通州路，闭卧逢窗梦自平”。该诗里所说的就是白河中的这种船只。白河河道浅，不能行汽船，因此我们只能依靠这个长方形的平底河船。……船溯航上游时需要长长的绳索在船头，几个纤夫在岸上前行，步调一致地拉纤。船头操楫，并上下拨动船帆，还需要一个助手协助。此外还需要一个厨师。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划，一天能行七八里。这些船夫也称为苦力。

### “白河沿岸的惨状”

白河两岸没有堤防，弯道甚多，河流非常缓慢，水呈黄浊色，由于河水很少泛滥，放眼望去，两岸都是一望无际的旱田。……这里的作物以高粱为最多，蜀黍次之，还种植有大豆、小豆、胡麻、棉花、南瓜、茄子等作物，长势良好。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前来收割，只有往返于上下游的船夫等人，将其作为每天的食粮，随意掠夺。棉花熟了，徒然如雪花般飘散，大小豆出荚，也只能散落地上。北仓至杨村间的白河沿岸，左岸从北仓往下依次是柴楼村、汉口、北新庄、马家口等村庄。右岸则是王庄、桃花口、新庄、下蒲口、蒲口、汉家庄、夹道等村庄。此外，右岸还有道路相通，应该是北京天津间的国道。我军的军用电线也是沿着此线路架设的。但是各村房屋全被烧毁，不然就是被破坏或被重新圈占，只有墙壁残留，没有一间房屋有屋顶，不管男女老幼，没有见到一个人。偶尔有消瘦的狗儿在河边游荡，正在吞食漂浮的人马死尸。……

### “杨村的景况”

杨村是天津通州间最为繁华之地，中间隔着白河，街区位于白河两岸，主要的街区在左岸。联军进入此地时，日军的大部队已经从右岸进发，只有炮兵与各

国军队一起从左岸进发。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敌人的抵抗非常脆弱，各国军队很快就进入了市区，右岸的我军几乎没有赶上战斗。因此，此地的街区遭受兵燹者少，更难得的是保留了不少完整的房屋。天津至此地的铁路已经开通，每天都有几趟列车往返。但是，如前所记，各国军队多从水路输送。到这里，水路和铁路大致可以并行，从此地转变方向，从水路向东北方向可通往通州，沿铁路向西北方向可通往北京。杨村的铁桥位于市区下游一里多地，已经修缮完成。但是因铁路还未修建完成，俄军每天还在忙着修理。此地的河有浮桥，从天津到北京的干线在此地从左按转至右岸。右岸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美国等各国守备军，左岸有日、英、俄、法等国的军队。此地的日本兵站司令部设在市区一个富人之家，司令官是藤村少佐（正彦），副官是冈田中尉（哲藏），中尉是一个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是才当了一年的志愿兵，在东京和我认识。这一家地方很大，房屋高。听说屋顶有临时新建的观景台，于是我们便爬梯子登上精巧的屋瓦，是类似于八犬传的芳流阁，到达屋顶，有一日本屋顶所能见到的晾台，上面建有一个四个柱子相连，驾着三四块木板的眺远楼。站起来眺望四方，正好可以一望直隶的大平原，犹如一幅大的立体全景画。通往天津的铁路如线一样笔直，白河河道弯曲，宛如蛇形。喷着黑烟奔跑的火车，被绳索拖着溯航而行的河船，将三三两两往来的各国士兵的白色衣服弄脏了，有时候变成了灰色，新穿上的冬服则变成了鲜明的蓝色。市区内外则飘荡着各国军旗，美军的兵营里在演奏军乐，俄国兵营外则是军马成群，那勃列翁帽檐有锚徽章的法国兵和白色大黑帽子沿带有遮阳的俄国兵握手往来，头上围着宽布的英国印度兵，和黄帽黑服的日本兵非常相似，谈笑不过一瞬间。

架在河上的浮桥由法国兵管理，桥和天津、北仓的一样，是用几艘船横排而架的，河中间只能通过两艘船，每次都需要打开通过。船只往返如织，桥上桥下帆樯林立，苦力们非常嘈杂拥挤。税所大佐和山川少佐从天津通过铁路已经来到此地等待，我们再次坐同样的船出发。

#### “白河的船中生活”

白河沿岸经天津以北的北仓、杨村、南蔡村、河西务、马头等地到通州，陆路都是宽阔的道路。此道实际上不单是天津北京间往来最繁华的道路，白河还是从南方各省经水运而来的百货运往北京的最主要线路，往返河上的船只每天都以百计。其船为长方形，上下持平，底深，船身稍微有点鼓，长约五六间至十间，宽八尺至一丈余，船内分为几个区，上面铺上木板，木板下面装货，也可以作为船头等人的宿舍。船上用木板围起来所形成的客室是上等座，普通的客船则以篷作顶，将犹如红色墙壁的东西按在木板上，作为乘客室。我们可以乘坐木板围起来的客室。船长十间，船身宽一丈一尺，船室长五间，宽八尺，高度能达到船中央最高处。面积为四尺五寸，用木板围住，屋顶用篷修葺，犹如在甲板上设立了一室，木板下面储藏货物，木板上面铺设草席，作为卧室。该船船头有一人在摇船，另有八名苦力船夫。这样的房间很少，大都是木板围起来的船室，而且这样的船只以前都是客货两用，其中运载贡米者，船首绘有如同狮头的彩色画像，故能一望而知。这被称为贡米船。几千艘这样的船只现在全都被各国军所占领，没有一艘用于私人。故每艘船都悬挂着各国国旗，从早到晚往返于白河之上，颇为壮观。每艘船都搭乘占领国的卫兵两三人，以防止他国兵夺取，保护运输品的安全。根据船只的大小，五六名乃至七八名苦力拉着系在船头的长绳索，在岸上行走。船溯航时，船头扬帆，舵左右摆动，根据河道的弯曲情况，伸缩绳索，以便前进。船帆的上下左右摆动和纤绳的伸缩，是利用几十个滑轮，巧妙地运行。日

本军队所使用的苦力，除了一天四五十钱的工资外，还给予若干玄米。苦力们自己做饭吃。除了一日三餐外，从天不亮到黄昏都在不断地劳动，其精力和勤奋，终究是日本劳动者所无法比拟的。他们并没有因为饭后的休憩或者吸烟而停工。如果行程紧急，还要另加工资。夜间点灯拉纤，在金钱面前，可以说是不辞辛劳。如果看所吃东西，大都是大碗的玄米饭，上面盖有油煎的茄子或南瓜和葱混在一起煮的食物，也有韭菜或腌辣椒，一般都是站着吃。他们经常从岸边的农田获取蜀黍做汤，一边劳动一边吃。白河沿岸土地肥沃，放眼望去，耕种着各种农作物。现在居民都逃走了，无人收秋，因此苦力们可以得到蔬菜，非常高兴。

“再次在白河船中生活”

船只准备好后，船夫解开缆绳，苦力开始在河中摇橹，和前日溯航上游不同，船只航行的速度很快，当天我们宿泊在码头的上游。第二天即八日上午，在马头下游有一艘装饰漂亮的帆船载着俄国兵，前后有很多帆船护航。该船在溯航上游的时候就遇到过。今天让人奇怪的是从早晨就开始下雨，于是关闭篷窗，休闲地下象棋。虽然没有仔细观看，但是船只行至河西务，听说前面有一艘装饰漂亮的船只，乃是最近新任媾和全权委员李鸿章正从天津奔赴北京。进入北清，一天遇两次雨只有这一次。该夜宿泊在河西务的下游。入夜雨停，空气非常清新，犹如阴历八月之景。深夜我走出篷窗，看到月明高悬，江心碎金，烟霭摇曳，岸上草叶冒霜，其壮观无所比拟。但是，寒气浸肤，无法久立船头，于是我又进船睡觉。九日，我们再次在杨村登陆，并访问守备队，晚上十点到达天津三井物产会社前的河岸，当夜还是在传中留宿。

《北清战地地志》做了如下记载：

“天津北京间的通道”

天津到北京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从杨村、武清县经黄村、卢沟桥进入北京，里程约三十三日里；天津北京间的铁路就是走的这一路线。二是从杨村经河西务、张家湾、通州进入北京，里程为二十八点七五日里，比第一条线路更近，且天津通州间可以利用白河水路，通州、北京间还有运河，因此运输极为便利，在铁路开通前，这是交通上的唯一捷径。……

“杨村”

杨村是个有一千余住户的城镇，它与河西务是天津通州间最大的城市，横跨白河两岸，左岸特别繁华。从天津到此地，河两岸都有道路。铁路从塘沽经天津到此地，在河的左岸，在这里过河，可通往北京。其铁桥位于市区下游一英里多的地方。实际上，从白河口到此地，是铁路与河流并行。从此处到白河上游可以溯航到北方，铁路向西走。通往北方的道路也分为两条，一是沿河道经河西务、马头、通州通往北京；一是经武清县、拱极城（卢沟桥）通往北京。因此，杨村因水路之便和位居交通之要冲，而使自身成为繁华城镇。市区中央架设浮桥，该桥如天津所见到的那样，几艘船纵排系在一起，每次上下行船，中间的三艘船都要驶离，以便打开通道。左岸比右岸繁华，设有督河府。此外，其南口平时有马队营驻扎。北口有阁楼，名为天枢阁，登上去可以眺望四方。八月六日联军前进时，此地的清兵很少抵抗，没有经过激战就占领了此地，大部分街区免于兵燹，其督河府现为日本守备队的本部，登上后面的屋顶眺望，城镇可以一览无余。该地平坦开阔，除村庄外，没有任何遮挡物，是发挥骑炮兵威力的绝好战场。

“河西务”

从杨村经白河右岸北进时，将路过大顿丘、小顿丘、铁庄、汉家营、南蔡村、砖厂、蒙村、西沽庄、小王庄、大王庄、张庄等村庄，最后到达河西务。此附近

一带是直隶的大平原，非常平坦，一眼望去没有任何山峦，甚至连丘陵都没有，只在村庄之间有杨柳映照的阴影，看来夏天行军困难。南蔡村八月八日被日军占领，河岸有日本守备队的营帐，有六百户人家。清兵已经败退天津、北仓，又从杨村逃窜，杨村以北没有抵抗，全线败退。但是沿线的村庄全都被烧坏或烧毁，没有一间房屋，处处不见人影，河岸的田地里栽有谷物和蔬菜，已经成熟，好像在等人收割。我于九月溯航此河，十月又回航，在沿途各地登陆，终未见到一人。河西务是个有一千余户的城镇，日本守备队在距离河岸二町余的地方安营扎寨，此地距离市区还有三丁多。此地也可渡河从东面大官屯通往芦台，从此地还有经西北到达北京的道路。陆路四通八达，加上河道便利，因此商业非常繁荣。但是，现在居民四散，不闻鸡犬之声。幸运的是四周开阔。驻防军也不感到蔬菜缺乏。

日本学者长野朗（1888—1975）《透视新天津》做了如下记载：

“从天津前往北京”

十月二十五日早晨，我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今年比在日本想象的要暖和，穿着冬装还感觉有点热。这是北支那特有的秋日好天气，早晨难得没有大雾。离开天津，进入北仓，然后到杨村。其间一面是永定河、白河流域，铁路两侧特别是左侧都被水淹了。一望无际的北支大平原的农田，全都是水，有些地方的水中还长出了芦苇，也有高亮枯萎在水中，高粱秆凌乱地倒在地里。其中还能看到倒塌的支那人房屋、倾倒的电线杆和柳树。这样的情景，过了杨村一直延续到落垡站。今年的水灾尤以津浦线为甚，受灾面积非常大。现在这里的洪水暂时还没有减少，进入十一月就会结冰，到明年四五月份还会有水。由于明年的播种无法进行，这就会造成超过两年的歉收。从北京、天津、保定的中间地带，至津浦线的两侧，天津地区从此时开始逐渐从水淹的危险中远去，能够察知其受灾情况。而且沿路眺望，和去年通过这里时相比较，农村的荒废景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因此，北支那的首要问题无论如何都是向这些贫民提供食物和住宿之地，这些全都是水灾后带来的问题。因此，这个冬天可能会出现很多乞丐，也可能出现因没有食物而危害治安的人。水灾救济是眼下的急务，从收容难民到发放明年播撒的种子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作者对武清运河沿岸船只、河道、农作物、建筑以及百姓在八国联军入侵后残酷生活景象的细节描述，具有鲜明的史料价值。

## 武清人开天津近代针织工业先河

据《天津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简史》记载，天津近代针织工业史上第一家针织厂是郭有恒袜厂，厂址在天津城里乡祠前胡同，属于家庭作坊性质，经理是郭有恒，原籍武清县人，大学生。他于1912年购买了一台日本手摇袜机，与其妻自织自卖。由于供不应求，就招收徒工扩大生产，厂址也迁到了海河岸边望海楼附近，自动袜机增加到七台、笨机（无动力手织机）增加到五台。因自产自销，在望海楼商场二楼开设了郭有恒袜店。由于经营有方，袜机不断更新，拥有84针、96针毛线袜机和120、140、150、180针等型号袜机。从品种上看有毛线袜、棉线袜、男、女童袜，根据季节生产。当时规模发展到自染、自织、自定、自销，缝袜头工序由住户加工。1926年在天洋商场二楼又开设了郭有恒袜厂门市部，经营范围扩大，驰名华北。1930年郭有恒与其弟郭香甫分家，郭有恒又经营了两年，至“七七事变”无心经营，将厂关闭，兑给王某，郭去了北京。继郭有恒袜厂之后，1914年天津又先后成立了义生、矩华顺、崇华等袜厂，以后逐步发展到1929年全市有针织厂154家，其中织袜150家、针织缝纫4家，拥有针织机1581台，职工1610人，大多数属于手工业社性质。

## 汪由敦的途径武清冰床诗

汪由敦，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生人，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安徽休宁人，终年 67 岁。他于雍正二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历史评价他学问渊深，文辞雅正，老诚敏慎，在职勤劳。他曾作有一首《自永定南埝历武清境坐冰床抵杨柳青作》诗，写于他在北京任上，“我衔使命驰星邮”，去执行皇帝委派他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一首清代乾隆年间的诗，与武清和冰床有关。他出北京，到永定河的南堤埝处开始乘坐冰床，历经武清境内到达杨柳青。诗云：

畿南七十二淀纳众流，寒冬冰塞道阻修。  
编苇横度直两版，施茵张幄如碧油。  
一夫牵挽躬伛偻，不欹不耸行不留，赧肩翻笑劳八驹。  
鸟道绝空阔，蚁行绕沙洲。  
平移稳似循轨辙，转旋胜过回轮辘。  
联若鹅鹳列，散若鳧鹭浮。  
陆不羨骅骝千里绝尘足，水不羨龙骧万斛乘风舟。  
岁晚还伸济川用，利涉切履履薄忧。  
我衔使命驰星邮，役夫取径得少休，独惜不为月下游。  
吴侬老向烟波听棹讴，平生奇绝见此不。

汪由敦在诗中用较多篇幅描写了乘坐冰床的快意与奇绝之感。他说，“平移稳似循轨辙，转旋胜过回轮辘”，说冰床平稳得出奇，没有一点颠簸之感，如同行进在车辙轨道上一样，并且旋转自如，由北而南前行，随心所欲，如空中小鸟那样任意飞翔，像蚂蚁绕行沙洲那样自由自在。同时描写了寒冰沃野的七十二淀上，佝偻着身躯撑划冰床的惟妙场景，以及很多冰床犹如燕雀的景象。并且感慨道，作为生于南方的他，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场面，影射出武清百姓的一种求生存的技艺。

汪由敦是清代重要名臣，也是很有声望的文人。不仅以政绩和军功显赫，同时还以书法和诗词文章见称。他一生主持编纂了《大清一统志》等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还创作了大量诗词文章，有记载的就有《松泉文集》20卷、《松泉诗集》26卷。

如上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位于武清西南部的三角淀翔实资料，为武清史料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当年作者笔下的那种“联若鹅鹳列，散若鳧鹭浮。陆不羨骅骝千里绝尘足，水不羨龙骧万斛乘风舟。”的盛景，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荡然无存，只能从文字里找到一些掠影。

## 诗中的杨村和杨村驿

“野水千帆集，人声沸暮烟。楼台两岸寺，灯火一河船。邻舫多欢笑，深更尚管弦。我怀念故土，秉烛照愁眠。”这是清代天津诗人梅成栋的《夜泊杨村》。千帆云集，人声鼎沸，楼台林立，灯火河船，再加欢声笑语，丝竹管弦。夜幕下的杨村，如一幅油画般迷人。设于其中的杨村驿，自然不同凡响。

杨村驿于元至元三十年（1293）设于北运河西岸。据《大清统一志》记载：“杨村驿在杨村务，与河西驿皆有驿丞，明置极冲，在县南五十里。”“杨村驿东二十里为桃口，又二十里为丁字沽。由杨村而西北四十里为黄家务。又三十里为河西务，皆运道所经也。”

元、明时，北运河为漕运要道，这里水、陆路交通十分便利，杨村是重要的水陆码头。杨村驿又是天津沿北运河溯流而上的第一个驿站，驿使和商旅络绎不绝，因而这里设专门机构，并任命驿丞管理。元代，这里便是北上船舶的停泊地，帆樯林立，昼夜不息。部分大船（时称“遮阳船”）只有在这里过驳至小船（称“浅船”），才能沿河运送粮食货物至北京。明永乐九年至十三年，政府下大力量对南北大运河进行疏浚拓宽，航运条件大为改善，漕运数量不断增长。而杨村是漕船换驳的主要地点之一，加之明承元制，“常事入递、重事给驿”（平常文书交给递铺，重要和紧急文书交给驿站），杨村驿的驿务十分繁忙。

元代傅若金《杨村》诗云：“杨村岸头驿使回，直沽洋里海船来。军夫伐鼓欺行旅，百里维舟不敢开。”一方面，是军方对邮驿秩序的干扰摧残；另一方面，洋里海船，百里维舟，折射出来的，是这里的繁华。漕运枢纽，咽喉之地，一旦有事，犹如社会时钟停摆一般，影响的可不只是驿务。

明朝诗人李时勉有《咏杨村驿》诗：“小驿临河口，萋萋草草堂。门口一古井，阶下几垂杨。寂寂尘生榻，喧喧鸟过墙。”河口，草堂，古井，垂杨，诗情画意，似无“驿骑如星流”的喧嚣。但笔锋转处，却是驿使的繁忙与无奈：“逢迎惟驿使，木偶被衣裳。”

清中期，杨村驿的驿船按极冲级水驿的标准配备，另配驿马 34 匹。供役人员有马夫、驿皂、轿夫、纤夫、驿书、兽医等共计 153 名。其中，仅纤夫编制 99 名。个中原因主要是，作为通往京都的咽喉要道，北运河流沙通塞无定，杨村经河西务、张家湾至通州一段淤浅最为厉害，常常边挖边淤，漕船溯流而上，需由纤夫拉船驱进。杨村、河西务在每年天暖季节，平均日通过船只至少 30 艘，99 名纤夫并不算多。

清乾隆二十年（1755），实行“裁驿丞、归州县”的改革，河西务驿丞被裁撤，而杨村驿得以幸免，原因是其离县治较远，“县管”有难度。因而，杨村驿成为清后期全国保留专职驿丞的 65 个驿站之一。

## 红学家笔下的高五姑

高五姑又名高小芬，是靠山调（建国后称天津时调）的第一代专业演员，生于1883年。据贾立青《曲坛漫步》记载，高五姑是武清县人，另据《新风霞回忆录》一书载，高五姑是直隶省武清县王庆坨人。

高五姑幼时被拐卖，清宣统二年（1910）拜弦师王宝银为师，正式学艺。遂应聘在小广寒落子馆登台演出，演唱靠山调、鸳鸯调。20世纪20年代演唱时调。30年代初蜚声曲坛，以善唱悲曲被称为“悲调大王”，与“靠山调大王”秦翠红齐名。她天赋歌喉，气力充沛，异于常人。嗓音高而刚劲，宽而脆亮；吐字具爆发力，咬字狠，这些特点使她的演唱铿锵顿挫，刚劲苍凉，酸嘶悲咽，催人泪下。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刚柔相济，抑扬合度”的演唱风格。很快，誉满津门，红极一时。她还根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了以“讲究唱小花腔玲珑，唱悲调感人”为特点的著名的“疙瘩腔”，使其演出的曲目韵味醇厚，优美动听。其成名曲目为《秦楼悲秋》（赛金花清光绪十二年作词），代表曲目有《七月七》、《喜荣归》等，均被灌制唱片。30年代后期因年老失去登台机会。1943年10月30日冻饿交加，毙倒于南市街头。

近读红学家周祐昌先生的《藤荫馀话》有一篇关于记述时调艺人高五姑的文章。其文如下：

余兄弟听刘（宝全）、白（云鹏）、金（万昌），皆逢老境，炉火纯青，三老中白、金，尤以红楼段见长，缠绵悱恻。惟以三国水浒段见称，而能传燕赵慷慨悲歌之致，豪宕感激之情，三津北里之哭者，其惟高五姑乎？观夫三弦一出，瞽目帽缨，弦定四合，酣鬯朗澈，秋水苍波。四胡绵密，长袖飘拂。伊人云老，瘦骨嶙峋，扶案侧立，目不旁视。无开场白，亦无上台鞠躬，过门一启，引吭高歌，声振屋瓦，全力以赴，一唱三叹，余韵绕梁。“悲秋”也，“荣归”也，“七月七”也。一曲既终，其不大汗淋漓者几希。二先生韩兆谦之言曰：真煞口！比之如吃沙瓢西瓜，解渴消暑，无以复加。听高五姑歌，令人起敬，令人下拜。尽管他人污蔑中伤，其人其艺，愈增高。其他时调歌者，赵少福一无是处；王玉（毓）宝松软庸弱；泼辣豪宕，姜二顺得其仿佛，惟气魄差小。

由此看来，红学家对高五姑的演技都如此赞美，也证明高五姑确是当时津门靠山调的佼佼者，其“悲调大王”名不虚传。

## 武清陨石 三百年下落不明

《武清县志》记载：“康熙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巳时，陨星一，其大如斗，从空坠落，有声，屋椽摧折，入地尺许。”就是这样一块大陨石，被当时的县官拉走之后，就再也不见踪影……

### 武清陨石 三百年下落不明

有“陨石猎人”之称的本市陨石收藏家孙林瑞又一次带着希望出发了，2003年12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第7届全国空间化学与陨石学学术研讨会，除了要在会上宣读自己的研究论文外，他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向各位与会专家打探曾经坠落在天津的那块陨石下落！

#### 1/365的巧合

收藏陨石近8年的孙林瑞有个心愿，就是找到曾经坠落在天津境内的陨石。根据掌握的资料，从夏朝至1911年，全国共发生过365次陨石坠落事件，其中仅有一次坠落在天津的武清县境内。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9月25日巳时(上午10点左右)，一块犹如大磨盘样的东西从天空落下，在外面劳作的农民都听到了这块巨大的物体在空中划过的声音。

清史稿这样形容：“从空坠落，有声”。当农民们还没有看清是什么东西时，这件异物已经落在村外一个农户的屋顶上，轰然一声巨响，随即墙倒屋塌，就连远在田地的村民都能够感受到脚下的大地震颤了一下。

“出事了，砸死人了！”不知谁喊了起来，如梦方醒的村民从惊愕中醒来，向出事的人家跑去。在倒塌的房屋下，人们找到了一块非常奇怪的石头，就连村里的老人也没有见过，两个小伙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没有将它挪动。

仔细清点后，村民总算出了一口气，除了房子倒塌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再看那块石头下面，地面都被砸出了一个有两三尺深的大坑。《武清县志》这样记载：屋椽摧折，入地尺许。如果有人被石头砸到，想活命绝不可能。

天上掉下了这么一块大石头，而且砸坏民房，村民只好报官。县官派人查了一番，将石头拉走了，据说是寻找石头的来源，但此后就没了下文。在以后的县志上，再也没有见到这块石头的记载。

#### 武清陨石到底在哪儿？

天津距离北京仅有一百多公里，天文观测当然要在京师的钦天监管理下进行，落在武清的陨石也极有可能被派来的天文官带回北京。不过，天津科技馆天文顾问赵之珩在参观北京天文台时，也没有在展出的陨石中发现标有武清发现字样的石头。天津的这块陨石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记录在志书中，那么肯定官方派人来查验过，这块陨石没有道理不被官方运走。”赵之珩分析说，这块陨石的下落成了一个谜。进入官方天文机构的陨石，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管理天文资料的官员肯定会受处分，但官方的文档中却没有相关记载。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这块陨石被联军抢走了。有根据的是，联军在攻入北京时，确实洗劫了北京天文台，

抢走一些物品。至于抢到这块石头的联军会不会把它运到国外，不得而知。尽管后来迫于国际压力，一些天文台的物品又被还回来，但天津武清的陨石一直没有找到。

那么是不是又可以推测，联军的士兵没有将这么一块大石头带回国，而是就地转卖，流入民间了呢？如果是这样，找到它还是有一定的希望。

### 流星和地球是亲戚？

谈起陨石，赵之珩对于陨石与地球的联系作出这样的设想：陨石和地球同龄，都是 46 亿年。这些陨石一般是小行星或彗星破碎的残片，或是太阳系形成时残留的物质。现在通行的太阳系起源说认为，太阳系最早是一团星云，后来凝聚成很多小团块，这些小团块又聚成了地球、火星等 9 大行星。

赵之珩打比方说，就像摇煤球一样，煤渣摇成煤球后，也有很多渣滓裹不进去，这些东西在空中运行，有一天掉下来，就是陨石。现在我们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任何 46 亿年前的东西了，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也只是 30 多亿年前形成的，所以，这些陨石是认识地球早期演化的重要依据。因此陨石与地球的关系非常近。

大大小小的陨石千奇百怪，按照内部物质含量的不同，可以分为石陨石、铁陨石和石铁陨石 3 大类。在这坚硬的石头内部，真的会有生命存在吗？赵之珩回答说，陨石对于研究地球与太空的关系相当重要，世界各国对此都相当重视，已经出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更令各国兴奋不已，陨石内存在生命也并非不可能。

### “陨石猎人”开始行动

孙林瑞的品石轩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如果不懂行，还真叫不出这些石头的名字。孙林瑞从柜台下面的小盒中小心翼翼地拿出两块石头放在柜台上，告诉记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陨石。”仔细端详，较大的一块陨石呈深绿色，另一块小的呈黑色。大块的陨石有 1 公斤左右，拿在手中沉甸甸的，特别压手，特别清凉，小的那块虽说分量轻一些，但对于其他同体积的普通石头还是要重许多。

孙林瑞介绍说，陨石与普通石头的明显区别就是——陨石的重量是同体积石头的 3 倍左右，通过这种比较，即使不懂行的人也能粗略地区分辨出来。1996 年，他偶然在一个奇石商处看到了陨石，觉得好玩，就花 100 元买下，从此也就喜欢上这东西。6 年以来他下广东，赴新疆，通过各种途径收集陨石，集下千余块、几百公斤的陨石。最重的是从新疆收得，重达 185 公斤，最小的是在广西南丹收集到的一块铁陨石，仅 2 克。

孙林瑞原名孙临磊，据他介绍说，天津有个取名习惯，母亲生孩子第一眼看到的東西就是孩子的名字。他出生时，母亲看到的是 3 块石头，所以取名为“磊”，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与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他最爱玩的就是沙子里的石头，更巧合的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接触的就是矿石。孙林瑞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根据中国有历史记载的陨石落地时间、地点(最早至公元前 2133 年山西夏县北第一块陨石，到 1911 年四川遂宁县陨石降落地)开始他的“陨石之旅”，将陨石的文化串起来，展现给后人一幅陨石的历史画卷。作为天津人，他特别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在天津境内的那块陨石，如果找到的话，不是又为天津增添一份厚礼吗？

## 崔黄口的“九桥十八庙”

崔黄口始建于明朝末年，与香河、宝坻接壤，历史上有许多美好的传说，“九桥十八庙”即是其中之一。

清道光年间，崔黄口王氏家族出了个父子进士，爷俩同朝为官，很受皇上宠爱，王氏在崔黄口建有王家祠堂，御赐“三怀堂”。并把崔黄口建起了一座小城，且顺势修了各种寺庙、庵堂。这样一来，崔黄口的名字就更大了，九桥十八庙成了崔黄口的别名。

崔黄口城的风格完全按照正式城的规模和形式建造。四个小城门，北门出口堵死，其他三门一律青砖到顶，红漆大门，土城墙上有多尾型马道，城墙下环绕着护城河，取玉带缠腰之意。

四个城门阁上都有一座雄壮宏伟的庙宇。东城门阁上供的是马王神，西城门阁上供的是财神，南城门阁上是火神，北城门阁上是真武大帝庙。

城内是十字街，将城划为田字形，正中央有一座土地庙，对南门部位是一城之主——城隍庙，与土地庙相呼应。西北部位有一座背南面北的倒观音堂，东北部位是东大寺，大寺内有两个房山，当中夹着一个小庙，称“两山夹一庙”，西南部位有一个地藏寺，东南部位是香火最旺的娘娘庙。

在这田字形的格局中，庙址的分布是十分对称的，城内七个寺庙加上四个城门阁就是十一个了。

城外的庙址分布也较为合理，东西南三个城门外的对面都有寺庙存立。西城门是西大寺，南城门是药王庙，在供桌底下还藏有一小庙，俗称庙中庙，东城门是关帝庙，俗称老爷庙，在它的庙脊上还立有一小庙，俗称庙上庙。在城西南距西大寺不远的地方有三个官庙，东北方距老爷庙不远的地方有个白衣庵。至此，城内外共十八座寺庙。

主要的庙会活动有：四月二十八日的药王庙会，三月二十的娘娘庙会，九月的关帝庙会，年关正月十五一般到南门火神庙前烧香上供。

“九桥”为平常的砖桥，分布也十分有规律，护城河上，东西南三门前都是一架青砖拱桥，通外界旱路。除此三桥外，或偏东或偏西，偏南偏北，都有两架砖桥建在水路与土路交叉处。护城河以外散布着大小几个水塘，或与沟渠相连，九桥的分布为了沟通各大坑塘，保证旱路交通方便，也有众星捧月之意。

## 河西务的“九窖十八缸”

提起河西务的“九窖十八缸”就必须从十四仓说起。

河西务十四仓是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建的。当年元世祖忽必烈为保大都百万人口粮食之必需，一方面疏凿京杭大运河进行漕运，一方面又实行海运。把南方产的粮食及日用品源源不断运进大都。在大都及附近的河西务等地设很多仓库进行仓储。河西务十四仓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到了明朝，大运河漕运更为发达，河西务的十四仓改为卫仓，不仅储存粮食，还储存食盐、茶叶、竹器、瓷器及金银珠宝等。清康熙八年（1669）运河再次决口，河西务城被冲跨，十四仓变成了水乡泽国，昔日的辉煌荡然无存。而十四仓的遗址却变成了一片废墟。

不过人们对十四仓地下埋藏着珍宝却有着很多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说。“九窖十八缸”即是其中之一。说的是明朝天启年间，一天，从南方驶来四条大船，船上装着一个一个沉甸甸的木箱子，靠码头后，既不让钞关人员检验，也不卸货，直到京城来了一位朝廷大员，拿出证件让钞关人员检验，才放行。过钞关后，四条大船渐渐驶过十四仓的前海子。掌灯之后雇搬运夫卸货。奇怪的是在那个官的授意下，每个搬运工都被人用黑布紧紧蒙住了双眼，搬运箱子时有人作引导，不准大声说话，轻搬轻放，若有损坏，犯杀头之罪。据老人们传说，当时搬运箱子的人们进仓院后，拐弯抹角走进一个地洞，光台阶就走了四十九级，洞里阴森森的。

在种种传说的诱惑下，村里很多人都刨过洞，寻过宝，但单靠锄、镐能挖多深？多数人刨出砖头瓦片，少数人刨出盘子、碗。因此，当地人编出“东仓西仓儿，不是砖头就是挖碴儿”的顺口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物局和市管处多次来人勘测考察，挖掘出宋、元时代的盘子、碗、秤砣、铜币等。1976年，天津文管处一行七人取样化验，挖出了三百年前的稻谷和一个海兰色的一米多高的大瓷瓶，瓶上绘的腊梅能自动变色，考古专家称是稀世珍宝。至于九窖十八缸的金银珠宝能不能找到，至今仍是个谜。

## 周家务的宫廷音乐会

在武清区崔黄口镇周家务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至今村中老人还称“傅家街”，提到它，就不能不提起周家务与宫廷音乐会的渊源。

清王朝建立之初，为安置有功的八旗子弟及皇亲国戚，在京畿实行“跑马占圈”的圈地制。凡被圈占的土地均称皇粮地，被圈占的村庄叫皇粮庄。当时，古运河畔的周家务被一个傅姓的皇亲圈起来了，庄头叫傅泰，是朝廷主管礼仪的四品官，傅泰的姐姐是乾隆皇上宠爱的皇后——富察氏。傅泰哥哥是乾隆皇上的宠臣傅恒，历任户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说白了皇上和傅泰傅恒是姐夫与小舅子的关系，所以傅家兄弟深得皇上的恩宠。

当年傅家在周家务村前占一条街，仿京城四合院的结构建造房舍。傅泰天生喜欢音乐，除在宫廷听礼仪音乐外，还爱听民间音乐。他每次从京城回周家务，都要带几位宫廷乐手和歌女在家中唱堂会，还把村中的吹鼓手叫来，一起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宫廷乐手演奏的自然也是宫廷音乐，村里大人小孩都爱听。有的年轻人请求拜师学艺，傅泰欣然应允，让宫廷乐手传授。后来竟有黄姓、王姓两位宫廷乐手把家眷迁到了周家务，傅泰赐给每家一座宅院，黄姓吹唢呐一绝，住在村南头，王姓吹管子无比，住在村北头，故村民有南黄北王之称。傅泰见村里人学宫廷音乐很多，遂出钱成立“宫廷音乐会”。每年正月踩街、庙会进香都隆重出会，平日应酬各家的红白喜事。自此宫廷音乐在周家务扎了根，而且声势闹得很大。

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筐儿港行宫，周家务宫廷音乐会奉旨迎驾，乾隆皇帝和皇后非常高兴，赐赏龙、凤旗各一面。

晚清时期，傅泰家运败落，而音乐会却保存下来了。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一个叫悟林的高僧来到周家务，此人是北京戒台寺受过戒的和尚，戒台寺是专门传授出家人经典及法礼的寺院，类似今天的专科学校，结业后授予衣钵、戒牌（官府发给和尚、尼姑的证书），凭此可云游天下各寺庙。悟林高僧不仅精通佛经，还深明乐理，会操乐器。村中音乐会的人们常向他请教，他热情耐心地传授指导，并将音乐会演奏的乐曲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更加规范。悟林又传授音乐会三十余曲佛堂音乐。从此，周家务音乐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村民为感谢悟林高僧的功德，重修村中的大承庙。大承庙占地十余亩，有前后两座大殿，前殿供释迦牟尼佛祖，后殿供奉文殊、普贤、慈航三大菩萨。钟楼、僧房、经堂二十余间，僧众三十余位，悟林为住持方丈，一个时期香火旺盛。

在悟林高僧的支持和帮助下，周家务不仅有宫廷佛堂音乐会，还先后成立了“吵子会”、“莲花落”、“鹤翎会”。崔黄口镇的炎九庙会（正月二十九日火神生日）是当地一个较大的庙会，崔黄口素有九桥十八庙之说，南门城头的火神庙为第一庙，每逢庙会进香，周家务的四道会必是头会。这四道会的顺序是：

一、吵子会。顾名思义，吵闹喧嚣。以四面大筛（象筛子般大的铜锣）、六对大铙、六对大钹开道，紧接着是十二对铙钹一齐奏响，声震十里之外。后面是仪仗队，强健的小伙子高举龙旗、凤旗、飞虎旗、五彩旗、会旗……缤纷夺目，绚丽壮观，整肃威严。

二、宫廷佛堂音乐会。以笙、管、笛、锣（云锣）为主体，另加大鼓、檀板、哑钹、碰钟、手钹、苏罗伯弦子等，依次演奏二十余种曲牌。悠扬婉转，气势恢宏，令人陶醉。

莲花落。也叫“莲花乐”、“落子”。属于地方曲艺歌舞类。演唱八至十六人，演唱者仅用竹板按拍，边唱边表演。其内容多是地方流行的小戏，如“小寡妇出嫁”、“思情十二楼”、“张其山卖线”等，情节幽默风趣，表演洒脱逼真，深受群众欢迎。

四、鹤翎会。表演者四到八名演员，骑着仙鹤（仙鹤是用竹片扎成骨架，用布糊裱，绘上色彩），边舞边唱，主要唱昆曲，内容有大四景、小四景等，分独唱、对唱、齐唱，唱到高潮处，会友及观众也唱，声如潮涌，表现出人们节日的欢乐气氛。

日本侵华后，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周家务的四道会无人组织了，会友们也无心演奏了。悟林禅师闭门读起了经文。1941年，林禅师六十大寿，村中小有名气的乐手胡玉亭正式拜悟林禅师为师，请求传授宫廷音乐及佛堂音乐。胡玉亭决心把这些乐谱及演奏技巧继承下来。悟林禅师毫无保留地教他，胡玉亭下了一定苦功夫，一句一句地学唱，一字一字地记谱，笙、管子、唢呐一个音一个音地练。胡玉亭对禅师由衷尊敬，与会友和睦相处，乐理、演奏高人一筹，颇受师傅的喜爱和村里人的尊敬，不久当选为音乐会的会头。

解放以后，政府提倡破除封建迷信，大承庙扒了，殿里的佛像拉倒了，和尚被撵走了，宫廷音乐、佛堂音乐再没人敢提起了，大鼓破了，锣、钹生锈了，道具毁坏了，无人问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天而降，周家务音乐会遭到灭顶之灾。造反派把各种乐器砸碎，当成破铜烂铁卖掉。道具、服装，从老和尚住处翻出的乐谱、经书皆付之一炬。凡是参加过音乐会的人，其家庭又有些历史问题的挨批挨斗，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游街，胡玉亭受迫害最重。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市县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周家务音乐会才得以恢复。胡玉亭冒死收藏的部分宫廷音乐和佛堂音乐曲谱得以重见天日。悟林大师传给他那支管子他也拿了出来，重新吹响了婉转悠扬的乐曲。其他乐器重新购买，周家务音乐会又成立起来了。胡玉亭不负重望，重新整理出宫廷及佛堂音乐二十多种曲牌。按演奏的顺序依次为：龙头、头段、二段、三段、翻竹马、折鼓、大开门、水龙吟、北尾、鹿身、杨柳青、万年吹、朝天子、凤尾、得胜令、八板……据考，这些曲调最早源于春秋时期的韶乐，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三千年前就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之说。

1984年5月，天津音乐家协会派专家到周家务录音、考证，确定二十余曲均是正统宫廷音乐和佛堂音乐。同年9月，周家务音乐会参加天津市举办的首届民间音乐盛会，周家务宫廷音乐队获奖旗一面，胡玉亭被授予“乐师”称号，刘纯、刘克功、傅振华、赵广智四人获“乐手”称号。不久天津电视台又把周家务音乐会演奏的宫廷音乐和佛堂音乐全部录音录像，进行播放。

欣逢盛世，枯木逢春。从此，这一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音乐瑰宝，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 武清有过海市蜃楼

海市蜃楼是滨海或沙漠地区因折光而形成的城郭、楼宇等幻景。

古时由于科学水平所限，人们误认为这是蛟（龙）蜃（巨蛤）所吐之气所形成的。连宋代爱国主义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说：“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

从史书记载看，除沿海或沙漠地区曾出现过海市蜃楼外，湖区也曾有过。清钱泳《履园丛话》中就说：在高邮湖、洪泽湖“近湖人亦见有城郭楼台人马往来之状。”据明徐昌祚《燕山丛录》载，武清也出现过海市蜃楼，但不是在海面上，而是在武清县的三角淀。其文曰：“武清三角淀，云是旧城，阴晦之旦，渔人多见城堞市里，人物填集。”《日下旧闻考》介绍说：三角淀在县南八十里，周回二百余里，即古雍奴水也。水自范瓮口、王庆坨、刘道口、鱼坝口汇于大沽港入海。今已淤成平地，乾隆七年（1742），分给贫民耕种。

现代科学进步了，但对海市蜃楼还缺乏规律性的了解。因此它依然是昙花一现与虚无缥缈的同义词。

## 京山铁路为何在武清绕了个弯儿

在武清东马圈与安标堡村之间，曾有一片占地约千亩的坟茔，当地人们称之为“曹坟”。就是这座坟茔，竟使得当初修的京山铁路绕了个弯儿。这是怎么回事呢？

武清王庆坨曹氏，原籍江苏徐州府宿迁县曹家集。明永乐二年成祖朱棣徙江南大姓以实畿辅，曹氏遂北迁至王庆坨村。

自明至清，武清曹氏历代受封或科举为官，成为乡贤或朝中重臣。明时，四世祖曹化雨，初为锦衣卫南堂理事，后以武功特进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深得皇帝器重。清时，七世祖曹涵十五岁奉康熙御旨入中南海万善殿读书，五载业成。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秋闱中式，翌年辛丑成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授职检讨，充任大清一统志馆、国史馆纂修馆。雍正四年（1726）怡亲王允祥及大学士朱轼保举督修畿辅水利。五年（1727），设京东、京西、京南、天津四局，分辖直隶全省各州县，为水利营田观察使兼天津局局长。雍正十年（1732）复回翰林院任职。曹涵在世时，为曹家鼎盛时期。

曹氏老坟原址在王庆坨南三里，因曹氏家族太大，原有墓地已无法埋葬。初选新址在京南采育乌音寺，但因路途遥远等原因，拟另选新址。曹涵历时十载寻觅新茔，于乾隆十九年（1754）选中东马圈与安标堡之间新茔地一处。

东马圈曹氏祖坟建成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修建者为曹涵。据传，当年曹涵为建新祖坟，曾带风水先生从北京一路南下，沿途查看。来到东马圈地界时，风水先生见此处地脉、水脉畅通无阻，且西有西马圈，东有东马圈，前有落堡，后有标堡。当时，风水先生说了一个顺口溜：“东马圈，西马圈，中间修座翰林院，前落堡，后标堡，子孙万代享荣华。”建议曹涵迁祖坟至此。

迁坟之前，定下葬时间为三月初三，因该日为王母降生之日，此日吉祥，但时辰不定，须待“鱼上树，戴铁帽之人”出现时方可下葬。“鱼上树”喻“跳龙门”，“戴铁帽之人”喻世代为官。

乾隆二十年三月初三日，曹涵在王庆坨举行了隆重的迁祖大典。送葬队伍浩浩荡荡从王庆坨出发，前队行至落堡，后队尚未出村，鼓乐齐鸣，蔚为壮观。时值落堡集市，许多人见此壮观景象，纷纷退到路边看热闹。其中有一人刚买了几条鱼，为观看方便，便把鱼挂在了路边树上。送葬队伍将至墓地时，天降大雨，看热闹的人四处躲避，其中一人无处可躲，便将一口刚买的铁锅扣在头上以避雨。这样一来，“鱼上树”、“戴铁帽之人”都出现了。此情此景，风水先生尽收眼底，遂通知曹涵，吉时已到马上下葬。曹涵便命送葬者及时下葬，立其父曹传与夫人张太安合葬墓为祖坟，并立墓志铭。

当年，曹坟之内绿树环抱，苍松翠柏，并建有别墅。

清光绪年间中国始修京山铁路，自北京经天津到山海关，全长415公里，分段修筑，历时21年。其中，北京至天津段施工设计时，拟在落堡设立车站，线路刚好斜穿曹坟墓地。工程施工约在光绪21年左右（1895年前后），曹家为保祖坟多方奔走，但毫无结果。而此时朝廷已令承包路业的德国人标明线路，限期完工。曹家焦急万分，四处打探情况。最终得知，主持工程的会办名叫孙彤轩，曾与曹家有交情，于是曹家备厚礼前往。孙彤轩为难地说：“你们怎么不早说？现在木已成舟，实在是不好改了，如果早作计划，就跟现在大不相同了。事到如今，真是没有办法。”经曹家再三恳求，孙彤轩命翻译把德国工程师请来。德国工程师沉思良久，便到坟地查看地势，决定变更线路：在离坟地一里左右的地方

设一肘弯,使铁路绕坟而过。事情虽然定下来了,但曹家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价。而当时清政府已有修建工程应绕避民间庐舍、丘墓的规定。尽管如此,京山铁路绕曹坟而过,仍在当地引起轰动,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诸如慈禧老佛爷、光绪皇帝亲自下旨,责令铁路改道云云。

东马圈曹坟作为武清丧葬文化的遗迹,毁于“十年动乱”,现已无据可考,唯有民间传说和曹氏后人回忆作为口碑了。

东马圈曹坟自兴至衰 211 年,期间墓地多次被盗,最为严重的一次约在民国初年。盗墓者从墓地西北约 500 米挖坑道进入墓穴,盗取曹涵基金银珠宝若干。因盗墓者手段高明,官府无据可查,成为悬案。

## 途径武清的萧太后运粮河

清代诗人蒋诗在一首题为《沽河杂咏》的诗中写道：“燕山府里界河横，辽宋分疆是武清；海口又连三女寨，古来天堑最分明。”由此看来，宋辽对峙时期，武清作为双方的分疆之地，各种物资的运输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故此，河流这种运输形式便显得更为重要。

历史上途径武清的萧太后运粮河共有三条。

第一条是龙湾河故道。辽宋对峙期间，幽州地区闹灾荒，宋朝封锁粮食北运。辽朝萧太后诏令军卒民夫，开挖一条从燕京经潞县、香河、武清至北塘的运粮河。明朝蒋一葵著《长安客话》记：“香河境内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县入七里海，相传辽时运粮河道也。”故称龙湾河，百姓俗称萧太后运粮河（即今青龙湾故道）。萧太后将辽朝根据地—辽西、辽东大平原生产的玉米、大豆、高粱装海船从今锦州渤海西岸南行，至北塘（今天津）靠岸，再将粮米改装小船经龙湾河浮运到燕京，途径今河北屯、下伍旗等地区，形成诸如南口哨、北口哨、西洞上、武洞上、后洞上等村落。

第二条凤河。凤河，隋唐时代称清泉河、桑干河。宋辽双方澶渊结盟之后，进入一百多年和睦相处时期，双方在界河开辟贸易市场，萧太后除利用龙湾河运输外，又利用龙河天然水道，略加疏浚，到信安、霸县等地进行贸易，所以龙河成了第二条萧太后运粮河。因凤河而兴的村落有高村、大王古庄、城关、泗村店、太子务、大南宫等。

第三条龙河。龙河、凤河是卢沟河（永定河）的支流，辽代的龙河从安次县的西马圈入武清境内，经董标堡、安标堡、西马坊等村，南流达宋辽边界。这条河道因与拒马河、桑干河、涑水、易水相通，商船也可以从宋朝的信安贸易市场直抵辽朝在涿州的贸易市场，将双方的香药、犀象、茶叶、粮米、漆器、牛、羊、马、驼等物资进行交易。因河而兴的村落有董标堡、东马圈、黄花店、王庆坨等。

## 武清人创始秦皇岛西餐店—宝星饭店

早在 1927 年，秦皇岛就出现了经营西餐的饭店，它的奠基人是武清王庆坨的张氏兄弟。张氏兄弟创建的宝星饭店是秦皇岛餐饮史上经营年代最早的饭店之一，宝星饭店的兴衰从侧面反映了秦皇岛的历史变迁。宝星饭店经营的菜系属英、法大餐，从第一代张曰芝到公私合营共传了五代，他们分别是二代于恩荣、三代孟兰亭、四代张兆荣、五代卞喜荣。这对后来秦皇岛西餐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张氏兄弟是如何创业、经营饭店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王庆坨有一张氏家族，家中兄弟五人还有一个堂弟，老大张曰生，老二张曰伦（堂弟早年去世），老三张曰顺，老四张曰芝，老五张曰达，老六张曰德。他们的父辈很早就来到天津市里谋生，张氏兄弟的父辈 30 多岁时离开人世，生活的担子压在了母亲身上。为了谋生计，十几岁的张曰生到驻天津英国军营里做帮工。幼小的张曰生很懂事，常常把英国军营里的剩饭剩菜偷偷带回家，才使弟弟们不至于挨饿。母亲有时买来高粱米磨成面熬粥糊口，弟弟们到天津周边地里拾柴禾。五兄弟在苦日子里煎熬着慢慢长大成人。

几经辗转，张曰生找到一份工作，在英国驻天津的邮政总局从事搬运工。张曰生一边工作一边托人给弟弟找工作。没多久，老三张曰顺和老四张曰芝在英租界内的英俊医院食堂工作，老三在餐厅做侍应生，老四在厨房学做西餐。老五张曰达成了天津邮政局的投递员，老六张曰德单身一人去了秦皇岛，成为港务局一名中级员司。

1925 年，母亲不放心在秦皇岛的小儿子张曰德，让张曰生去秦皇岛看望张曰德。张曰生来到秦皇岛住了一个多月，他看到这里经商的大多是天津人，跟在天津的感觉一样，他暗下决心来秦皇岛干一番事业。

1926 年，张曰生再次去秦皇岛，在朋友的帮助下，在道北正街（现称道德街）租了两间门面开起了照相馆，专事冲洗、照相业务。既顺利又干得非常好。因此，张曰生想在道南再发展一处。但是，驻秦皇岛的英国人总经理邱顿不批准买地建房。1927 年，趁着邱顿回国休假之机，才把房产申请批下来，于是抓紧时间盖起二层小楼，当地人称砖头楼。楼下一层开办商行，经营百货、文具等，另隔出一间用作冲洗照片暗房，楼上用作照相。原来的平房开饭店，经营西餐。为了给饭店起个好名字，张曰生专门请测字先生测名，先生让张曰生用曰生组成“星”字，前边冠以“宝”字，就叫“宝星饭店”。

饭店和商行开业前，张曰生让在天津的兄弟三人来秦皇岛一起做生意。因此，张曰生管理商行、照相馆；张曰顺、张曰芝经营饭店。开业后，宝星饭店生意非常红火，其原因是原来哥俩在天津英租界干这行，又都会说几句英国话，再就是饭店经营西餐，哥俩能把握外国人的口味，加之地理位置好，港务局的很多活动都来宝星饭店举办。

宝星饭店接纳的顾客大都是美、英、意三国的船员，他们时常喝完酒闹事，宝星饭店也经历了多次磨难。1928 年的一天，道南美国兵营里来了七、八个兵丁，他们是宝星饭店的常客，因此进了饭店很是随便，喝完酒不给钱便走，张曰生上前理论，美国兵不理睬，张曰顺、张曰芝等不让他们离开，美国人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张曰德曾练过武术，顺手抄起棍子把美国兵打出门外，美国兵哪肯甘休，把门口的铁架子拆了，挥舞着铁管朝张曰德打来，幸亏张曰德腰上扎着板带，才无大碍，美国兵占了便宜回了兵营。张曰生让宝星饭店关门停业，以示抗议。第二天，张曰生带着哥几个到当地政府、警察局报案、说理，他们不理不睬。饭

店关门后，一些外国人吃不到西餐很着急。美国兵营的军官得知此事后，自知理亏，便派人上门道歉，张曰生对他们说：“你们美国人是强盗！”周围商号的同行都说张氏兄弟是好样的，长咱中国人的志气！后来美国人不得不做出让步，赔偿了损坏的东西，张氏兄弟考虑到宝星饭店处于英租界内，停了几天业又开门营业。

从饭店开业到1937年的十年间，算是宝星饭店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日寇侵占秦皇岛，在道南敦福号旧址驻扎了日本宪兵队，来往的行人避而远之。

1937年10月的一天，一帮日本特务闯入饭店，说是要检查。他们指着汤勺上的12角星图案，硬说是国民党徽，他们不容分辩查封了饭店。一个多月后，通知他们把汤勺上的12角星抹掉。否则不准使用。张氏兄弟只好从天津重新订做餐具。

12月的一天，日本特务发现宝星商行楼顶上挂着红灯笼，饭店门口挂着绿灯笼。日本特务询问，宝星人跟谁接头？这信号给谁看的？并下令马上关门不准营业，等调查清楚后再处理你们。就这样张氏兄弟一家人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多月。结果是把灯笼拆除，不准使用。1939年，张曰顺的儿子张绪芬初中毕业后到饭店当会计，张曰达从天津邮局调到秦皇岛邮局工作。

由于兵荒马乱，外国人勾心斗角，日军伪军组织开会，日本株式会社的活动，常来宝星饭店骚扰，因此，宝星饭店吃饭的人越来越少，1942年宝星商行关门停业。宝星饭店把雇员减到只剩三人。

1945年，日寇投降后，宝星饭店辞掉雇工一家人经营。张曰生把宝兴商行交给了张曰达，1946年重新开业，张曰生回了天津。

1956年秦皇岛的商业经过了公私合营运动，加强了宝兴商行、宝星饭店的实力。张曰顺、张曰芝由旧社会掌柜变成新中国门市部主任，后调到饮食服务公司，张曰顺的三儿子张绪芳调到道北长城路饭店经营起早点。

“文革”期间，宝星饭店曾改名叫“红星饭店”，张氏长辈划为资本家。他们的后裔在学校、工厂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家族的亲人无法相识，运动期间，都选择“回避”，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张氏兄弟的创业始末，是一部社会变迁史，从中也折射出老一辈创业的艰辛困苦。

## 十三陵地下玄宫中的武清白城砖

位于北京昌平区天寿山南麓的明十三陵，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明十三陵中，从永乐七年（1409年）营造的长陵到清顺治初年的思陵，时间跨度长达二百余年。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长陵和定陵。

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慨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而武清的白城砖在这座瑰丽的古墓葬群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大兴土木，兴建工程浩大的陵墓，十三陵即为代表之作。明朝迁都北京后，有十三位皇帝埋葬在此，故称十三陵。十三陵每一座陵墓的修建都要花费十多年时间，役使几十万军士和民工，耗银千万两。兴建这些陵墓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材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而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明万历年间，有人上奏说：“今武清地方土脉坚胶不异临清。去京仅一百三十余里，较临清近二千余里，一改兴作，不但粮船，民船不苦烦劳，抑且为国节省，有生财之效。”经工部核议，皇帝准奏，武清蔡村始烧制城砖，每年30万块。

北运河处在燕山山前平原，地势北高南低，落差大，水流湍急。为了便于航行，人们想出了使河道弯曲的办法，加长河道，缩小坡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弯抵一闸”，从中闪耀着我国古代先民智慧和创造精神。蔡村地处运河畔回转弯曲的地方，运河水夹带的泥沙，厚厚地淤积在水流相对平缓的河道中，已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性，是烧砖的理想材料。烧制城砖的工艺是很复杂的，将泥土挖出晾晒，然后经过浆泡、过滤、摔打、制坯等各种工序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48市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高。为了便于检查，每块砖上都打有窑户、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砖色灰白，故称白城砖。

明万历二年（1574年），此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已开始谕令临清、武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制白城砖120万块。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有大幅度增加。

## 象生花高手出武清

绒绢花又称人造花、象生花。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中出土过不少唐代绢花，其工艺水平已相当高，说明我国制作绒绢花具有悠久的历史。

近代，天津武清区是出制花高手的地方。当时，清宫廷内用花量很大，所以，许多武清制花艺人到北京去耍手艺。其中，龚怀在北京东安市场开设了祥瑞花庄；刘亨元在北京开设立万聚兴花庄，被人誉为“花儿刘”。他们的作品备受清宫佳丽青睐。还有的资料上说到刘亨元的作品曾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得过四等奖，我翻阅了有关巴拿马赛会的资料，没有刘亨元获奖的线索。再者，巴拿马赛会上也没有四等奖这一奖项。

武清南王坪的王永癘(1876~1957)身怀绝艺，勇闯上海滩。他擅做纸、绢、绫、绸、通草等人造花，并开创纸拉花和纸摺灯制作方法，其作品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天津著名的老字号——“玉丰泰”京花店也是武清人开的。1905年，武清制花艺人卢玉山等三位制花高手合伙在天后宫开设“三义厚”绒绢花作坊。1927年，他们将门市部迁出天后宫，改名为“玉丰泰”京花店。1946年，卢玉山因年老体衰，告老还乡，遂将店铺作坊卖给王锡传等人。王锡传等继续使用“玉丰泰”京花店这一老字号。

“玉丰泰”制作的绒绢花，不仅是京津地区逢年过节以及娶媳妇、过彩礼时女子必戴之物，同时，“玉丰泰”在全国各地名演员中也享有盛名，很多演员的“头面”也都是请他们制作的。

20世纪初，上海已有制花的手工作坊，当时只有绢制的胸花、头花和衣帽花等少数品种，供婚嫁喜庆和戏装之用。20年代，河北武清人王宝仁来沪开设宝盛永花作。该业淡旺季显著，从业者终日劳累难以维持生计，世有“有女不嫁做花郎”之说。制花作规模很小，自产自销，有的由城隍庙前街（现名方浜中路）一带的裕丰恒、戴春林等花粉店代销。

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的材料，赵松海(1916~1977年)天津武清人。先天残疾，15岁来沪入花作行当学徒，潜心学艺。民国35年(1946年)于兴业路205弄58号寓所设海达纸花工艺社。1955年，在浦东烂泥渡路45号组织绢花生产小组，1956年6月上海工艺美术联社组建。此前，同年3月16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成立，包括赵松海在内的多位著名艺人进入该室从事研究创作，带徒授艺，成为上海工艺美术的专业队伍，有社员73人，绢花月产量1.2万打；1958年绢花生产合作社迁至成都南路36号莲花寺内，社员增至194人。同年，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增设了人造花专业，擅长制作盆插、瓶插绢花的赵松海颇有造就，由他制作的凤凰铁树、迎春松、红棉树、小黄杨等盆插和瓶插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制品造型优美，精工染色。有盆景五针松、橡皮树等作品陈列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场所，产品打入国际市场。1964年被评为人造花工艺师。

## 武清城关的惠泉亭

一本名为《京兆武清县报告书》的书籍，书成于民国八年（1918），由北京翰雅斋出版。主要记述民国七年（1917）武清的一些主要事件，图文并茂，极有收藏和参考价值，其中一幅老照片《惠泉亭图》和《创凿甜水井记》引起笔者极大兴趣。

《创凿甜水井记》言称，1917年夏秋之交，武清上游五条河流洪水大发，至使下游武清城关沥涝成灾。当时，武清知事张象焜在巡察灾情时得知，城关若遇洪水，地面杂质冲到井里，浸透到地下，水退之后，方圆百里都会出现成片的盐碱，这与武清原为退海之地有很大关系。所以，一旦发生洪灾，就会满地出现盐碱，造成浅井水咸苦，水质差，影响老百姓的饮水安全。知事张象焜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他告诉百姓商家，要想解决城关百姓吃咸苦水的问题，必须学习外国人打井的方法，就是一边打井，一边测试水质。这样，打出的水才有保障。他这一号召得到百姓响应，经商议井址就定在署衙东面一块空地上。自1918年立冬到1919年清明，历时150天，开掘四十八丈，超过苦水层，找到了甜水。经试用“无碱性，无盐味，甘泉清冽，类似琼浆瑞露，淋漓恍如天酒。”

《创凿甜水井记》在介绍打井经历后，感叹“事无志而不成理，能见而始达，古人掘井九仞而不及泉，非无泉也，功未竟耳。”城关凿掘甜水井的经验在全县推广，使百姓免遭吃咸苦水的历史，惠及了武清百姓。

“洋井”建成后，为了使城关百姓吃上甜水的历史不被忘记，百姓在井上建造了“惠泉亭”，并由武清县知事张象焜题写了亭名。上世纪80年代，城关百姓仍在饮用这口“洋井”的水，但“惠泉亭”已荡然无存，具体是天灾人祸，还是战争动乱造成的，就不得而知了。

## 流行于武清一带的北板马头调

“马头调”是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古老曲牌。在清代大型俗曲总汇《白雪遗音》中，“马头调”是其中唯一一首有工尺谱传世的曲牌，因此显得更加珍贵。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马头调”的主要流行场所、曲牌的音乐结构特征以及在现今曲种中的流行情况进行了些微考释，并明确“马头调”是主要流行于码头一带的一类曲牌，其具体音调属于名同曲异的范畴。

“马头调”清初开始在北京城区传唱，又作码头调。据刊行于1795（清乾隆六十年）的《霓裳续谱》记载，当时天津流行的小曲就有马头调，它盛行于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这种小曲，是从花船上的媚曲变化出来的。随唱的乐器，有弦子、琵琶、四弦和胡弦。”（见《人民首都的天桥》）。道光八年（1828）华广生编选的《白雪遗音》刻本中共收入马头调五百一十多首，分《马头调》、《马头调带把》、《马头调带把湖广调五更》等不同形式。唱词内容以情歌为多，共有四百三十多首，如《卖相思》、《独自一人》等。其他有从戏曲故事改编的《凤仪亭》、《醉打山门》等几十首；讽刺贪官、赃官的政治歌谣《不认的粮船》和《李毓昌案》两首；描述风光景物的有《济南八景》、《元旦》等十几首；《戏名》、《古人名》等游戏文章十五首。当时多由歌童演唱，后来才出现专业的盲艺人。清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学秋氏在《续都门竹枝词》中曾有“秋波临去转难当，白眼看它顾曲郎。一自‘马头勾调’盛，瞎姑镇日瞎奔忙”的诗句。据白凤鸣（1909-1980）回忆，马头调“是运河南北流通时艺人在客、货船中演唱的一种小曲。流行于武清到通县一带的称‘北板马头调’；流行于沧县、德州、郑家口、临清一带的，称‘南板马头调’。”（见《鼓王的三绝》，载《曲艺》1981年四期）。

另据刊行于光绪十八年（1892）的《永庆升平》一书，在第三十二回“哈大人升任上海道，张广太杀贼沧州城”一节记载，张广太（武清河西务人）因其素好“马头调”，在天津落魄时，恰逢沿运河到上海赴任的道台哈大人途经天津，被广太素日所好的“马头调”迷住，遂收其为属下。据《永庆升平》作者郭广瑞在其序中自署“燕南居士”，知道他大概是北京人。据此可以断定，光绪年间“马头调”在京津之间已广泛流传。

“马头调”的曲调，《白雪遗音》卷首刊有其工尺谱。据清末民初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其腔调仅七个，倒换用之而已。不好听，然唱者最费力。凡师之教徒，多以此为课程，练习音与气也。近来无唱者，以不受欢迎故耳。”这种说法指的应是北板马头调。南板马头调则曲调徐缓、婉转动听。杨懋建在《梦华琐记》中提到：“京城极重马头调，游侠子弟必习之。矻矻然，断断然，几与南北曲同其传授，其调以三弦为主，琵琶佐之。”作为一个独立的曲种，马头调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北京的广播电台广播，旗籍出身的演员韩洁远（原名恒杰远），凭每天深夜在电台自弹自唱南板马头调享有盛名，擅唱的曲目以戏曲故事为主，有《藏舟》、《游湖》、《合钵》、《水斗》、《祭塔》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北京只有瞽目艺人姜蓝田会唱马头调，姜逝世后遂失传。

京韵大鼓演员刘宝全擅唱南板马头调《白猿偷桃》，曾担任过刘宝全弦师的白凤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唱段传授给中央广播说唱团赵玉明、新岚云演唱，有录音保存。

## 刘邦在武清兴建泉州古城

提起泉州，人们就会认为，这是指今天的福建省泉州市，其实大大地错了。两千年前，天津地方（武清区、河北区、北辰区）曾经称过泉州。由于有出土文物作证，泉州故城已成为汉代和汉代以前天津平原开发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叫泉州？《水经注》明确记载泉州城是以城周围有水而得名，“历水泉八十里，取泉流即清之意”。故城在漯水（今永定河）和沽河（今北运河）的下游，所以，此城的原名得以一直保持至今。泉州，是刘邦建立西汉政权的第二年，即与项羽争夺天下的第一年（公元206年），在天津设置的最早县治之一，其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市区以北和武清县境。故城位于武清城上村，距天津旧城仅二十公里。城墙宽十七米，用土夯筑，夯层十厘米，南城墙内中间开一门，由于破坏严重，残留部分最高不足两米。城内散布着丰富的文物。战国遗物有燕国鬲、陶豆、兽纹瓦当。汉代遗物中有大板瓦、筒瓦、卷纹瓦当和夹云母屑的红陶釜等，其中燕国兽纹瓦当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距古城东南十一公里的今天津北辰区双口村，曾经出土过“泉州”戳记的陶罐，城址中也发现印有“泉州”二字的陶片，说明这里确系泉州故城，是武清两千多年前的旧县县治所在地，是天津最古的城镇之一。如果您到现在武清的城上村，仍旧可以看到古城墙的整体残骸。

实际上，刘邦在兴建泉州城之前，北辰和武清两地的人口集中地，也在那里。就是说，在西汉筑城以前，这里已经是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聚落，因为部分出土文物的年代可追溯到西周，城南沟壕的土坡上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到战国时期，这里已经拥有一些比较讲究的建筑，证据是出土了两种艺术价值颇高的半瓦当，一种是当面上塑出一只翘首怒吼奔跑的猛虎，形象生动有力；另一种是两只相对而立的龙形神兽，形态神现。读者注意，能在当时装饰这种瓦当的，显然不是一般的建筑。如果大胆一点猜想，很有可能三千年前，那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镇。

对于城上村附近的这座古城，史书上有记载，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天津诗人、芥园水西庄的主人查礼（查为礼）在他《铜鼓书堂遗稿·游莎题、上方二山日札》中记载今城上村的古址：“出天津北门，历丁字沽，二十五里至桃花口，绕堤行三十五里路至土城。”这个记载是二百多年前，乾隆年间中期的事，经考证，这座“土城”在今城上村北二百米，这是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泉州县县城遗址，因为乾隆年间编修《武清县志》地图中，此处即标有“泉州”字样。

1973年春，有人在这座古城之内采集了很多陶片，其中有横印隶书“泉州”二字的残陶器底，它比前些年在北辰双口出土的带“泉州”字的陶罐，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是当地所出文物，更能证实这个遗址就是西汉泉州故城。

## 武清鲜于璜墓摭谈

鲜于璜墓位于武清县高村公社兰城村东，南距武清县旧城约二十里。1973年社员在取土时，于距地表一米多处发现一方墓碑，此碑呈圭形，上有“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字样，笔势方折，系小篆结构。1977年在碑北六米处发掘出古墓。

据墓碑记载，鲜于璜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官吏，历任郎中、度辽右部司马、赣榆令等职，中途服丧，后为三公征辟，汉殇帝延平年间拜安边节使，抵御乌桓骚动有功，至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年八十一岁，亦多任郡县地方官吏。

鲜于璜墓的墓碑，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这是建国以来出土保存最好、字数最多的一通汉碑。碑石刻记了鲜于璜生前的“勋绩”。鲜于璜所处的时代，内部党派斗争激烈，安帝执政后，重用宦官。杨震一派耿直的官僚认为，这是“黑白混淆，清浊同源”。从此，在外戚与宦官的冲突以外，又加上清流与浊流的矛盾。鲜于璜当时曾“出司边方，单于怖畏，四夷稽颡”。任雁门太守七年有余，到官视事，“民殷和睦，朝无顾忧，勋绩著闻，百辽咏虞”。此碑于东汉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十八日由他的孙子鲜于鲂等所立。

鲜于璜死后，又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四朝，历四十年，始立此碑。其原因，恐怕与党锢斗争有很大关系。桓帝十五岁继位，梁太后临朝。她采取了宦、戚并用的对策，因此鲜于璜的事迹得以重新表扬。碑文中称其“清风流射”，“有勋功于汉室”，很耐人寻味。此碑的发现，印证和补充了《后汉书》的有关记载。

出土时碑已倒，碑座遗迹犹存，用饰有柿蒂花纹的方砖砌筑，状如长方形覆斗。碑作尖首长方形，通高242，宽82，厚12公分。碑首有圆形穿孔一个。碑额中间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字，两旁线刻青龙、白虎各一。青龙昂首舞爪欲搏，白虎回首张口似吼，是两个强有力的护神。碑首阴面刻一朱雀，衔草伫立，振翅欲飞，与青龙白虎构成四种神中的三神，另有一身玄武（龟）未见。图案形象生动，刀法洒脱，线条流畅，颇见雕刻者的艺术造诣。

鲜于璜碑的书法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它的阴阳两面皆有铭文，共827个字。除七字残泐难以辨认外，余皆清晰完好。碑阳铭文叙述死者的生平事迹，其中提到鲜卑和乌桓两个少数民族的情况，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碑阴为长篇四句韵语，内容与碑阳大致相同，文末列举死者上下三代世系，是了解鲜于璜家族的主要依据。更珍贵处，是此碑书法艺术的造诣，字体方整，结构严谨，笔触稳重有力，笔锋含而不露，表现了端庄雄健，淳朴浑厚的古隶风格。笔划丰厚饱满，用笔较方，起笔收笔不露锋芒，浑厚含蓄，行笔顿挫有致。字径由四至四点五厘米不等，字形中长、扁参差，统一中具有变化。此碑的出土，引起金石、书法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誉其“为雄强风格的汉隶，增添了另一典型”。与飘逸秀丽的曹全碑、方劲古瘦的张迁表颂碑相比，更有独树一帜之妙，是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鲜于璜碑在天津武清出土，不仅使人们得见汉碑淳朴古拙的典型风貌，而且也预示着古碑石今后继续发掘的新的希望。

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又分前、后二室，通长14.7米，宽3.6米。甬道原有左右二室，可能埋葬时即已废弃。墓壁皆用青砖砌筑，墓顶砌成穹窿形，墓底铺砖三、四层不等。墓顶之上是经过夯筑的封土，现仍高出四周平地1米多，直径约20米。这种结构是东汉时期常见的中型墓葬，与墓主人的身份是相符的。

由于遭受盗扰，棺椁亦朽，人骨与随葬品甚是凌乱。不过在清理过程中，仍获得随葬品 73 件。

这里还有饮食用的壶、罐、盘、盒、魁、耳杯和灶等，包括了餐事用具、食具和酒具，魁是带柄的斗，又称羹斗，斗身原系木质漆器，已朽，只剩斗柄，铜质鎏金，作成龙首形，瞪目张口，躯饰鳞纹，工艺极精。耳杯又称羽觞，是酒器，出土有陶和木质两种，木耳杯仅剩两个，髹漆朱绘卷云纹，色彩清新，线条流畅。墓中还有青石雕成的石匣一件，长 56 厘米、宽 39 厘米、高 28 厘米，盖雕一独角怪兽，以作辟邪之用，匣内浮雕耳杯四个，碟二个，鱼二尾，应是模仿生前食盒，供死者永远享受的。值得注意的是遗物中有一件四系褐釉瓷罐，通高 36 厘米，胎质呈灰色，腹部压印网格纹，肩部塑四个对称的扁环形耳，与湖南马王堆一号墓的瓷罐类似。此类“硬陶”式瓷器，在北方汉墓中很少发现。

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起居用品，包括照明用的灯，焚香用的熏炉，梳妆用的镜、梳、篦，修整简牍用的书削，佩戴用的玉璫等。灯为陶制明器，分三层组成，通高 96 厘米，灯座堆塑舞乐、骑马人物三周，灯盏分插在两层陶盘的口沿上，共六个，夹以龙首形装饰，造型宏伟壮观。熏炉铜铸，炉罩镂孔蟠螭花纹和兽面花纹，晶莹古朴，殊为精美。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套包括仓楼、仓房、陶碓、陶井的庄园设施模型。陶仓楼通高 85 厘米、宽 86 厘米，单檐四阿五脊顶，密排瓦垅，上设天窗三个，反映了古代通风贮粮的知识；顶檐前后各有三组斗拱承托，正面有门窗及平台、栏杆，两旁还有斜坡梯道与地面相连，左侧有一浮雕人物作背粮登梯状，既显示了古代仓房的结构，又展示了粮食入仓的场面，构思别致，是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艺术作品。陶俑仅存两件，一男一女，男俑手捧甬肃立，女俑手捧一物跪坐地下，惟妙惟肖。这些文物生动地展示了地主庄园的性质，对内课役童隶，理营产业；对外欺凌小农，掠劫财富。在我国历史上，这种地主庄园整整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人民革命胜利后被彻底铲除。

## 东汉鲜于璜墓碑发现始末

1973年出土于武清的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墓碑，是我国解放以来所发现保存完整、存字较多的汉碑，为研究汉代历史、书法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武清区高村镇兰城村东约一华里处，有一块名为苏家坟的“岗子”，地势偏高。1973年5月，该村村民张俊华在“岗子”地挖土时，发现距地表一米深处有一块大石板，两面均刻有文字。他认为石板可作为石台阶用，于是将这块长2.42米宽0.81米厚0.12米的石板用车运回家，卸在院门口。1973年7月，武清、蓟县等五县划归天津市后，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对五县开展文物普查。当考古队看到上刻“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的墓碑后，认为是考古工作一大发现。经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初步研究，得知该碑刻于公元165年。为了保护文物，当时村里派民兵看守。同时，市文管处带墓碑拓片到北京，经国家文物局进一步鉴定，一致认为这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一大成果。

鲜于璜墓碑运抵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前，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加固，二是拓片。鲜于璜墓碑在地下沉睡近两千年，石质发生变化，表面剥蚀，内部有的地方也已成了“千层饼”，敲击时发出“噗、噗”的声音。从北京请来专家往碑内注射环氧树脂，以达加固的目的。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墓碑的书法艺术并了解碑文，特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请来老师传拓。时值隆冬，室内外温度几乎无二，当时为解决宣纸太湿这一问题，不得不使用了热吹风的方法。

1974年2月，市文管处、县文教局、县文化馆和高村公社党委的负责人参加了兰城召开的社员大会，大会向保护文物有功的单位和个人赠送了锦旗和农具。同年5月，鲜于璜墓碑正式移交给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保存。

## 武清“元宝”寻踪

1971年武清白古屯大赵庄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时，于地下3米处出土一笏银铤，平面呈束腰形，表面微凹，周有波纹，长14.5厘米，宽8.7厘米，重1974克。正面砸印“平阳路”、“伍拾两”、“张海”等字，鏤有“课税所”等字，背面阴刻“平阳”二字。银铤无纪年，其年代，只能按照铤上的文字进行分析。

《元史·地理志》记载，“晋宁路……，金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大德九年以地震改晋宁路。”则知平阳路之名，仅元初才有。元代的平阳路（晋宁路）在今山西省临汾一带，属中书省直接统辖。所以此铤属元初之物。

又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太宗庚寅年（公元1230年）始立平阳府征收课税所，每四十斤盐得银一两”。这里称“平阳府”，是因当时元朝还未建立，故仍用金代地名。“课税所”名称，正与此铤同，表明此铤是平阳路课税所所用课盐税得来的银子铸成的，年代属元更凿然无疑。

1969年，武清双树小河村在村西平整土地时，出土银铤八笏，同时出土的还有六鏊耳锅、黑釉大罐等遗物。铤亦呈束腰形，和大赵庄出土的相似。无铸造地、机构等标记，只鏤刻“行人”和“秤子”的姓名，以及银铤的重量。这是官衙在把银子交给金银作坊或调集工匠铸铤时，为确保质量而采取的措施。八笏银铤鏤刻的重量，最大50两，最小49两，实测重量最重2008克，最轻1965克，反映了我国元代以来衡器实际重量的变化，这是封建统治者增加剥削量造成的。银铤上鏤刻着各类的符号，是流通过程中打上的标记，符号越多，表明转手的次数越多。所以这批银铤是流通用的。其年代，根据铤的形制，同出的锅、罐等判断，也属元代之物。

白银作为贵重金属，可以铸成货币流通，更适合作为财富储存。据文献记载，银铤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因为它初期的形状像封建社会官吏上朝时所持的笏，因此也被称作笏或版。传世的唐代银铤，长一市尺左右，宽二寸许，厚一分多到三、四分，重量不等，这是最初的银铤形制。宋代银铤开始规格化，铸成平面束腰的“元宝”形，有大小两种，大的重五十两。小的重十多两到二十两不等。“元宝”的名字就是元代开始的，有“元朝之宝”的意思。

元代银铤以铸造的目的、用途不同，可分成和买银、平准银、税银等多种。和买是一种信贷关系，国家专铸一种银铤作为信贷流通用，黑龙江阿城出土的银铤上即鏤有“忻州和买银重伍拾两”字样。平准银是经天平校准的银铤，每铤必重五十两，江苏省句容县出土一铤鏤有“平准，至元十四年，银伍拾两”字样，背面又阴刻“元宝”两字，可认为是元朝的标准官银。税银则是国家的税务机构把收税所得的银子，铸成银铤上缴国库的，大赵庄银铤即属于这一种。当时元朝军事活动频繁，支出多，课税亦多，有金课、银课、铁冶课、河泊课、烟茶酒醋课等各种名目。大赵庄银铤属盐课所得，平阳路隶属有解州和安邑两大盐池，是重要产盐区，平阳路课税所的主要任务也是管理盐税。

武清发现元代银铤的地点，比别的地方较多，这就使我们联想起了元朝的经济命脉大运河以及宋辽对峙时期途径武清的萧太后运粮河。元王朝在各地搜刮的财富，大多是通过这一渠道源源流入国库的；国库中的财富，也多经此转输到需要开支的地方。因此运河上下，常年漕船穿梭，行人往来活动频繁，不可能没有事故发生，从而造成银铤散失。这两个银铤出土的地点，也正距运河不远，大赵庄在运河故道西岸，当地村民说该处还曾是运河码头，小河在运河东岸，离河二里许，可见确和运河有关。

## 潞水漕影

元代有一条最为繁忙的黄金水道，它一头支撑起元大都繁忙的物资供应，另一头托起直沽的繁荣，这就是今天称之为北运河的潞水漕渠。在忽必烈进驻燕京琼华岛的当年，即下令“勘汇亡金河仓規制”，着手组织漕运。开始时仍使用金朝开通的“天津、通济”漕渠，以后又逐步改造，包括通州以上和通州以下两个部分。通州以上部分，是扩大水源，重建闸河，在昌平筑堰，把白浮神山泉、双塔河、榆河、一亩泉、玉泉山等水都引到大都城内的海子（今积水潭），再东南流出文明门（今崇文门附近），把一百多年前金朝填塞的金口渠挖开，建成新闸河，东流至通州入潞水，即是通惠河。通州以下部分，“于蓟榆河口径直引开，由蒙村跳梁务（今棠粮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淀（今谐音作“伍旗”）盘浅风浪远转之患。”这是一项裁弯曲直工程，是从香河县孙家务蓟榆河口，向南经河西务至杨村，取消绕行下伍旗的大弯，北运河的基本格局至此形成，并保持至今。

裁弯曲直工程是1276年完成的，在此以前浮鸡淀旧渠已使用了几十年，因此沿线亦有许多遗存，包括下伍旗附近的小庄头、忠义庄、营村及棠粮务附近的中迤寺等遗址，其中以忠义庄遗址规模最大，面积达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米，曾出土过潮州“铭文铜镜”，以及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等各个窑系的罐、碗、盏、杯等瓷器。口碑流传当地过去有古城，应是河西务兴起前，北运河中途的一个重要漕运据点。在中迤寺遗址发现栈桥遗址，以柏木桩作支柱，宽4米，长20米伸入河中。附近发现一艘沉没的对槽船，满载高粱，还有一千多枚铜钱，年代最晚的是“至元通宝”。另有一艘长5.6米，中间宽，两头尖的沉船，应为当时巡逻用的“刀鱼船”。

河西务漕渠开通后，这一线立即繁忙起来，留下了丰富的遗存，主要遗址有十四仓、小河、蒙村、秦营、杨村、辛庄、孝力等，多颇具规模，出土有重要文物。其中以十四仓遗址规模最大，面积50万平方米，覆盖东仓、西仓、龚庄3个自然村。文化层厚1-2米，发现有成排的房屋基址及下水道等遗迹。历年出土文物极多，包括铸有“皇甫”、“西京”等字样的铜权、铁权，以及铜镜、石砚等，尤以瓷器最为丰富，有龙泉窑、定窑、磁州窑、钧窑等不同窑系的器皿，包括碗、碟、盏、盆、罐、杯、炉等，另外还有狮、狗、人物等多种工艺品。其中磁州窑“春夏秋冬”四季瓶、影青瓷狮、龙泉窑瓷炉等，更是难得的文物珍品。河西务是元代漕运的重要据点、元大都外围最大的仓储基地。《元史》记载1287年“自京畿运司分立都漕运司，于河西务置司，分司临清”，掌御河上下漕运。又于1288年分置内外二漕司，“其外者河西务置司，领接海道运粮”。知这里曾是兼管河漕和海漕的漕运高级机构所在地。并在此建造了14座国家粮库。今遗址东南面称“海子”的地方，即是当年的停船处，残存有码头遗址。到明隆庆六年（1572）又在今河西务镇建造砖城一座，方形，面积25万平方米，《长安客话》称之为“京东第一镇”，“两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到清末漕废才逐渐衰落。

## 北运河沿岸之战

1900年，联军攻陷天津后，遂沿北运河长驱北进，向北京攻击前进。天津失陷后，清军马玉昆、聂士成、吕本元、何永盛等部，约1.5万人守北仓；宋庆率所部5000人，守杨村；武卫前军冯义和、胡殿甲部守芦台；勤王之师记名总兵蒋尚钧率豫军驻杨柳青；义和团2万余人守卫在铁路沿线。裕禄召集宋庆、马玉昆等共同会商固守北仓、杨村的部署，马玉昆亲赴各地观察地形，在北仓以南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第一道由刘家摆渡、韩家咀附近的火药局、刘家房、唐家湾等据点组成，筑有大炮阵地，埋设了地雷，由9000余人防守；第二道以北仓南的庄为中心，筑有向左右延伸3公里的墙垒，在要隘处理了地雷，以北仓东南和西北构筑了火炮阵地，由4000余人防守。北仓有预备队2000人。宋庆在杨村车站，跨北运河构筑5公里长的墙垒，沉大船2只，堵塞水道。从西局子武库和韩家墅武库，运出枪枝弹药，补充部队。

联军在攻占天津后，就加紧筹谋进犯北京。8月初，联军在天津集结的部队已达3.4万余人。8月8日，联军召开了各国指挥官会议，拟定了先占北运河两岸各要点，后犯北京的作战计划。4日夜，联军1.8万余人，携81门大炮，从天津沿北运河两岸，进犯北仓和杨村。从左岸出发的是俄、德、法、意、奥军，共4850人，携大炮28门；从右岸出发的是日、英、美军，共1.32万人，携大炮53门。8月5日，联军先犯北仓。深夜，联军进攻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吕本元、何永盛与日军展开炮战，继以肉搏相拼。随后英、美军增援，双方血战4小时，吕、何两军不支，先后退却，清军的第一道阵地被联军突破。上午9时许，日、英、美军攻击北仓第二道防线。

周鼎臣部与联军展开激战，马玉昆派两个营赴援，联军绕道10余里，出马军后，马玉昆部被日军拦截，周鼎臣部得不到增援，虽有义和团数千人助战，未能阻遏联军凶锋。6日晨，联军分3路攻击杨村。俄、法军攻清军右翼，美军攻左翼，英军攻正面，日军殿后策应。清军营官吕霞帮带领300人，隐蔽在铁路一旁，进行伏击，予联军以杀伤，吕身负重伤，乃率部退却。郭殿帮部在杨村抗击美军第十四步兵团的强攻，宋庆速调步、骑、炮兵奋力反击，在激战中，统领周鼎臣和营官朱怀双身负重伤，部队伤亡大，势孤援绝，战斗到中午11时，杨村失守。直隶总督裕禄奉旨前来督战，由于战事不利，守军节节败退。八月六日，联军侵占杨村，总督裕禄带了三五个亲兵出杨村，向西北方向疾行，洋兵紧追不舍，裕禄慌不择路，躲进南蔡村一处民宅，怎想这间房子里竟并排放着许多棺材，洋兵便围住村子，鸣枪入村，然后一家一户搜查。裕禄见事不可为，自知必死，跪下向北京方向磕了三个头，口呼“智穷力竭，辜负国恩。”在洋兵冲进大门的同时，惨叫一声，举枪自杀身亡，他的亲兵却逃了出来，一路飞跑，赶到北京报讯，这一天是八月八日。宋庆、马玉昆渴望援军不至，撤出南蔡村。

北仓、杨村之挫，清各自撤走，周鼎臣重伤身亡，马玉昆也因损兵折将，无力再战。就在这危难之际，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请纓迎战联军。李秉衡原为山东巡抚，因早期在处理教案中同情和支持义和团，触怒列强，被清廷政府革职。在军情紧急之秋，李秉衡挺身而出，率兵抗击联军北犯，被清廷倚为干城。7月25日，慈禧太后召见其于宁寿宫，并任命他为帮办武卫军事务，率提督张春发、按察使陈泽霖、总兵夏辛酉、万本华部和3000义和团民，毅然出征。

8月8日，李秉衡率部抵达河西务西北的羊房，令张春发、万本华率部驻河西务，陈泽霖部居西侧，夏辛酉部居东侧，李秉衡亲率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马队两

营，择地指挥。

8月9日晨，联军紧逼而来。张春发、万本华部先后与日军接火，因立足未稳，有枪无炮，承受不住日军的猛烈炮火，副将杨得胜阵亡，部队伤亡很重，且战且退。从北仓、杨村撤回的清军成了惊弓之鸟，不战而溃。李秉衡从河西务退到马头镇，联军展开两翼，包围而来。夏辛酉率部迎战，苦战6小时，将敌打退。

10日，陈泽霖率数营赶来，驻守马头镇，李秉衡率指挥部转移到张家湾。马玉昆率师不战，退守南苑，沿途焚烧抢掠，民众逃散。李秉衡出师不利，连日战败，面对兵败山倒颓势，自度出师难捷，莫如完节而终，以谢朝廷，遂于11日服毒殉国。其总理营务处王廷相也投河自杀，联军占领张家湾，直犯通州，驻通州翼长文瑞和长麟不战而退。

8月21日联军占领通州，兵逼北京城下。

## 武清人创建“狗不理”

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为什么叫狗不理呢？读表面意思，似乎是连狗都不理的包子，还那么出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它有着自己的来历！

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的风味名点。目前已经有了英文名称：“GoBelieve”。它色白面柔，大小一致，底帮厚薄相同，一咬起来直流油，但又不感肥腻，味道十分鲜美。

“狗不理”创始于1858年。清咸丰年间，河北武清县杨村（现天津市武清区）有个年轻人，名叫高贵友，因其父四十得子，为求平安养子，故取乳名“狗子”，期望他能像小狗一样好养活（按照北方习俗，此名饱含着淳朴挚爱的亲情）。

狗子十四岁来津学艺，在天津南运河边上的刘家蒸吃铺做小伙计，狗子心灵手巧又勤学好问，加上师傅们的精心指点，高贵友做包子的手艺不断长进，练就一手好活，很快就小有名气了。

三年满师后，高贵友已经精通了做包子的各种手艺，于是就独立出来，自己开办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他用肥瘦鲜猪肉3:7的比例加适量的水，佐以排骨汤或肚汤，加上小磨香油、特制酱油、姜末、葱末、味精等，精心调拌成包子馅料。包子皮用半发面，在搓条、放剂之后，擀成直径为8.5厘米左右、薄厚均匀的圆形皮。包入馅料，用手指精心捏折，同时用力将褶捻开，每个包子有固定的15个褶，褶花疏密一致，如白菊花形，最后上炉用硬气蒸制而成。

由于高贵友手艺好，做事又十分认真，从不掺假，制作的包子口感柔软，鲜香不腻，形似菊花，色香味形都独具特色，引得十里百里的人都来吃包子，生意十分兴隆，名声很快就响了起来。由于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多，高贵友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戏称他“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人们喊顺了嘴，都叫他“狗不理”，把他所经营的包子称作“狗不理包子”，而原店铺字号却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据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天津编练新军时，曾把“狗不理”包子作为贡品进京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尝后大悦，曰：“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不及狗不理香矣，食之长寿也。”从此，狗不理包子名声大振，逐渐在许多地方开设了分号。

狗不理包子以其味道鲜美而誉满全国，名扬中外。狗不理包子备受欢迎，关键在于用料精细，制作讲究，在选料、配方、搅拌以至揉面、擀面都有一定的绝招儿，做工上更是有明确的规格标准，特别是包子褶花匀称，每个包子都不少于15个褶。刚出屉的包子，大小整齐，色白面柔，看上去如薄雾之中的含苞秋菊，爽眼舒心，咬一口，油水汪汪，香而不腻，一直深得大众百姓和各国友人的青睐。

关于天津狗不理包子的来源问题，坊间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史学家罗澍伟先生提到狗不理包子创始人高贵友的孙子高焕章先生曾写过一份亲笔回忆材料，对“狗不理”名称来源给出了确定的说法：

“狗不理”是我祖父的乳名。他本名叫高贵友，生于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父母是河北省青县人，顺着运河逃难来到天津，最后落脚在今属武清区下朱庄藕店村。藕店村多出面案厨师，“刘记蒸食铺”的老板即是藕店村人。因为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父母疼爱之至，故取名叫“狗不理”，图个长命百岁（意思是连狗都不理，阎王爷更不会理他）。后因家境贫困，加上收成不好，为给孩

子谋生路，于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他 14 岁时，托人带到天津，在侯家后中街“刘家蒸食铺”学徒。这家蒸食铺当时以卖蒸食为主，包子为辅。我祖父在铺里干小伙计，学做包子馅儿。

三年学徒期满后，我祖父便在蒸食铺附近租了一间小门脸儿，又找了一个人帮忙，专卖包子。他们俩开销小，经营上薄利多销，因此买卖日益兴隆。后来又租了对门一间房子，改为操作室，人手上也由原来的两个人增至十余人，扩大了经营。当时他没有字号，人称“狗不理包子铺”。

1856 年（咸丰六年），我祖父 25 岁时，见买卖越做越大，便给包子铺立了字号，叫“德聚号”。

## 亲手击毙柳小五的匡克维

《天津日报·武清资讯》刊登了孙福山先生的《郭士明其人其事》及李朴先生的《击毙柳小五始末》，详细介绍了柳氏被击毙的经过，其中涉及到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叫匡克维，就是他亲手击毙的柳小五。

据《匡克维列传》记载：匡克维，字振纲，生于民国乱世，武清县城北高村人也。其家族皆富户，乡里之望也。

振纲身中，有英姿，正直嫉俗，常晒其族田舍翁也。幼读家塾，后游泮通州潞河师范，期间濡染共产之说，归里，竟自散钱粮济贫。

七七事变，振纲忿塞欲死。乃破家财，并迫族亲捐购枪弹，招募乡勇，树帜抗日，自号曰红军抗日先锋队独立第二营。尝次其乡小周村毗。

然振纲不谙军事，与日军数战皆北。未几兵溃，不复振焉，乃思投八路。踌躇间，适故交造访，说之曰：“志士何处不可保土卫国？且蒋公正朔，共党匪盗，君欲有为，不当明珠投暗。”振纲然之，遂从国民政府，游击日寇。

民国三十四年，振纲尝助国军将领受日降，镇武清，并谋除汉奸柳小五事。

柳小五者，名世平，武清惯匪也，日军器之，委津海道剿匪总司令衔，辖京东津北，嚣张一时。日降，柳筑巢下伍旗，拥兵逡巡，欲洁身于国共以售。适县令黄涤臣公子大婚有期，振纲乃与僚属阴谋，欲假婚宴除世平。世平有金兰弟张万芳者，僚匪也。振纲乃先利弊之，令邀世平至。万芳果诣世平，世平虽疑，亦不惧，勒兵驱车往城关。及至，关吏托道塞，令卡车改道，骑纵数十乃转歇城隍庙。世平乘吉普，随护仅四耳。比至衙，邑宰殷逆之。门吏以院小，息世平仅一弁从入。世平阴怀三铤，并无惧色。至筵室，诸僚恭延世平先入。世平略谦，遂入。方入，门内二力士突出左右，指若钢钳，反剪其臂，铤并下。弁方欲动，颇遭一弹矣。世平缚阶下听罪，料无活，乃嘶骂不休。振纲怒曰：“逆贼何多鹅噪！”遂发数弹击之。旁者多有恨世平者，复毙其数十弹。

迨鼎革，振纲坐反革命收监。未几，罹肺癆呕血不止，卒狱中。享年不足三十。

振纲独生，体胤无存，妻亦不知所之，其门遂绝。闻有一妹，逢文革，患失心疯，常游走乡里，时人皆谓之曰“匡疯子”。然其神志虽丧，淑雅尚不失。乡邻今逾六旬者，抑或能忆之也。

惜哉！热血青年，破家为国，然道奇运蹇，竟不得其死，此其恶行败德者乎？盖乱世纷争，匹夫不由己也。

以上史料无论是出自一家之言，还是众家之说，对研究武清历史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史料。

## 霍元甲与李瑞东比武的真实过程

霍元甲(1869-1909年),字俊卿,天津静海小南河人,出身镖门,家传迷踪艺(即秘宗拳,亦称燕青拳),是我国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霍元甲》影片的不断涌现,这位被艺术化了的武术大师遂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而被国人顶礼膜拜。其实,历史上真实的霍元甲是人不是神,他只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普通爱国武术家而已,其真实短暂的一生,绝非影视剧中渲染夸张的那样尽善尽美。对此,史料有详实记载,我们切莫将“戏说”混同于“史说”而认假为真,以讹传讹。因此本文主旨在于陈述霍元甲与李瑞东的比武过程,故不予离题赘述霍李二人的武术历程与生平传略。

李瑞东(1851-1917年),字树勋,号文侯,又号烟霞逸士,天津武清城关镇人。因其鼻子扁平,故而人送绰号“鼻子李”。李瑞东自幼习武,一生历经六大名师之嫡传,艺综多门,功臻化境,集各派精华于一身,融内外功夫于一体,学而化之,自成一系,创李派太极拳法。他是当时北方武术界的领军人物,曾任“中华武士会”首任会长,并曾担任清官四品带刀侍卫之职,是一位德高望重、建树卓绝的武学大师。

历史上有关霍元甲与李瑞东比武一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金恩忠《国术名人录》一书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关霍李比武的文字记述中,我们发现作者所述多系不足为信的巷尾之谈,尤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名扬四海的武术大师霍元甲》一文为甚,文中以武侠小说式的演义,将霍李比武说得神乎其神,且对德艺双馨的一代武术大师李瑞东先生颇多贬损与丑化,作者显然是一位于武术之道一窍不通的俚俗浅人。比之金恩忠在《国术名人录·霍元甲》中以耳代目的撰述,《名扬四海的武术大师霍元甲》一文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值一晒。

关于霍元甲与李瑞东比武的真实情况,有关历史学家经过多年的搜求考证,终于弄清了这场本来极普通、极平常的比武真相。兹述于后,以正视听。

霍李比武的具体时间已无从可考,大约是在1900年李瑞东回乡期间和1909年霍元甲赴沪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金恩忠在《国术名人录》一书中说霍李比武时“俊卿(即霍元甲——笔者注)三十五,李(李瑞东——笔者注)年花甲”。霍元甲生于1869年,1904年其年正好35岁,而生于1851年的李瑞东则时年53岁(即使按民间虚岁计算,李瑞东至多也是55岁)。显然,这是金氏不详于李瑞东实际年龄的凭空杜撰,不足为信(金氏在《国术名人录》中对其他武术家的记述,舛错讹误处亦俯拾皆是)。为何将霍李比武的时间界定在1900年至1909年之间呢?因1880年(光绪六年)李瑞东随师兄王兰亭赴京,霍元甲尚为11岁之少年。李瑞东进京后一边练拳,一边在端王府任职,1894年又进宫担任宫廷侍卫兼教师。直到1900年才返回武清家中,所以1880年至1900年这20年当中,霍李二人几乎是不可能接触到的。而自1909年始,霍元甲便又离津南下去了上海,不久即病逝沪上。故将霍李比武的时间界定于1900年至1909年之间是比较符合逻辑与现实的。

霍元甲艺成之后,为了生存,便到天津法租界怀庆药栈海河码头当了脚夫。因霍自幼习武且天生神力,便被众脚夫推举为脚夫头儿。而此时李瑞东的回民弟子穆巴(津郊穆庄子村人,金氏在《国术名人录》中误为摩二巴)因违反门规,被李瑞东逐出师门后也正好同霍元甲在同一个码头当脚夫。

当时,武清河西务运河码头有一名曰金达官者,亦力大无穷且粗通摔跤之术,

在河西务小有名气。霍元甲闻之不服，遂乘船至河西务找金达官较技。金虽力大，但不通武功，故负于霍元甲。输手后金对霍言：“你若想成名，可去城关镇与‘鼻子李’——李瑞东一较高下，无论输赢均可成名。”于是霍元甲在河西务住了一宿，次日便去武清城关镇找李瑞东并与其比武。

当时，李瑞东正在李宅前院指导弟子练功，见有人来访，遂热情招呼，以礼相待。谈及武事，李瑞东问霍所习何门功夫，霍曰摔跤。李瑞东便对霍元甲说：“霍师傅习摔跤，泼脚功夫一定很好，我现在站立不动，你可尽全力用泼脚踢我几下，我若有丝毫移动，便可见你功夫。”霍元甲遂依言踢了李瑞东一脚，李屹立未动。于是，霍元甲又全力一脚踢去，李瑞东仍然稳如磐石，巍然不动。此时，李瑞东发话道：“第三脚可叫你拿不回去！”霍元甲自知李瑞东有告诫之意，故未敢再踢第三脚。这就是霍李二人之间比武的真实情况，甚至还有霍元甲踢完李瑞东后，二人又动手时霍被李从屋内击至院中跌扑的说法，此说尚难完全确定。

当天霍元甲因路程关系而不能赶回天津，于是李瑞东设晚宴款待了霍元甲，并将霍留住于李宅西跨院客房内。当晚，霍元甲与李瑞东得意弟子李进修(字子勤，号李八)共住一室。翌日晨，当李瑞东让弟子招呼霍元甲共用早餐时，却找不到霍元甲。原来，霍元甲天一亮就起来自行离去了。李瑞东因霍元甲未用早餐而深感不安，于是让李进修将其追回用早餐。可是李进修追出去数十里地也未追上霍元甲。显然，霍元甲早已不辞而别。

数日之后，与霍元甲同在怀庆药栈海河码头做工的穆巴(被李瑞东逐出师门的回族弟子)来到李瑞东家，说：“霍元甲回去后说到武清战胜了先生，天津已经传开了，我不相信，特来弄个明白。”李瑞东遂让弟子李子廉(号李三)与穆巴一道速去天津海河码头，约霍元甲到天津法国教堂公开比武，以明真相。可当李子廉在码头见到霍元甲询问此事时，霍却矢口否认，并好言相劝李子廉。当时码头上的脚夫们也都说霍元甲并未说战胜李瑞东的事，李子廉遂将穆巴训斥一顿。穆巴跟李子廉又回到李瑞东家，李瑞东怒斥穆巴不该造谣生事，但是，穆巴却一再赌咒发誓说自己绝未造谣，所言俱实。此时的李瑞东已不再相信穆巴，严斥穆巴今后不准再登李宅之门，并将其逐出家门。穆巴回去后因想不通此事而自缢身亡，并非金恩忠在《国术名人录》里所称，穆巴是因和霍元甲弟子刘振声打赌输后付不起“赌券”而缢死的。

霍李比武一事，不过如此，却被一些好事者添枝加叶，大肆渲染，甚至不惜编造弥天大谎来粉饰霍元甲，丑化李瑞东，真是可恶之极，令人发指。穆巴也因此成了霍李比武的“牺牲品”，良可叹也！

以李瑞东先生当时在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以及从他所留下的著作与武术体系来看，霍元甲先生根本就是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是霍元甲的身后要比李瑞东热闹得多，在大量杜撰的影视作品的蛊惑宣扬下，霍元甲发生了从“人”到“神”的蜕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大英雄、大豪杰。相反，李瑞东的身后却比霍元甲冷清了许多。但，在真正懂武术、知武史的内行心里，李瑞东的形象要远比霍元甲清晰和高大得多。因为，李瑞东留给后人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实用性与操作性皆极强的实实在在的武术财富与文化瑰宝，绝非向壁虚构、子虚乌有的浅薄演义故事与乡间豆棚瓜架下的野老谣传。

## 程派高式八卦掌源自武清

八卦掌是以易理说拳理，借八卦命名于拳术的中国传统武术拳种之一；是一种把攻防技法和导引养生方法融合于绕圈走转之中的内家拳术。八卦掌创始于董海川先师，形成于 1866—1894 年之间(大约 28 年)，是董海川先师将中国南方道士修炼的“转天尊”功法和他本人以往掌握的中国拳术技法相结合的产物。开始只称之为“转掌”，后经其嫡传门人弟子尹福、程廷华等共同整理发扬，使之日臻完善，广传于世，并定名为八卦掌。

程派高式八卦掌认宗董海川先师，是高义盛创编。高义盛在宗承程派(程廷华先生)所传的基础上，集平生之所学形意拳、八卦掌、大红拳等拳技，博采众长，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创造性地将八卦掌分为先天掌和后天掌并分而练之，从而创编了独具特色、自成一式练法的八卦掌体系。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刘凤彩先生以高义盛所传遗著《八卦揉身连环掌》(手抄原本)为基础，结合自身研习经验和体会，主编《程派高式八卦掌谱》时，与王书声、刘树行等众门人弟子共议，将高义盛先师所传拳技体系定名为程派高式八卦掌，并得到专家认定。

专家认为：天津和山东都是程派高式八卦掌的发祥地。高义盛祖籍山东，后迁居天津武清县艾蒲庄村。高义盛毕生以研习传授八卦掌为业，程派高式八卦掌形成于高义盛几十年往返于山东和天津传艺授拳的过程之中。始于 1909 年或更早，“高式八卦掌体系在 1926 年时已有雏形；1932 年重校掌谱时已初成技理兼备的架构；1936 年高义盛审定谱稿，标志着其对高式八卦掌体系的建树已完成”，大约历经 27 年。

专家认为：在高式八卦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送艺人”的奉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但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高义盛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换言之，高八卦掌体系并不是高氏曾习拳技的总合，而是他以从其师程廷华及师兄周玉祥学得的程派八卦掌为宗，并以其中的八大掌为根本，对其他拳技进行了有一定原则的选择吸收，按一定程式的系统整理、依一定规律的融贯统一之后，才最终创编出独具特色的高式八卦掌体系。

在吸收方面，高义盛按“先天为体，后天为用”的原则，选择那些既有助于练内培本，又易于融入转圈的拳技，吸收入先天掌。选择那些既有助于发挥人体各部位的攻防作用，又易于将八卦掌击法特点融入其中的拳技，吸收到后天掌。例如，高义盛不取代表红拳特色的那些架式宽舒、蹿蹦跳跃的动作，而选择吸收了其中的一些腿法和肘法，作为后天掌的素材。

高义盛不取作为形意拳基本拳法的五拳动作，而是选择吸收五拳的锻炼程式和发劲方法，作为后天掌的借鉴。

在整理方面，高义盛追求锻炼形式的程式化和技法的系统化。

高式先天掌是以程派八大掌为主体整理而成。八大掌，亦称老八掌，或称八母掌。传统练法是八个各自成串而又各有起式和收式的组合练习。其师程廷华及周玉祥所传皆然。高义盛以转掌为头，换掌为母并创编“乌龙摆尾掌”缀于比附于八大掌之后，作为掌尾，整理成有头有尾的高式八大掌练法程式，并名之为“先天掌”，作为高式八卦掌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

高式后天掌 64 式练法，不同于刘德宽整理编传于北京的 64 手，也不同于吴峻山整理编传于国术馆系统的 64 掌。它是高义盛以周玉祥及其师程廷华所传散手掌和吸收来的拳式为素材，以八卦之数为掌数，以技法特征为标准，进行分类

整理，形成每路 8 式，突出一类技法的八路锻炼程式。合此八路，共含八类技法，计 64 式，暗合叠卦之数，高氏名之为“后天掌”，作为又一子系统。

先天掌和后天掌两个子系统成形后，高义盛借用“先天为后天之体，后天为先天之用；无先天则后天无根本，无后天则先天不成全”之理，综合先后天掌，构成高式八卦掌基本技术体系。

在融贯统一方面，高义盛以同一程式和劲法规律，以及同一的运动风格，对其创编的技术体系进行了统一。例如，高式先天掌，掌掌沿圆走转，势势劲力圆柔，处处衔接顺遂，整套一气呵成。看不出乌龙摆尾掌等高氏新编入的掌法有丝毫不融合的地方，倒给人以锦上添花之感。高式后天掌 64 式，每式沿直线往返单操成趟、放长打远，式式如此。就是脱胎于红拳招术的八腿、八肘也全依此程式和功法进行练习，已不复再有红拳运动风格。

专家认为：高义盛经过上述三方面努力，创编成的拳技体系，既以八卦掌传统练法为基础，又颇多新颖之处；既不失八卦掌运动的共性风格，又有自己独特的运动特色，形成一个有别于八卦掌流派中其他分枝的技术体系，自成一式练法。

程派高式八卦掌经过百年的承传发展，门人弟子甚众。开始仅传于天津、山东，继而又流传到祖国大陆四方，乃至港台地区；还传入了美国、日本等国家。2006 年，天津武协成立程派高式八卦掌研究会，为推动程派高式掌在海内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新贡献。

目前，程派高式八卦掌已成为具有鲜明天津地域特色、在天津传人最多、影响最大、群众最喜爱的八卦掌流派之一。所以专家认为，天津是程派高式八卦掌的发祥地，程派高式八卦掌的源头在天津武清。

## 曹雪芹与武清的渊源

### 崔黄口与曹雪芹家事有密切关系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祖先汉人。明天启六年（1626）远祖在明与金的战争中被俘被编入旗籍，归属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皇室家奴），后随清军入关，屡立战功，一跃而为“从龙勋旧”。

清定鼎北京，“国初勋臣皆给庄田以代廩禄”。顺治皇帝年幼时，由多尔袞摄政，顺治四年（1647）以前，多尔袞曾下令在京东各大县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行动，即用跑马占地的方式，进行圈地，分配给皇室、王公、八旗子弟。曹雪芹家就在此时圈占了土地。

曹雪芹祖父所著《东皋草堂记》，其中说：“东皋，在武清、宝坻之间，曰崔口，势洼下，去海不百里，……余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与东皋鸡犬之声相闻。”曹寅文词中的“受田”，就是圈地受田这么一段史实。他说：“余家受田也在宝坻之西，”并说距东皋（指崔黄口）不远。那么究竟在何处呢？“崔口”，清后期的地图上标作崔黄口。此处在武清区域东北三十里，与宝坻区西境邻接。综考有关资料，剖析曹寅家的受田就在宝坻西境“白水坨”西南一带。而崔黄口之田是曹寅兄与二弟曹宣的庄地。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采用“真事隐”的写法，他完全可以把白水坨写成黑山村，因为白与黑，水与山，坨与村相悖，正是隐笔之所在。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里描写贾府正当过年的时候，特插入了“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向宁国府缴租”的一段情节，其中还提到乌进孝兄弟管着荣国府几处庄地，“离我那里只有百多里。”正是崔黄口一带。

### 与曹雪芹同源的武清曹氏

曹雪芹祖籍是丰润，还是辽宁铁岭，红学家们其说不一，然而曹雪芹先祖与天津武清曹氏同源，则是基本可以定论。

曹氏以国为姓，出于周代。先世居于淮阴，宋大将军曹彬之三子玮后裔端明、端广两支，前者迁河北丰润，后者迁辽宁铁岭。端广传七世为世选，明万历末与努尔哈赤交战中被俘为奴隶。世选子振彦随驾入关，生玺，玺生寅，寅生頰，曹雪芹即頰之子。而曹彬的四子珣之曾孙彦约后裔，即北迁武清的曹氏始祖。可见两支均出自曹彬之后。在武清县崔黄口，相传曾有曹氏祖墓。

曹氏家谱始修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经康熙五十四年（1715）、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光绪二十九年（1903）凡五修之多，1936年六修，1995年又出新本，修谱之频繁在津门诸姓中可谓多矣。

据谱载，明永乐二年（1404）徙江南大族充实畿辅，曹氏云、俊、温、信四昆仲由江苏徐州府宿迁县曹家集迁居顺天府武清县王庆坨赵甫庄，是为始迁祖。至明弘治、正德年间又分为四支，其中道聪则为武清中曹一世祖。

四世曹化淳，幼时入宫为太监，其人性资聪颖，又善书草隶，明天启年间受魏忠贤宦党迫害，禁锢留都(金陵)七年，崇祯时召回，颇受宠信，曾任总提京营戎政时，以抗后金(清)树奇功碑，又曾独自捐银四万两，修筑宛平城垣。入清时，清廷发崇祯之丧，他连上三疏，求封陵安厝。野史说他“开门献闯”，他上疏力辩其诬，顺治皇帝诏示：“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陈。”实际上曹化淳于崇祯十二年(1639)乞准假归里，其兄曹化雨卒于崇祯十六年，化淳正守丧在籍，根本不在京师。

曹化雨长化淳七岁，是化淳的仲兄，官锦衣卫南堂理事，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史称为人正直平允。当魏忠贤肆虐，残及水乡，他不畏强暴，弹劾其罪，救活数村人。在乡每遇欠赋者、婚不能娶者、贫死不能葬者，皆倾囊相助，又曾建义塾，着意培育乡人子弟，且乐善好施，历四十年不懈。

清康熙二十四年、三十一年皇帝出巡，两度以曹家近野轩为驻蹕之所，六世曹传(工诗词，善书法，曾捐田创庆成书院)受到召见，并赐对联：“祖德渊源，珠树云裔，佑其子孙获福；皇恩累及，琼浆玉壘，滴来草木生香。”“存敬堂”匾额。

特别指出的是，曹氏后人曹秉璋 1957 年通过郭沫若将家藏崇祯皇帝赐给曹化淳的宋赵伯驹《海天旭日图》和古琴“韵磬”分别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和中央音乐学院，1983 年，又将乾隆皇帝初刻本《近野轩诗存》(曹传撰)一书捐给天津图书馆。

## 明代北京上方山的两位武清籍名僧

上方山位于北京西南郊房山区境内，距市区约 70 公里。山下有个小山村叫圣水峪，自圣水峪西北行，进入一道狭长的山峪，行程一公里，一道依崖贴壁从天而降的云梯，把你引上一处远隔尘嚣的世外净土——这就是上方山。

上方山为千古名山，这里森林茂密，山峰奇秀，洞穴深奥，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在这里你可观赏松柏、银杏、古槐、树中之王等珍奇古树，千年古刹、石雕佛经、前朝壁画、摩崖石刻，无不闪耀着岁月沧桑的辉煌。云水古洞，多姿多态的石花、石幔、栩栩如生的石象，令人目不暇接，高达 38 米的石笋，居亚洲第一，还能听到石琴、石鼓、石锣演奏出悦耳动听的乐曲。“南有苏杭，北有上方”，历代文人把上方山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杭相提升论，在世人的心目中，上方山是北方的一处人间天堂。

天下名山僧占尽。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东魏时期，上方山就有高僧结庵而居。一千多年来，上方山更替了一幕幕繁华，成为北京西南著名的佛教名山。

据《北京市房山区文史资料》载文：明代上方山有一位颇有影响的禅宗大师，这就是天香禅师（1506—1579）。天香禅师，名宗连，字天香，今天津市武清区人。其塔记称赞他：“勤参苦究，洞晓真宗，京师人民悉蒙教益。”足见天香禅师当年在明都北京颇具影响。天香禅师晚年来到上方山，居于朝职洞面壁、参经，万历七年（1579）圆寂于朝阳洞。

孤山禅师是明代另一位有作为的上方山僧人。孤山禅师原名李进寿，今天津市武清区人。与天香为同乡。早年供职内庭银作局，后来于少林寺出家，法号圆银。几年以后，来到上方山，万历四年（1576），得到冯保的资助在孤山口创建了普济寺。后来普济寺成为一方名刹。

上方山作为一座历史名山，其旅游潜力很大。随着上方山诸寺的逐步恢复，上方山将成为人们回归自然、感受灿烂的佛教历史文化的观光和休闲胜地。

## 清康熙年间著名高僧溟波

溟波，俗姓郭，讳超古，字溟波，河北武清县北仓村人（今属北辰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世，清云居寺重开山第一代住持。父名文选，幼年也曾出家，后来还俗娶王氏，生七子，溟波行五。

据溟波本人自述，他的出家与他的父亲有关。相传，溟波三岁那年，父亲重病身亡，灵魂到了地府，冥官说：“你出家不终，应该减寿十二年。”父亲回答说：“我是身不由己，怕不能为父母传宗接代，所以才还俗。”冥官闻言，颇为感动，说道：“如此说来，这是孝心，不该减寿。”这时，旁边的一个人对溟波的父亲说：“你让一个儿子替你出家，就放你回去！”父亲答应了，果然起死回生。于是溟波七岁的时候，被舍到天仙庙落发，投智庵为师，十八岁作应院，二十五岁更衣学禅。顺治十年（1653），三十七岁的溟波经一位禅宗高僧指点到北京悯忠寺受具足戒。随即投天津如来庵大博禅师。一天，溟波来到大博的方丈，请教大博：“什么是本来面目？”大博没有回答，只是举起了拳头。溟波见状说道：“除此还有么？”大博挥拳便打。从此溟波疑情顿发，坐卧思之而不得其解。

溟波随大博到杨村报国寺，大博在堂中坐定说道：“这屋里有一个病汉，欠出一身白汗！”溟波疑情愈切，忽然间他脱掉一只鞋子似乎有所感悟，他把自己的领悟向大博表白，大博反问他什么是本来面目，溟波回答说：“六六三十六！”大博说：“说得不对，再说说看！”溟波又答道：“九九八十一！”大博挥掌打他，说道：“这九九八十一，还是六六三十六！”溟波一喝便出，从此当机不让。三年以后，溟波才得到大博禅师的印可，终于参禅开悟。四十岁时，溟波入主云居寺。成为云居寺的一代名僧。

云居寺自顺治年间老僧如全稍稍修治之后，到康熙十一年（1672）所谓“颓者益颓，而残者日就剥落”。是年云居寺住持溟波大师开始对云居寺进行全面修复建设，西域寺、东域寺、梦堂庵、云居寺双塔、戒坛，以及石经山藏经洞、暴经台一应建筑，或翻新、或修补、或重建。据载在溟波的主持下，云居寺共修复建设殿宇、禅堂、寮房、厨库二百余间，这在云居寺历史上规模空前。又造八大菩萨、十二药叉大将、二十四诸天，并遵云居寺刻经故事，刻造经碑两方：一方刻《金刚经》，一方刻《药王经》。

一次，溟波遇到康熙皇帝，康熙问他：“你是那里人？”溟波回答：“武清县人”康熙问：“属那一宗？”溟波回答：“临济正宗。”康熙问：“可通佛法么？”溟波回答：“通。”康熙笑道：“赐白金三十两添钵吧。”

溟波托钵行化，来到磐山，恰逢康熙皇帝朝山进香，康熙亲临问候：“老和尚可好吗？”溟波奏谢：“万岁洪恩！”行至山门，康熙下马，又问：“你可识字吗？”溟波回奏：“不识。”康熙随口问道：“不立文字，不离文字？”溟波回奏：“不离文字，不立文字。”康熙又问：“什么是戒？”溟波回奏：“戒，

就是止，还有什么话解释呢？”溟波随康熙走进大雄宝殿，康熙上过香，起身四顾，似乎要与溟波开玩笑，说道：“有禅棒吗？”溟波立在一旁，没有回答。康熙又问：“为什么不回答？”溟波回奏：“回奏了恐有所触犯。”出殿门，康熙又问“你和佛藏比，谁更有学问？”溟波依然默不作答。

溟波是清康熙年间著名高僧，蜚声遐迩，新城县、北京东便门、海会寺、甘露寺等处多请其参禅。王公大臣、皇亲显贵多与之交。著有《溟波禅师语录》、《西天七十世南岳三十七世》康熙三十一年（1692），溟波圆寂于云居寺。

## 亦僧亦商的武清人

据杨国萱先生“不同寻常的老板”一文记载，天津早期中药业老板多达数百人，其中有一位亦僧亦商的寺庙住持老板。

天津城内有个庙，庙里有个中药社，中药社经理就是该庙住持。出家僧人当经理，天津中药业仅此一人。

僧人原籍武清县，1907年出生，1913年入如意庵广北小学读书，小学未毕业，因父丧失学。1921年僧人进西沽丹华火柴厂当徒工，两年后，16岁的徒工遵母命，在护饷老爷庙出家，后为该庙住持。

老爷庙香火不旺，僧人性喜赌钱，每日必到南门法院后间业里找赌友赌博，加上有口嗜好（抽大烟），生活哪能维持？所幸庙里薄有庙产，有七间房屋可以出租，也算不无小补。但是僧人生活挑费太大，钱还是不够用，于是在庙里开了个小药社，制售膏药补贴生活。

小药社一共两个人，另一个是僧人的哥哥。小药社不做拔毒膏、伤科止痛膏、狗皮膏等市面常见的膏药，而是专门制售一种叫水蓬膏的膏药。这种膏药能消肿利水，活血化瘀，对胸腹积水、胀满疼痛、积聚痞块、四肢水肿和小便不利等有一定疗效。

水蓬膏不见于世久矣。为不埋没僧人的贡献，现介绍其制法如下：水蓬花、大黄、当归、三棱、莪术、穿山甲、秦艽、芫花、草大戟等量，碎断后入麻油锅，下漳丹制成膏药，后加入芦荟细粉搅匀，待温度降至50°C时加入血竭、肉桂细粉，搅匀后分摊于布面上即可。用时贴在肚腹上，孕妇忌用。

僧人平时不穿僧衣，出入随便。解放后常在北门里一些大头贩子手里买袁大头，然后到鸟市用袁大头换烟土。有了烟土，除了供自己吸食，也卖给其他吸毒的人。1952年肃毒运动中，僧人被判刑三年。出狱后，僧人还俗，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北京妙峰山王三奶奶殿

北京妙峰山可说是很有文化底蕴的景区之一，踏春、避暑、赏红叶、望冬雪。妙峰山有三处庙宇群：惠济祠、回香阁和玉皇顶。非常有趣的是，山上供奉了释、道、儒、俗各路神灵，是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民间崇尚的大集合。

进山门向左拾级而上便是惠济祠，这是一个非常规范的四合院。正殿是灵感宫，其中供奉了五尊娘娘坐像，碧霞元君位居正中，眼光、子孙、斑疹、送生四位娘娘两旁配祀；东配殿为地藏殿，供奉佛教的地藏菩萨；西配殿为药王殿，供奉的是神医扁鹊；观音殿为侧殿的主殿，北侧还有一个月老殿，其楹联最为平易近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今生大快事，莫错过姻缘。”观音殿南侧是喜神殿，喜神就是戏神，供奉的是梨园祖师唐明皇李隆基。西侧殿的正殿是财神殿，中国的财神很多，此处供奉的是所谓正财神的道教神赵公明。

王三奶奶殿在财神殿北侧，楹联上写“居人苦，广结善缘，同归般诺；列仙班，普济苦难，公证菩提。”殿内供奉的王三奶奶塑像，为北方老妇人装束，梳髻，尖足，手拿烟袋，旁边侍女手牵一头黑毛驴。王三奶奶确有其人，她生于清乾隆三十年，还是咱们武清人，名叫乔红山。她自幼随父习武，后患病生命垂危，被云游居士王三思所救。王三思在太医院 20 多年，医术很高，乔红山为报救命之恩，嫁给了他，故人称其为王三奶奶。她向王三思学习医术，尤以针灸和偏方最为见长。王三思死后，王三奶奶便行走江湖行医治病，她先后到过天津、唐山、大同、五台山、邯郸、沧州等地，救人无数，对于穷苦人家分文不取。除行医外，她还会算卦、测字，借此以治疗人们的心理疾病，为人排忧解难，被人们视为神人。王三奶奶十分崇信碧霞元君，从 17 岁开始，每年都来妙峰山进香，在庙会期间搭建茶棚，为香客们免费提供茶水。她在 56 岁时坐化于妙峰山。人们认为王三奶奶得道成仙了，尊其为“愁善引导圣母”、“广济菩萨”，并在山上为她建造殿堂，塑像供奉。

## 天津最早的天主教堂

双树村位于天津武清西北部靠近河北省界的香河。

据史料记载，清末天主教传入武清境内，最早是宝坻大口屯镇的神父在这里传教，“墙内开花墙外香”，1867年在双树建立了教堂，它是天津市范围内建造最早的天主教堂，比名扬海外的望海楼教堂要早两年。这座教堂在义和团运动时被当作重点攻击目标，当年的法国神父戴德荣率教徒护堂，双方进行了一天一夜的艰苦较量，戴德荣率众弃堂逃往宝坻县大薄甸，和大薄甸教徒共同与义和团对峙达一月之久。这就是天津近代史上有名的“义和团攻打大薄甸”的事件。双树教堂失守后为义和团烧毁。

我们在历史资料中见到的双树教堂，是后来由村内天主教徒自行出资修建的。据说，教堂的建筑非常精细。工匠在砌砖时，对每一块砖都要细细打磨，进行磨砖对缝，与建筑行业普遍使用水泥砌砖的方法不同。不仅如此，教会对工匠的砌砖速度还做出具体规定，每日不得超过三百块砖，以保证施工质量，因此，教堂耗时一年方建筑完成，为典型的罗马式建筑。

教堂位于双树村中心。教会办有男校和女校，比当时国民党村政府公办小学的费用低得多。女校由修女院的修女们任教，修女一般都是公认信德好的教徒的女儿，称为“住家姑奶奶”，终身不嫁。男校则聘请教徒中具有一定学识者为教员，讲授国文、算术和尺牍等课程。教徒的子弟在读教会小学之前，还有一种学前班，教会称之为要理班，学生均为五六岁的孩子，主要学习天主教入门知识。

在参观双树教堂基址时，那雄伟壮观的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已荡然无存。悉心去体会，惟有脚下的土地还能使我们感觉到往事的一丝气息。

## 刘髯公与末代皇帝溥仪

《天津日报·武清资讯》2005年12月20日副刊刊登了侯福志先生撰写的《武清有个津城旧报人刘髯公》文章，恰巧，笔者在阅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编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发现刘髯公与末代皇帝溥仪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刘髯公，字仲儒，生于1893年，杨村人，卒于1937年，平民出身。曾在法国驻华公使馆当过调查长。1924年，与段松坡、薛月楼等在天津共同创办了《新天津报》。他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因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被迫害致死。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当时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在北京发动了轰动全国的逼宫事件。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驻天津的警察署署长和几个日本警官的“护送”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乘火车逃到了天津，住进了日租界的“张园”，后搬入“静园”，常到这两个地方觐见的就有《新天津报》主笔、武清人刘髯公。后来，溥仪想借日本人来恢复帝业，准备到长春建立伪满洲国。

《我的前半生》中提到“那两天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有警告，甚至有姓爱新觉罗的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心对外不说真心话。有个天津的小报记者，叫刘冉（髯）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时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这时跑来打听我有没有出关的意思。他见我极力否认，于是又替我尽了辟谣的义务。但他没想到，就在他的报上登出了为我辟谣的同一天，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虽然刘髯公是溥仪家的常客，但始终没能察觉溥仪依靠日本复辟帝业的野心。

## “崩豆张”创始人张德才

“崩豆张”是天津最有名的一家专门制作和销售各种豆类干货小吃食品的私营企业。公司由总店和一个分店、一个加工厂共三部分组成，有职工六十余人。总店设在南市食品街，在古文化街设分店、王顶堤设加工厂。生产糊皮正香崩豆、去皮夹心崩豆、桂花酥崩豆、豌豆黄、三豆凉糕、冰糖奶油豆、冰糖怪味豆、儿童珍珠豆、去皮麻辣豆等。分高、中、低三个档次，共16大类76个品种。产品畅销天津、北京、武汉、南京、贵阳、杭州、合肥、大连等地，1990年作为天津市的名、特、优、新产品，指定在亚运会期间进京展销。

“崩豆张”是个老字号。早在清朝嘉庆末年，“崩豆张”的创始人张德才，他是今城关镇沙河屯村人。在清朝宫廷御膳房任厨。当时，宫廷和王府中的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们吃饱喝足之后，总希望有小食品磨牙消食。张德才悉心研究，精心实践，终于制成多种豆类风味干货食品，如“糊皮正香崩豆”、“豌豆黄”、“三豆凉糕”及果仁、瓜子等。同时，在佳节喜庆宴会时，他还为宫廷制作了“九龙贡寿”、“麻姑献寿”、“龙凤呈祥”等特种成型贡品。尤其是“糊皮正香崩豆”，在宫廷中最受达官贵人的青睐。

“糊皮正香崩豆”原名“黑皮崩豆”。制作这种崩豆、要用外五料（桂皮、大料、茴香、葱、盐）和内五料（甘草、贝母、白芷、当归、五味子）以及鸡、鸭、羊肉和夜明砂乌等。这种崩豆外形黑黄油亮犹如虎皮，膨鼓有裂纹，但不进砂，不牙碜，嚼在嘴里脆而不硬，五香味浓郁，久嚼成浆，清香满口，余味绵长。

1985年袁世凯之女给《世界大观》写的《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还提到：“袁世凯倒台后，时常命家人上街买糊皮正香崩豆吃。”可见，“崩豆张”确实名不虚传。咸丰年间，张德才去世，“崩豆张”的第二代传人张永泰兄弟三人携妻带子回天津定居，这一宫廷食品也被带到天津。张氏兄弟首创“崩豆张”总号，并先后在城里丁公祠和小药王庙开设了二家分号“永泰成”、“永德成”，自己制作和销售各种豆类干货小食品。从此，“崩豆张”在天津卫的名声大振，可谓家喻户晓。光绪年间，“崩豆张”的第三代传人张相兄弟二人继承祖业，在南市建物美大街、大罗天（今天津日报社旁）先后创立了“老德发”、“德成”、“老来财”、“老来福”、“老张记”等字号，自产自销风味豆类干货小食品。“崩豆张”的第四代传人张国华十四岁随父学艺，民国二十八年年后在滨江道（今稻香村旁）及教堂后的“崩豆张”、“老张记”字号中协助其父操作，得祖传绝技。解放前夕，接管“老张记”并担任经理。解放后，1956年公私合营，张国华转入和平区干果加工厂任厂长，1983年退休。

“崩豆张”的第五代传人是张福全、张祯全、张祥全、张有全和张大全。1985年“崩豆张”首批进入南市食品街经营，重新恢复了老字号。“崩豆张”在张国华的主持下，始终保持了传统的风味和特色，赢得了众多的消费者。

1993年，“崩豆张”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认证为“中华老字号”，并在闻名遐迩的南市食品街创建了天津市崩豆张食品有限公司。同年，张国华老先生又将其祖传加工工艺、配制秘方及操作经验等，亲自传授于第五代传人张有全。

张有全先生精明能干、经营有方，在其父传授珍珠果仁（白沙果仁）传统制作方式的基础上，对口感、外观进行深入的研制，不断探索、改进创新，使之达到了香、甜、酥、脆的口感效果。

在新产品的开发中，张有全总经理带领职工在原有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合

了现代科学配方，引进、采用国外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生产出几十个品种具有现代时尚感的新型休闲食品：香酥豆果，所用花生选料精良，酥脆香甜，20多种口味满足了不同食客需求；吉利豆，9种鲜水果味儿，甜甜的、软软的让人回味无穷；果味奶片，以其百变的外形，香甜的奶香味而畅销全国，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现在，“崩豆张”所经营的产品，品种口味多达百余种。由于经营的品种繁多，市场销售良好，因而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南市食品街已拥有的上、下两层门市坐落在食品街的黄金一角，面向八方来客，迎接四海宾朋。

由于“崩豆张”一贯注重产品质量，始终恪守信誉，1990年曾作为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指定产品，赢得了各国体育健儿和中外宾客的好评。1993—1994年期间，曾获得天津市商会、天津市个体劳协“非公有制经济先进代表”的殊荣；并被辽宁省1993年迎新春交易会消费者评为“最喜爱食品”；1997年荣获北京地区“市场知名品牌”，而被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技术监督局评为“外地市场受欢迎的天津产品”。1998年被天津市政府评为“驰名商标”，2000年被评为“天津3.15消费者信得过品牌”，并获得中国质量监检协会颁发的企业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2005年被天津市和平区工商联评为“优秀会员”。

## 刘髯公义葬周铁珊

清同治十三年(1860年)的一天,一个小男孩在天津市区的东于庄呱呱落地。小孩出生前,其父梦见天上一颗星星坠落院中,以为这孩子将来是个人才,便取名周星。此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慈善画家”、民国时期的天津书画慈善会会长。

周星成年后更名周让,号铁珊。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家住天津东于庄(今属河北区),祖上本行医,后世以绘画及干田园为业。铁珊幼小时,母亲便去世了,稍长随父亲学习唐诗、宋词和山水画,临摹文与可、郑板桥画稿,后又进学堂攻读《四书》、《五经》及其他经史典籍。19岁就能画大幅竹子,且书法、诗文俱佳,名声大噪。

在黑暗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当权者的腐败,民众处在极度苦难之中。面对灾害频频,民不聊生的现状,青年时代的周铁珊虽很有绘画天赋,却不甘于终日守砚、坐拥书城的生活。他先是想弃文习武,准备投奔北洋水师学堂,以武力救国。但当北洋水师因清政府推行妥协投降政策而惨败在日军手里后,周铁珊受到沉重打击,他不再从军,也不去走科举之路,还是决定用艺术来富强祖国,立志在他的后半生将艺术创作的收入贡献于社会,用自己的艺术才华为受苦受难的民众尽一点儿微薄的力量。于是,他便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绘画之中。

他遍游名山大川,寻访古代文人足迹,潜心艺术变革,使自己成为技艺全面且又有个人独特风格、铮铮铁骨、大气凛然的艺术家。他的山水画学王原祁、龚半千;花卉学陈白阳、恽南田;兰竹学文与可、郑板桥;从物学唐伯虎。涉及的题材广泛,技法不拘一格。后又潜心研究写意画法,由注重设色转为以水墨为主,并大胆破除当时以“四王”为正统的羁绊,扩大“扬州八怪”在天津的影响,因以“周颠”自命,画风大变,形成独自的艺术风格,被誉为“画竹大王”,蜚声于上世纪30年代的津门画坛。

为了全力救济穷人,具有卓越艺术成就的周铁珊果断拒绝了当局的高薪聘请,却欣然担当起天津书画慈善会会长之责。出任书画慈善会会长无分文报酬,生活并不宽裕的周铁珊不仅组织和领导书画慈善会的工作,而且将其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书画慈善会。并且他又将慈善会捐来的钱,一部分送给孤儿院,一部分用来购买玉米面分给穷苦百姓。

“慈善画家”周铁珊对一切都怀有慈悲之心,为了穷人的事,他宁可自己作难。穷人受到欺侮,吃了官司,却又无能为力,周铁珊得知后,自己出钱、垫饭帮其讨回公道,不但为他们书写讼状,还为他们担当律师,公开出庭为其辩护。摆小摊的小贩生意暗淡,过不了年关,他就叫夫人把家里仅有的钱粮送给他们。失业的人求助于他,他当场作画,让他们拿着他的画去找工作。

据知情的老人们讲,有一次,周铁珊上街,无意中看见一张假冒他的名义画的招生广告,十发气愤。然而,他却想这个人肯定是在个人生计上遇到了困难才这样做的,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一把,于是主动寻找到那个人,对他说:“做人同做画一样,要诚实。”继而又教给他绘画技法,培养他独立创作的能力,最终使他掌握了绘画艺术并以此作为自食其力的谋生手段。

周铁珊对穷苦百姓抱着深深的同情,对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则一向横眉冷对。一次,一对男女买了他一幅画。后来,当得知这一男一女是天津特务机关的头子和他的姨太太时,周铁珊后悔至极,想方设法硬是让他的儿子用高出原价三倍的

钱将那幅画买回来。别人对他不理解，问他何以如此，周铁珊回答：“我生来就不给恶霸作画。”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后，大举进攻华北。在这种情势下，周铁珊纵然画艺高超，但他的画也实在是不好卖出了。由于贫困的折磨，周的夫人及他的三个儿子先后染上肺病，相继死去。国破家亡，饥寒交迫，沉重的打击使周铁珊一病不起，以致冯玉祥请他到泰安教冯的夫人李德全画画，周都无法动身前往了。1936年冬，74岁的周铁珊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周铁珊死后，还留下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周铁珊生前有位最要好的朋友，名叫刘髯公，武清杨村七街人，回族，是著名的爱国报人。1924年与段松坡、薛月楼合作，创办《新天津报》。此后又陆续发行《新天津晚报》、《文艺报》、《新天津画报》、《新人月刊》等报刊。此公脾气禀性很像周铁珊，也是位主持正义、疾恶如仇、对贫苦百姓极富同情心的人。刘曾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不顾生命危险，用自己的钱财解救一千多个被日军围困在东天仙戏院(今河北区民主影院)的难民。周、刘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年身为《新天津报》(社址在今河北区建国道)社长的刘髯公多次到周的家中拜访，在报上连续刊登周的作品，周对刘的爱国行动亦是钦佩不已。当周铁珊在凄风寒夜中死去，又见周抛下的两个身无分文的女儿时，刘髯公心痛至极，他自己出资厚葬他的挚友周铁珊，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位慈善画家那金子般的心肠。然而，就在刘髯公为周料理完后事的一年后，他自己也身陷囹圄，受到日本特务的迫害，含恨而死。

## 马三元打杨村（鼓词）

讲述人：孟昭元，51岁，贫农，双目失明，算命先生，一贯道徒大王务公社孟家东庄。

内容提要：鼓词，为梁格庄老艺人韩三庆在义和团运动后编写的，时年54岁，自编自唱。共四段，第一段为马三元打杨村，第二段起銮，第三段六国合约，第四段回銮。

讲述时间：1958年

### 一、马三元打杨村

一片狼烟白昼昏，  
万处悲声夜静闻，  
携男抱女东逃西奔，  
搀老扶幼收死人。  
民受倒悬苦之尽，  
以卵击石武共文，  
众臣宰抛官逃走弃了任，  
在前清是卖国求荣一自是买卖臣。  
有一位为国亡身的聂总镇，  
才显那赤胆忠心的马玉昆，  
只因为将相不和失了天津郡，  
武库又被外洋焚，  
火药房失了营连着就是一个败阵，  
五马庄挑沟守水不辞劳辛。  
带兵官一身而逃潜身外，  
众儿郎弃甲抛戈军变民。  
马大帅眼看着难把三军心稳，  
无奈何撤队伍回到北杨村，  
虎帐按册来盘问，  
马步儿郎不满三营人。  
南来探洋人迫得紧，  
北来探后路缺少接应军。  
又报道：打前敌的是小日本，  
英法德美是接应军，  
一路上鸡犬不留苦之尽，  
两岸民房被火焚，  
顷刻间占了汉沟镇，  
早晚今日住杨村。  
马大帅声如巨雷肝胆震，  
直挺彪躯眼出神：  
大清国传了256年洪福该了尽吗？  
嘿！莫非说一统中华化灰尘？  
有心前敌去临阵，  
一杯水怎救一车薪！

我有心弃职逃亡自顾命，  
辜负皇上雨露恩。  
这一些残兵败将难临阵，  
总莫如做个大仁大义尽忠臣。  
“众儿郎遣散各投奔，  
无论长次均把粮台分，  
一路上公买公卖天良方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虽然是国法军令不看准，  
举头三尺岂无神？  
并非是今朝拿话叫你们准，  
吃粮当军哪有善心人！”  
众将说：“大帅欲想何处奔？  
如影随形不离身。”  
大帅说：“尔等何必往下问，  
莫非说拿我当做逃君的臣？  
太平年沾皇恩有馀不尽，  
荒乱年岂怕死自贪生！  
一把骨头一条命，  
快马一匹快枪一根，  
单人闯进他的六国阵，  
我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清臣！”  
众将说：“大人意想连忠信，  
难道说我们祖父就不是大清民？”  
大帅说：“六国合约营规紧。”  
众将说：“一个舍命挡万军！”  
难得这异口同音皆不愤，  
倒叫我马帅长精神：  
“众兄弟：国法军令且莫论，  
汝等捧我马玉昆。  
我一阵压下洋人夺津郡，  
单看回旗再长身。”  
铁路北摆下一字长蛇阵，  
炮队马队动了身，  
枪林弹雨打得紧。  
排子枪响了连三阵，  
东洋死了两千人，  
大炮一开天地震，  
这不就压过下来村。  
大帅说：“众位兄弟别泄劲，  
不得天津不撤军。”  
唉！忽然报蔡村来凶信：  
中堂大人坠了金。  
忠良闻听心不愤，

一人无智死万军！  
有国难投有家也难奔，  
无奈何蔡村殉了身。  
二声报董大帅现在督京郡，  
北京城里稳人心，  
忠良一听泄了劲，  
直挺彪躯眼出神：  
我有心撤回队伍把京进，  
又恐怕外人藐视我马玉昆；  
我有心夺津郡，  
抗旨不尊为反臣。  
格吱吱咬破皓齿千丈恨，  
砰砰砰战靴踏断五七针，  
无奈何撤回军队把京进，  
北京城见驾保当今。  
这一回马大帅怒打杨村镇，  
到下回慈禧逃走要动身。

## 柏林奥运会赛场上的武清人

1936年8月1日至8月16日，第十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4066名运动员参加了各类比赛的角逐。篮球比赛首次列入奥运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共派出69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6大项的比赛，参加此次比赛的中国篮球队共有正式队员14人和一名教练员、一名管理员，这其中就有两位武清人，他们分别是牟作云和李清安。

牟作云，有中国体育界元老、中国篮球运动开创者和奠基人之称。亚洲篮联第一副主席，中国篮球协会顾问、国际篮联终身荣誉委员、亚洲篮联终身荣誉会长，国家级教练、国家级裁判，体育活动家。他为国家篮球运动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全国CBA篮球第十赛季总冠军队捧起的中国篮球至尊鼎“牟作云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牟作云，1913年生于天津武清区黄花店镇冀营村一个农民之家。1928年考入北平育英中学，1934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他有篮球、跳远、标枪等多项体育特长。上学期间，标枪曾打破全国纪录，三级跳远打破华北纪录，篮球入选国家代表队。1936年，牟作云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第十一届奥运会。但由于经济条件差，有关部门只靠募捐一笔钱为代表团租了一条外国油轮，又加之当时的气候条件恶劣，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半个多月才到达柏林，第二天即参加比赛。结果除一名田径运动员在预赛中达到及格标准外，其余全军覆没。牟作云和队友们躲到主会场的一个角落抱头痛哭。他下定决心：献身国家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1946年牟作云赴美，进入美国春田大学体育系读研究生，兼任篮球和田径助理教练，获得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牟作云任国家篮球集训队总教练、国家体委篮球司副司长。他从全国各省市选拔优秀篮球运动员组成国家集训队，进行艰苦的训练和选拔工作。不久，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篮球代表队，他任教练兼任八一篮球队教练。新中国十年大庆之际，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篮球代表队云集北京，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了隆重的赛事，中国篮球代表队击败了欧洲冠军匈牙利队，苏联冠军红星队也败给了中国队。世界舆论大哗，西方报纸评论中国队是“睡狮猛醒”。主管全国体育工作的贺龙元帅在国宴上向牟作云频频举杯，风趣地说：“我们赢了东方，还要赢西方！”

1964年，牟作云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此后，牟作云率领中国篮球代表队先后出访过40多个国家，不仅锻炼了篮球队，提高了个人和整体水平，还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1972年，花甲之年的牟作云率领中国篮球队访问日本，受到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亲切会见；1978年，牟作云率队访问美国五个城市，卡特总统的母亲热情接见了球队全体成员。美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席将一支刻有“体育大使”的金笔赠给牟作云，称他是继乒乓外交之后，又一个开展两国人民友好活动的使者，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提出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牟作云是其中一位。

牟作云离休后，仍为中国体育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兼任北京国际网球活动中心董事长、中国篮球杂志社总编等职。国际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委员”称号，亚洲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主席”殊荣。牟老目睹了新中国一步步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列的实事：23届奥运会上，中国打破了金牌0的历史，雅典奥运会

上中国实现了百枚金牌的突破,特别是2008年中国申奥成功……老人无限感慨,含泪说:我的夙愿实现了。

篮球队管理员李清安是地道的天津人,祖籍武清的李清安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燕京大学,随后到驻天津的美国领事馆工作,并加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一名篮球高手。1933年至1935年,李清安以队长、领队、指导等不同身份,率领天津、河北篮球队参加了在杭州、南京、上海举行的大型运动会,连获佳绩。1936年,担任中国篮球队管理的李清安同时还担任一项新的工作,奥运会篮球比赛裁判员。

早年,天津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的大楼里,有一座体育馆,里面有青年会会员组成的“竞进篮球队”,李清安曾是这个队的队员,曾在教会办的潞河中学读过书。从中学时代,他就好打篮球,以后在青年会做体育工作,还同也在这里工作的老乡和同学“胖李”李友珍去美国春田大学深造过。李清安是个细高条,瘦长脸,架一副玳瑁边的轻度近视镜,性直爽、好交游,说起话来,既快且急,给人一种“胡萝卜就酒,嘎嘣脆”之感。这一瘦一胖的“天津体坛”二李后来好上加好,竟成了儿女亲家。

在“二李”之前,篮坛老将董守义是青年会的体育干事。当时的汇文中学和南开中学篮球队常进行比赛,多得董老的教益。后来由李友珍接任,李清安则主持了由董事长张伯苓倡议的利生体育用品厂的东马路门市部,工厂经理是南开中学体育教员齐守愚(武清人)。如此珠联璧合的老四位,对培养三十年代享誉津门的篮球劲旅——南开“五虎队”可谓都有功绩。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清安在中华体育总会天津分会工作,又担任天津体委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底,记者夏华听说河北区有个举石担(墩子)的穷苦人家孩子赵庆魁,臂力不凡,因练习举杠铃日子浅,没能报名参加次年三月全国比赛的选拔赛,而替他惋惜。他除写了一篇访问记在当时的天津《新生晚报》上加以介绍外,又给李清安写了一封信,建议单独为他补行考核。李清安欣然接受了,并在春节后对他考核,结果,这个当年只有十七岁的小伙子,轻松地推举、抓举各八十五公斤、挺举起一百一十五公斤,竟超过了那次入选的同级别第一名,取得了入京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也就在这以后,他被选入中国举重队,一九五八年,赵庆魁不负众望,两次打破世界纪录,他成了五、六十年代中国举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九六〇年,他开始在国家体委从事举重的教练和领导工作。

一九八四年之前,当二十三届奥运会即将召开之前,李清安是市政协常委、天津体育学院顾问。

## 王庆坨曹氏家族的故事

王庆坨位于武清区杨村镇西南 30 公里处，建于辽金时期因有土著王庆首先定居在土丘之上，故名王庆坨。明永乐二年（1404 年），成祖朱棣徙江南大姓以实畿辅，曹氏家族就是在这时由东楚（江苏徐州府宿迁县曹家集）北迁至王庆坨落户的。历代经营，家道渐兴，曹氏家族遂成为武清名人辈出的望族。著名人物有四世祖曹化雨，六世祖曹传和曹氏鼎盛时期的七世祖曹涵等。在位于武清区东马圈镇东马圈村与安标堡村之间，曾有一片占地约一千亩的曹氏坟茔，当地人称之为“曹老坟”。曹氏祖坟曾经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惜于“文革”期间毁于一旦，今已踪迹无存。

### 曹氏名人

明清两代，曹氏家族多人受封或科举为官，成为乡贤或朝中重臣。

明朝时，曹氏始祖曹道聪以曾孙曹化雨贵，赠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二世祖曹廌以孙曹化雨贵，赠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三世祖曹万德以子曹化雨贵，赠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

四世祖曹化雨，字次渠。初为锦衣卫南堂理事，后凭武功晋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时值魏忠贤当朝，恣意结党营私，为非作歹，殃及水乡。他不畏强暴跋扈，列举其罪上书朝廷，惠及村民，捐俸佐军，代民纳税，使民免罪。对贫不能娶，穷不能葬者，都曾慷慨相助。乐善好施，建立义塾，教育乡人子弟，历春秋四十年。

到清朝时，五世祖曹文度，字坦之。以孙曹涵贵，赠儒林郎。

六世祖曹传，字书言，号近野，别号虚极道人，以子曹涵贵，封文林郎翰林院检讨，晋赠儒林郎，再赠承德郎。天资聪颖，工诗画，尤擅书法，自成一家。仗义疏财，创建“庆成书院”培养人才，捐献船只治理水患。

七世祖曹涵，十五岁入中南海万善殿读书，康熙六十年成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授职检讨，充任大清《一统志》纂修官，督修畿辅水利，营造农田。

### 曹传与康熙治水

武清区地处天津西北部，海河水系中西游。境内有永定河、北运河、凤河、龙河等十几条水道纵横交错，故历史上水患非常多，仅清代水灾就多达百次。历代帝王兴修水利不断，清康熙帝御驾武清视察水情就达 17 次之多。康熙帝拨银两、筑堤坝、清河淤、手书“导流济运”碑文，立于筐儿港，其间曾御临驻蹕六世曹传家，这段千古佳话虽广为流传，但详情却鲜为人知。

曹氏家族居住的王庆坨村四面环水，西达赵北口，左侧的三角淀（又名雍奴薮，方圆 200 余里，其泽野包括近畿九十九淀），是汛期泄洪的重要区域。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月，圣祖仁皇帝玄烨视察水情来到此处。由于曹家早在明朝时就已经名闻京师，而康熙作为一代圣君，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多与前明旧臣贤良过往。此次出巡也不例外，驻蹕曹家为行宫。时曹传年方 22 岁，

正值青年，便与乡耆一同迎驾，得被召见，奏对称旨。这是曹传第一次面圣，也为日后发生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康熙四十七、四十八年间（1708—1709），康熙帝沿运河出巡，由于河道被荪根淤封，船不能前行，銮驾仅到赵北口。曹传得知消息，自持感念恩遇，应前往恭迎，但又恐鲁莽未敢贸然见驾。

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春巡，再次来到王庆坨，触景生情，对随从说：“朕前年来此巡查水情，曾经住在王庆坨的曹传家，他可以也应当来迎驾呀。传旨，若曹传来，毋得阻拦。”于是，贴身太监当即宣旨，向当地官员询问曹传，官员皆如庙宇中的神像肃立，茫然不知。毕竟时间相隔了23年，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而曹传也已由英俊少年步入了45岁的中年。于是，急忙派出人马到周边的村庄寻找，也没有找到曹传，各级官员不知所措，张惶不已，唯恐皇上怪罪丢了乌纱。而与此同时，曹传正带领族众，乘舟摇浆赶来，行至龙舟停泊水域以外的警戒线被卫士大声呵止，不得前行。无奈只得停舟，远远地张望。这时听见护卫船只上的卫士窃窃私语，忙上前询问，卫士就将皇上寻曹传进见一事说给他。曹传一听，大喜过望，连忙说道：“正如你所说的，我就是皇上要找的曹传，烦劳进前通禀一声，”卫士听罢，先是一怔，转而又喜，心说皇上要找的人叫我找到了，不是升官就是赏金，哪里还敢耽搁。事不宜迟，迅速用护卫船只将曹传的小舟带到行营水域内，把曹传交给御前大臣，带领复旨。内臣进殿时，康熙帝正在批阅奏章，闻听后龙颜大悦道：“朕就知道他会来的。”风趣地命令曹传进见。曹传遂摇着自己的小舟靠在龙舟旁，系好缆索，攀悬梯登上龙舟，行进见大礼。康熙帝命赐座，再三询问水旱情况，乡里粮食收获情况，家里有什么困难等等。又传御膳给随行家人和族众。当问到后嗣情况时，回答只有一子在外读书。康熙帝闻听又说：“你们这里乡间怎么能有好的师傅？这样吧，你回去后，挑选几个有读书天赋子侄到宫里去，朕令内廷师傅来教他们读书。”

三月，曹传带领儿子曹涵及侄孙等四人来到皇宫，面圣后留在中南海万善殿侍读，还可以按时领取银两和粮食补助，享受廪膳生员的待遇，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异遇。从此以后，每当康熙帝来武清时，曹传都去恭迎銮驾，每次被召见，曹传只感激圣恩，从未向皇上道疾苦，对此，家人及族众不理解，曹传答道：“我渺小的就像一个虱子卵，不过是一介臣民，能得到皇上的恩遇，犹如井底之蛙得见圆日，午后的蓬亭得睹阳曦，这就是我心中的天地旷远的原因。”

康熙五十九年（1720），曹传作诗并书写对联进京入宫为皇上祝寿，得到康熙帝的褒奖，并想留在内宫为官，曹传固辞。是年秋天，曹涵举乡试，曹传携子赶赴密云面圣谢恩，康熙帝龙颜大悦，命停銮，赴行在御书“惠迪吉”三个大字赐予曹传。

### 曹传曹涵父子与雍正治水

雍正帝继位后，勤于国事，亦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雍正三年（1725），受怡贤亲王暨大学士朱轼的推举，命曹涵督修水利，营造农田。儿子曹涵奉命治水，父亲曹传自然放心不下，故经常询问工程进度，做事是否尽职尽责，上对得起朝廷，下要对得起一方百姓。曹涵的治水是在上官及曹传的监督下完成的。

由于王庆坨一带的村庄皆为靠近水泽之地，故经常有盗贼出没，祸害乡里。为加强地方治安，自顺治朝就设立了王庆坨营，设都司、千总、把总各一员，又

有哨船往来巡察，目的是使乡民无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雍正初期，国事动荡，国库空虚，朝廷划拨经费银两不足，造成船只超限使用，船只老化，无力修缮。等到汛期洪水到来时，临时借用民船使用。久而久之，形成了惯例。开始只征用船只，后来由征用船工。其行为就如同征派徭役一样，行径近乎疯狂，乡民不满，怨声载道。曹传对此大声疾呼：“不要引起事端。”于是，召集乡里族众共同捐资修造哨船，雇佣划船手，以供给营卫差遣使用。这种地方武官随意派拨的弊政，无疑是吸吮民脂民膏的行为，为此，曹传竭尽全力想要挽回。直到陈元彬与陈廷敬前后莅官都司时，方采纳曹传的建议，上书雍正帝，立改弊政，官民平息。为此，曹传特作《王庆坨营豁免船记》，以纪念二陈对水乡百姓的功德。

### 家族兴衰

天道轮回，兴衰常理。曹氏家族同样摆脱不了盛衰交替的规律。曹氏家族兴于四世曹化雨，盛于七世曹涵，后家道败落。有关曹家衰败的记述有二种说法。一是将兴衰归结于“物之反常”的凶兆，相信天道如此，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记述，不足信。在纪昀撰写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武清王庆坨曹氏厅柱，忽生牡丹二朵，一紫一碧，瓣中脉络如金丝，花叶葳蕤，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从柱而出，纹理相连。近柱二寸许，尚是枯木，以上乃渐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时亲见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先生曰：‘物之反常者为妖，何瑞之有！’后曹氏亦式微。”

另一则是有关复兴庄地名来历的传说。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曹氏后代曹某与家住北京恭王府的乾隆皇帝内兄傅恒勾结，秘密伪造了契据，冒称百顷土地作为抵押，从傅恒府上借银5000两。由于当时曾任职翰林院检讨的该地主人曹涵尚健在，同时，朝廷又有“旗汉不准交产”的禁令，傅恒不敢轻举妄动。至乾隆二十三年（1768），傅恒得知曹涵已去世，便依仗皇亲国戚的权势，不顾前朝顺治、康熙帝多次禁止圈地的诏令，竟以皇帝赏赐傅贵妃旗产胭脂粉地（供嫔妃胭脂粉开销的用地）128顷的名义，派人通知武清县，径直来到东场子，强行圈占土地100多顷。除曹家90顷外，又圈占四邻村庄土地近20顷，迫使数十户平民丧失土地无以为业。后来，曹涵后代和邻村失地受害人一起，执土地文书到县衙申诉，经一年多的诉讼奔波，最后，以傅恒退出多占邻地结案。曹氏家族90顷土地被傅恒占有。傅恒派朱修伯在东场子建东、西两宫房，管理收租事宜。并改东场子村名为傅兴庄，取傅家兴旺发达之意。后来，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傅氏后裔因家业衰落，将土地转卖他人，傅兴庄经年演变为复兴庄，含恢复重兴之意。

## 杜建时前夫人是“中共地下党”吗？

天津解放前，杜建时先生由国民党天津市副市长升任市长后，曾盛传杜当时的新婚夫人曾洛生女士是“中共地工”，并传在杜官邸内的厕所中藏有曾的发报机。后曾女士离开天津。此事真相如何？

1947年夏末，天津和平路（当时名“罗斯福路”）与多伦道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就是原日本樱村照相馆旧址开设的一家照相馆，光亮的橱窗里忽然出现了张放大的照片，是当时天津市的国民党市长杜建时，着戎装佩长剑，胸际勋章灿烂，与一位身着白纱衣裙、手执鲜花的女士的合影，极为引人瞩目。这是当年8月17日，新郎杜建时与新娘曾洛生的结婚照。但是，过了不久，忽然在天津市民中传出，这位市长夫人曾洛生，是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已经被捕，她的发报机就藏在杜官邸厕所的澡盆下。这个传闻轰动一时。人们议论的话题，集中于一个国民党的堂堂市长，竟倾心于一个“共产党女地工”，并且结为夫妻，天天生活在一起，在国民党“戡乱”甚嚣尘上之际，岂不是一件奇闻。

杜建时，天津武清杨村人，1908年生。“杨村糕干杜家好”，他就是杜家后人。杜曾在南开中学读书，后来进了东北讲武堂，在张学良部下当过中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易帜，杜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1936年被蒋介石传送到美国堪萨斯州陆军参谋大学留学。从此，飞黄腾达并成为蒋介石囊中人物。1942年，蒋成立“国防研究院”，自兼院长，即派杜建时任副院长，负责实际领导工作，则名副其实地成为蒋智囊团成员。以后，又派杜任蒋侍从室中将高参及伪“国民政府”参军。蒋介石曾与美国磋商，在1944年底用中美联合部队，强攻并登陆还在日本占领下的天津。蒋介石当面嘱咐杜建时预先做好准备，在登陆后充任“天津地区军事管制司令”兼任“天津市长”。此项方案因太平洋美军节节前进而搁浅。当年，杜建时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全过程我都参与了。”可见蒋对这个年少翩翩，既出身行伍，又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杜建时之信赖了。抗战胜利前夕，杜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议；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杜被急电召回，都出于蒋介石的指示。杜说，当见到蒋时，“最后蒋说（说时蒋脸上忽然变得很严肃）：‘还是派你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听我的话，不要推诿。’”杜说，当时就感到天津的情况很难办，因为既有老政客张廷谔任“市长”，又有中统特务控制天津。后果果然发生了曾洛生的问题。

曾洛生是曾国藩的后裔，曾任蒋介石妻子宋美龄的秘书，是个通晓中外的才女。她曾留学美国，专攻妇产科，获医学硕士学位，是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杜、曾结为琴瑟之好，就是宋美龄当了月下老。他们结婚时，天津《民国日报》、《益世报》都刊登了“结婚启示”，婚礼第二天报纸还登出新闻。这样一位女士，怎么忽然被渲染上神秘色彩成为“地工”，而且是国民党“党国所不容”的“共产党地工”呢？

杜建时的“市长官邸”坐落在烟台道西端、墙子河畔。这是一幢院落很大、绿草如茵的花园别墅。杜的原卧室在二楼，间量很大，接收时除家具依然，已空空如也。唯一能证明杜建时曾住在这里的，是写字台玻璃板下的杜建时照片。杜着国民党中将军服，肩头横列两颗金星，脸微微扬起，站在一辆坦克车旁。但这张照片因粘在玻璃板上，房主离去匆忙，想撕去又未能全撕去，大半部被牢固地留下了。杜先生惨然地说，“我那时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后来就当了俘虏。”意思是解放军攻下天津太快了。

当年,接收人员认真地查看了这所小楼的每一个房间。杜的卧室在二楼东面,中间有一间客厅,西面就是厕所。人们立即想起解放前“澡盆下藏发报机”的传闻,就立刻去“查勘”。只见厕所墙上地下贴满白色马赛克,普通的抽水马桶一目了然。而那带有关键性的所谓藏发报机澡盆,原来是“炕式”的,即全部用白色瓷砖包镶的,外观浑然一体,任何微小之物都无藏身之地!看来,解放前曾洛生为“中共地工”之说,大概是空穴来风了。

当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的杜老,虽已白发稀疏(那年他77岁),语调平缓,但记忆力仍很好。

“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的造谣!”杜老有些愤慨,“现在谈心里话,那时我根本不愿当天津市长。我多年做军事工作,而且对研究现代军事理论兴趣很浓,当市长我很厌烦。张廷谔当市长,一贯独断专行。等他走了,我当市长,粮食呀,物价呀,弄得我焦头烂额。可是就这样,还有人天天盯着‘市长’这个位子,想打倒我取而代之。这个人不是别人,他也是天津人,也是‘南开’的学生,就是国民党驻天津华北区金融管理局局长施奎龄!我是军人,他是CC系的委员,以熟悉天津又有行政才干而自居。曾洛生是”中共地工“,就是他造的谣言。最后都传到总统侍从室去了。”

采访者接着就问杜老:“您那时候就听到这个传闻了吗?”

杜老说:“岂止知道,我去南京时还为这件事找过侍从室呢哪!侍从室的人都了解我和蒋的关系,说蒋夫人听了只是淡淡一笑,什么也没说。侍从室的人还给我出主意,让曾洛生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所以,在1948年4月底,我就送她去美国深造去了。”杜说:“也因为这个缘故,我是单身一人成了解放军战俘的。”

采访者接着就问:“解放后在战犯管理所,您给旅美的曾洛生女士去过信吗?”杜老说:“去过,去过。她还回过我两封信。但是远隔重洋,又是两种社会制度,又是朝鲜战争,国际关系很紧张。她不能来,我更去不了。而且当时都感到前途渺茫,谁都回避和不愿谈未来,后来消息就中断了……”

采访者不愿触动老人内心深处的感情,也不想再问了。

这时,杜建时先生的夫人,既是名画家,也是天津人的李念淑大姐(杜建时1963年获大赦,时年57岁。同年与小他十岁的画家李念书女士结婚。)在一旁说:“一提起曾洛生,你看他,你看他……”

从这件事,可见国民党内部之倾轧,以及特务分子手段之狠毒,连一个“特别市的市长”也不放过。

## 国内研究灵岩石的第一部专著

张轮远(1899—1986)不仅是著名的藏石专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藏石理论大家。其所作《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是一部研究雨花石、大理石的专著,填补了研究、鉴赏雨花石、大理石的空白,尤其对于雨花石的研究、鉴赏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对张轮远的雨花石收藏及其收藏理论试作阐释。

### 一、雨花石收藏的一代巨擘:“万石斋主”张轮远及其收藏

张轮远原籍河北雍阳人(今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早岁就读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总理同窗,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后因水土不服转入北京大学,受业黄侃、吴北江,打下了深厚的学术根基。张轮远性格清介,郑逸梅评其为人:“介通、质文、明韞”(《南北两大藏石家》,《大成》第一八三期);由此可见,他非常注重个人的气节和操守。民国年间曾任天津法院推事,芦沟桥事变后立即以疾隐退,不再供职于司法界。晚年定居天津,应聘为文史馆馆员。早岁著成《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晚年有《余霞集》存世,取刘禹锡诗句“莫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意命名。

张轮远早年受乃师郑子周、中学同窗薛卓东以及老一代雨花石收藏大家王猩酋的影响,对雨花石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嗜石成癖。尤其老前辈王猩酋,在长期的交往中,两人亦师亦友,互赠雨花石,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金石之交,生死不渝。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张轮远收藏雨花石就已经著称于世。1947年沙孟海为张轮远的札记写序,题字:“见石如见人”。并作条幅:“删繁就简三秋树,喻石育人二月花”。写出主人雅爱文石的精神性情。

雨花石界早就有“南许北张天津王”之称号,“北张”即指张轮远。张轮远晚年又与上海雨花石大收藏家许问石订交。张轮远在早年既与王猩酋为师友,晚年又与许问石书信订交,确乎是藏石界的一段佳话。

张轮远首先是一位雨花石收藏大家,其次才是一位研究雨花石的理论家,因而最能反映其学识水平和鉴赏境界的也就是他的雨花石收藏。他的居所号称“万石斋”,他也就成为“万石斋主”。张轮远珍藏的雨花石虽然并没有万石之多,但经他过眼的雨花石一生恐不下十万枚之巨。

张轮远非常珍视自己一生的收藏,并在自己收藏的三千余枚精品中拣选64枚,为之作图作记,起名作谱,谱成《万石斋石子小传》(二十三则)。再加上《万石斋藏石琐记》(二十一则、二十二则),便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个人雨花石收藏小史。

张轮远收藏雨花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经历了相当时期的搜集,才得以沙里拣金,达到如此的规模。他的雨花石收藏曾经历两大劫难。第一次是日寇侵华,中原战局跌荡,当地土匪、兵匪抢劫,老家的财产以及“万石斋”所藏雨花石几乎全部散失,所幸珍品始终带在身边,未曾遭到掠夺。晚年文革冲击,对于张轮远则是又一次浩劫,所藏雨花石,再度经历被清洗的命运,藏石几乎全部失散,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文革结束后,劫后余生,雨花石亦仅存三四百枚了,不及盛时的十分之一,所幸部分精品、珍品存留下来,亦是不幸中的万幸。为了使自已一生收藏的雨花石珍品能够供更多的人研究、欣赏,能够更好的得以保存,张轮远晚年毅然割爱,于1979年把毕生收藏劫余尚存的三四百枚雨花石捐赠地质部北京地质博物馆以作科研之用。他去世以后,北京地质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

物馆联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雨花石精品展，其中“万石斋”的藏品最为翘楚。

## 二、第一部系统研究雨花石的理论专著：《万石斋灵岩石谱》

《万石斋灵岩大理石谱》，1948年初版刊印出版。198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又作了再版。1993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古玩文化丛书·说石》中又将它辑入。作为一部鉴赏著作，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竟能连续三版，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全书不是自己亲身所见所感，便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事理兼备，内容博恰，是民国时期研究赏石文化的经典著作。其中《万石斋灵岩石谱》，则是第一部详细阐释论证、研究雨花石的专著。作者共分25则，概括起来，则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则至第六则为第一部分，概括雨花石的鉴赏心理、历史、出产地、名称、成因，这是论述雨花石的基础部分即概论部分。第七则至第十九则为第二部分，是雨花石的专论部分，对于雨花石的质形色文、象形、命名、鉴别、石品、等第以及研究意义等分别予以阐述，这一部分对雨花石的收藏和鉴赏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是作者理论阐释最为集中和精彩的部分。第二十则至二十一则为第三部分，介绍了作者对于民国年间的雨花石收藏的见闻、逸事以及“万石斋”所收雨花石珍品小传。对于所见雨花石珍品分别予以记述、转录。为民国年间灵岩石的收藏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弥为珍贵。第四部分则为作者对于历史上有关雨花石重要文献和诗词的辑录，为后来者研究

雨花石提供必备的相关资料。这四部分构成了《万石斋灵岩石谱》的理论框架，此书一出，就在雨花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是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二十世纪下半期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雨花石的收藏和研究几乎基本上是在这部专著所提供的理论框架范围内进行的，有着广泛的影响。

## 运河枪声

近代以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 1949 年平津战役结束，北运河畔的枪声延续了九十年，武清人民经受了九十年的战火洗礼。

运河枪声终止至今已有 50 多年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的曹诚同志在 1945 年到 1948 年的三载大动荡年月里，任冀东 15 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武清、宝坻、宁河等地多次战斗都参与指挥了。回忆当年，这位老将军十分感慨，当时武清等县都处于敌我拉锯的争夺态势，特别是武清地处平津之间，有铁路、公路通过，且跨运河两岸，所以历来就是必争之地。而作战地域主要是运河沿岸的老战场，如三克杨村镇，四洗武清城，多次横扫蔡村、河西务。当年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但是我们坚持了“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因此，在同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拉锯”时，总是把敌人拉垮。解放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的武宏同志，在平谷、武清等地打了很多仗，六次负伤。1944 年他率领部队协同武、宝、宁支队在武清刘靳庄粉碎敌伪军的多次围攻，1945 年在桐高村全歼伪军两个小队，1947 年指挥宁河县大队深入敌区全歼芦台二分所守敌，我军无一伤亡，金钟河伏击战，伪县长以下三百多敌人无一跑掉。有一次突袭到天津郊区，打开敌人军火库，搞来了很多武器装备。

1948 年攻打杨村担任突击班长的李恩宝同志（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参谋长）回忆当年，打杨村在当时平津之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虎口拔牙”，在十来个据点中主攻梁家大院据点。1948 年 2 月国民党暂三军汽车团，在武清、宝坻两县还乡团配合下，突然袭击北运河以东的解放区，连续扫荡七天，烧杀抢掠，有 40 多名县、区和村干部被杀，近百名干部被逮捕，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军集中了三个团兵力攻打杨村，主攻目标是国民党宝坻县流亡政府驻守的北运河东的梁家大院，救出了我方干部。2 月 21 日夜，部队长途奔波，是夜风沙大作，部队顶风急行，到达杨村附近，风停月明，我军突然兵临院外，子夜发起攻击，穿插分割，扫清歼围，经过一夜鏖战，除双龙桥南的据点外，所有据点全部攻破。当部队攻进梁家大院，冲进厢房，打开地下室的门，向下边喊：“同志们，快出来吧！解放军救你们来了！”关在这个地下室的几十名干部走上前来，见到了亲人，流着眼泪和指战员握手拥抱。这时天快亮了，大家看到在墙根放着一堆木牌子，上面写着这些干部的家庭地址、姓名、职务，这是敌人准备天明时枪杀我们的同志时用的。在六天里，已有两批被捕的干部被敌人枪杀了。这次战斗，救出被捕干部 50 余名，毙敌百余名，俘敌三百余名，摧毁国民党宝坻县流亡政府和县党部，同时逮捕带领汽车团袭击解放区的敌大乡长和还乡团头子 20 余名，从而稳定了武清局面，保卫了解放区，发展了生产，并为平津战役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战勤支援。当年参加战斗的李尚武同志，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政委。1946 年武清县县长田世英同志在北靳庄英勇牺牲，疯狂的敌人将田世英同志的头砍下，带到县城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在此形势下，李尚武任中共武清县委（路北）书记，当时，武清县委、县政府机关撤退到大黄堡水洼地坚持斗争，处在困难环境，但仍掌握民心向背这个斗争主动权，县委根据实际情况，派警卫班长步行 150 里去平谷、密云山区寻找地委，汇报坚持斗争的情况和敌人的兵力部署。不久，曾雍雅司令员率 16 团、34 团、36 团，开展武清战役，首先攻克崔黄口和大良、周辛庄、刘家庄等据点，运河以东，除杨村、梅厂等敌人据点外，全被我军攻克，敌人只能龟缩在运河线上的据点上，国民党发动内战

没过半年，我军就在武清打开了局面。这位在艰苦环境磨练的文武兼备的县委书记，深感人民群众的潜在伟力，我们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民心向背决定胜负的历史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运河枪声九十年，是内忧外患的许多血路之一，尤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数先烈倒在了这条血路上，曾在这条血路上战斗的幸存者，如今已是老年了。爱国主义是常青的主题。武清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战火洗礼，从英法联军战火连年百余载的地方史志，是一部壮丽的爱国主义教材。

## 1950年国庆节“阴谋爆炸纵火案”中的武清人

1950年9月30日,《天津日报》第一版以《特务妄图于国庆节进行破坏津公安局迅速破案》为标题报道了此案

1950年9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外国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阴谋炮轰天安门的重大案件,一时轰动全国。与此同时,天津也破获了敌特企图在国庆节前后制造爆炸纵火案……

### 神秘信件

新中国建立后,逃往台湾的敌特组织不断地向大陆派遣特务搜集情报,与潜伏下来的特务里应外合,制造暗害、爆炸、纵火等刑事案件。

1950年2月清晨,王明五从天津南市的家里出来,刚出胡同口就与一个叫花子撞了个满怀。待他站稳正要发作时,叫花子却不见了踪影,低头看时却见上衣口袋插着一张折纸。他展开纸刚看了一眼就连忙折上揣进了兜里,下意识地四下里看了一眼,掉头回到家中。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乔振东如约来到山泉涌饭庄的一个雅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王明五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二人寒暄后,王明五便压低了声音说:“李先生,咱们可有笔大买卖要做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封“叫花子”给他的密信。乔振东接过来认真地默读着:

“山先生、李先生:近来买卖不行吧。不用担心,这边的人已谈妥一批货,因时候不到,还不易出手。不过货在我手,准有你们的,价款另议。现在,可由山先生出面,张罗一些伙计。7月上旬,二位先生同来我处看货。兄崔铎。1950年2月,香港。”

乔振东明白,这是香港特务机关给他们的指令,其中“山先生”是王明五,李先生是自己,崔铎是香港特务机关的头子,指示他俩发展特务队伍。虽然信中没有写明“货”是什么,但他们二人明白:这次是要干大事了!

### 特务团伙

随着天津的解放,市军管会发出布告,责令一切原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人员到指定地点登记。不到一年的光景,一些过去跟着国民党干过坏事的人,有的自己主动自首,有的在家人的催促和帮助下,向人民政府坦白交待了自己在建国前的罪行,走上了改过自新的新生之路。但仍有一些顽固分子拒不登记,坚决与人民为敌。

乔振东,1923年生于河北省定兴县,1947年经人介绍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解放前夕移居天津集贤里,在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特务头子吴景中、张培英领导下,从事特务情报活动,化名李文广。

王明五,1911年生于河北省武清县(今属天津市武清区),解放前历任国民党十六军上尉司书、天津水上保警队大队长、保密局北平站行动组员等职,为保密局北平站行动组崔铎的有力帮凶,化名王秀山,又名王玉崑。手下有一伙儿效忠他的特务,都是些心狠手毒的亡命徒。他平时喜好饮酒,时常喝得酩酊大醉,

不醒人事，人称“迷糊”。解放前夕来到天津，住在南市的叔叔家，在泰康商场以经营古玩字画作掩护。

崔铎解放前担任国民党保密局北京站行动组中尉组长期间，搜集中共情报，缉捕中共地下党员，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解放前夕，他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处受训，并迅速提升为保密局驻香港华北负责人，化名杨明，月薪 2000 元台币。他频繁往来于港台之间，随时接受国民党国防部的反共指令，在香港遥控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两地的潜伏特务，指使他们刺探共产党情报，网罗招募国民党旧部，组织暗杀和破坏活动。坐落在香港干诺道大街的大东酒店，是他的居所之一。但他老奸巨滑，神出鬼没，有着超强的嗅觉，生性多疑，因此经常是居无定所，时常搬家，就连香港的特务也只有定时接头的时候才能找到他。

### 特殊任务

1950 年初，国民党国防部交给崔铎一项“特殊任务”：在大陆庆祝第一个国庆日前后，在京津两地实施爆炸纵火等破坏活动。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想要完成这项任务绝非易事，非有几个死心塌地的人不可。京津两地的潜伏特务逐个在他的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地过了一遍，最终他选中了王明五和乔振东。王明五跟随自己多年，不但了解而且信得过；选择乔振东是因为他曾是张培英手下的一个小特务，还不为共产党所注意。不过，他对乔振东还是不放心，决定让他二人到香港，一是考验，二是培训。所以，他写了前面的那封密信。

王明五、乔振东接受任务后，乔开始四处活动，广泛收集人民政府情报，准备 7 月份去香港时给特务头子们的见面礼。王则联络天津潜伏的敌特分子，发展对共产党不满的敌对分子，组织拼凑反革命组织班底——“华北反共救国军”。王明五在建设路上的世界商场找到了以摊贩身份做掩护、曾任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部副官的宋世元。天津解放后，他不但不向政府登记，还联系旧部，造谣惑众，声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共产党长不了”、“在人民政府之下永远没有出路”等反动言论。一见王明五来联络他，二人一拍即合。之后，宋世元又介绍四五个人加入华北反共救国军。

7 月 15 日，王明五、乔振东来到香港。在港期间，崔铎亲自对乔进行特殊训练，教授他新式爆破技术。交待他回到天津后，要听从王明五的指挥，如果在行动中被捕，一定要严守组织纪律，绝不能泄露机密、供出同伙。如果做了叛徒，定会被黑枪打死。交给王明五的任务是：回津后，立即设法搞到硫化钾，交给乔实施爆破，千方百计协助乔完成任务。特务们最后研究确定了天津方面的爆破目标是东站、北站、第三发电厂、百货公司、新华书店、美琪影院、国光影院、新华戏院。如果爆炸成功，香港方面将给他们二人每月 60 块银元的固定奖励。

崔铎最后指令道：“爆破时间定在 9 月 30 日，目的是扰乱共产党国庆节日的庆祝活动，制造恐怖气氛，让老百姓不敢参与游行、集会等庆祝活动。如果戒备森严，无从下手，那么就改在 10 月 3 日，那时，各种庆祝活动均已结束，会出现短暂的松懈和麻痹，搞爆破活动相对容易些。”行前，崔铎给了他们 1400 元港币的特务活动经费。

### 蠢蠢欲动

9月24日，回到天津的王明五来到世界商场，将一只金壳英格手表交给宋世元，令他到罗斯福路116号聚和化学原料行订购60磅硫化钾。如果不能赊账，就以手表做抵押。并且叮嘱他说：“总之，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炸药，没有炸药，爆破就不能实施，此举的成败全在老兄身上！”接受任务后，宋世元立即来到聚和化学原料行，但该行仅有40磅硫化钾，每磅3万元，只收现金。宋世元马上将这批炸药买下，因为数量不够，他又接连到香港药房等几家化学品商店购买，结果都因缺货而没能买到。无奈，他只好如实地告诉了王明五。王明五听后沉吟片刻说：“我们不一定要炸毁目标，只要搞出动静，造出声势，社会混乱了，老百姓恐慌了，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炸药不够我们还可以放火吗！”

27日晚，在世界商场，宋世元将已经捆扎好的40磅硫化钾悄悄地放进了王明五黑色提包中。辞别了宋世元，王明五立即赶往西楼大桥路24号特务杜文宝家，将一封早已草拟好的书信交给他，令他转交乔振东。杜文宝接信后立即连夜交到乔振东手上。乔振东展开书信，只见上书：

“李兄，货已购妥，如不慎，见信后，可于旧历十七日早8点到上次见面地方一谈为盼。因老地方太远无暇前往，勿误为盼。山。”

乔振东明白，“李兄”即自己，“山”指王明五，“货”是硫化钾，而“见面地方”则是中心公园。

## 一网打尽

1950年初，天津市公安局领导就已得到消息：敌特企图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日前后搞阴谋破坏活动，以达到动摇和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目的。为此，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一方面布置警力加强巡逻，严加防范，一方面动员群众，擦亮眼睛，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全市的公安干警配合人民解放军，对天津的政治、文化、商业区加强警戒和保卫，对铁路、火车站、大中型工厂组织纠查队协同保护，各公安派出所对自己管辖区域严格防范，做到万无一失。

尽管特务制订的方案很周密，行动也很隐蔽，但他们的罪恶行动仍没能逃脱我公安人员的视线。经过明查暗访和聚和化学原料行的举报，警方得知：乔振东、王明五在建国前曾是保密局天津站、北平站特务，而天津解放后，他二人拒不向政府登记，而且前不久还以谈生意为名一同去了香港，在香港一待就是两个多月。他二人回津后，更加引起警方注意，侦察人员对他二人进行了秘密跟踪，对南市王明五家、集贤里乔振东家、大桥道24号、世界商场、山泉涌饭庄、中心公园等地早已实施了严密监控。特别是宋世元在聚和化学原料行购买了硫化钾后，更加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市公安局领导果断地作出指示：在敌人实施爆炸前，将这伙特务一网打尽！

9月28日清晨，公安人员早早地来到中心公园，他们化装成晨练的人，有的打太极拳，有的打球，有的踢毽，只等特务们的出现。8时许，王明五先到了，只见他身着青夹袍，脚蹬一双胶底黄皮鞋，缓步走到一张长椅前，将手中的黑提包放在椅子下坐了下来，下意识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这时，乔振东也出现在公园门口，当他见到王明五后正要走过来时。公安行动组长一声令下：“行动！”十几名公安干警像猛虎一样扑了上去，两名特务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已束手就擒了。当场在王明五的黑色提包中起获了40磅硫化钾，在乔振东身上搜出了两封密信。与此同时，兵分另一路的公安干警也将宋世元、杜文宝等特务抓获。一起阴谋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企图借国庆节爆炸纵火的重大案件就此结束。

## 高聘卿和他灌制的唱片

高聘卿，1909年生于天津武清县大良后沙坨村。1943年举家搬到南线毫村。

20世纪30年代开始，先后经办宝利、国东以及北京的胜利和百代四家唱片公司，致力于京剧、地方戏、曲艺、音乐等唱片的灌制，为当时很多著名演员票友录下了精彩唱段，曾参加北京国剧学会。他对京剧史和京剧论的研究造诣很深，为弘扬民族戏曲，尤其是对京剧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高聘卿少年时期就酷爱京剧，私塾10年后，至哈尔滨慎昌洋行当业务员，同时参加“中东铁路俱乐部”，为会员，并向陈远亭、吴喜年、周喜增、李妙兰、南铁生等学戏，曾学过青衣，后改老生。还向言菊朋、马连良、余叔岩、徐兰沅、雷喜福等人请教过，并经常参加演出活动。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胜利唱片公司在哈尔滨成立分公司，聘高聘卿任副经理，是以经销唱片为主。后来调至天津宝利唱片公司任业务部长。在此期间对一些唱片厂家所灌的唱片高感到不妥当，如选材、选段、演员及唱片处理方面不适合，或有的音质不好、有的不是演员拿手唱段、有的不是著名演员等，高聘卿决心有机会组织灌唱片时一定灌制能流传百世的和具有特色的名唱段。

一二年后，高聘卿被调到北京为成立国乐唱片公司做准备工作，又曾至日本学习灌制唱片的音质和音响的处理。

1933年，在宝利唱片公司的协助下，高聘卿带领一批演员及名票到日本东遗言灌制唱片，这些演员是：评剧演员爱莲君、爱三侠，河北梆子演员秦凤云、王金城等，京剧票友孟广亨、乐朴荪、张吾翼、顾珏荪等，为国乐公司灌制了第一批唱片。所有唱片的音质、音响、选段，全部由高亲自掌握。这批唱片心上印有“宝利公司贡献”字。

1937年，国乐唱片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经理为日本人，高聘卿任文艺部主任，地点在北京景山后街。收音所（即灌音室）在和平门内东栓马桩，即当时的“中央广播协会”（会长是周大文）。“国乐”英文为CORONA，是日本一种吉祥鸟的名字，并作为商标和公司名称。国乐公司总部在日本东京，唱片厂在日本横滨。国乐唱片不报场，音质好、音量大，就是很旧的唱片音量也很大。高聘卿说，灌唱片就灌名人名唱，或特点突出的剧目，或没有人灌过的戏。

国乐公司成立后曾为京剧演员言菊朋、马连良、余叔岩、李万春、金少山、李多奎、萧长华、诸茹香、裘盛戎、马德成、李少春、程砚秋、荀慧生、奚啸伯、陈丽芳、谭富英、周啸天、李世芳、宋德珠、毛世来、艾世菊、吴素秋、陈少霖、王泉奎、小杨月楼、万啸甫、杨菊秋、杨菊芬、管绍华、韩世昌、高聘卿、郗缙云、茹富蕙等灌过唱片。曲艺演员有王佩臣、刘宝全、小彩舞、小蘑菇、赵佩茹等，还有其它地方戏、音乐等唱片。

国乐唱片公司从 1937年至 1939年 ,三年间灌制了不少当时成名的演员的精彩唱段 ,共约 400张 ; 1940年结业 ,全部设备、模版等转让给太平唱片公司。

1940年 ,高聘卿被聘为“华北演艺协会”剧务科科长 ,当时的会长是周大文。

1941年 ,胜利唱片公司聘高聘卿到北京胜利公司任副经理。百代公司相继聘高为该公司顾问。两家唱片公司合用一个灌音室——百代公司灌音室。灌片内容、演员、音质都由高负责。此间又为一些名演员灌制了不少剧目的名唱段。有马连良、言慧珠、奚啸伯、金少山、李多奎、萧长华、马富禄、陈少霖、姜妙香、程砚秋等 ,评剧如喜彩莲等 ,为当时在北方的名演员留下了宝贵的音响资料。

胜利、百代公司于 1945年结束。高聘卿后到沈阳中央信托局工作 , 1950年到太原建筑工程部工作 ,直至退休。

1945年至 1965年 ,高聘卿收藏并整理出大量京剧资料 ,著有京剧史、京剧理论研究及名京剧演员表演艺术浅谈等 30余万字 ,准备出版 ,不幸“文革”期间被焚毁。“文革”后 ,又通过回忆重写 ,但由于年事已高 ,身体不适 ,仅写出部分资料 ,尚待整理。

高聘卿退休后 ,曾为很多京剧票友、爱好者和业余京剧团说戏 ,排戏 ,进行艺术指导 ,还改编京剧剧本《南天门》等。退休后住在天津市南开区 ,每日饮酒自得 ,唯红星二锅头 ,佐以西红柿几片、花生一小碟。为人谦逊和善。津门一以老唱片为业者 ,尝从彼处借得若干珍贵资料 ,借而不还 ,流失不闻矣。与名琴票从鸿逵住处仅隔三个路口 ,但二人皆八十开外 ,腿脚不便 ,神交而终未谋面。

1997年因病卒于养老院 ,终年 88岁。

## 天安门国徽的制作者是武清人

他是中国国徽的制作者，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至于这位老先生的身家姓氏，则似乎成为了一个谜。

在电视节目《建国 55周年专题》中介绍国徽诞生的过程时，曾提到了已故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师郭效儒老先生。这位郭效儒老先生的祖籍就是武清，曾用名郭通城，1921年 6月生人。尤其令人崇敬的是：他的许多事一直都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人还能够想到这个人就是当年国徽的制作者。

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毛泽东号”机车的车徽浮雕、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胸像、南开大学的周总理青铜浮雕像……这些都是北京工美集团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效儒的作品。但是，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级人物，人们往往只记住他们的作品，而很快就会忘记这些作品的作者。据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在着手雕塑一尊郭效儒的塑像。而年轻一代的学生们早已不知道郭效儒是何许人也了。

那是 1951年的秋天，雕塑家高庄用最短的时间塑成了国徽泥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的模具却怎么也打不开了，于是多次到郭老的“美术供应社”找他。建国初期，满北京城也没有几个真正学过雕塑的。但郭效儒是正经的科班出身，北平国立艺专（中央工艺美院前身）雕塑科出身，又读了 3年研究生，之后留校任教。1948年，郭效儒就以为辅仁大学公教美术会雕塑的“中国六朝时代耶稣圣像”而闻名艺术界。这是中西观念、风格在雕塑上的首次结合。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教会迁往意大利还特地带上了这件作品。因为郭老是雕塑科出身，所以他的办法就比较实用。他将高庄制作的石膏全部立体部分的凸起角度改为 75度角，这样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而郭老改过的这稿也最终成为共和国国徽的定稿。至今，这枚国徽的小样儿仍然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

一天，郭效儒的一位邻居找上门来，原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 80诞辰快到了。艾黎先生的一个养子非常想送给他一份礼物，想来想去，觉得给老人家塑个像最好。于是想到了郭效儒，就托这位邻居帮着给牵个线。郭效儒一听，这是一份孝心。很痛快地就应下来，只是叮嘱“多拿几张艾黎先生的照片”。

郭效儒选择了薄浮雕的艺术形式。薄浮雕像可以说是郭效儒的绝活，一个浮雕的厚度只有 5毫米，但是浮雕上的图案却纤毫毕现。这种作品的创作过程必须像微雕一样，达到老僧入定的境界。郭效儒的女儿郭正懿现在还记得，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才取出玻璃板，看着案头路易·艾黎的照片，一点一点地将塑泥塑到玻璃板上。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父亲拿出一个薄浮雕石膏像，问她雕得好吗？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位面带微笑、慈祥的外国老人，眉间凝聚着一种慈爱的神情。他就是路易·艾黎，但又不仅仅是。

路易·艾黎 80诞辰的庆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郭效儒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当路易·艾黎浮雕像被揭开的时候，这位国际友人端详了许久。转过身来和郭效儒亲切握手，说：“你是我中国的知音。”后来，路易·艾黎回国的时候，特地将这幅浮雕运送回新西兰。现在，郭效儒的《路易·艾黎像》被新西兰博物馆收藏。

后来，郭效儒又创作了周总理青铜浮雕像、张仲景像、郑成功像、陈嘉庚像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纪念币等一系列传世佳作。直到 2003年 6月 27日去世，仍有许多作品停留在草图阶段。郭效儒在一份简历中这样总结自己：“我由一名纯艺术家转向工艺美术工作者，走了一条与一般艺术家不同的道路。几十年来，

我总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基本上放弃了个人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基于我在青年时代的两个追求：一是致力于把欧美雕塑艺术与我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试图形成我国现代雕塑艺术风格；二是致力于把纯艺术与现代工艺技术有机结合，力图把我国工艺美术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工艺技术能力的实用美术工艺，以期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 “内联升”鞋店创始人赵廷

旧北京曾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的顺口溜。戴马聚源帽店的帽子最尊贵，穿用瑞蚨祥绸布店绸布做的衣服最光彩，脚踏一双内联升靴鞋店的靴鞋最荣耀，持有四大恒钱庄（恒利、恒和、恒兴、恒源）的银票最富有。从这个顺口溜中可以知道，“马聚源”、“瑞蚨祥”、“内联升”和“四大恒”是过去京城最著名的店铺。

“内联升”靴鞋店是赵廷于清咸丰三年（1853）创办的。赵廷是武清县人，父亲在家乡务农。赵廷从十几岁开始，就在京城一家靴鞋店当学徒。由于他聪明好学，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在三年多的学徒期内学得了一手好活计。他出师后，得到当时清朝一个官员的帮助，筹资白银万两，在较为繁华的崇文门内东交民巷开了一家靴鞋店，字号“内联升”，采取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

“内联升”的“内”指“大内”，也就是皇宫，意即穿了店里的鞋子可步步高升。这个名字正好迎合了官员求高升的心理。

“内联升”开业后生意甚是兴隆，大小官员到“内联升”定做、购买朝靴的络绎不绝。“内联升”的买卖之所以好，不仅是因为名字好听，更主要的还在于其做的朝靴做工讲究，穿着好看、舒适。

早期的“内联升”专为朝廷官员做朝靴。那时候，小官吏定做、购买朝靴都要亲自到店铺里去；而中高级官员做朝靴一般都让“内联升”去人为其量尺寸，做好了以后再送来试穿，这样“内联升”的伙计为一双鞋常常要跑好几趟。官员第二年做朝靴，“内联升”还要派人去量尺寸、送鞋子，很麻烦。经过生产经营实践，赵廷想出了一个既省事又可拉顾客的好办法，就是把清政府大小官员凡是在他店里做过或是买过朝靴的人的姓名、年龄、住址、靴子尺寸、特殊爱好等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叫做《履中备载》。有了《履中备载》，“内联升”做好了朝靴就可以直接派人给官员送去，而且保准合脚。这种办法不仅让“内联升”的伙计少跑了路，而且给顾客省去了很多时间，很受顾客的欢迎。另外，在当时，官员常将朝靴作为一种礼品送给亲友或上级。“内联升”有了《履中备载》，大大方便了送礼者，也使自己招揽了不少的生意。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进北京城。侵略者在北京城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内联升”店铺全部毁于大火。等侵略军撤出北京后，“内联升”在灯市口西街的乃兹府重新开业。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内联升”经营惨淡。1912年，袁世凯制造兵变，到处烧杀抢掠，“内联升”又受其害，经理赵廷气愤而死。赵廷的儿子赵云书接手“内联升”后，把店铺迁至前门外廊房头，并另立制鞋作坊。

清王朝覆灭后，靴鞋被淘汰，“内联升”又制作缎子面的千层底布鞋。为了让这种鞋打开销路，“内联升”在鞋的制作方面力求工精物美，穿着舒适。由此，“内联升”再次扬名京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的穿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穿皮鞋的人增多，穿千层底布鞋的人大大减少。由于“内联升”的名气大，其营业虽大不如以前，但尚可勉强支撑住；而同行则有的停业，有的转产。

解放后，“内联升”获得新生，制作的千层底布鞋依然受到一些消费者的喜爱。郭沫若曾特意写诗称赞“内联升”的布鞋：凭谁踏破天险，助尔攀登高峰。新知虽勤摩挲，旧伴每付消融。化作纸浆造纸，升华变幻无穷。

1956年，“内联升”实现公私合营，店铺迁至前门外大栅栏街上（现为总店）。

如今，“内联升”已翻建成宽敞明亮、楼上楼下几千平方米的新店堂，不仅经营千层底布鞋等传统产品，而且增添了大量的各式男女皮鞋。“内联升”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传统手工制作布鞋的生产、销售企业，2006年被中国商业联合会正式授予“中国布鞋第一家”的称号。

## 第一届春晚是武清人主持的

新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个春节联欢会是在 1956 年，然而担任这次联欢会的主持人（当时称为报告人）竟是武清人郭振清和歌唱家郭兰英。

郭振清的祖籍是武清石各庄村，当时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1952 年，他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六号门》，从此为人们所熟知。就在 1955 年，他又刚刚主演了电影《平原游击队》，游击队长双枪李向阳的形象正在深入人心。郭振清长得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十分符合那个时代工农兵的形象，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初涉银幕，普通话还不很标准的郭振清成为了这台明星云集的晚会的报告员。在这台春节大联欢上，人们相互之间是以当时最值得自豪的“同志”相称，报告员郭振清对来宾的称呼也是这种没有性别之分的“同志”。在这些昔日的艺人们脸上我们看到了洋溢着色彩，这一从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变化，在他们的心理上，在他们的精神面貌上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老舍、巴金、周立波等著名作家，梅兰芳、周信芳等京剧大师，乐松生、郭琳爽、荣毅仁等商界名流，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中国核物理先驱赵忠尧参加了联欢会。

总导演张骏祥是著名导演，也是我国电影界一位很有成就的剧作家和理论家。担任导演的岑范、谢晋、林农和王映东后来都成为我国有名的导演。

## 曹试甘与西部歌王王洛宾

曹试甘，(1911-1997)原名曹承沛，武清王庆坨人。

曹试甘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有名的乡医，父亲也会治病。因受家庭影响，曹试甘自幼学习优良，1926年考入北平市立师范学校，后又升入国立北平艺术学校。在校期间，曹试甘与之后成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是同窗好友，还有一位好友是老志诚，三人毕业后都有志于教育救国并为艺术献身。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曹试甘被迫到外地任教。在抗日期间，他专教日本人禁唱的歌曲，以此来反抗日寇的侵略。1944年回北平继续从事音乐教育，期间与老志诚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电信歌咏团，演出时曹试甘不是洞箫独奏就是小提琴独奏。1945年10月，曹试甘参加了北平艺术界庆祝抗战胜利音乐会，群情奋然。1946年，曹试甘与老志诚又回北平师范学校任教。

那时，曹试甘和老志诚经常去北平广播电台作直播，他们带着自己培训的合唱团演唱进步歌曲。1947年秋，王洛宾从新疆回到北平，筹备举办新疆民歌演唱会。好友重逢三人分外高兴，决心把演唱会办好。曹试甘辅导北师的春雪合唱团把王洛宾的《阿拉木汗》等多首歌曲改编为四部合唱，认真排练终于完成。年底先后在北师大礼堂、北师大礼堂成功举办了新疆民歌演唱会，盛况空前。这次演唱会的成功，曹试甘的教唱、组织、改编、辅导是功不可没的，他为朋友殚精竭虑。在民生凋敝、民怨四起的国民党统治时期，音乐打破了北平的沉闷，社会各界及青年学生掀起了歌唱新疆民歌的热潮。

曹试甘是个多才多艺的音乐教师，乐器演奏他会钢琴、风琴、月琴、三弦、琵琶、二胡、京胡等，不仅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美术、诗文、手工等多个领域都有研究，并用于教学取得成效。他将学生当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爱，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因此他得到了所有学生的敬仰和爱戴。

解放后，曹试甘对教育事业更加热爱，对工作精益求精。他在教具发明制作、音乐创作、编写教材方面都付出大量心血，其教育、教学的理念为我国现代音乐课程改革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文革”期间，曹试甘受到冲击和迫害，尽管如此，他还将珍藏多年的《九宫大成》等一些古书籍委托好友老志诚隐藏。“文革”后，曹试甘凭记忆抄写了多首谱写的歌曲，留下了诸多音乐遗产。

## 抗日英雄王氏姐妹

王剑同志是武清王庆坨村人，1939 年秋后从文安调到任邱县五区担任妇救会主任，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 年 7 月，冀中八地委派王剑回文新县任县妇救会主任。她到任不久，有一天在屋里炕上仰卧，两眼凝视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正在为如何与日军进行斗争、为妇女求解放而遐想，突然看到几只燕子在空中自由地飞翔，顿时想起要改名王空燕，意为要象燕子一样，唤起群众；要以燕子衔泥叨草筑窝的精冲，顽强地与日本侵略者做艰苦的斗争。王空燕个儿不高，身体不壮，但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她那修长的眉毛下，一双黑亮的大眼睛闪闪发亮。她多才多艺，特别是她那燕语莺声的歌喉非常动听。她唱的《纺棉花歌》委婉圆润，《三八妇女节》歌慷慨激昂，把不少中青年妇女引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王空燕同志意志坚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她体弱多病，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又使她得了肺病。但是，疾病并没吓倒她。她还是那样乐观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战斗着。虽然她从小生长在富裕家庭，但在当时文新县那种艰苦的生活和残酷的环境下，她没有丝毫退缩，更表现出她那高尚的品德和钢铁般的革命斗志。由于工作出色，成绩显著，王空燕同志多次受到分区领导的表彰，也得到领导的关怀。1942 年 8 月，领导发现她的病情严重，便命令她到分区医院治疗。王空燕同志无奈，只好住进了冀中抗日根据地饶阳县分区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两个月后，日军开始了对冀中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敌人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清剿的方式，到处烧杀抢掠。分区医院在饶阳大洼一个坟地里被敌人包围。在激战中，王空燕不幸被捕。敌人妄想把王空燕同志带回据点，但她象一棵劲松，丝毫不动。日军翻译官问她：“你是个女共党？”王空燕毫不含糊地说：“你说对了，我就是共产党员！”敌人又说：“跟我们到据点去，保你活命。”但她坚定地回答：“我死也不跟你们去。”敌人恼羞成怒，把她捆起来，并将绳子一头拴在马身上。敌人威胁说：“你去不去？”王空燕同志面不改色，昂起头说：“不去！就是不去！”凶残的敌人，狞笑一声，马蹄腾空，飞跑起来……就这样，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中华妇女的优秀干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王空燕同志，热血洒在了中华大地上。

王空燕姐姐王钊中学毕业后，日军侵占了她的家乡王庆坨。她放弃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裕生活，带领 18 岁的妹妹王剑，来到文安县投奔她的老师仇友文(当时仇任我抗日人民政府县长)参加抗日工作。她们象火种，走到哪里，哪里就燃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烈火。她们首先在文安城内女子师范学校开展工作。在她们宣传、发动和影响下，以学生杨海燕、贺慧芬(现名贺民)为首的一批女师有志青年，利用暑假之机，发动起全县抗日募捐活动。她们带着慰问品，步行 100 多里，到任邱县西大坞村慰问八路军，受到上级的表扬。她们还不顾校方的阻拦，带领十多名女师学生参加了八路军，当上了文艺宣传战士。

她们在文安完成开拓任务后，于 1939 年冬，先后调出文安，到更艰苦的地方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她们不怕流血牺牲，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她们也发挥了半边天的智慧和力量，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 从北大走出的两位武清籍大师

张中行，原名张璇，学名张璿，武清区河北屯镇石薄庄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是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羨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羨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张中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担任过《现代佛学》主编。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季羨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散文集成为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短短几年就奠定了他散文大家的地位，被季羨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代表作有《顺生论》，此书由很多短小的文章组成，内容深刻，文笔优雅，充满哲理。

张中行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是学贯文坛的大师。

周祖谟，字燕孙，原籍武清河西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6年毕业后，考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任助理员。1939年至1946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副教授。1947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0年起任教授直至1995年逝世。

周祖谟从事语言文字学的科研和教学近60年，精通音韵学、训诂学、古籍目录学和校勘学，学识渊博，著述严谨，功力至勤，共完成了21部专著(13部已刊)，320余篇论文。《问学集》收录从1934年至1962年所写的论文、札记、书评和序跋44篇，内容涉及音韵、文字、训诂三方面，论述精审，创获很多，多为传世精品，代表作有《诗经韵字表》、《审母古读考》、《禅母古读考》、《四声别义释例》、《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宋代汴洛语音考》、《陈澧切韵考辨误》、《论段氏说文解字注》、《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徐锴的说文学》等。与罗常培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是填补两汉语音史研究空白的上乘之作。1995年逝世后，生前整理的书稿《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于1996年出版，完成了生前遗志。《广韵校本》(附校勘记)是研读《广韵》的必备参考工具书。《唐五代韵书集存》集中编印了30种唐五代韵书的写本、刻本以及关于等韵学的写本资料，分别异同，辨章源流，详加考释，是唐五代韵书整理的集大成的著作。

周祖谟在古籍整理和校勘方面也卓有建树。1956年出版的《方言校笺》是研究扬雄《方言》的主要依据。其他代表作有《尔雅校笺》、《洛阳伽蓝记校释》、《论校勘古书的方法》、《古籍校勘述例》等。现代汉语的代表作有《汉语词汇讲话》、《普通话的正音问题》、《划分词类的标准》、《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等。

关于周祖谟，张中行先生在其《流年碎影》一书之“同学点滴”有如下记述：周祖谟，他字燕孙，1932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原籍是武清县河西务，我念通县师范时期由家乡往返必经之地，如果允许高攀，也可以算作小同乡吧。他专攻音韵学，七七事变以后，到辅仁大学去任教，得到余嘉锡先生的赏识，选为东床。解放以后回母校北大，在中文系任教。音韵方面著作不少，成为知名的学者。对于音韵，我一窍不通，但有那么一次，也借了他的光。是80年代中期，我为本

单位主编《文言常识》，其中“字音”一节，当然以用他之学之名为上策，我登他的中关园平房之门，他没有退路，也就写了。此外，他还有音韵学之外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校释》，在多种本本中后来居上，也与我以很大的方便。是 80 年代晚期，他由中关园迁至朗润园，与我成为近邻，我去看他一次。他健康情况不佳，说有力下楼（住二楼）而无力上楼，寂寞，希望我常去谈谈。其后，我因为杂务多，又听说他飞跃太平洋，到他女儿处去休养，就没有再去看他。而一晃就是三几年过去，我也经过一次迁居，离远了。是 1994 年末，听说他继马钰之后，也作了古。我有时想到过去，他那清瘦而微笑的样子，以及其学问的纯厚，心里感到凄凉。幸而他后继有人，是周士琦世兄，也治古典，多有著述，如果死后真能有知，他那一贯的微笑就可以带到泉下了吧。

## “私遗不入家”的田豫

三国时，渔阳雍奴(今天津武清)人田豫为并州(今山西太原)刺史。有一次，鲜卑族素利部落派了一个使节来见田豫，田豫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使节一落座，见四周侍从环立，说：“您能否让左右退下，我有话要说。”田豫一笑，示意侍从们回避。

这时，使节起身跪了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包，里边是黄澄澄、重达三十斤的黄金，双手献给田豫说：“我们首领看您十分清贫，所以送您一些牛马，但您却把它们交给了官府，想来是因为这些礼物太扎眼。今天秘密地送些黄金给您，可以作为您家中的财产。”

原来此前素利就曾遣人送来了大批牛马，本意就是送给田豫的礼物，感激他对部落的保护，可都被田豫缴入了国库，或是分给了下属。于是，素利便派出一名使节，让他单独求见田豫。

田豫听了使节的话，非常高兴，张开宽大的衣袖，把黄金全部揽了过来，说：“素利首领的好意，我拜纳了，请转达我深深的谢意！”

使节不辱使命，高兴地回去交差去了。他前脚一走，田豫便立即命人进来，将三十斤黄金登记造册，入库充公，并写了一道奏折送给魏文帝，详细说明了情况。

看过奏折，魏文帝十分感慨，下诏表彰他说：“春秋时期有个魏绛，为表示与戎族友好，光明正大地接受他们送来的礼物。现在你举袖接受鲜卑送来的黄金而交公，你这种做法，我十分赞赏。”同时赏赐给他五百匹绢。

田豫收到五百匹绢后，像往常一样，一半藏进公家的府库里，以备奖赏给立功的将士，另一半则派人送给了素利部落，答谢他们送来黄金的情意。

田豫一生战功卓著，历经9战，8胜1平，三次斩将，堪称大魏北疆第一将。但他为官“清敛约素”，“家常贫匮”，每次打了胜仗，朝廷给他的赏赐，他全都分发给属下将士。边疆胡人给他个人送来礼品，也都登记好收入官府，从不拿到家里。

田豫的高风亮节连边疆的少数民族都十分钦佩，可在同僚中却显得另类，为此没少遭到嫉妒。公元233年，公孙渊在辽东反叛，田豫奉命征讨，很快取得了胜利。事后，青州刺史程喜心里不平衡，他知道明帝喜欢珠宝，于是秘密上奏说：“田豫虽创立战功，但纪律松弛，俘获了很多兵器、珠宝，都散在众人之手而不上缴官府。”这让魏明帝大为生气，别人都得到了升官晋爵，唯独田豫没有得到任何表彰。有人为他鸣不平，田豫却非常淡然：“为国立功，为民建业，难道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吗？”

田豫在七十多岁退休，隐居于汝南郡魏县(今属河北邯郸)，因为从不营治家产，生活非常困窘。有一次，田豫曾经的部下健步诣奉命征北，他心中感念过去老领导对他的恩情，出发前特地到魏县去看望他。田豫非常高兴，亲自杀鸡做小米饭招待，临走时又送健步诣到田野上，说：“退休老人，你还辛苦地跑来看我，可惜我对你没什么好处啊！”健步诣亲眼见到田豫的清贫，分别时流下了眼泪。回去后，他向汝南太守说起了田豫的生活，汝南太守大为吃惊，立刻筹集了数千匹布，派人馈赠给田豫，田豫却一匹也不肯收下。

八十二岁时，田豫病重，他把妻子叫到床前，吩咐说：“我死后一定要将我埋葬在西门豹祠的旁边。”妻子有些为难，就问道：“西门豹是古代的神仙，怎么能葬在他的身边呢？”田豫哈哈一笑，底气十足地说：“西门豹所做的事与我差不

多，如果死者有灵，他肯定会善待于我。”

田豫死后，就如他所愿，葬在了西门豹祠的旁边。汝南太守和百姓得知消息，十分悲痛，为缅怀他，“既为画像，又为立碑铭”。皇帝也颁布诏书，赞扬他“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户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将他的事迹布告天下。

收受贿赂，是为官都最为隐蔽和相当忌讳的事，可田豫做起来却十分坦然，这是因为他内心光明，并没有半点阴暗和隐私。人生无愧，俯仰天地，难怪他在死时，敢与名闻千古的西门豹并列。

田豫一生清贫，节俭，廉洁。年老离职后，家中十分贫穷，“故吏民为具资数千匹，遗人饷豫，豫概不受。”从而以“私遗不入家”为后人所敬仰。

## “茅屋知县”祖应世

祖应世出生在清朝初期的宁远城(今兴城)中,他通过刻苦攻读进入国子监。

康熙十八年,武清发生了强烈地震,房屋坍塌十有八九,很多百姓因地震而亡。连续三年,武清天灾不断,史书记载“非涝即蝗”,饿殍遍野。康熙皇帝有意考验祖应世,命他赴武清为官。

一踏上武清的土地,祖应世看到沿途村镇因地震、水患造成的狼藉景象。到了县城里,又看到县衙修葺一新,室内陈设讲究。看到此景,他眉头紧锁,决定在衙门内的空地上建筑草屋栖身,与百姓同甘苦。茅草屋建成后,祖应世和家眷住进了里面,屋内十分简陋,屋外只有一棵兀然而立的古槐。

一天,祖应世外出视察归来,适逢风雨交加,他坐在茅屋内来了灵感,提笔草书“瘦槐轩”三字,并即兴吟诗一首:“官衙萧索午风平,计日茅檐已落成。灼灼新花初入圃,亭亭老树喜当楹。座开北牖清流榻,步到东窗绿满城。幸得连朝疏羽檄,月明忽动故园情。”吟罢,他挥毫书写“瘦槐轩”三个字,裱糊好后悬挂在草堂之内。

祖应世担任武清知县为政清廉,吏治严谨。当时武清连年灾荒,百业萧条,祖应世上书给康熙皇帝,减轻了武清县的赋税,归还了一些朝廷官员圈占百姓的田地。一些邻县的贫民流落到武清县,祖应世用自己的薪俸开设粥场,并劝僚友绅士各出米谷以相救,使“流移存活者不下数万人”。至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河运堤岸、兴办义学、修葺学宫等等,他无不亲躬。由于祖应世的苦心经营,武清县出现了“禾稼丰登,黔黎乐业”的年景。

祖应世秉性刚强,得罪了一些乡绅及恶势力。康熙二十五年,祖应世遭人陷害,被削职回乡。武清百姓奔走串联,还有人进京上访,希望朝廷收回成命。祖应世得知此事后,一面安顿境内民众情绪,一面派人星夜赶到京城,劝说上访人员返回家乡,平息了事态。

祖应世临走那天,武清县衙冷冷清清,他告别了茅草屋,离开了老槐树,踏上回乡的路程。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武清县城里的百姓这一天全城罢市,众多百姓长跪于路旁不起。祖应世和家人向百姓一步一招手,十步一作揖,泪水涟涟地别于县城东门。

祖应世被罢官后回到宁远安心著述,一晃就是四年。康熙二十九年夏,武清县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和蝗灾。时任直隶巡抚的著名廉吏于成龙到武清视察,一进县城南门便看到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有三位老者手捧万言书,跪倒在于成龙面前。于成龙下车扶起老者一问,原来是为祖应世鸣冤叫屈。百姓们说:“祖大人是好官,是清官啊!草民要求圣上明察,武清离不开祖大人……”于成龙答应了群众的请求,一边查实赈灾,一边暗访案情,终于弄清祖应世被诬告的真相。于是于成龙向皇帝“具书题请”,康熙帝深悔,下旨召回祖应世并官复原职。

祖应世到武清复任后,治理长达七载,百姓深受其益。百姓为感恩于他,修建了“祖公生祠”,勒石记颂,以歌厚德。康熙三十二年,祖应世和潘问奇合编《宋诗啜醪集》一书,收录了宋代诗歌多首,还对陆游等宋代诗人进行了评述,遗憾的是该书至今没有被发现。

康熙三十六年,祖应世接到调令,离武清出任大城知县。武清百姓纷纷挽留,又有人到京城呼吁,希望朝廷能重用清正廉明的祖应世。因祖应世政绩有口皆碑,康熙特下旨“升品级迁通州知州”。临赴任离武清那日,从武清县城到沙河,一路民众齐站路旁为他送行。

祖应世离开武清后，继任者为了不忘他的德政，将县衙内的三间茅草屋永久保留，直到乾隆年间编印的《武清县志》上，仍将茅草屋连同名号“瘦槐轩”印在县衙平面图上，祖应世为茅屋所作的《瘦槐轩记》却通过乾隆年间《武清县志》保留下来。时至今日，清官祖应世的故事仍在武清民间流传。

## 许铤上书开“海禁”

据清朝同治年间编纂的《即墨县志》记载，自即墨县衙建成以来，主政的县令有 260 余位。其后尽管有所增加，但数量不会太多。在大堂里面的墙上，悬挂有历代即墨县令更迭表和著名县令的简介。明朝万历六年（公元 1578 年）到此赴任的许铤就是其中一位。

许铤是河北武清人（今属天津市），进士出身，他只身一人到达即墨后，就忙着走村串巷，访贫问苦。那时的即墨，土地贫瘠，海口封闭，一片凋敝的景象。作为一县之主，许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么办呢？惟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挥地域优势，开海口，通商贸。这件事儿，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要冒着“杀头”的危险。

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几乎每一个皇帝都颁布过“海禁”令，定制就是“片板不许下海”，一再宣布“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当然，“海禁”并非始自明朝，宋元时期都曾实行，但从“海禁”政策的执行力度看，明朝无疑是最严厉而且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朝廷实行这种政策，对即墨地区的影响显而易见。

对于朝廷的政策，许铤显然是清楚的。但为了老百姓的生存，他还是在到任不久就向朝廷上了一份奏章。在这份奏章中，许铤提出，“本县系本省末邑，偏居一隅，与海为邻，既非车毂辐辏之地，绝无商贾往来之踪”。由于老百姓缺乏养家糊口的手段，每到征收赋税的时候，让人忧愁不已。历史上管仲改革造福齐国，原因是什么呢？“全在權利”，即贸易市场的获利。圣上若开恩，给“登莱赤子开一线生路”，就不能再实行海禁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嘉靖十八年，本县城阳社民牛稼者”，自己投资搞起了海运，在淮安觅船，航行两昼夜到达金家口通贸易。正赶上“是岁大饥”，“沿海居民赖以不死”，结果是不只是牛家暴富了，跟着他跑生意的人也都发了财。因此，“夫所谓海防者，本以防倭兼以防贼，非以防淮商也”。“夫防所不当防，禁之而未必能禁”，反而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束缚和阻碍。应当推行“垦荒田，招移流，筑堤岸，通商艘”的政策，“即万一遇饥荒，有此生路，亦不至坐毙，此无穷之利也”。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个地方官为地方着想、为百姓谋福祉的拳拳之心。

或许正是由于许铤的言辞恳切，打动了远在北京的圣上，朝廷终于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允许青岛口、金家口、女姑口等即墨境内的海口对外开展海上运输，货物直通苏、闽、浙一带，沿海贸易日趋繁荣。据在女姑口发现的《重整旧规碑文》记载：“我即邑（即墨）自前明许公（许铤）奏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既通，农商之利益普……”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青岛就已经渐渐不再是一个小渔村，而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贸易港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岛能有今天的发展，许铤功不可没。

## 闭关三疏的李钦

据乾隆七年《武清县志》记载，李钦（1476-1542年），字敬之，号心斋。武清人。李钦在做官的30年中，公正廉明，爱民如子，特别是对上乃至皇帝，敢于进谏，不怕杀头，其刚正无私大义凛然的气概，值得我们借鉴。李钦是武清人民的骄傲，李钦的刚直不阿，永远在人民群众中传颂。

公元1476年，即明宪宗七年，李钦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当时，李钦并不姓李，而姓张。是因其祖父入赘通州张家，李钦出生后称张钦。后李钦中进士做官后才恢复了李姓。

公元1512年，36岁的李钦考中进士，这是饱经二十几年寒窗之苦，终于金科及第了。李钦带着父母的嘱托走马上任了。李钦被授予御史，负责巡视长城各关口的防务情况，每到一处，他都告诫守关将士：北方有强敌，务必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深知长城关口的重要，不可轻敌和懈怠。

公元1518年，即明武宗朱厚熹正德十二年七月。武宗经不住谗臣江彬的怂恿，决定出居庸关去宣化一带游玩。传令官飞马通知李钦，令他准备开关门让皇帝出游。李钦接旨后，连夜修书，上疏武宗说：北方蒙古强敌，一直窥探我大明疆土，亡我之心不死，万岁还记得吗？英宗皇帝御驾亲征被俘的事，还有景泰年间兵临城下，于谦苦敌守北京的危机时刻吗？万岁出关是危险的，恭请收回成命，不可出关。

武宗被江彬撩拨得心痒难挠，出关心切。并不把李钦的上疏放在眼里。

八月，武宗换了便装，行至昌平时，让传令官飞报居庸关开关放行。李钦见上疏不行，直谏无效，就命令居庸关指挥孙玺把关门栓紧锁死，把钥匙藏起来，副指挥刘嵩与李钦商议，是否迎到昌平见驾。李钦说：就万岁出关这件事来说，是我和万岁生死之会。不开关违君命当斩我，放天子出关万一出了问题，我还是活不成。我选择的是不开关不放行，即使被处斩，将来万岁和百姓都会明白的。是日，武宗皇帝一行人马来到距居庸关十里处。

武宗传令孙玺见驾，孙玺给万岁捎话：李御史亲自坐镇守关，我不敢擅离左右。武宗又令副指挥刘嵩来见他，刘嵩也捎话说：李钦大人说了，长城各关口都由他管，任何人不得越权，并手执宝剑坐在关门前喝道：谁敢提开关二字斩立决！李钦连夜禀烛疾书，二次上疏申明利害，请皇帝不要草率行事。次日，李钦差人上疏，这时武宗派来的使者已到，使者对李钦说：万岁看了大人的二次上疏，令我来找你，你还是知趣点，快点开关，否则……李钦未等使者说完，拔出宝剑喝道：“这小子假传圣旨，想骗开关门，给我绑起来砍了！”使者吓得抱头鼠窜报之武宗。武宗大怒，令锦衣卫将李钦捕杀示众。这时，大臣曾梁储、蒋冕等从北京追到沙河，说李钦上疏是好意，满朝文武都劝万岁别出关，起驾回京师吧。武宗无奈，只好回北京去了。

又过了二十多天，武宗化装成百姓，只带几个内侍，悄悄地出了德胜门，一路上只住牛棚民舍，到了居庸关，万岁问刘嵩：御史李钦在吗？刘嵩说：李大人去白羊口巡视去了。万岁松了一口气，急令开关，武宗等一行人趁夜幕，急匆匆出关而去。李钦在白羊口得知万岁要出关的消息，急令人通知居庸关不得放行，并又三书进谏。当赶到居庸关时，方知武宗已于昨夜出关了。李钦双手高举谏书、跪地向西大哭，守关将士无不垂泪。当时京师盛传李御史闭关三疏，刚烈之气誉满京城。

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即位。47岁的李钦被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在这

期间，他仍负责长城一线的防务。他指挥边关将士，清剿了盘踞在胡店险山恶水中的土匪大盗，使边关一带的人民安居乐业；并将东起环县西到兰州的古长城修补加固，挖壕沟建城堡，进一步巩固北部边防。

嘉靖十七年（1539），李钦去四川巡视。为了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李钦改按人征收税粮为按地亩征收，这一改税深受贫苦农民欢迎。他还领导四川军民，修筑城堡，以御西北之敌，保障中国西北部的安宁；又修筑堤防治理水患，促进农业生产，天府之田人旺粮丰。四川人民为他立碑歌功颂德。李钦从四川回北京后，有人提议李钦官升工部侍郎。许久，未见皇帝准奏。在官场生活了三十年的李钦，看透了官场中的倾轧和尔虞我诈，更看到了居高官的险恶，深知高处不胜寒。李钦再次上疏皇帝，书中陈述了为官多年上对得起万岁栽培，下对得起黎民百姓，对事出以公心，对人以诚相待。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这些年为官对父母未报养育之恩，恳请万岁恩准，卸任还乡。

公元1542年即嘉靖二十年，李钦卸任还乡。由于长年的积劳成疾，同年病逝，享年66岁。

李钦为官时，经手的钱币粮秣无计其数，但家中却一贫如洗，儿孙们仍过着清贫寒素的生活。李钦唯一留给人们的是为官刚正清廉的品格，为人真善坦诚的德行。

## 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丁昌平

丁昌平，字圣里，号艾园，为山东琅琊人（即今山东临沂）。清雍正壬子（1732年）科举人，援例授直隶赵州高邑县知县。后调直隶顺天府武清县知县，题署赵州直隶州知州，以外忧（父亡）回籍。敕授文林郎。丁昌平为人忠厚善良，以爱为治。

丁昌平来到武清，正赶上武清发了大水，农民受灾严重，上官上报后，已分别发下赈灾款物给以救济。并发给种子，让农民再种晚秋作物，以弥补水灾之损失。谁知祸不单行，晚秋作物又被大水淹没，颗粒无收。丁昌平报上官，请求赈灾。上官觉得刚刚上奏朝廷，朝廷已经发来了赈灾物资，朝廷是会怪罪的，就没有上报，只让丁昌平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丁昌平根据武清遭灾无力自救的事实，又一次来到上官府邸，详细陈述武清水灾残状。说着说着，丁昌平不禁痛苦流涕，终于感动了上官，武清灾情得以上报。丁昌平也知此事非同小可，回到县衙，夜不能寐，便斋饭素服，在家待罪，人民却得以重生。

不久，丁昌平的父亲去世，他奉旨回家料理丧事，临行之日，武清人民都穿上白衣服，沿街相送，远远望去，皑皑一片，整个武清城好象是下了一场大雪。

据丁昌平于乾隆三十年为《琅琊丁氏家乘》而写的《重修世谱序》中称：“岁之辛未，余自武清宦归……”得知，丁昌平于辛未年（乾隆16年即1751年）在武清知县位上离任，就是说在知县吴翀之后在武清任职。据《武清县志》历任县官名表记载，知县吴翀于乾隆四年（即1739年）任武清知县，乾隆七年（即1742年）续修《武清县志》，在其后武清任知县的只有清乾隆三十五年（即1771年）的甄克允。从这一阶段武清知县任职时间分析，吴翀不可能在武清知县任上任职三十一年之久。可以在此证明，丁昌平在武清知县任职时间应在1742年至1751年之间，这一发现，填补了历任武清县官名表的空白。

## 为民请命的陈池养

陈池养(1788-1859)，字子龙，号春溟，晚年号莆阳逸叟，兴化府莆田县荔城人。进士出身，历任多处州县长官，清正为民，所到有声。

陈池养自幼聪颖，五岁入里塾受业，十一岁学为文，择本里名师课业。十三岁从师学《四书》，习诗赋。新任兴化知府考士，得第三名，遂送入兴安书院受业。十六岁时，学使岁考，正场名列郡学第三，复试第一，受到学官传谕奖励。

清嘉庆九年(1804)，十七岁的陈池养乡试中举，与郭尚先同行进京。翌年春闱落第，遂与郭尚先等五人结为文会，每五日到莆阳会馆课业，论说经史。自己亦常研习文字，颇有进益。

(1809)，嘉庆帝五十大寿，特开恩科。陈池养历经多年磨练之后，终于与邑人郭尚先、陈云章同榜登第，时年二十二岁。挚友郭尚先选为翰林庶吉士，陈池养因诗、字欠佳，未能进入翰苑读书深造。引见即授知县，分发直隶(今河北)统补，给假归莆筹措衣装。

清嘉庆十五年(1810)冬，陈池养到京都领取官凭，十六年赴直隶侯补。初补无极县(今属河北)，奉部驳未就任。武清知县孙成褒，怀疑高六毒杀韩贵兴命案审讯缺乏证据，按察司委派陈池养前往武清研判。经审讯认为无毒，禀请检验。陈池养回省后，补隆平县(今属河北)知县，“为政有盛名”。

不久，武清县亦宣布检验无毒。状主不服，再告京状。朝廷遣大臣核验，结论仍是无毒。不意，案交刑部复审时，却罗织罪名，逼供成有毒，并诬指知县孙成褒贪赃，陈池养亦受牵连，解职质证。孙知县终被落罪遣戍，陈池养亦被革职。池养心知孙知县是良吏，出城门时，以百金赠行。直隶各州县闻池养义行，争相欲与其交往。直隶总督温承惠亦知其屈，许诺奏留捐复，准其投效军营，在定州(今属河北)粮台支給兵米事务。不久，嘉庆帝谕旨中堂(宰相)：高六毒案有冤，遂奏准恢复陈池养原官。

查《大清历朝实录》刑部奏折称：刑部奏、讯拟高六毒毙韩贵兴一案。得上日、此案高六因图占韩贵兴家产、谋毒毙命。致令韩氏绝嗣。阴险已极。到案后复狡供卸罪。致韩贵兴尸骨惨遭蒸检。又于谋毒韩贵兴之时、将赵幅儿误行毒毙。惨伤二命。按律斩决。尚觉情浮于法。高六著即处斩。仍加梟首示众。张宽身充大兴县仵作。孙成褒因虑武清宁河二县仵作。不谙检骨。特调取前往。该犯听嘱得赃。不但不据实检验。竟将尸身割卸。用药物久煮。令毒痕脱落。骨殖残毁。以致承审各官被其欺蒙。俱罹罪辜。张宽一犯、险恶已极。不得以赃未满贯。稍从宽减。张宽著改为绞候。入于本年朝审情实。余依议。

皇帝上谕称：谕内阁、邹炳泰等奏、武清县民人姚翰清等一百余人公递呈词、为已革发遣知县孙成褒、捐资赎罪一摺。本日朕召见邹炳泰等、并据面奏、伊等于接收呈词后、传集该乡民等详细询问、佥称孙成褒、居官清正、爱民有素、兹闻其获罪远戍、不忍坐视、是以捐资代为赎罪、其情词出于至诚等语。孙成褒在武清县任内。克孚舆论。阅呈内牒举各事迹。该乡民同声爱戴。似无虚捏情事。但该革令犯事缘由。系因县民高六毒毙韩贵兴一案。初验本无错误。继因审无确供。详请覆检。致为仵作张宽及伊门丁书吏串通受贿朦蔽。该革令被欺枉听。部议褫革发遣。实系罪有应得。著邹炳泰等传到该乡民等明白晓谕、以伊等同心好义。感戴去任之官。其意亦属可嘉。惟孙成褒平素官声虽好。而断狱错误。则朝廷执法愆辜。不能宽宥。若竟徇所请。此后官员获罪者。或诡托效尤。其弊大亦不可不防。令该乡民等将代孙成褒赎罪银二千两、即行领回。勿许渎恳。至孙

成褒获罪遣戍。并无贪酷情弊 大。其详请覆检。亦尚有慎重民命之心。将来到戍三年期满。该管大臣奏请。朕核其案情。亦必降上 日释回。兹念其平日居官尚好。著加恩于到戍一年半。即予释放回籍。国法民情。并行不悖。该乡民等亦当共知感激。若再行妄诉。即当治以应得之罪。

又查光绪七年（1881）蔡寿臻监修的《武清县志》卷六“官师志”及1991年版本《武清县志》“历代政权”第三节“县官名表”，嘉庆六年由朱杰任武清知县，后嘉庆二十三年分由窦景燕、刘澐任武清知县，在如此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不可能由朱杰担任知县一职，显有遗漏。从上述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孙成褒在嘉庆十六年，窦景燕在嘉庆二十三年就在武清任知县，本着“前志疏漏，后志增补”的原则，应在新修志书中加以补充，以免给后人留下遗憾和不足，或可有益于后世。

## 津门药业膏胶露酒专家吴秀岩

据杨国萱先生《名列国药四大号的大仁堂和宏仁堂》载文，解放初期，按商业归口管理的中药企业，天津大约有 770 多家，其中号称国药四大号的，是隆顺榕、乐仁堂、大仁堂和宏仁堂。

大仁堂创办于 1914 年，资东姓张，河北省邢台人，老东家叫张循卿，少东家叫张采诗，张采诗解放初期是个年轻的教员。邱祝三、徐士斋、吴秀岩等在大仁堂担任过总经理。大仁堂有五个门市部，1914 年在芦庄子开业的大仁堂药店，是总店，1927 年在清和街、1930 年在东马路、1932 年在滨江道、1934 年在建国道开设的大仁堂药店均是芦庄子店的分店。大仁堂创办时仅有资金一万元，40 年后大仁堂资本超过百万，职工近百人，零售额占天津全行业的 10%，成为天津中药业名副其实的大户。

大仁堂一贯重视汤剂饮片和丸散膏丹零售，自己在清和街有加工厂，所制饮片和成药质量上乘。大仁堂的饮片加工精细，品种齐全，在一般药铺买不到的高档饮片，如檀香、苏木、豆蔻、龙涎香等，大仁堂从不断档。大仁堂的成药，如牛黄清心丸、舒肝丸、乌鸡白凤丸和百寿丹等，在天津有一定声誉。虎骨酒是大仁堂的大产品，大仁堂的虎骨酒能在天津市场与同仁堂、乐仁堂、达仁堂相抗衡，足见产品不赖。

说到大仁堂虎骨酒，就不能不提大仁堂总经理吴秀岩。吴秀岩是武清县人，出生于 1900 年，1914 年进大仁堂学徒，1944 年任大仁堂总经理。吴秀岩是津门药业膏胶露酒专家，他能熬膏药和膏滋(内服药膏)，会熬制虎骨胶、龟板胶、鹿角胶等各种药胶，做银花露是一把好手，做药酒更有所长。他做的虎骨酒、参茸酒，酒味醇厚，药力颇强。大仁堂的店堂还常有名医应诊，求医问药的人络绎不绝，光是店堂就给大仁堂招揽了不少生意。大仁堂在津门的崛起和发展，吴秀岩起了很大的作用。

## 武清的皇帝行宫

据史料记载，位于北运河畔的筐儿港曾建有行宫一座。清朝皇帝多次驻跸于此，留下许多御笔诗章。

筐儿港行宫在武清的龙河、运河交汇处。是顺治年间建的。行宫四周，碧水环绕，翠柳成荫。左侧为停靠“龙舟”的船坞，右侧是存放仪仗的“銮兴所”。行宫的围墙高耸，四面均设宫门，四角各设角楼。门前，白石铺地，直通“龙舟”停靠的地方，两旁垂柳围墙，相互揖让。主建筑坐北朝南，正殿巍峨雄伟，一色的黄琉璃瓦贯顶，五脊六兽、凌空翘首。殿前有宽敞的丹陛，白石为阶；阶下白石甬道通往四个宫门。正殿两侧，耳房各三间；东西两厢，陪房各九间、宫房各五间。两厢各设一便门：左门外，垒石为山、层峦叠翠；右门外，藤萝花架，盘根错节。行宫正门前阶下，有古槐一株，高十数丈，叶茂根深，郁郁葱葱，是乾隆曾祖父顺治帝于顺治八年（1651）省方问俗至此，亲手栽下的，当时已114载。行宫东南20米处修一别致的八角凉亭。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北运河筐儿港处决口。翌年二月，康熙帝玄烨南下阅河。四月，驻跸筐儿港，召见武清知县章曾印，准奏修河银三千两。于冲决处建减水坝20丈，开挖筐儿港引河以分水势，导流济运。挖坝基土堆于石坝两端，成土丘状。行宫建于石坝北部（在今十一孔闸北约160米处）。

康熙四十三年十月，玄烨帝巡北运河至武清，宿于筐儿港行宫。阅视石坝与新河，并题诗《看运河建坝处》：“十月风霜幸潞河，隔林疏叶尽寒柯。岸边土薄难容水，堤外沙沉易涨波。春末浅夫忙用力，秋深霖雨失时禾。往来踟蹰临渊叹，何惜分流建坝多。”康熙四十九年，玄烨帝亲书“导流济运”，刻石碑于筐儿港行宫东约100米处。

雍正六年（1728年），怡亲王奏筐儿港旧坝扩为60丈，展挖筐儿港引河，改筑长堤。翌年，于土门楼村北开始建滚水坝40丈，并辟青龙湾减河，夹以堤堰。自此，两条引河济运河，河涝缓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弘历帝下江南，宿于筐儿港行宫。次日起舟至夕，仍返行宫。乾隆三十七年，弘历帝再下江南，阅筐儿港，宿行宫，且谕将八里湾改直。二十九年，又将筐儿港石坝整修加筑。

乾隆三十二年（1767），弘历帝巡视天津，周览河堤淀闸，由北运河过境，题书“导流还济运”，刻碑立于行宫东南约80米处。三十五年二月，弘历帝阅视筐儿港，题五言诗《阅筐儿港工作》：减河制诚善，日久注为阨。前度命修筑，今来阅接成，港春流则断，涨夏杀其盈。原始宣防意，本因一策营。此诗刻于“导流还济运”碑阴，为行书字体。

1905年时，行宫、八角亭尚存完好。1925年，行宫被北运河河务局（时由直隶所辖）卖掉，八角亭被扒毁。

## 武清名僧黄和尚

名僧黄和尚俗名黄君维，武清大碱厂长屯人，生于清光绪年间，法号慧净。

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以致家贫如洗。虽于 16 岁结婚，生下一儿（名作斋）。但难以维持生活，于 22 岁在北京出家。

是僧，幼学壮行，博闻强记。出家后，苦读经典，并精于医道（儿科），深受长老器重。受戒三载有成，遂往天津宫北“白衣庵”（现古文化街娘娘宫附近）主持朝事。当时天津人对宫北“白衣庵”之黄和尚，大多知晓。

黄和尚 50 岁时，正是曹锟做大总统，杨以德为天津警察厅厅长，正是这位名僧煊赫时代。庵中有僧徒 20 多位，他有自己的包月车。

举凡，津市“八大家”及杨厅长等官僚，均为座上宾。何以如此？旧社会官僚和“八大家”，平日求顺祝福，多念喜佛，殡葬礼仪皆以黄和尚主持为荣故喜丧请其作佛事者，应接不暇。

黄和尚岁广交豪门巨户，但从不仗势欺人。且以精儿科普济众生，分文不取，深受市民敬仰。基于手中多金庵中禅堂斋戒器皿铜、锡、瓷多种，经卷盈阁，办佛用具十分考究，一种豪华肃穆之气充盈庵中。

那时，家里很穷，他的老伴儿托人向黄和尚要钱度日，每次黄和尚必先斥退众僧徒，待来人说明来意。黄和尚虽多金，但很吝啬，只是当听到家里很苦时，方开柜给以五元（当时可买两石玉米）。给钱之少，可能是身为出家人吧。

日常家乡亲友去津，进庵求医问药，均慷慨允诺，贫困者并助之以金。

黄和尚于 77 岁那年冬月一日，坐缸内溘然长逝。

## 天津小洋楼里的武清人

### 近代天津知名报馆

刘髯公(1895-1930)，字仲儒，直隶(今河北)武清(今属天津市)杨村七街人。回族。曾充当清新军士兵，法国驻华使馆文书，和天津法租界工部局侦探长。1924年与段松坡、薛月楼合作，创办《新天津报》，以平民化”、敢说话为标榜。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试行“评书上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三侠剑》等长篇评书小说，扩大报纸销路，行销远及东北、西北各地。此后还陆续发行了《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晓报》、《文艺报》(三日刊)、《新天津画报》(周刊)、《新人月刊》共六种报刊。并扩充报社，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1937年天津沦陷前，《新天津报》宣传抗日，甚为激烈，沦陷后，1937年8月3日在特三区被日寇逮捕，严刑拷打，后经天津各清真大寺阿訇联名具结保外就医，不久逝世。

刘髯公故居坐落在河北区建国道66号。建于民国时期，整座故居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意式建筑风格。大院总面积2330.16平方米，二层楼房共有24个房间。地下室和楼房结构一样，共有12个房间。还有一处后楼外出檐柱走廊，塔楼相连，华丽、气派。刘髯公故居曾经过了几次改造，但主体建筑的外貌基本没有遭到破坏，很多旧有材料被保存下来，至今还有些窗框和栏杆是当年的原件。刘髯公故居曾为近代天津知名报馆，该故居现由天津市木材公司使用。被列为天津市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这所故居现由天津市木材公司使用，建筑仍然保存完好。

### 端庄气派陈家宅

陈光远(1872-1939)，字秀峰，直隶武清(今属天津)崔黄口人。在天津租界的北洋寓公中，是首屈一指的百万富翁。他19岁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武卫右军队官、北洋常备军军政司总务处总办、步队统领、北洋第四镇第八协统领。1918年冯国璋代理总统后，他被任命为江西督军，与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合称长江三督，是直系军阀的重要骨干。1922年被免职，来天津作寓公。在天津，他通过亲家龚心湛在北洋企业中大量投资，购买了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公司、华新纱厂、耀华玻璃厂等企业的股票，约计100万元左右。1939年8月，陈光远病故于天津博罗斯道寓所(今和平区烟台道62号)。

陈光远寓所位于和平区大理道48号。是一所大门楼、高台阶、欧式现代风格建筑。黄色硫缸砖墙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二层凸出于三层，二层上有一大型露台，三层楼顶有一八角凉亭，建筑风格独出心裁，端庄气派中透着豪华壮观。

### 杜建时隐身桂林路

杜建时，字际平。1906年生于河北省武清县杨村(今属天津)，国民党陆军中将。平津战役中，向人民解放军自首。1961年获人民政府特赦。

1962年，杜建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同年，最高法院撤消1961年特赦通知书，认为根据杜当年情况，不应以“战

犯”对待。1989年11月7日在北京病逝。

今桂林路19号居民楼，解放前为桂林路45号，1954年曾改为23号。1949年的1月17日上午，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市长杜建时，就是从这座楼房的地下室走出，向我军自首。

这幢楼房的原主人为买办费品一。

1948年夏，随着我军解放进程加快，在华北进行战略决战已不可避免。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原来住在台湾路，他觉得靠近城郊结合部，一旦打起仗来很不安全，遂决定在市区找个住处。不久，梁子青将费家大楼的首层租了下来，并把全家都搬来居住。

1949年1月14日10时，我军解放天津的最后城市攻坚战打响。为躲避炮火，杜建时在梁子青的邀请下，躲到了桂林路45号(今19号)，即梁从费家租下的临时住所。据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陈德仁研究员调查考证，当时的情况大体如下：

1月14日拂晓，杜建时去了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顶层，持望远镜观察了我军总攻前的天津全城情况，然后回到市政府。10时许，我军总攻的炮火击中市政府大楼，将楼顶打了个大洞，顿时楼体震动，玻璃破碎。杜感到办公室和住所(时在烟台道47号)都不安全，就命人在市训团(今天津市第20中学)地下室备房。

当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召集杜建时等研究战况，商定放下武器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由杜建时承揽去办。杜马上邀民主人士李烛尘往杨亦周(天津市参议会议长)宅，要李、杨二人次日晨出城与我军和谈。杜在杨宅还起草了放下武器的《和平宣言》，从14日22时起在电台反复广播。可惜此举为时已晚，解放军已攻入核心区。

## 天津广武学会里的武清人

人们都知道武清李氏拳法传人遍及世界各地，但李氏拳法走入学校成为师生强身健体的传统项目却鲜为人知。

在张伯苓开创南开中学时，特别重视体育运动，发扬国粹武术，提倡尚武精神，强我民族。在学校除了具有完善的体育设施，优秀的体育教员，科学的体育课程外，还在1915年创办了广武学会，聘请良师，传授武术，为师生健体强身，提供了活动场所。

广武学会设在学校南楼的地下室，约一百平方米，面对南操场。室内摆设着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器和其他练功器械，另有一约十平方米的房间，供武术师傅住宿。

当时，南开始聘武林大师韩慕侠为武术教员。后来中华武士会李昭荫接替韩受聘于天津南开中学，在校创立“广武学会”。李昭荫是李氏拳法第三代传人，武清城关无梁庙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卒于1986年。自幼从叔父李进修习武，二十余岁时，随师叔蒋万和在南开学校共同主持“广武学会”的工作。除任教外，向师叔继续学习武功。

武术师傅蒋万和，武清县人，是神鹰怪杰“鼻子李”（名李瑞东，清末为皇家护院，官衔是“宫内带刀侍卫”，神鹰是西太后所赏封号）之徒，曾从事保镖行业，常走关东，颇有声望。

蒋师傅当时年约六十，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手腕四方，与肘一样粗，功底深厚，武艺高强。他教的拳术有少林五手、金刚八式、劈挂掌、二郎拳、形意拳、醉拳。器械有行者棍、单刀、双刀、子龙枪、虎头双钩、三、七节鞭。基本功有骑马蹲裆式、转柱子、打扔铁砂袋、带铁砂袋、吊腿、磕树等。

学会学员以学生为主，自愿参加，也有部分老师和校工加入。会员练功均在课余时间，分批教授锻炼，常至晚九、十点钟。所有会员经过习武演练，均感体强祛病，精力倍增，由此也出现了不少人才。如王文翰和高春田，均被航校录取，在抗日战争中驾机作战，为国立功。张亦谔成为天津足球队员，夺取过万国杯。炊事员吴连起、吴连第兄弟练就一身好本领，曾和日本武士比武，战而胜之，为中国人争了气。

1933年，“鼻子李”之子李伯英来津住在学会，也教会员武术，群以师叔呼之。他年约四十左右，身体较瘦。一天，蒋让高徒吴氏兄弟与李伯英分别比拳，只见他来回转动，迈步敏捷，身躯灵动，吴氏兄弟打不着他，反而累得满脸流汗，李伯英却气不喘，脸不红，笑嘻嘻若无其事。后吴连起与李伯英比棍，两人棍贴棍转了很久，不分胜负作罢。吴连起问蒋：“怎么我的棍被师叔的棍贴上就撒不出来呢？”蒋说：“师叔运用了气功。”

李伯英在广武学会教武，完全改变了蒋师傅的教法，让师生打、扔、捣鼓子袋和磕藤子（把十几根藤子捆在一起，少部分埋在地下当树用）跑砖和跑板子。夜晚，在南院四百米跑道的操场上，将砖横立，按步的距离摆成长列，要求在砖上跑一圈一块砖也不能倒。把长四丈半、宽一尺半多的板子搭在操场围墙上，跑到顶头，再转身跑下，来回数次。刚一跑是不容易跑到顶头的，不是胆小不敢跑，就是被弹下。李伯英对每人都是手把手教，讲提气运气之法，锻炼轻功，增强体质。至于拳术，专练一招一式和招法变化，讲招式名称和交手时注意站位和对方的眼神，这些练法完全是防身之术。

当年曾在“广武学会”习武的师生，很多都是身体强壮，这与南开倡导的

尚武精神是分不开的。

据当时的《益世报》载文：“现有南开学校学生姚尚通、新学书院学生杨震东等，鉴于中国孱弱之风，思以挽救，故特纠合同志组织广武学会，以研究吾国武术为宗旨，藉斯提倡尚武之精神，强健同胞之体魄，聘有武清李瑞东先生之高足蒋致中君教授太极、少林、形意各术。按蒋君肄习拳术二十余年，于各术无不精奥，洵可为近今技击界中之泰斗，广武学会成立已经二载，成效昭著，今为普及起见，在法租界新学书院附近设立分会，每日下午三点半开会。”云云。

## 赵佩茹在杨村吃忆苦饭

赵佩茹是天津市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十年动乱”的时候，进驻市曲艺团的工宣队说：“得对演员进行教育，吃忆苦饭。”可是这忆苦饭去哪儿吃呢？地点还不在于天津市区，在杨村。不能坐车，得背着背包走着去，像骆玉笙这样的女演员，也得走着去杨村。到了杨村之后，先安排下地插秧。

团里自己带了做饭的师傅，可是去哪儿找忆苦饭的原料呢？“造反派”指挥，到附近村子里去收麸子、谷子皮和荞麦皮。这些东西团都团不到一起，于是拿一个勺往笼屉上一甩一团，就开始蒸。蒸好了之后，每人两个，必须吃，说这叫忆苦思甜。

众所周知，荞麦皮是用来做枕头的，吃到肚子里根本就不能消化。当天中午，大家都把饭吃了，也没出什么情况。到了晚上，赵佩茹吃了一个，另一个实在吃不下去了，就偷偷搁在了口袋里，去厕所把忆苦饭扔里面了。

这当口被一个上厕所的人看见了，于是报告了工宣队。工宣队在全团通报，勒令赵佩茹写检查，并罚他吃一个礼拜的忆苦饭。这可要命啦！他每天就跟搓药丸一样，搓成一粒粒儿的拿水送。驻地部队里的领导实在看过不去了，跟工宣队说：“这可不行，你知道荞麦皮在肚子里不消化吗？时间长了，人非得吃出毛病来不可！”

结果工宣队说：“这么着吧，赵佩茹态度好，减三天！”

赵佩茹已经吃了三天忆苦饭了，这三天，他就没上厕所。得知提前三天结束吃忆苦饭时，赵佩茹心里这个高兴啊，赶紧往厕所跑。他从厕所出来以后，马三立就问他：“哟，佩茹，你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有！”赵佩茹说，“三天没解手，今儿解手，还真有收获！”

“有什么收获？”

“我拉出俩枕头来！”

大师就是大师，在那个随时都有可能挨整的年代，赵佩茹还没忘了“砸挂”。

## 新凤霞与武清名伶的交往

曾与武清籍戏曲名伶李银顺、贾学章、花莲舫、王度芳、刘翠霞同台配戏的新凤霞在其《新凤霞的回忆》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从艺期间同武清籍名伶的交往，读来别有一番回味：

记得一次在聚华戏院，李银顺主演《大蝴蝶杯》，我们四个小孩演家郎，李玉山演田玉川。演到“打家郎”这场戏，也叫“打萝卜头儿”，四个家郎走过场，田玉川一拳一个打下去，我又是第四个；因为我走得慢，李玉山一看生气了，怪我没有跟上，他一把把我抓起来，向下场门一扔，我趴在台上了，来了一个嘴啃泥，我忍着疼，赶快爬起来追上那三个人。

演《唐伯虎三笑点秋香》，这个戏当中丫鬟最多，春香、夏香、秋香、冬香、石榴我都演过，石榴只有一场戏。我记得石榴在拦路追求唐伯虎那场戏，我设计了几句唱，手提着一条木棍拦住唐伯虎唱：“今年我二十八岁了还没有找到如意郎，我像一团火，你似冰一样凉……”石榴是老夫人的大丫头，二十八岁。我那年十三岁演这么一个大丫头，手里提着一根棍子；扮演唐伯虎的是我师伯贾学章，评剧的名小生，那时他快五十岁了。由于我演得严肃认真，这个角色、这场戏成了这出戏的很受欢迎的重点场子了。……

我的第一个师傅就是小五珠；第二个师傅碧月珠，……我另外还拜了张福堂师傅。……我这三位正式的师傅虽然都是男演员，但都是评剧界的头牌名师。我还有一位女演员师傅，但跟她学戏不多，她艺名花莲舫。她有点怯口，嗓音好听，咬字清楚，越清楚越突出了她的怯口；越有怯口，观众反而越爱听，别有风味。

这几位都是名师，我也得过他们的真传。师傅们都喜欢我。三位男师傅都是正式拜师的；但花莲舫不是，是她喜欢我，自动提出要教我，我当然求之不得，又做了她的徒弟。

王度芳也是文明戏的演员，他也是很早改行唱评剧了，他也是天津人，是有名的“天津八大家”的后代，有文化，原来也是文明戏票友。

我跟王度芳演戏时间长，从一九四六年就在一起演过戏，解放后又在一起演戏，直到他一九五九年退休才分开。他的戏路子也是学朱侠影的，老生、三花脸、小生都演。《柏丽恨》、《赖有旦杀妻》都演得好。

值得一提的是新凤霞与刘翠霞的一段交往，那就是新凤霞为了学习刘翠霞的演唱风格，为刘扮演了一次狗形。

四十年代评剧在天津最红的演员刘翠霞号称“评剧大王”。她的嗓音清脆，以高调为基本唱腔。天津乡亲们说：“听了刘翠霞，胜似喝酽茶。”天津人喜欢喝酽茶，听了刘翠霞唱的戏比喝酽茶还美。

当年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花莲舫在天津演出，刘翠霞得数第一位。后来的天津评剧演员大都唱刘派高腔，至今刘派的高腔仍是天津的评剧特点。

我小时候头脑里有个印象：角儿的架子大。那是我十三岁，最羡慕评剧名演员刘翠霞了。想听听她调嗓子，我师傅张福堂是给她打鼓的，师大爷张恺是给她拉大弦的琴师。一天，师大爷告诉我，说刘翠霞要调调嗓子，我要求带我去听听，师傅和师大爷都答应了，我高兴地跟着师傅去了，师傅说：“角儿调嗓子，你听听，好学点东西，可得老老实实地听，角儿的脾气大呀！”

我心里有点害怕，师傅在前，我在后，一进屋看见刘翠霞，人很瘦，手里夹着烟卷儿，在抽烟；看见我跟着师傅进门，生气了。说：“怎么带一个孩子来？干嘛的？”师傅对她笑嘻嘻点头哈腰地说：“我的徒弟来听听您调嗓子。”刘翠霞

不紧不慢地说：“听调嗓子就在院里吧，干吗还进屋子呀！”师傅知道刘翠霞不高兴了，赶快说：“到院子里吧！”我就站在门外窗下听她调嗓子。她唱了一段《雪玉冰霜》的“写信”一段：“提毛竹心内酸长叹了一声……”她发音吐字很讲究，太好了！在台下看戏，是不会听得这么清楚的，真是高明。我从心里佩服她。

刘翠霞唱了一段，很不高兴地对我师傅说：“福堂啊，明天别带人来了，今天我嗓子没有调好。”师傅赶快说：“知道了，明天不带她来了。……”用手势指点我，叫我快走。我就先出大门，在门外等着师傅一起回去。

我听了刘翠霞调嗓后，更觉得还应该学到她的唱法和演唱气口就好了。但她已向师傅说了不许我去了，这怎么办呢？我要求师傅再替我想办法听她的唱。师傅烦了，生气地对我说：“你太讨厌了！”他又说：“你听刘角儿唱得好，要长本事，能在她的班唱戏，就能天天听！”

小孩子心实，我一心想在刘翠霞班里演戏，我跟师大爷张恺要求能够请刘翠霞给我指点一下才好。刘翠霞的戏班叫“山霞社”，在天津东马路国民大戏院。我每天去后台把着门帘偷看戏，但我不敢叫刘翠霞看见我，怕她不高兴了，又轰我出去。后台的叔叔大爷们认识我。有人帮我出个主意，叫我在后台唱一段给陈静波听听。陈静波是刘翠霞的男人，他又是班主。说是陈静波听了，觉得不错，就能进“山霞社”。

我师傅见着陈静波说：“财主，我的徒弟来了，让她调调嗓子您听听，要是有点出息，请刘角儿指点指点，在咱们班来个零碎活，叫她见见世面……”陈静波是个大个子，又胖长两只大得可怕的眼睛，说：“行啊！一会儿‘角儿’抽完烟，让她下来给听听，叫这孩子调一段。”我心里听着高兴极了。自己准备好了，等着刘角儿来指点。

刘翠霞果然抽完了烟来了，师傅叫我调一段，我站在师傅面前，师大爷拉大弦，师傅打着梆子，师傅叫我唱一段刘翠霞的拿手好戏《劝爱宝》，我心里有点害怕，但又想这一次要唱坏了，我什么都完了，要有“上阵不认爹”的精神，我就唱了一段；还好，也没有忘词，也没有丢板凉调。师傅问刘翠霞：“这孩子您听怎么样？”刘翠霞不作声，我又看着陈静波，他是财主，我心里在等着他的回答。我两眼直直地望着他，看他面带着高兴的样子。师傅又问：“陈三爷您看哪？”陈静波说话了：“我看这孩子有个好处，不怵阵，敢唱角儿的拿手戏《劝爱宝》就不错。”师傅又说：“请刘角儿给指点指点！”刘翠霞说：“再唱一遍。”我看见她脸上很不高兴的样子。

师傅很严厉地对我说：“来，再唱一段，唱《雪玉冰霜》吧。”我看见刘翠霞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实在提心吊胆，心想这回可不好唱啊！一张嘴：“提毛竹心内酸长叹了一声！”由于我用力过大，跑了调儿，师大爷立即把弦放在腿上了，师傅也停住了，我吓得站在那儿也傻了。陈静波说：“这孩子怎么了？刚才唱的不错呀！”刘翠霞冷冷地说：“这孩子没有多大的出息，吃不了蹦虾仁，虾仁蹦到嘴里也得蹦出来！”师傅对她说：“她是害怕，怵角儿，让她跟角儿演一场戏吧，叫她见见场面。”陈静波很好，说：“明天演《打狗劝夫》。”师傅说：“那好，让他演个小丫鬟吧！”我心里直发毛。因为我在白玉霜班演过一次丫鬟，惹得白玉霜生气，把我轰出来了，不许我再去找他们班。这次又要遭白眼。刘翠霞不紧不慢地说话了：“演个丫鬟干吗？演个‘狗形’。”师傅赶快点头：“可以……”就这样，我在第二天果然穿上狗形演了一出《打狗劝夫》当中的狗，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在台上听见刘翠霞的演唱。虽是演个狗形，也学到了东西！我也很知足满意，总算在刘翠霞的戏班演了戏。

## 书画家赵元礼原籍为武清辨考

赵元礼，(1868--1939)字幼梅，号“藏斋”，近代诗人，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曾任直隶河北高等工业学堂监督，1921年与严范孙、金息侯、王守恂等人组织“城南诗社”，以“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享誉津门。李叔同曾从其学，著有《藏斋集》《藏斋诗话》等。

1935年2月，赵元礼为《蒙斋文存》第五集撰《序》云：“族弟生甫，性笃挚，博极群书，以治古文名于时，为桐城陈剑潭、新城王晋卿及吾邑徐弢斋(世昌)所甄赏……惜其中寿以疽发背死。家贫子幼，环堵萧然。”

那么他这个“族弟生甫”又是谁？

1929年，马仲莹缮稿之《城南诗社小传·赵芾传》载：“赵芾字生甫，天津人，原籍武清，清给谏赵之符裔也。诸生。公府秘书。著有《蒙斋文集诗集》。”赵芾曾为《李氏家谱》作序云“余先代亦自江南迁居津之上仓”。

据康熙乾隆七年吴翊重修《武清县志》载：赵之符字尔合，号怡斋，原籍江南会州卫，以军功北徙，居武清之北仓。清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官至左佾都御史。

现天津市北辰区北仓明清隶顺天府武清县，雍正九年(1731)改隶天津县，所以说他的原籍为武清实为情理之中。

## 旧天津窑主李万有

北京有八大胡同，上海有四马路，而在天津则有南市，南市是天津最有名的妓院聚集地。天津妓院最早开设在侯家后一带，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天津后，就转移到了南市。据1911年统计，全市一二等妓院有106户。其中，南市境内就占67户。聚华后、升平后、丹桂后是妓院的密集地。据旧天津×××解放前夕最后一次统计，全市共有妓院653户，分布在南市境内的就占40%多。南市的妓女有3000~4000人。游妓和暗娼尚未统计在内。李万有就是南市中最有名的窑主之一。李万有出生在武清县一个庄子里，从小就不学长。长到18岁时，已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离开家到天津闯世界，在老铁桥做工，经过几年辛苦的劳作赚了一些钱后，便与人一起做起了贩驴的生意。一赚到钱，他就吃喝嫖赌。一次，他遇上了爱卿堂的妓女金玉，便迷上了她，整日往那销魂窟里钻，不久赚下来的几个钱让他连赌带嫖地挥霍光了。当他再次逛妓院找金玉时，妓院的掌班对他变了脸色，轰他出门。他一怒之下，大闹妓院，被人揍了一顿后，送进衙门，被判三个月苦刑，当众把他的小辫剪掉。出狱后，头发还没长出来，于是人们就送给了他一个外号叫“马子盖李三”。马子盖李三出狱后，找不着事干，又没有钱，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一天，他看到东门城墙上贴着一张告示，还有不少人围观，便上前打听。原来是清×××要招一批劳工去南非开金矿，工钱给得也多。他心一横，便报了名，远赴南部非洲。谁知，到了那儿却发现，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工钱也不多。干了一段时间后，便想出一个赚钱的主意：开赌局。每天下工后，他就坐庄开盘。谁不赌也不行，不赌的，他就寻机揍人，这样一来，他便成了劳工里的一霸。在南部非洲干了整整四年，他通过赌局，赚了几百块大洋。一回国，他便直奔爱卿堂找他的旧相好金玉，可是金玉已不在那里了。他不甘心，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家妓院里找到了金玉。李万有与金玉厮混了一段时间后，便把金玉赎了出来，决定合伙开妓院。1915年，李万有在南市西水套子租房开了一家妓院，名曰魁卿堂。开始由金玉接客，以后又花钱从外地买来三个姑娘。随着生意的红火，两年后，李万有让金玉另立炉灶，在聚华后租房，开了第二个妓院，叫做金玉堂，金玉做了掌柜。随着李万有财富的不断增长，他的妓院规模也越来越大。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先后开设了魁卿堂、金玉堂、金华堂、小香班、三元堂、新立堂等七家妓院。各妓院的妓女大多是他从外地买来的良家妇女，还有一部分租来的和搭住的。所有的妓女在接客之前，都得陪他先睡一晚。年纪太小的，先让她们跑茶客。到十五六岁时，便由他亲自给她们破身。

1927年，李万有拜梁嘴养船的林树和为师，加入安青帮。在群英后成立青帮公所，他当了帮头。公所发展很快，收了100多个徒弟。市里的徒弟平时都在各妓院干事。有当掌班的，有管财的，有的充当保镖和打手。他的势力越来越大，渐渐地成为天津卫的“名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天津。李万有的妓院就开始向日本人献媚了。不久，便当上了天津乐户公会总会长，为日本人卖命。

1944年，日本宪兵队派人找到李万有，说日本兵在各地打仗很辛苦，让乐户公会组织慰问，言下之意就是让李万有组织妓女到日本兵营。于是他分别向各区分会布置，让他们报上参加慰问的妓女名单，可是，各分会都没报上名单，一个妓女也不愿意去，日本宪兵队又每天派人来催。李万有情急之下，想起了警察局保安科科长张相纲，希望他能帮他解决此事。张相纲于是强制集中了30多名妓女，分别送往驻在天津东站、山东、河南等地的日本兵营。这次替日本人卖命使他担惊受怕了许多日子，深感这乐户公会会长一职凶险，便托病辞去了此职。

回到群英后当伪甲长去了。在当伪甲长期间，他仍然为日本人卖命，组织各家妓院向日本人献铜、献铁、献饰品，供给日本人制造军火。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有继续经营他的妓院，直到天津解放。

在长达几十年的经营妓院生涯里，李万有可以说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在开设妓院初期，李万有为了能站稳脚跟，对妓女表面上还是挺好的，对她们甜言蜜语，不打不骂。可是不久，他便露出了他凶残的本性。对妓女实行残酷的管理，以便从她们身上榨出更多的钱来。

李小香，原籍山东，家乡因闹水灾，随爹爹一起外出乞讨，走到天津时，她爹爹连病带饿死在路旁。年仅10岁的她在爹爹的尸体旁哭天喊地，昏死过去。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屋里，屋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笑眯眯地看着她。原来这个人是一个人贩子。不知人世险恶的小香被此人带到了天津南市李万有的家中，卖给了李万有。小香进了李万有的家后，做了李万有的丫环，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侍候李万有，为他端屎端尿，挑水做饭，什么活都干。稍有差错，便会遭来李万有的殴打。一天晚上，小香给李万有捶腿，李万有嫌她捶得重了一点，便一脚踹向小香，吓得她跪在地下连连求饶。李万有恶气难消，恨恨地说道：“今晚我没工夫打你，你就这么跪着不许动，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可怜的小香就这样在地上一直跪到天亮。

五年之后，李小香长大了，女大十八变，她也越来越显得漂亮了。李万有看到小香的变化，心中不禁窃喜，感到这么多年来“投资”算是没有白费，现在到了领取红利的时候。一天晚上，李万有糟蹋了小香。半年后，小香开始正式接客。又过了两年，李万有买来几个姑娘，开设了小香班，名义上让小香做领班，但小香还得接客，大小事务实际上由李万有操纵。小香班大多都是年轻的姑娘，开业后，每天晚上嫖客们蜂拥而至，妓女们一天至少要接七八个客人，小香也不例外。由于接客过多，小香染上了淋病，疼痛难忍。李万有不仅不让医治，还逼着她带病接客。最后，小香病倒在床上，奄奄一息。李万有怕小香死在家里不吉利，便叫来两个伙计，暗授机宜。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个伙计把仅剩一口气的小香抬上了一辆板车，拉向城外，在路上小香便咽了气。那两个伙计把小香的尸体抛在东郊野外。为了防止妓女外逃，李万有在每个妓院里都安置了他的青帮徒弟充当打手。妓女们进了妓院就像进了牢狱一般，是很难逃出去的。

小桥是李万有用200元从乡下买来的，刚刚16岁，正处妙龄，长得楚楚动人。李万有便把她据为己有，供自己享乐，百般蹂躏。小桥不堪其辱，便伺机逃跑。一日，她乘上街买菜之机逃走，李万有得知后，马上派出手下人马四处搜寻，最后从武清县把小桥抓了回来。李万有为了杀鸡吓猴，便叫来各妓院的领班和部分妓女，命令打手当众把小桥的双手反剪起来，又用绳子扎死她的裤管，然后弄来一只猫，塞进她的裤裆里，同时命令打手狠狠地抽打她。两个打手每人手持一条皮鞭轮番抽打，打得小桥在地上来回滚爬，那猫也在她裤裆里面乱抓乱咬，不一会儿，小桥便昏死过去。等打手们把那猫放出来时，只见小桥身上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下身也被猫抓得鲜血淋漓。小桥在床上整整躺了十几天才能下地。刚有好转，李万有就让她正式接客。

李万有不仅对妓院的妓女心狠手辣，丧尽天良，对自己寡居的儿媳妇也不放过，干出灭绝人性的乱伦之举。

小红本是李万有的儿子李兆庆的媳妇，结婚后不久，李兆庆就因吸毒过多而死，留下了小红和一个早产的孩子。一天晚上，李万有乘小红睡觉之时强奸了她。不到一个月，又被李万有送到妓院去接客。李万有是一个老天津，他深知自己若

要在这天津卫长期立足，没有一个好的靠山是不行的，他除了投靠日本人和伪警察局外，还结交了臭名昭著的大土匪、大汉奸、敌伪津海道“剿匪”司令柳小五。柳小五也是一个好色之徒，为了讨好柳小五，李万有为他在日本租界建了一座柳公馆，并把妓女莲花送给她。柳小五有一个怪癖，专爱糟蹋小脚女人。李万有得知后，便命令其手下四处搜寻缠足的姑娘。最后在河北某县找到一个农户家的女儿，名叫红梅。为了得到红梅，李万有设下一条奸计。红梅的父母正在忙着找婆家，李万有于是派人给媒婆送去钱和布料，让她对红梅父母亲讲，天津一布衣掌柜膝下只有一子，为人忠厚老实，生意兴隆，家境颇为盈实，与红梅正好匹配。红梅父母信以为真，便把女儿嫁了过去。红梅被接到天津后，立刻被送到李万有处，李万有派人专门看管，给红梅买来绫罗绸缎，并派裁缝为她量体裁衣，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同时又在英租界购置了一座新公馆。柳小五一回到天津，便把红梅接到公馆，急不可耐地要寻欢，红梅此时才知上了当，死也不从。然而终因力不从心，被柳小五强奸了，从此红梅被囚禁在这深宅大院之中，成为柳小五的玩物，没过多久，红梅便因精神抑郁染上了肺病，饮恨而亡。

天津的解放无疑敲响了李万有们的丧钟，但是他们还是心存幻想，认为：“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没有取消过妓院。虽然共产党坐了天下，可能不能坐得长还是回事呢。就算坐得长了，共产党也是人，离不开咱们这行当。不管什么时候，妓女永远是妓女，离开妓院就别想活。”李万有一方面表示要主动交待，服罪认罪，企图掩盖其累累罪行，可以从轻发落；另一方面，李万有威胁自己手下的女，不准她们揭露他的罪行。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们不辞辛劳，深入到妓女中间，做思想发动工作，宣讲党的政策，为她们消除思想顾虑，大胆揭发李万有的罪行。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法院很快就掌握了李万有的种种劣迹和罪行。

1951年7月10日，李万有被押上了审判台，天津市人民法院向他宣读了判决书：

####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书

1951年7月8日，军地五刑字第2653号

被告：李万有，男，74岁，武清人，住南市聚华后荣吉巷13号

被告因恶霸一案由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检送来审理判决：

主文：

被告李万有因恶霸罪处死刑。

事实及理由：

被告李万有自幼即为恶霸流氓，近三十余年开设妓院多处，且为本市乐户公会会长，参加特务组织“忠义普济社”，充任第七分社监事，又参加“清理教”及封建组织“青帮”，广收徒众达百余名之多，其势力扩张至杨村、蔡村等

地区。清光绪年间，被告因报私仇曾大闹爱卿堂(妓院)，被清中堂衙门判刑，故而剪去发辫，成为无赖，名声远扬，被呼为“马盖子李三”。后被告赴南非洲做工，仍设置赌局，诓骗工人辛劳所得工资现洋 200 元，更在矿场蛮横无道，打架聚赌，欺压工人。1915 年被告霸占薛永泰所设妓院，并强占妓女郑金玉等开设妓院始，先后开有魁卿堂、金玉堂、金华堂、三元堂、小香班、新立堂等妓院七处。拐卖良家妇女，先施强奸，再逼令充当妓女。先后遭难妇女计有小香、双喜等数 10 人。被告对遭其毒害之妓女则尽情剥削，经常打骂，不给饱饭吃。被告利用剥削压榨所得，在老家购置土地一顷余，房屋 20 余间，兼充地主剥削农民。在日伪统治时期，被告利用伪甲长及乐户公会会长身份，向各处及其所掌握的 12 家妓院搜要铜铁资敌求功，向各妓院强要妓女 30 多名，献交日寇兽兵奸淫糟蹋。此外更代其党羽、汉奸、津海道“剿匪”司令柳小五与日寇联系，认贼作父。庭讯时，被告对上述各节均供认不讳。

查本案被告一生所作，均为欺压敲诈及为害人民之暴行，广设妓院，极尽压榨蹂躏妇女之能事，搜献铜铁资敌，为民族仇敌及汉奸部队效忠，背叛祖国以求荣，且参加反动组织，招收党羽徒众 100 余人，维护其封建势力，横行不法，欺压人民。核其所为，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应判处死刑。

基上结论，判决如主文。

1951 年 7 月 8 日

天津市人民法院院长兼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

王笑一

天津市人民法院审判员邵牧岗

## 一庙压三县

在武清区河北屯境内，不少人都知道一庙压三县的历史故事。

在今天的河北屯镇东部有三个比较小的村子，分别是前韩口、王马街和刘家街。当年，前韩口村属于武清县管辖，而王马街和刘家街分别属于香河县和宝坻县管辖。由于三个村子较小，经济条件又不好，故三个村的村民商议在三个村的中间地带共同建一座土地庙，以供奉土地神。土地庙建成后成为三县内三个村的共同祭祀之处，所以被人们称之为“一庙压三县”。

土地庙，又称福德庙、伯公庙，为民间供奉“土地神”的地方，多于民间自发建立的小型建筑，属于分布最广的祭祀建筑，乡村各地均有分布。在解放前，凡有汉族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地方——土地庙。

王马街于1958年划归武清，刘家街于何年划归武清未曾考证。

让人更感到惊奇的是该镇肖赶庄老李家，是过去香河与武清分界线。炕头属香河，炕梢子属武清。李家先人常对家人讲，一会儿到武清赶集，一会儿回香河吃饭，家人感到惊讶，原来他只不过是从炕头到炕梢子，又从炕梢子到炕头，没出几步便跨越两县，在当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据河北屯石闻璞先生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小庙尚存，大概毁于“文革”期间，具体该庙建于何年，现已无从考证，但小庙给人们留下了往日乡民的辛酸历史。

## 义和团在武清抗击八国联军纪实

一九〇〇年五月间，义和团接连把清军打得丢盔弃甲，节节败退。帝国主义列强眼见清政府不中用了。美、俄、日、英、德、法、意、奥八国就勾结起来，组成八国联军，直接出面镇压义和团了。

那个时候，一批一批的义和团从山东、冀中奔向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驻京的各国公使急忙发电给天津的各国领事，命令增兵前往北京“援救”。于是各国领事与侵略军头目商定，从大沽和天津拼凑二千一百名联军，由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打着“保护使馆”的旗号，于六月十日，沿京山铁路向北京进犯，妄图消灭北京的义和团。

六月十二日，西摩尔侵略军到达落垡。武清、安次的义和团闻讯赶来进行阻击。当时，一队侵略军正在落垡车站五、六里地的地方修复铁路，义和团的英雄们就从铁路南侧呐喊着冲杀过来，侵略军还没有来得及摆好阵势，义和团的勇士们就已经冲到跟前，展开了白刃战。有一个腰束红带的年轻战士打在最前头，当他奋勇夺取一个美军头目的指挥旗时，不幸被侵略军击中数枪，当场牺牲。义和团的战士们，眼看着战友中弹牺牲，个个义愤填膺，决心要为英勇牺牲的战友报仇，更加勇敢地向敌人冲杀，杀伤了好些鬼子兵。洋鬼子招架不住，就丧魂落魄地向落垡车站逃跑。这时，义和团的其它队伍越来越多，他们同心协力，一个劲地向车站打去。但是，侵略军蹲在车站内、车厢里，用枪炮还击。义和团的战士们便和正在扒铁路的乡亲们商量怎么个打法。这时，一位老人说：“用刀去砍，不行。我看用大抬杆（一种老式土炮）准行！”众人一听高兴得跳起来，都说：“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到哪里去弄大抬杆呢？这位老人不慌不忙地说：“南边有几个村子，村里有好几户地主，他们都有看家护院的大抬杆。这家伙可凶啦，和洋枪差不离。把它弄来，火车也好，洋兵也好，管叫它完蛋！”义和团立即派人强迫那几户地主交出了七条大抬杆。大家动手，很快就把碎铁片、铁珠子和火药装满了大抬杆。正好天也黑了，马上用这七条大抬杆接连不断地向着车站和火车“轰轰”地打开了，把个落垡车站打得烟雾冲天，黑烟弥漫。这时，义和团的勇士们高举大刀长矛，冲入车站，登上火车，见到鬼子就猛砍猛刺，打得鬼子兵狼嚎鬼叫，连滚带爬。这一仗打死打伤不少敌人。

从天津乘火车去北京，本来只要三、四个小时，但西摩尔联军在义和团不断阻击下，走了四天，才走了一百三十里地，挣扎到了廊坊。就在西摩尔联军到达廊坊的十四日晚上，三百多团民包围了廊坊车站，当即刺死意大利侵略军五个，杀伤无数。这个时候，从廊坊去北京的铁路、桥梁已经被义和团完全破坏，火车根本走不了。西摩尔被困在廊坊，粮草将尽，弹药也得不到补充，就派出一列火车，开回天津，搬运粮食和弹药。他们哪里知道，这时候杨村东南的铁路也已经被义和团彻底破坏。这列火车开到杨村，再也不能向前去了。

西摩尔侵略军被阻在廊坊，欲进不能，后援无望，便决定退回杨村，企图从北运河乘船去北京。六月十八日，正当侵略军滚出廊坊时，义和团二千多人发动了猛烈攻击。义和团的战士个个像下山的猛虎，手举大刀长矛，直冲敌阵。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鏖战，杀死强盗五十多个。这时，西摩尔见势不妙，忙率残兵败将逃奔杨村车站。

就在当天晚上，义和团又机智神速地包围了杨村车站，再一次向敌人发动袭击。那一天，正是阴历的五月二十二，深夜以后，借着微明月光，义和团一个个紧握着锋利的大刀，悄悄地穿过密密层层的高粱地，向着车站急急走去。当他们

走到高粱地的尽头，从高粱枝叶的隙缝中望去，只见车站上敌人的营房里灯火寥落，鬼子们已经入睡。车站外边只有一个哨兵，无精打采地溜达着。这时候，一个义和团战士身子伏在地上，从高粱丛中出来，慢慢匍匐前进。当他逼近敌人哨兵身后的时候，猛地一跃而起，手起刀落，把哨兵宰了。高粱地里的战士们就一齐钻出来，冲进车站敌人的帐篷中去。敌人正在睡梦中还没有明白过来，义和团战士们就像削瓜切菜一样，杀死杀伤不少鬼子兵，等到其他营房里的侵略军赶来时，义和团战士们已经安全撤退了。“义和团，猛如虎。看见鬼子兵，就像猫见鼠。叫他脑袋搬了家，一刀一个如宰猪。”这就是当时人民对英雄的义和团战士的赞歌。

一连串的袭击，使敌人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就在夜袭杨村的下半夜，侵略军误传义和团又来了，吓破了胆的洋鬼子，拼命地互相乱打起来了。这一场“误会”沙俄军十五个被打死打伤。

联军只好在西摩尔的带领下沿北运河，向天津逃命。

## 民国年间传奇的皮鞋油销售商——王树常

20世纪 30年代初，华东皮鞋油的销售，以欲擒故纵的韬略，在极短的周期内打开了销路，震惊了北平商界。华东皮鞋油在“三北”地区行销了 20 余年。

华东皮鞋油在北平打开销路的过程，说起来确实有些传奇色彩。

上海有一位搞化学的学者，很有经济眼光，他预测中国人穿皮鞋的热潮不久就要到来，鞋油的需要量定会空前提高。他根据市场需求，研制了一种黑皮鞋油，投入市场。他身居上海，以地域名称为产品取名为华东牌。华东牌皮鞋油品质优良，光泽度高，用于皮革表面后，尘土落上，轻轻一抹，光泽如初，且能滋润皮面，保持皮面的柔韧。

华东皮鞋油在上海起步已打开销路，势头非常看好，厂家拟在几个大城市寻求有声望的批发商合作，开拓华北地区市场。当时北平有几家较大的批发商，颇有名声，但由于经营思想滞后，他们认为推销新产品，前期投入太大，收效较迟，不敢担此风险。

售品所北平批发部的经营者，却预见到鞋油的需求量肯定会上升，如不抓住时机，则稍纵即逝，便以大胆的开拓精神，承担了颇具风险的华东皮鞋油华北地区的总包销业务。

东晓市当时是北平最大的百货市场，专营百货批发业务，也是百货商情的集聚点。那里有一位“跑合”的，名叫王树常，武清王庆坨人。王树常干的营生如同今天的“中介”。华东皮鞋油的消息，就是他传到东晓市的。在早市上人们围着他，打听华东皮鞋油的事。可他从来不当着众人传行情，有人问他就是一笑了之，可对另外一些人，则是叫到庙门的墙根咬耳朵，说完之后还嘱咐一句：“现钱取货啊！”

那时批发部跑外的推销出去的货，一般的都要四五天之后才能把款收回来。这次可不然，凡是到批发部买华东皮鞋油的，一律交现金提货。一时各零售商纷纷用现款提华东皮鞋油，以应门市的急需。

这场华东皮鞋油销售的始末，是采取了欲擒故纵、先付出后取得的策略。售品所用厂家发出的宣传货，赚了一大笔现金，虽不是空手套白狼，也很可观了。于是，电告厂家大批发货，就这样，在预期之内，为华东皮鞋油在北平得以畅销打开了市场。而后，售品所又与厂方协商，签订了包销“三北”地区华东皮鞋油的协作合同。先后在东北、西北几个大城市，推销方式照方抓药，同样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华东皮鞋油在北平一直畅销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后来，天津、北平、两广等地生产的皮鞋油陆续上市，那已是华东皮鞋油走向市场 20 年后的事了。

**参考书目：**

《津门谈古》  
《天津文史丛刊》  
《旧天津的新生》  
《天津老教堂》  
《天津运河故事》  
《津沽漫记》  
《津门艳迹》  
《津门考古》  
《津门诗钞》  
《抗日烽火在天津》  
《新凤霞回忆录》  
《情史》  
《老残游记》  
《醉茶志怪》  
《阅微草堂笔记》  
《孽海花》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施公案》  
《恨海》  
《醒世恒言》  
《华勇营出军志》  
《永庆升平》  
《蜚阶外史》  
《乾隆英使觐见记》等

## 后 记

网罗散佚，拾遗记微，期作正史之补，兼充精神文明之助，是本书编写的宗旨。

内容以文史为主；时限以史书记载建治年限为主；文体以白话为主；史料以邑域志书未刊者为主；题材以介绍武清轶闻野史为主；稿源以新发现为主。这六个为主，是本书组稿的方针。

必有可征，必有可读与必有可鉴，是本书审选稿件的标准。

喜爱文史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给我们上历史课的周福生老师，既是校长，又是满腹经纶的历史老师。他在给我们上历史课时，不是死读书本，照本宣科，而是变成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比如讲到春秋战国时，他就把一些成语故事讲给我们听。讲到三国时，就把一些诸如三顾茅庐、草船借箭、失空斩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丰富了课堂内容，也使学生们牢牢记住了历史，可谓用心之良苦。从那时起，学习历史便占据了 my 脑际。后来我工作后，也时常订一些书报刊，主要是文史和文学方面的。再后来，逐渐加入到收藏史书、搜集武清历史的队伍中来，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史爱好者，可以说，周老师对我的启蒙和教益已深深植根于我的心灵深处，对于我后来在文史方面的小有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加入区作协以后，也得到了我区已故文史专家马悦龄先生的悉心指导，得到了文史专家王毅先生的热情帮助，也结识了冯品清、吴冀良、陈景山、张振发、杜宝江、孙德恕、孙福山、杨振关等老师，还结识了今晚集团副刊吕金才、王振良等文史专家，他们对我后来在文史方面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更得到了高元勃、李蔚兰、李克山等老师的提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参与了《武清县志》《政协武清文史资料》《武清人物》等书籍的编辑整理工作，还自费出版了《儿时梦影》《英才风采》《梨园名伶武清人》，在一定范围内反响不小，我也因此获得全国首届书香之家的称号，被市作家协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这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深知，我的学识，我的阅历，我的水平与荣誉还有很大的差距，深入系统地研究地方史，无论是知识水平，专业能力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向书本学，向先辈学，向实践学，不断丰富自己，才对得起诸位先生对我的期望与爱戴。

文史就像一杯浓郁芳香的琼浆玉液，始终滋养着我对于她的好奇与涉猎。有人曾经的对我说，你天天鼓捣那些枯燥的故纸堆，不显得单调吗？我的回答是，不但不显得单调，而且很有味道。只有你深入其中，才觉得原来文史是那样的滋养心性，陶冶情智，愉悦身心。抢救挖掘武清文史，给后人留下些许资料，即使是受点儿累，流点儿汗，我也无怨无悔。养性事天，修身立命是我的终生追求。

本书的编写，荷承本市史学家周利成、武清籍收藏家侯福志及陈景山等文史专家鼎力襄助，提供尤多史料珍贵、文笔清新、韵味浓郁之力作。同时，也包括作者本人多年来搜集、淘寻古书所得，或见诸报端，或作收藏玩味，亦可作为补遗史实之憾。

这里特别感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韩胜军先生为本书书写了书名，感谢为本书

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 ，感谢文史专家王毅先生为本书书写了热情中肯的序言，他们的善举是一项对文化事业有益的阳光工程。

武清有历史记载达两千多年，举凡与文史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或记闻见杂事，或叙往昔郊游，或忆社会百态，或录人物轶闻，均在作者收录之内，这或许对丰富武清文史起到一点作用，也不枉费笔者一片心机。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排论次必多不当，尚祈求文史界专家及读者不吝赐教。

乙未初夏于育德草堂

# 地方文化淘宝的孜孜行者

王 毅

在今年区政协期间，接到汉东君的书稿，命我作序。熟识的文友，汉东君在我的印象中精明不失豪爽，率性兼具诙谐，人称谓“怪才”。“才”自然是身具才艺；“怪”则是他非攻一门，涉猎颇广。他喜爱文学，在乡镇任职也缚不住手脚，不时有散文、传记、轶文一类作品问世，我所见的他的散文集《儿时梦影》即证明了他与文学相恋的童贞；他博闻强记，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与行动能力，喜欢那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奇闻轶事，喜欢收集名人字画，凡有线索，无论上京下卫，往返奔波，不辞辛苦，所以能为常人所不能、道常人所不知，2011—2012年他先后出版了《英才风采》和《梨园名伶武清人》两部书，挖掘某些资料之珍贵，令圈内文友刮目相看；他还有一副颇具磁性的好嗓音，加之头脑灵活，说唱俱佳，是个不错的主持人材料，而且他还有仿学带地方口音领导人讲话的“一绝”，惟妙惟肖，常令人忍俊不禁，博得喝彩。

汉东君近年写作重点似乎有偏向于方史和风俗的趋势，手中的《武清人不能不知道》书稿可见一斑。书中内容既有武清人的耳熟能详，如杨村的糕干万全堂、河西务的九窖十八缸、兰城的

墓碑鲜于璜、九桥十八庙在崔黄……人物如城关李瑞东、下伍旗的柳世平等，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兼而有之；也有鲜有所闻的奇闻轶事，特别是自明、清以来传世作品中关涉武清的描写也多搜罗其中，如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情史》、清代的《施公案》、《孽海花》、《永庆升平》等，这或者是更具发现意义与文史价值的东西，从中可以窥见汉东君对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心底的一种责任与焦虑。“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银烛照红妆”，用心良苦，其志可嘉。

面对资讯发达眼花缭乱的世界，徜徉其间“淘宝”且乐此不疲确实不易。汉东君最近五年间大概出了四部书，创作不可谓不丰。人们向他祝贺，他总是自谦地称为是“哄自个儿玩儿”，但这埋没不了他的勤奋。无疑，他是在地方文化“淘宝”中的一位孜孜以求的苦行者。

资讯的发达在带来丰富与便捷的同时也难免泥沙俱下。所以，一是参阅一些材料时应注意披沙见金，圆睁慧眼；二是有些观点及选材该注时则应注明出处，或可避免不必要的口舌之殃。

书成，谨此致贺。

二 一五年二月一日 于一品轩